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一九四三—一九四四)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十四册

(一九四三——一九四四)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十四册

(一九四三——一九四四)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21印张 403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册

ISBN 7-5035-0493-5/D·254

定价：16.00元

编 辑 说 明

一、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公开出版建国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公开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内部本的基础上编辑的，各册篇目都有所增加，并广泛收集了每个文件的各种版本，经考证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刊印。

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著作，凡已编入他们的选集或专题文集的，在编入本选集时，只列目录，未印正文。

三、本选集编入的文献，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或资料的原貌刊印；对于其中文字错漏等的订正，一律用符号标出，错字改正用〔 〕，漏字填补用〈 〉，衍字改正用[]；辨认不清的字以□代，缺字以△代；标点不全或无标点的；加了标点并加注说明。

四、编入本选集文献的标题，一般均照原题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而由编辑拟定、修改的，均加*以示区别。

607-69/14

2

五、对于某些文献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个别词句，也作了初步的考证，并加了若干注释，按顺序排于篇末。重复条目只在本册第一次出现时加注。

六、编入本选集的非正式中共中央文件及其他文件，除原作为附件的外，均作为附录按时间顺序排于卷后。

七、本选集使用国家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照排。

一九九〇年十月

目 录

一 九 四 三 年

- 中共中央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
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3)
- 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致陈毅、
饶漱石电)..... (5)
- 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和保存
干部给陈毅、饶漱石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 (7)
- 中央对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发表宣言
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9)
-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
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 (12)
- 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
-

指示

-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
彭德怀电)…………… (14)

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决定

-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17)

关于主动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

-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朱德、
王稼祥、叶剑英致各战略区域电)…………… (20)

军委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

-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 (21)

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 方针的决定

-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24)

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

-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刘少奇致华中局，
陈毅、张云逸电)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 (28)

毛泽东、朱德为感谢印度医疗队援华致印 度国民大会信

-
-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34)
- 中央书记处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
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36)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
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38)
-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42)
- 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
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43)
-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通过)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领导
方法的若干问题》)
- 对国民党现状的分析和关于我党今后的工
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44)
- 中央书记处关于冀鲁边区工作给山东分局
等的指示
-

-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 (46)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
宣言
(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 (48)
- 军委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的情
况通报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62)
- 朱总司令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68)
- 朱总司令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
(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 (69)
- 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 (71)
- 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
事准备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73)
- 中央总学委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
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 (74)
- 毛泽东：质问国民党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 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
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79)
- 关于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刘少奇致陈毅,
饶漱石电)…………… (80)
- 关于敌后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致彭德
怀电)…………… (82)
- 周恩来: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 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对
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85)
- 对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形势的分
析和关于党的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各中央
局、中央分局并吕正操、李先念、黄敬电)…… (87)
-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89)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

- 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97)
- 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 (102)
- 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103)
- 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 (107)
- 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招待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 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111)
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 (112)
- 中央书记处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 (136)
-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下敌后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

- 彭德怀致邓小平电)…………… (138)
- 关于在反特斗争中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
杀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
康生致华中局等电)…………… (140)
- 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
义》一文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42)
- 一 九 四 四 年**
- 中共中央向敌后军民致贺电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 (147)
- 中央书记处关于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
应讨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 (150)
- 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
原则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 (156)
- 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
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157)
- 中央书记处关于东江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

-
- 政权问题给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161)
- 军委、总政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163)
- 中央关于检查拥政爱民及拥军优抗工作的
指示
(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 (170)
-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北局减租指示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 (173)
- 中央宣传部关于延安一般机关学校政治教
育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二月)..... (175)
- 中央政治局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 (178)
- 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
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
会演说词)..... (180)
- 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群众生产问题给华中
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 (190)
-

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国内问题宣传政策的
通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192)

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关于学习谭政《关于
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日)…………… (194)

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谭政在西北局
高干会上的报告)…………… (195)

学习与时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
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四年四月任弼时在边区高干会
上的讲演)
(见《任弼时选集》)

中央书记处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
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 (231)

中央关于发动与争取基本群众的方针给华
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233)

-
- 中央关于改订华中财税政策给饶漱石、张云逸、曾山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235)
- 总政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 (237)
- 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243)
- 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致辞、
问题与答复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253)
- 关于华中部队准备向河南发展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陈毅
致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电)…………… (259)
- 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261)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抗战七周年纪
念口号
(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 (268)
- 中央关于五师工作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
彬、陈少敏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 (272)
-

- 附：关于五师工作和向河南发展等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郑位三、李先念、任质
彬、陈少敏致张云逸、饶漱石、曾山并刘少
奇、陈毅电）……………（273）
- 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美英
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275）
- 附：晋察冀分局关于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
问题的请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277）
-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
冯白驹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279）
- 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致李先念、
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
冀察晋分局、晋西北电）……………（282）
- 中央关于收集研究全国经济情报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285）
- 中央关于争取教民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288）
- 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289）

- 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293)
- 中央关于布置湘粤两省工作和桂林疏散给
董必武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295)
- 中央关于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林
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297)
- 请各地扼要答复十项重大问题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李先
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
华、林枫电)…………… (299)
- 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和组织水手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
陈毅致华中局电)…………… (302)
- 中央关于克服财政困难和生产自救问题给
鄂豫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303)
-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306)
-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 (314)

中央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319）
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321）
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322）
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 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323）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325）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336）
附：国共谈判双方来往文件	
一、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341）
二、国民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343）
三、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致中共中 央代表林祖涵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	（345）
四、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致国民政府代表王 世杰、张治中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	（347）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353)

**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
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357)

如何解决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周恩来讲演)…………… (359)

毛泽东：蒋介石演说具有危险性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评蒋介石在
双十节的演说》

**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再致国民政府代表
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 (372)

**军委关于准备对付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给
邓小平、滕代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377)

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379)

**军委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问题给郑位三、
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382)

- 中央关于四师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 (384)
- 军委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386)
- 中央关于发展广东游击战争等问题给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388)
-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 中央关于巩固津浦路以西地区并向水东发展给张云逸、饶漱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 (391)
- 南下的方针与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任弼时在南下第一支队出发前的干部会上的讲话)
(见《任弼时选集》)
- 延安协定草案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393)

-
- 附：一、赫尔利致毛泽东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394）
- 二、赫尔利带来之五条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395）
- 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397）
- 中央关于东江、琼崖工作给林平的指示 -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399）
- 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给晋察冀分局
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400）
- 中央关于华中军事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404）
- 附：一、华中局给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
子恢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405）
- 二、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部署向中央的
报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409）
-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
来致王若飞电）……………（412）
-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
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 (414)

中央关于五师财经工作的指示

-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426)

关于扩大解放区的指示

-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致
程子华电)…………… (430)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

-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431)

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

-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
致罗荣桓、黎玉电)…………… (435)

附 录

一 九 四 三 年

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439)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 (444)

论共产国际底解散

-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社论)…………… (448)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453)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社论)…… (458)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

——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465)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476)

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为党的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

(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解放日报》)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

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

反对内战通电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 (488)

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解放日报》社论)…… (494)

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500)

-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
（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解放日报》）……………（504）
- 论时局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时评）…（540）
- 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547）
- 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552）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
社论）……………（559）
- 国民党与民族主义
——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566）
- 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577）

一 九 四 四 年

- 敌后军民的道路——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583）

-
-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一九四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暨
一九四四年工作基本方针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西北局委员会
通过）……………（588）
- 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
（载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解放日报》）……………（595）
-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
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602）
- 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纪念抗战七周年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社论）……………（630）
- 评此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社论）……………（636）
- 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
（载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
日报》）……………（641）
-

一九四三年

中共中央关于征调敌后 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 保留培养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抗战五年半以来，我们的党和军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巩固；创造了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坚持了极端残酷的敌后斗争；形成了今天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这些辉煌光荣的事业中，我们的党政军民全体干部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我们必须有最大的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延保留与学习。在敌后发展的顶点，早经过去；由于根据地和军队的继续减缩，我们的干部，在数量上亦允许从现在工作中抽调一部出来。而部分的干部，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身体条件亦有不适于继续敌后工作者，因此中央特有如下决定：

(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

(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着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的选

送质量好的干部。

(三)选送的干部，军队中应该是营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地方应该是县〈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山东及华中因为交通更困难，故选送干部的质量，应更好些。

(四)老弱伤病及妇女工〔干〕部，不宜在敌后而必须送来延安者，其条件可酌予变更，但必须解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来延后多数干部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自给自足的生产工作，以便共同努力渡过难关。

(五)专门家及优良技术干部，亦应酌量情形尽多送来延安保留培养，和更有效地发挥其特长。

(六)送来的干部应该是政治上纯洁的；如有个别政治上有问题而必须送来延安者，则应将其政治问题及你们的意见详告我们。

(七)各地抽调干部的数量与来延路线均由北方局和集总及华中局和军部负责进行之。

(八)为保证干部来延的安全，应保持高度秘密与审慎，以防遭受不应有损失。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关于新四军 行动总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

毛泽东致陈毅、饶漱石电)

陈、饶：

来电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

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四十余师，包围德军二十二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三十一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

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少奇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 泽 东

一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 华中敌后斗争和保存干部 给陈毅、饶漱石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

陈、饶：

四日电悉。(一)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荫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二)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其他路线则可经刘晓送西安转延,或经北京、章德⁽¹⁾、开封转延,交通建立办法另告。但人数不能太多,并须可靠的能在敌区国民党区行走的干部才可以。

(三)在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以免在敌后损失，但须估计他们的身体是难于长途行军的。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章德，系彰德之误。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

中央对晋察冀边区第一届 参议会发表宣言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晋察冀分局：

(甲)二十九年发布之施政纲领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并且直至现在还是适用的。目前不但不应发布和旧纲领并无多大区别的新纲领，而且不应对旧纲领条文有所修改，致影响旧纲领在群众中的威信。此次参议会可发一宣言，此宣言由参议会中共产党员发起，邀党外人士联署向参议会提出通过然后发表。宣言中拥护二十九年之施政纲领，同时对二十九年纲领中未包括之事项加以叙述。

(乙)你们所提新纲领草案中有些提得不适当的地方，指出如下：

一、目前晋察冀边区形势的特点是边区极大部分地区日益游击化，根据地日益缩小，处境日益困难，而严重的困难则还在今后，因此除说明有利形势外，应将此点补充进去。而对基本根据地区与已经变为游击区之地区，我们的政策应有不同的提法。

二、应着重提出调整边区各阶级关系，以巩固边区党政军民及各阶层间的团结。

三、应着重提出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便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军民公私必须积极协力发展生产，发展贸易，以开财源，以裕民生。

四、在冀中冀东等广大的游击区中，不仅汉奸之依照法定手续处理，严格的法制制度之建立，财政税收之严格统一与正规化等，均难实行，即对于敌伪政权，敌伪组织及敌伪之各种设施，必要时亦不得不采取两面政策应付，因此虽应对之分别进行瓦解、分化、争取、打击或相机抵制，却难一律摧毁或坚决反对，在纲领中应同时照顾这些情况。

五、在环境日益困难，游击区日益扩大的条件下，应争取先机，积极缩编，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和训练，并由政府和主力军尽量供给民兵以武器弹药，方能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及游击队打击敌人的蚕食政策与扫荡，以达缩小敌区扩大或保持我区之目的，不必提出实施志愿义务兵役制问题，因实际上今天很困难实行，反可给敌利用来欺骗群众。

六、在目前边区斗争条件下，不仅要教育民众尊敬爱护与帮助军队，更应教育部队爱护尊敬并帮助老百姓，使军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这点在今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有重要意义。

七、有些过高而难实现的办法不应提出，如允许战

后实行薪俸制及减轻人民负担等，这在将来是无把握的。

八、关于保障人权中之逮捕拘讯处罚问题，在今天敌后斗争形势下，除第六条所规定者外，应加上在敌人扫荡时及游击区等特殊情形之下，经政府授权者不在此例的意思。

（丙）以上所指各点，在你们起草参议会宣言时望加以注意。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 联防军政治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1〕}

由于延安与华北华中的联系更加困难，陕甘宁及晋西北两个边区更加重要，特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直接管辖上述两个边区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兼任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委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兼联防军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撤消，并入联防军政治部，委方强同志为三八五旅及陇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委伍晋南同志为—二〇师三五八旅及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委张平化同志为—二〇师及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甘泗淇同志不在晋西北时代理—二〇师及军区政治部主任。

另以总政治部一部搬至杨家岭王稼祥同志附近，组织很精小的总政〈治〉部，统管全军政治工作。

中 共 中 央

一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 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德怀同志：

你十二月十八日电最近才看到，兹复于下：

(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和国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

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上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四月起学了八个月，今年三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准备以今年一年审查完毕。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的深刻的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澈底。过去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

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下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为这两件事必须进行各种对外对内的严重斗争。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最近中美中英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美英放弃了在华的特权。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党部凡在战争环境许可下，均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美中英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均须循此目标前进。并向全国人民说明下列各点：

(一)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历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残暴，中国民族中败类白西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抵抗主义者、直到汪精卫等等卖国求荣的无耻；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解放斗争，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红军运动直至现在的民族大抗战。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斗争。

(二)中国殖民地化过程与民族解放过程的斗争，到了“七七”抗战以后，已进入到决定胜负与决定中国最后命运的阶段。百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斗争涌出了领导这个斗争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七七”抗战的发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坚持，全国军民的卓绝奋斗，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英美苏(苏联还远在十月革命后即发表声明书，声明废弃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后又签订孙文越飞协定，更于一九二四年正式签订条约，完全取消中俄间不平等条约，完全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使中英美间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

(三)中国今后命运是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决定。抗战已五年有半了，今后困难尚多，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巩固国内团结，反对民族败类——汪精卫及其他无耻汉奸，揭露日汪间一切奴役中国、出卖中国的协定，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

(四)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我党中央在去年七七宣言中已指出战后中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事实证明了：当国内团结，国共合作时，

中国是充满着光明与希望的，当分裂内战时，人家便来欺负，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上一次国共合作，曾经收复了汉口、九江租界，这一次国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是保证中国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

（五）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便投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孙中山先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变革命方法，采取发动群众的路线，实行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共产党在大革命时代始终尽了急先锋的作用，后虽不幸破裂，被迫退入农村，继续民族解放的斗争，但自“九一八”后，共产党又不断提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与恢复国共合作，特别是“七七”抗战后，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举国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伟大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的地位，担任最艰苦的职务，转战敌后五年有半，抗击在华日军恰好一半，前仆后继，未尝稍懈。共产党不仅是为抗战胜利而坚决斗争，并且还要在战后独立、自由、民主、与国际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同样也站在最前线。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关于主动加强 统战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朱德、
王稼祥、叶剑英致各战略区域电)

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毛 朱 王 叶

且虞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军委关于部队干部 实行交流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1〕

各战略单位：

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建议：

(一) 我军所处环境，交通不便，上下隔阂，各地情况特殊，很不一致，因此干部太流动是不容易熟识情况，有碍于正确领导，但干部太固定，亦使干部进步停滞，上下隔阂，故在适当程度内(如政治部之科员科长，司令部之参谋与科长等等)实行干部交流之必要。即：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这样既可以从工作中更好的来培养干部，又可以沟通情况，密切领导与加强部队的工作和战斗力。

(二) 上面与下面的交流：长〔常〕在领导机关之干部，特别是新知识分子干部，应使之到部队里去做一个时期的下层实际工作。而在部队中做了相当时期工作之干部，则应吸收到领导机关参加一时期的工作，这对于这种干部本身与领导机关都是有好处的。就这种干部本身来说，可以使他们扩展眼界，能总结经验，得些较全

面的知识。就领导机关来说，能经常反映下面新的情况，与下面的实际有更好的连系。现总政与联防政治部，已实行此种交流，作为一种干部制度与工作制度。暂规定总政每次与一二零师及原留守兵团部队交流四人：团级二人，一老一新。营级二人，一新一老。交流期每半年或一年一次。前方各部队亦可根据具体情况，实行此种干部交流制度。

(三) 前方与后方的交流：这里又包含两种不同的交流，即：

1. 原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应吸收一部分由华北与华中抽调回延的干部到部队里去，增强实际作战的能力，原在该部队的干部，则抽调一些到军校学习。

2. 前方各部队亦有自己的后方，应将在此种后方机关工作的干部（如参谋、宣传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工作人员），与经常处在战斗前线上的干部，酌量实行必要的交流。

(四) 军队与地方的交流：这对于军队与地方都有好处，就军队来说，可以更好了解地方情况，与地方关系弄得更好些，可以学些地方工作作风，补助部队工作作风不足之处，就地方来说，可以使其工作更能适应战争环境与军队关系弄得更好些，也可以学些军队作风，补助地方工作作风不足之处。此事，各部队可提到当地党领导机关商定实施办法。

(五) 此外，部队政治工作者，可能时应以一部分

转到军事工作岗位上去，但其他专门工作与技术人员，则不适用交流办法。上述各种交流主要是指一般政治性质的工作干部，而军事干部的交流则只限于军事工作本身（如这个部队交流到那个部队，参谋、军事教育者与指挥员等交流）。

（六）实行上述各种交流不管是长期的与短期的，都应把自己最好的干部调出来，反对本位主义，借交流之名，以坏干部换好干部，或者只要人家交流，而自己则一毛不拔，应识大体顾全局，对本位主义的应严加纠正。

军 委

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此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 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五年余以来，我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与敌伪作艰苦的斗争，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主要是依靠着八路军新四军与广大的人民，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妇女工作是有成绩的。可是由于我们在妇女工作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缺乏深入下层、埋头苦干、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建设对于坚持抗战、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没有把经济工作看为妇女最适宜的工作，没有把握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及家务牵累、生理的限制与生活的困难，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妇女能做什么、必需做什么，就根据主观的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规定计划，成立团体，要妇女经常出来开会，对她们作不必要的动员，浪费她们一些人力物力，致使工作一般化，组织形式化，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

这种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倾向，是使妇女工作停滞不能更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

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要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为实现上述的方针，各地妇女工作作风、方式、方法，须有澈底的转变。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妇女群众的生活、需要、情绪，顾及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选择中心地区开展工作，逐渐影响邻近地区，以至推动全局。因此：（一）各地妇委妇救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深入村庄，教育帮助与解决农村妇女参加生产战线中的困难，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妇女工作的尺度；（二）农村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煮饭、能喂猪、能理家……应按照各地具体情形来作计划，但她们的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她们家庭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不可能妇女孤立

的去做，不要重复过去某些地区只从形式上、数字上标榜妇女开了多少荒、建立妇女林等没有实际内容的缺点，要动员妇女实实在在参加到广大群众的生产中去；（三）根据妇女群众的需要进行组织，纠正过去有名无实的组织方式，以生产合作社及各种方式（如纺织小组等）去组织她们，这些组织应成为妇救或妇联的基本组织，而不是办一些有名无实的空团体、空机关；（四）尽量减少对农村妇女群众不必要的动员，减少开会，爱惜她们的人力物力，使她们有更大力量从事生产；（五）妨碍身体健康致影响生产的，如小脚及不注意卫生等，应当鼓励妇女改革之；（六）对于妇女文化的政治的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歌唱的小调等；（七）妇女干部要消除轻视经济、生产工作的错误观点，必须了解，生产不仅是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妇女工作者要密切与巩固和农村群众的联系，只有从深入农村中去组织妇女生产、解决其生产困难、增加其经济利益着手。要做到此点，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国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国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今年纪念“三八”节的方针，就是动员妇女积极参加

生产工作，各地应按具体情形，规定详细办法。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 整风运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

自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下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二十二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他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一九四三

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风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已经作成此种计划并在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七十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拖着很长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尾巴，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对于上述新老两类同志（目前着手是对于干部），给予深刻的整风锻炼，借以纠正其错误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关节，坚定其阶级立场与党的立场，改造其工作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正确，或对马列主义武器掌握得较好的同志，则借整风增进他们的修养，可以使他们更趋于进步与发展。因此，凡以为整风是专整下级，不整上级；或专整上级，不整下级；或专整新干部，不整老干部；或专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或专整别人，

不整自己；或专整自己，不整别人，都是错误的。

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各地内奸的严重程度虽然不一致，也不是说每个支部都一定有内奸，但就各个地区说来，可以断定，此种情况是无例外地存在着。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因此，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

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表露各种正确的意见，发扬正气纠正缺点。第二，在于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以便根据其表现而给予具体的与明确的纠正，使他们在自己经验中认识自己矛盾着的思想，因而便利于克服错误思想，转变为好同志。否则毫无生气的，平平常常的学习，必不能有多大的效益。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使领导机关与广大干部逐渐识别他们。对于内奸分子，凡非军事紧急时机，紧急地点与紧要环节，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做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澈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至于任何同志的正确意见，更要虚心倾听，绝对不能抑制。

在采取这种政策后，在第一阶段中，一方面正确意见会生长表露，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说怪话、反领导、乃至反党等各种不正确的现象，也会发生。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要使错误思想多多暴露。这一阶段是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强调四三决定上要求注重领导一方面，着重发扬正确意见，缩小

民主范围，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但须注意这种克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克服，而不是武断的命令主义的克服，不要伤害每一个还可挽救的同志。在这一阶段内，仍然不要提内奸问题。到了第三阶段，是学习党风的阶段，这是学习深入时期，此时大家都接触了实践问题(党风)，又有了思想武器，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开展最热烈的阶段。此时除学完党风文件外，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于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作用。在第三阶段中，还应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与改善工作。

这样，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五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做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五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这样，一年以内(除去战争及其他繁忙任务所占时间)可以大体上结束整风学习，而把全部完成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任务，推至以后的时间。延安部分机关学校，一九四三年四月才结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这些机关学校，从一九四二年冬季才开始着手审查干部，一九四三年四月，才正式审查干部。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

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但对内奸问题若过于仓卒处理，势必不能澈底，且易发生毛病。内奸的可怕是我们的不自觉，只要我们一旦自觉，内奸就不可怕了。有军队与政权在手，且有内战时期肃反经验的党，是有充分可能把内奸肃清的。故各地在一九四三年冬季以前，必须着重与深入整风，决不可放过整风的伟大思想斗争。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关于处理内奸问题，中央准备尔后再向各地作具体指示。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毛泽东、朱德为感谢 印度医疗队援华 致印度国民大会信*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印度国民大会诸先生：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这个医〈疗〉队五人均在八路军工作，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医疗队五人中除已先后返印的三人外，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际，我们希望印华两大民族团结得更加坚固，以便与其他一切反法西斯国家配合作战，借以达到打倒法西斯，解放一切被法西斯压迫的人民，同时即借以解

放印华两大民族，获得两大民族的独立。

谨致
热烈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何时打败 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

(一)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这是情况变化宣传必须随之变化的实例。

(二)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关于此点，中宣部过去宣传要点曾有解释，去秋以来的《解放日报》亦已改变论调。

(三)但有个别根据地上的领导同志至今还不了解此

种意义，不但不去作正当解释，反而机械的继续宣传今年打败日本的口号，以至引起人们怀疑，提出询问；仍然不知道如何解释，屡电中央询问。这是不知道宣传应随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原故。

（四）今年英美是否开辟二条战线，或苏联是否能于今年独立打败希特勒，此时都还不能断定。苏联现在已提出准备决战口号，红军实力已极大增加，故今年打败希特勒有极大的可能性，但也有要待明年才能打败的可能性。如果今年能打败德国，则明年自有可能打败日本，否则还要推迟时间。各地宣传，在目前几个月内不要去强调打败日本的时间，等到欧洲形势充分明朗时，中央及《解放日报》自有指示。

（五）对于过去口号，在疑问者多需要公开解释地方则公开解释之，仅有个别同志询问者则个别答复之，无疑问地方则不作解释。

（六）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如胜利早临，我们并不吃亏，如胜利延迟，我们早有精神准备及工作准备。

中央书记处

五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
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

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一九三七年以来的六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与群众动员，借以达到澈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的来到。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

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

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末，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定能够完成的。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 翻译工作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指定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同志组织一翻译校阅委员会，由凯丰同志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及译完西方史两册，以应急需。希望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各同志把这一工作当作对党最负责并必须按时完成的业务之一部分。

中 共 中 央

一九四三年五月廿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 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根据目前国内外情势，抗战六周年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因此除中央将有宣言发表外，各战略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下列各同志均请作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贺龙、林枫〔枫〕、朱瑞、罗荣桓、陈毅、姚〔饶〕漱石，各同志之文章题目由新华社另行通知，一般的文长不要超过五千字，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文章望于六月廿日前经新华社电台发总社，经中央审定后统一广播发布。

中央书记处

五月卅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对国民党现状的分析和关于我党今后的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德怀同志：

(一)有电悉，同意对太南处置办法。

(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

(三)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

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 泽 东

六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冀鲁边区 工作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

山东分局朱、罗、黎^[1]并告北方局：

冀鲁边形势严重，已成为完全的游击区域；必须善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密切与群众联系，隐蔽自己的力量，澈底改变过去的一套工作[作]作法与组织形式，才能适应该区的艰苦斗争，有下列提议望考虑执行：

(一)关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及游击区的群众工作经验与具体作法，冀中、冀南的经验对该区极有帮助，分局、北局应经常将此种经验介绍给他们，给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二)该区脱离生产人员太多，望考虑在不妨碍坚持的条件下，将军队之一部分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减轻敌人注意和减少人民负担。

(三)军、政、党在组织上应实行完全一元化，除可以隐蔽的地方干部外，其他负责干部应随军行动。统一党、政、军、民的领导，不必再保留各个机构的架子，多余的及当地难于隐蔽的干部，亦可有计划的撤出。

（四）该区内有汉奸与国特的活动，希注意，我们已得有一些材料，即分别电告。

书记处

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朱、罗、黎，指朱瑞、罗荣桓、黎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

我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对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了，当此抗战六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愿向我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发表自己的意见。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六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现在是处在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这就是：

第一、苏英美三国的团结，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加巩固了，法西斯侵略国想用和平诡计离间苏英美团结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这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具有历史意义与最值得庆幸的。

第二、苏英美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战，将在今后一年中展开起来。这个决战，本来在过去一年中就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英美未能实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所以推迟了一年。目前则是在苏英美三国第一个联合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在苏英美三国的陆军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的时候，苏联从东线英美从西线举行第二个第三个更伟大的联合作战，给予德意法西斯以最后决定性的打击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只要欧洲大陆上能够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则在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一年中已经建立了打败德意法西斯的一切先决条件，今后的一年就将是一个决战的年头了。

第三、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有些中国人不希望同盟国先打败希特勒，或者是因为头脑不清醒，或者是因为不愿意希特勒法西

斯制度归于失败，也就是不愿意日本法西斯失败，否则是不能解释的。

第四、太平洋上的形势，也因美国力量的增强，英美联军的几次作战胜利与中国的坚持作战，而转变为对同盟国有利，对日本法西斯不利。美国力量还在猛烈的增长着，日本法西斯虽然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日本法西斯对于美国在一年中制造飞机十二万五千架，坦克十二万辆，大小军舰二千艘与船舶二千万吨的生产计划，表示极大的恐慌，正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法西斯侵略国方面，则有如下的显著的变化：

第一，是法西斯侵略国已经陷入国际上完全孤立的地位。过去一年中，由于苏英美三国对于德意匪军的第一个胜利的联合打击，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于日寇的威胁与中英美三国在太平洋上及中国战场上对于日本匪军的打击与合围，使得所有这些法西斯国家均感到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施行和平诡计，企图离间英美与苏联的神圣的同盟关系，妄想有一方能够和他们订立苟且的和平，以便他们先击破另一方，达到挽救他们自己，并整个灭亡全世界的目的。但是，此种诡计已经遭到英美与苏联一致的坚决的打击，于是不论德意法西斯，或日本法西斯，就均只剩下“无条件投降”一条死路了。法西斯国家又企图拉拢现在尚未加入战争的各中立国家。但是某些被希特勒们原来希望拉入侵略集团的中立国，

现在看见侵略国大势已去，不愿加入了。某些原来倾向同盟国，但因畏惧侵略国的攻势而表现犹疑与动摇的中立国，现在也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这种犹疑与动摇。和平诡计既已破产，拉拢中立国的阴谋又不成功，这样就使一切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第二，是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团结亦已发生危机。在反侵略同盟国的军事胜利与外交胜利的打击下，就使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不和生长起来，并已造成了危机。这个危机，不但生长在德意两国之间，也不但生长在德国与其各附庸国之间，而且也生长在德日两国之间。由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与外交失败，希特勒维系意大利、日本及各附庸国的威信已经突然下降。意大利内部正在生长着一种要求退出战争的力量。日本内部的极端亲德派亦已受到其他派别的排挤，只要希特勒再遭遇一二个如同斯大林格勒与北非那样的打击，日本统治阵营内的任何派别都将不敢再依靠希特勒，不敢再依靠法西斯同盟了。到了这种时候，法西斯侵略同盟不但在其外部处于完全的孤立地位，即在其内部亦将处于各个孤立的地位。这种对于日本法西斯在国际上陷入完全孤立地位的威胁，使得日本法西斯匪首东条在过去一年中，不得不向中国沦陷区及南洋各占领地的民族叛徒们提出了一种所谓“新政策”的无耻诡计，给这些叛徒们挂上“独立”的假面具，以壮自己的声势，并妄想欺骗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匪首东条的所谓“新政策”，不是任

何什么有利于日本法西斯的情况的反映，而仅仅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

第三，过去一年反法西斯同盟的伟大胜利，又造成了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军事危机。不管希特勒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再一次向苏联进攻的冒险计划，也不管日本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向苏联进攻或向其他方面进攻的冒险计划，但是“大势已去”的感觉是笼罩着一切法西斯的军队与人民，总的主动权是已经落入同盟国之手而离开了侵略国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了。成为战争基础的物质力量，例如人力资源，军备资源与生活资源，同盟国方面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极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对于侵略国，已经占了优势；加上今后一年的动员，毫无疑义，同盟国将占到压倒的优势。而在侵略国方面，则德意的资源已经变到接近枯竭的阶段，日本在生产上亦快要达到他的顶点，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一切侵略国的严重的军事危机。

第四，一切法西斯侵略国，由于他们的国际孤立，内部不和，军事危机这样许多的因素，再因为他们的残酷的惨无人道的统治，就造成了在他们国内与在他们占领区内的政治危机。一切侵略国家，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裂口，正象火山的裂口一样，一天一天的扩大起来，酝酿着巨大的爆炸。这是一支从法西斯脚底下轰掉法西斯的大军，其爆炸的时间，必然在法西

斯的内外危机达到其顶点的时候，突然地轰发开来。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一九一八年德奥帝国主义所处的情境，就会相信这一点。我们也只要看一看过去一年中国沦陷区的民心与日寇军队的兵心曾经发生何等样的变化，就可以推断，这样继续下去，日寇的政治危机的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了，日寇的本国人民是一座火山，日寇所统治的中国人民，南洋各地人民，朝鲜人民与台湾人民，又是许多的火山，只要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在内）给予日寇几个严重的军事打击，这些火山是会爆发起来的。

同胞们！将士们！中国抗战已经六年了，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在抗战第六年中，我们遇到了同盟国与侵略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变到于我们及同盟国极端有利，于侵略国极端不利的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毫无疑义，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敌人与实现解放还须给出绝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胜利与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是反对法西斯同盟的一员，处在

现在这样极端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呢？我们是一个农业国，比不上工业的先进国，但是我们有广土众民的优点，我们的人民又是富于斗争的坚忍性的，六年的抗战就是明显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算是很好地配合苏英美各同盟国的作战，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呢？六年抗战中我们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经验，求得比较过去更多的成绩，借以克服现有的许多困难，并在将来对敌反攻时准备好我们的力量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

应该加强作战。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在日寇

与汪逆的阴谋勾引之下，最近数年中，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叛卖祖国者，竟达三十三人之多，未闻政府通令讨伐，由是伪军突增，日汪所谓“新政策”的欺骗，得以到处宣传，肆无忌惮，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处置，以振军心而利抗战。为了加强作战，兵役制度的改革是急不容缓的。现行兵役制度中存在着的许多严重缺点，例如捉人、捆绑、购买与完全缺乏政治动员等，极大地妨碍着动员广大人民上前线的要求，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迅速加以改革。

应该加强团结。我们现在不来详说过去数年中以及最近时期中在中国抗日阵线内部曾经发生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冲突、妨碍、限制等等不良现象，而只希望政府能够于今后改革这些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是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支持政府抗战的，为了克服今后抗战中的更大困难与准备配合同盟国实行对敌反攻起见，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

应该改良政治。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政治应该如何改良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曾经发表过许多次的意见了，现在来说这个问题，也还是和过去一样，认为唯一

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日本侵华军队总共不过三十几个师团，何以我们以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还不能战胜它或取得更大的胜利呢？难道工业不发达是唯一的理由吗？不是唯一的理由，也不是主要的理由，而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因而没有发动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中国和苏英美各国不同的，苏英美各国是抗战时间愈长久，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愈增长，中国则反之，大部分地方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了完全不应该的打击与限制，大大低落了，抗战第一、二年中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的四年中逐渐看不见了。这种政治上壅蔽抑塞的情形，如不实行必要的改革，则其对于抗战的妨碍将是不可计量的。这种情形，就产生国内各阶级间，各党派间，各民族间的许多不和睦现象，而抗战是极端需要这种和睦的。我们希望政府能于抗战第七年中，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较之现状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

应该发展生产。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说过多次了。现在经济的严重困难已经发生，如果没有适合时宜的改革，要应付今后愈加困难的抗战与准备有力的反攻将是不可能的。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

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全国工人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而应该改革的事情是很多的，我们现在只指出上述四项，以供政府的采择。至于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本党在去年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中已经明白申述，并已获得各界同胞的赞成，这里就不多说了。

抗战愈益接近胜利，困难将愈益严重，这就愈益加重了政府与人民的责任，也愈益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上作战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责任是超越寻常的加重了。

在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敌后人民的艰苦奋斗是史无前例的。侵华敌军的半数是由他们之手抗击了六年，并且还要继续抗击下去，直至驱逐敌军出中国。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但凭自己的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广大的土地，建立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实行了奖励生产同

时又保护工人的劳动政策，实行了鼓励人民爱国心与发扬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因此引起了日寇与汪逆汉奸群的深仇大恨，誓死要消灭他们。残酷的“扫荡”，阴险的蚕食，堡垒如林，沟墙遍地，“三光政策”与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无止息的推行，“剿共委员会”的普遍设立，都是为了要消灭他们的。敌后战场上的斗争是如此的残酷，大后方同胞或尚有不明此种情形者。

共产党员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们！敌后的男女同胞们！加强你们的团结，团结得如象一个人一样罢！残酷的战争只会把你们锻炼得特别勇敢，特别坚强，敌人要想把你们屈服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护军队的政策，澈底地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目的。

更好地将敌后战场上的一切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配合作战组织起来，加强对于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技术训练、战术训练与政治工作训练，加紧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反蚕食斗争。使一切军事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学会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把反“扫荡”反蚕食的艺术提到更高级的程度上来。你们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能手，你们在六年爱国战争中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全国人民都是关心你们

与寄托极大希望于你们的，因此你们要更加努力提高你们的军事艺术与政治工作艺术，以便配合正面战场上的作战，驱逐敌人出中国。

十分注意争取日军的士兵与伪军，协同日本共产党进行破坏敌伪军的工作，使这个工作极大地加强起来。组织日本工农学校，发展日人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发展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及抗日团体，使这一切力量变成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强有力的友军。

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反对贪污浪费，惩治懒惰分子，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一切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

共产党员还要虚心学习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理论。继续整风学习运动，发展自我批评，坚决地、澈底地、毫不客气与毫不容情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任何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工作，不应该放松你们的学习，你们应该在艰苦的长期的

战争中学出超人的本领来。

敌人总是每时每刻地、千方百计地想要从你们的外部与内部破坏你们、消灭你们的，你们要十倍、百倍、千倍地提高你们的警觉性，你们要学会同敌人特务机关作斗争的一切新办法。

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机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们的忠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

根据。当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到决定胜负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军委关于 蒋介石进攻边区的 军事部署的情况通报*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总部、一二九师、一二〇师、聂军区、一一五师、新四军：

(一)去年十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后，形势似稍有好转。但不久，蒋介石即令朱绍良、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三月蒋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自己公开出面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可说是进攻的思想准备。四月甘肃民变规模日趋扩大，至五月，竟占二十三县，人数至数万之多，当时蒋估计我方或将支持民变，彼即借口向我进攻。但我方依据团结抗战方针，对任何反政府民变都不干涉，边区留守部队，谨守自己的防地，不给彼方以任何借口。但彼方挑拨性的言论及以挑衅为目的的军事布置仍然非常积极。五月共产国际解散，蒋胡均认为此乃对共党镇服良机。六月，蒋允许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安，但不给以任何具体意见（周、林现尚在重庆至西安途中），其用意似在周、林回延，我党中央正讨论如何改进国共关系问题时，彼即发动闪击战式的军事行动，

逼迫我党接受彼方提出交出军队取消边区之条件（这些条件现尚未正式提出，但已在报纸上宣传），因彼方已熟知我党一贯方针是为团结抗战而努力，竭力避免一切足以引起两党磨擦与两党破裂之事件发生，彼方或以为在此种情况下，有将我党压服之可能，故乘周、林回延时机，急速抽调河防部队追入边区附近，并下令边区南线各军限七月八日准备完毕，待令攻击，故边区形势现已极度紧张。至于日寇东条实行勾结中国抗战阵营叛变而不甚强调反蒋的新政策以来，蒋与日寇密使（吴开先等）经常接洽，是否与此次进攻边区之准备有联系，亦值得严重注意。此外西安国民党方面则传出下列消息：半月内苏德大决战将爆发，日本将闪击苏联，集中目标于先打击苏联，再对付英美等语，蒋、胡向我进攻之准备如此急迫，或亦与此有关。兹将五六两月及最近数日内胡宗南军事进攻准备的具体情况列举于下：

（1）令五十三师由韩城河防开洛川，接替暂骑二师防务，暂骑二师限五月十七日到耀县集结，业已接防完毕。

（2）一六七师由大荔河防开郃县^{〔1〕}，已于五月十三日到达。

（3）赶运粮弹补充宜川、洛川、中部^{〔2〕}、宜君一带之部队运输络绎不绝。

（4）令所属修补工事，并令调查边区地形、工事、粮食、交通情形。

（5）令潼关河防之第一师，赤水（临潼属）之第七十

八师准备交防行动。

(6)令现驻甘肃之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亦作进攻边区准备。

(7)令炮二旅在淳化成立第二指挥所，王曲之装甲兵二团(战车坦克七十余)装油待动。

(8)七分校教导总队刘钊铭已集结两个团，由岐山开赤水一带，接替第七十八师防务。

(9)一六五师与六一师的武器均已全部换成新品。

(10)令胡公冕、侯声赴延安视察边区情形。

(11)五月二十日傅作义电胡宗南商讨夹击边区，并谓应不怕破裂和牵动国家大计。胡复电极表赞同。

(12)胡得息〔悉〕第三国际解散消息，突加紧张，对封锁线部队重新部署，进攻边区部署均已完成。

(13)五月二十三日电蒋呈报对我作战计划，共分三期：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以陶峙岳、范汉杰分任总司令，完成攻防准备，确实封锁。第二期除河防部队外，加强关中兵团，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继第二期之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收复马栏、关中、陇东全部。并请中央派空军及令二战区协助，惟因甘南民变胡系调去了五个师兵力影响其第二期计划实施甚大(以上均系五月情形)。

(14)自六月初迄今边区形势更形紧张。六月四日胡令各部：现系军事紧张时期，部队随时有移动，兵仗不得缺额，否则以贻误论罪。

(15) 驻宜川之九十军长李文令工兵连开洛川，归五十三师指挥，修筑交河口桥梁。并令辎重连大车二十辆开洛川，协助五十三师运输。

(16) 暂骑二师六月十日已接替一六五师耀县防务。新二十七师由富平庄里镇开到洛川附近。并令暂二十五师、新二十七师、五十三师、暂骑二师、陕保指挥部等防务，统向右延伸，全部已于六月十日延伸完毕。

(17) 六月十八日胡宗南随同陶峙岳，李文及六十一师师长邓钟梅，暂二十五师长刘英，新三十七师师长徐保等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并召集新二十七师、五十三师官长训话。

(18) 六月十八日胡之副参谋长李昆岗电三十六军（三十六军在甘南进攻民变）或另有任务，希努力进剿。

(19) 六月十八日，李文批准第一野战医院开洛川，九十军对我军之作战计划亦于是日携至洛川交胡。

(20) 六月二十八日胡令第八师（袁璞）限六月三十日开陕北同官^{〔3〕}待命作战，令驻赤水之七十八师即开郃县。第一师驻朝邑之一个团开东泉店。

(21) 六月三十日，胡令九十军之二十八师，即刻秘密由韩城开赴中部集结待命。七月二日又令改开洛河（洛川南）集结。该师八十三及八十四两个团七月二日晨已出发；八十二团及师直七月三日晨出发，七月六日可全部到达。

(22) 七十八师原令开宝鸡之一个团改开郃县。

(23)第八师于二十九日全部到达同官山地，该师留商县剿匪之二十四团第三营亦拟调回参战。

(24)十六军炮兵团第一营，已于六月二十八日由郃阳⁽⁴⁾开耀县。

(25)重炮三团三营，六月二十八日已撤出河防阵地，三十日已向西行动。

(26)西安办事处三十日亦有电告：胡对边区之军事部署，忽趋紧张，对闪击陕北空气，由军队的紧张准备军官干训团及党政当局之议论，以及于社会，此种情形比过去为迫急。此种布置恐出自蒋及国民党估计日本半月即将攻苏借机进攻边区等语。

(27)七月二日陶峙岳令各军限七月八日准备完毕，听候胡手令动作。

总的说，胡进攻边区之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部队的动员，粮弹的准备，均已完成，只须待命进攻，胡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置于边区周围，这是历来所未有。从此点看，蒋是否与日本有何谅解，值得注意。此外辎重部队的配属，兵站的开设，通讯线路的调整（非必须线路的撤收，新线路的增设），部队非必须品的后运，战前教育实施，都表示进攻准备已经完成，可以随时作战，这些都是历来所未有的。

军 委

午支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 [1] 郿县，旧县名。今陕西省彬县。
- [2] 中部，旧县名。今陕西省黄陵县。
- [3] 同官，旧县名。今陕西省铜川市。
- [4] 郿阳，旧县名。今陕西省合阳县。

朱总司令为呼吁团结 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西安胡副长官宗南兄勋鉴：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边区留守部队，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吾兄前派胡侯二兄来延参观，备致赞美。嗣接尊电，拟再派侯兄驻延联络，德等当即表示欢迎。不料近日形势大变，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

朱 德

午支

根据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刊印

朱总司令为呼吁团结 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

(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

万万火急，重庆蒋委员长，参谋部何总长，军令部徐部长钧鉴：

自五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职部进迫，职部均一再退避；所有经过情形，均经呈报，并电胡副长官宗南制止在案。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慨自抗战以来，职军奉命改编，驰赴战场作战，六年于兹，虽毫无补给，而未尝稍懈。陕甘宁边区为职军唯一之后方，少数留守部队，亦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陈周徐郭诸联络参谋，久驻延安，以及胡副长官派来胡侯二联络参谋等，实所目睹，备致赞美。詎意近日形势突变，南线友军已作发动内战之积极准备。沿固原、平凉、长武、邠县、栒邑^{〔1〕}、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洛川、宜川之线，除原有封锁部队十余师外，近复由河防阵地调动增加之

兵力不下六七个师，声言大举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边区军民闻此意外事变，莫不奔走相告，骇异莫名。窃思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除电胡副长官呼吁团结外，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叩

午鱼

根据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梅邑，旧县名。今陕西省旬邑县。

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决定 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四)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

广大动员。

中央书记处

午齐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关于对付国民党 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 军事准备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德怀同志：

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邠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攻击。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毛泽东

午佳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总学委关于 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 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

为了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积极的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继续加紧的清除奸细，中央总学委有以下的通知：

(一)将中共七七宣言、朱总司令通电、托匪汉奸张涤非假造民意的消息⁽¹⁾、解放报七月九号社论、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文件（可以参考其他文件，如解放报七月六号刘少奇同志的文章和八号王稼祥同志的文章），在各机关、学校、部队、民众团体的广大群众中，展开热烈深刻的讨论。讨论时间，一般的规定为一星期。讨论方法，可以采取群众大会、军人大会、支部大会、干部会、小组会、大座谈会、小座谈会、漫谈会、作报告、上课、集体阅读、集体问答、自由辩论、个人研究、学习晚会等各种方式，根据具体环境、具体对象灵活运用。

(二)在讨论文件中，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

反特务斗争上，提高干部与群众的阶级觉悟。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与非无产、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号召全体党员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的批评、纠正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与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如果战争真正爆发，估计一部分幼稚动摇的党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发生逃跑叛变的行为，因此目前更要加紧进行教育，指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各种对我之有利条件，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各种不利条件，以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同时指出我们也有各种困难及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以坚定其战斗的决心。

（三）在进行干部与群众的教育中，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利用这次国民党正要进攻边区的时机，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目前特别应注意下列工作：

（甲）从思想上去瓦解敌人。拿国民党撤退河防进行

内战的具体行动，拿国民党三十三个将级军官的投敌叛国的具体事实，与欢迎日寇奸细吴开先到重庆并仍作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具体例子，打破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实质上是日寇的第五纵队，号召他们不要再为日寇第五纵队服务。告诉他们国民党区域内民情隔阂，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等具体事实，打破他们认为“国民党尚可依靠”的心理。说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救国的功绩，实行民主自由、丰衣足食的事实，与他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他们晓得不应破坏与不可战胜的道理。号召他们在此紧急时机赶快出来坦白自新，党的宽大政策是开着门的，但如果甘为第五纵队服务，观望等待，企图进行阴谋破坏工作，则将以军事时期的严厉办法处理之。

(乙)加紧反特务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各机关、学校、保卫部门的同志应写反特务斗争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号召自首分子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充当日寇第五纵队的实质，反对国特破坏抗战团结、挑拨内战、杀害青年、破坏共产党、八路军与边区的罪恶，号召全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

(丙)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别工作，将精密细心调查研究的个别解决，与有准备的坦白大会、劝说运动结合起来。加紧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有计划的教育干部，达到百分之十的干部学会反奸工作。

(丁)各保卫部门应继续加紧审讯工作，在监狱中进

行反省运动与控诉运动。

（戊）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九条方针（见《防奸经验》第六期），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四）加强警戒工作，严格的执行枪支登记制度与各机关学校的警卫制度。各机关学校应立刻建立有名有实的自卫军，澈底检查过去机关自卫军的工作，纠正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徒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一切办法，使自卫军真正成为保卫自己警戒敌人的组织，并适当的进行军事教育。

（五）改造机关党的支部组织，使各机关学校的首长（特殊者例外）兼任党的组织负责人，使党、政、学的工作一元化。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指1943年7月6日新华社以《特务机关破坏团结假造民意竟敢提出“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为题作的两则新闻报导。原文是：

（一）〔新华社西安六日电〕确息，六月十二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座谈会，张涤非主席，宣布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事打击中共之必要，并提议打电报给毛泽东。张特务头子当

从衣袋内取出其预制之电文，内容首述第一次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次述第三国际解散为加强盟国团结，中共应解散以加强中国的团结。到会者慑于特务威风，不敢说话。当由张涤非说道，此稿应即送有关各机关签名，五天内不答复者即为默认，有增删意见者可以注明，以便最后修改拍出。此次伪造民意会议，共开十分钟。被邀者三十余团体，但到会者只有九人，其中有秦风日报、华北新闻、工商报、三青团读者导报、图书审查会各一人。此外有李翼燕、王季高、李菴等人，则均系CC特务头子。

(二)〔新华社重庆六日电〕此间国民党机关中央通讯社于七七纪念前夕，发表了一个破坏团结的新闻，该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电文已于六日发出。

7月8日，《解放日报》刊载时，加了编者按：西安特务机关所制造的“民意”，和日本法西斯匪首东条及中国大汉奸汪精卫之主张如出一辙，均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毫无区别。一个堂堂当权政党之官方通讯社竟发出此种类似敌人与汉奸口吻之宣传，实属可怪已极。日本人及汪精卫还有要求“取消八路军”一条，西安特务劳动营尚未提出，或曰：此项尚稍有所待云。

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印发 《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1〕}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中央宣传部

午马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评〈中国之命运〉》，见本册附录。

关于打破 对国民党的幻想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刘少奇致陈毅、饶漱石电)

陈饶：

元电悉。

(一) 恩来、林彪诸同志已回延安，在重庆与蒋关于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结果。蒋在三月间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作准备，最近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宣传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大军于边区附近，企图压迫我党作城下之盟。但进攻的危险尚未完全过去。

(二) 数年来，由于蒋介石顽固派在大后方实行极端反动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使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及与人民的矛盾大大发展，现在大后方是民不聊生、民变蜂起，而国民党对之毫无改善的根本办法。如此下去，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力量只有继续削弱崩溃。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在将来组

织有力的对日反攻，实大成问题。而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

（三）在上述情形下，我们应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与三民主义的方针下，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且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和提高我党的威信。最近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等文章，你们应广为散发，并在党内外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并借此在党内加紧阶级教育。

（四）你们除开召集民众大会发出反对内战拥护共产党与陕甘宁边区通电外，对于顽固派的武装进攻，仍应照过去的方针，准备坚决的武装自卫。在盛家桥、黄姑滩的敌人撤退后，你们应准备在这里打击桂军对于你们的进攻。

刘少奇

廿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关于敌后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德怀同志：

(一)周林⁽¹⁾返延，七大准备开会，请你及罗薄聂吕⁽²⁾来延参加大会，希预为布置。太行太岳北岳各区须重选代表若干，中央另有通知。

(二)敌后整风有进步，可于七月九日北局关于整风经验及关于思想意识二文见之(已交广播)。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

(三)审查干部之方针为：

- 一、首长负责；
- 二、自己动手；
- 三、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 四、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 五、调查研究；
- 六、分清是非轻重；
- 七、争取失足者；

八、培养干部；

九、教育群众。

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其详另有说明。

（四）蒋胡进攻边区计划，被我及时揭破，见我有备，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五）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澈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六）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

一、对敌斗争；

二、整顿三风；

三、精兵简政；

四、统一领导；

五、拥政爱民；

六、发展生产；

七、审查干部；

八、阶级教育。

(在陕甘宁边区对敌斗争改称军事教育作为第八项)。

(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八)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此电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几个区党委负责同志。

毛泽东

午卅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周林，指周恩来、林彪。

〔2〕罗薄聂吕，指罗瑞卿、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

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一、目前边区周围局势暂较缓和，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已告一段落，保卫边区与审查干部的工作虽仍须继续进行不懈，但趁此时机利用活生生的事实与群众中已经激发的感情，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应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澈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澈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

和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而为达此目的，三朝两口，轻描淡写，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济事的。因此，中央总学委决定自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

二、规定在此期间以学习以下五个文件为中心：

(一)“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二)“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

(三)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

(四)王稼祥同志《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五)刘少奇同志“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

并参考《解放日报》七月一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七月十二日社论《质问国民党》，七月二十七日社论《论时局》，及其他有关的文章。

三、为使这一学习能够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规定八月五日至十五日浏览阶段，八月十六日以后再进入讨论阶段。中央总学委决定在浏览阶段结束，讨论阶段开始前召集一次会议，反映浏览情况，研究讨论方法，望各单位学习领导机关注意准备意见。

中央总学委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

对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吕正操、李先念、黄敬电)

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的进行不声不响的对于我军的军事进攻；对于日军及伪军则采取消极态度，同时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的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卅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廿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卅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

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文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程度，降敌者日益增多。英美两国舆论对于国民党抗战不力与政治黑暗日益不满。国内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和我们同样受压迫，同情我党的倾向在增长中。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

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澈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澈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例，对于这些部门，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学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的（逮捕审讯）约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

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妨〔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须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乃是广大的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

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地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澈底收效，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调查研究，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之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搜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

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

争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查出二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都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的，许多人且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

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形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豫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至八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二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了]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为将来准备了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好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在此次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

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分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反动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地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针与经验，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并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创造你们自己的经验。

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参杂着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他部门及其他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或地方，便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 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一)秋收已到，各根据地须责成各级党政检查减租政策实行情形。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澈底的，必须于今年澈底减租。党部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及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造出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在报上发表社论及减租运动的模范消息。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与政府的法令是领导与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自动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产生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及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现在根据地已缩小，我党在根据地上细心地认真地澈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共生死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实施程度，并实行澈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

运动。

(二)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军群众与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党部、政府及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有关明年全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及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苏区称耕田队或互助社），吴满有运动（农业劳动英雄），赵占魁运动（工业劳动英雄），黄立德运动（机关学校种菜英雄），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工，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手工制造及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手工业（禁止做生意）的个人业余生产，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及为着改善伙食的大司父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均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

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家庭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注重节省开支的保守的单纯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与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以为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及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及个人业余生产，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民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吴满有生产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放粪）推行于各地，而说吴满有方法不应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及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

观点是错误的。而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与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原则下，把一切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与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与方法。今年的全部一律澈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公私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实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与日用品，准备与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民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及民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与拥军的运动中，澈底检查军队方面与党政民方面自己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与拥军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

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批评自己，而不批评对方），而澈底改正之。

（四）此指示主要地说明今年减租、明年生产及明春举行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性。其他各项政策，迭有指示，现不重述。但应知道：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但是只要全党同志认真地实行了十大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我们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难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

中央总学委关于 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

《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根据 1943 年 10 月 22 日《解放日报》刊印

中央宣传部关于 进行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一) 《解放日报》与新华社自十月五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与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后，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战虽暂告一段落，但各地的阶级教育（即十大政策中的时事教育），仍应毫不放松地有系统地进行之。在阶级教育中一般应达到如下目的：

(1) 在事实方面，暴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特务机关之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是残酷的剥削压迫与进攻，对敌伪是消极观战勾勾搭搭。其结果是：势必使许多部队走到投降（举庞孙等为例），将这些事实与共产党忠于人民的政策对照起来。

(2) 在思想方面，说明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之荒谬反动，严格区别蒋介石主义与孙中山主义，区别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今天我们在对外宣传上仍应强调孙中山的进步性（即在此种宣传中亦不允许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混同起来，新三

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在纲领上虽基本相同，但其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但在对内教育上，则应清算孙中山的历史与思想，打破知识分子及某些党的干部对孙中山之不合事实的幻想。应该在所有新党员新干部（包括非党干部）中进行澈底的人生观教育，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个人主义的、以及所谓超阶级的人生观，与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马列主义的人生观严格对立起来，不允许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含糊。

（3）在前途方面，说明世界前途与中国前途都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法西斯反共分子特务机关的。这种前途不是渺茫的前途，而是显然可见的前途。在群众中间，要继续宣传我们是坚决反对内战的，但是如果内战起来，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下，一定仍然能够取得抗战与革命的胜利，灭亡的只有反动派。“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口号在今天是不适用了的。在干部中间更应指出：今天的形势是在我党历史上空前有利的，根本区别于大革命时期与内战时期。世界形势不同（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的革命高潮，苏联的无比强大与不孤立），中国形势不同（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对日战争仍在继续，同盟国反对中国内战并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处于：对敌伪、对友帮、对中共、对人民、对内部的五大矛盾中，国民党在各种困难中的削弱），我党力量不同（有几十万武装与许多根据[〔]地，有了大革命、内战与抗战三个历史时期的经验，特别是有了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因此,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为了进行这一教育,应采取干部会议、小组讨论、群众大会、文字宣传、戏剧宣传、音乐、绘画种种方法。一切机关、部队与学校(从党、政、军的干部学校、训练班,直到中、小学、冬学、夜学、识字班),均应无例外地进行,但应根据对象分别采取不同内容与方法。在干部中,应配合整风与审查干部工作进行之,用号召思想坦白,暴露错误思想,粉碎反动思想武装的方法,达到帮助坦白运动与审查干部之目的。在人民中则应配〈合〉减租斗争与防奸斗争进行之。同时并应利用种种可能将我们的宣传与宣传品传播到伪军与顽军中去。

(二)在上述方针之下,各地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特别是宣传机关,应立即着手用大力准备在今年的十月革命节,进行普遍盛大热烈的纪念,用报纸、传单、标语、图画、音乐、戏剧及干部会议、群众大会、群众游行、民兵、自卫军检阅等方式,庆祝红军的伟大胜利,庆祝法西斯主义的溃败,庆祝世界与中国的光明前途,宣传人民大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要在干部与人民中极大的提高对于革命事业的胜利信心(但在宣传的文电中不必骂国民党)。宣传内容本部即以党播陆续播出。

中央宣传部

西马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指本书所列目录中的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 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澈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个真理已为各根据地的无数事实所证实。因此各根据地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问题，

看成是有普遍原则性的，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无论是在前方后方，也无论已否参加实际工作，都应该找到适当和充分的时间，召集一定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联系各地区各个人的实际，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地方与部队中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普遍负责领导所属范围内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学习运动，并检讨本身过去对文艺工作的自由主义或认识不足等缺点。须知只有经过这个学习与批评，才能使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与艺术家成为可能，而这种革命文艺与革命艺术家的产生，对于根据地人民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又须知在今天的文艺战线上，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其他战线一样，不但存在着保持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分子，而且还混有若干为敌人反动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他们过去利用我们的尊重文化人（这是对的）与若干同志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是错的），散布思想毒素，进行反对人民的破坏革命队伍与革命文艺队伍的纯洁性的活动；不经过认真的学习运动并使这些分子觉悟，则文艺事业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巩固都将遇到困难。

（三）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

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其已发展者则应加强指导，使其逐渐提高。各根据地有演出与战争完全无关的大型话剧和宣传封建秩序的旧剧者，这是一种错误，除确为专门研究工作的需要者外，应该停止或改造其内容。报纸是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大的益处。那种轻视新闻工作，或对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由于过去许多根据地的文艺运动都曾不适当地强调提高，故在执行这两项工作或其他任何工作中，目前的方针都应该特别着重普及方面，如戏剧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指导地方与部队的群众剧团或群众戏剧活动，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在这一方面，专门化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刻觉悟到过去对这个任务的不认识或认识不足，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今后应以十分的热情与恒心来开始这个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工农（首先是工农干部，八路军与工厂工人）的学习条件较好，更应以大力有系统地进行之。

(四)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中央总学委对此已有明确指示。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受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在他们中间尤须深入地宣传这个文件。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

根据 1943 年 11 月 8 日《解放日报》刊印

中央总学委关于 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 机会主义》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选录在这里的季米特洛夫、曼努意斯基等同志的几段文章，其总的精神就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这些文章虽然多数还是一九三五年写的，较近的也是一九三九年的，除了少数几段之外，也不是专为中国而写，但其反机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则至今仍完全适用于中国，值得每个同志深切注意。季米特洛夫等同志在这里用马列主义的革命立场解决了统一战线是积极政策而非消极政策，统一战线与投降主义的严格区别，统一战线下右倾的增长与反右倾的必要，团结中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民族战争与民主民生的密切联系，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确路线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中央都曾从同样的革命立场达到同样的正确结论，但也曾有些同志从相反的立场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一面可以帮助同志们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

新民主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一面也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那些机会主义的错误怎样绝对背离了马列主义，怎样绝对背离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从而加以澈底的克服。因在整风学习中有吸收国际经验之必要，故选录此种文件以供研究。

书中的小标题和旁点，都是我们加的。

中央总学委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附：

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

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积极政策

季米特洛夫论不可忘却布尔塞维克的积极精神

同志们！我们在报告内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内故意抛开关于革命前途的响亮话。可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理由象从前那样乐观来估计革命发展的速度，而是因为想叫我们的党不要去倾心于革命空谈或徒然争论前途的估计而忘却布尔塞维克的积极精神。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听其自然的立场，我们并不是以旁观者的资格，而是以积极参加人的资格来观察和估计革命发展的过程。我们的党是一个干革命事业的党，我们在每个运动阶段上执行适合于革命利益及适合于当时具体环境的任务，精明估计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程度，这也就最能替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造

成必要的主观条件。……

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们，离开此地回国之后，务必传布一种坚固的信念，确信我们共产党员对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命运，对本国人民的命运，对整个劳动人民的命运，负有责任。

世界是工人造成的；世界是我们工人的世界，而不是社会寄生虫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现在的统治者，不过是暂时的人物。

无产阶级，却是人类世界真正的明天的主人翁。它应当行使自己的历史职权，在每一国，在全世界，取得管理的机关。（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七次大会闭幕词》，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一六三——一六四页）

曼努意斯基论七次大会策略立场的 实质是革命的积极政策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策略立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无产阶级……必须实行革命的积极政策。……革命的积极政策，便是削弱资产阶级阵地的政策，便是破坏其帝国主义的各种设施的政策，破坏其进攻苏联的准备，破坏其向工人阶级的进攻，破坏把资产阶级专政变为法西斯化的企图，同时这一政策，又是巩固无产阶级阵地的政策。资产阶级对内对外的侵略，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上面现在十分紧张的表现出来。在反对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当中，无产阶级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以反对最凶恶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务须把主要的火力去反对目前战争的挑拨者与罪魁的那些国家。在这些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各国内部各派资产阶级互相间的矛盾，但是应当以革命的精

神来利用这些矛盾，切不可反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切不可减弱无产阶级自己的阵地。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当在那些决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及社会革命的各种社会派别、阶级及民族中，扩大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战线。过去有些劳动阶层，因为受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影响，曾经动摇到反动方面去，并保证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现在由于无产阶级这种重要的政策，及其对于事变进程之积极的参加，毫无疑问的，将会使这些劳动阶层重新回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所有这一切，便要求共产党适当地改变方针。……正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派的政策之破产，共产党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同时对于工人运动命运的责任，现在都放在共产党员的身上。共产党不能只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团体，应当成为在各国国内以及全世界的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因素；共产党应该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政策，消灭由于社会民主党政策所引起的无产阶级失败的不良影响；共产党应使无产阶级走出孤立的地位；在群众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中，共产党应当使群众得到显而易见的实际胜利；应当准备条件，使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获得最后胜利。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无希望与无前途的立场，共产党应当针锋相对的提出斗争与胜利的实际前途，以提高工人阶级对于本身力量的自信心，并使工人阶级在觉悟上深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当权人物，只是暂时的人物，而世界真正的主人翁，则为无产阶级。第七次大会决议的实质，正在于此。（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三八——一四〇页）

反对对统一战线作投降主义的曲解

有些人以为我们集中火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因而就要减弱我们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论据，恰好等于有人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因而就减弱群众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恨。如果不加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那末，究竟能否顺利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呢？不能够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日益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形式。不是人道的、民主的资本主义，而是野蛮的、反动的资本主义，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用主要的火力去反对法西斯主义，能不能顺利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呢？不能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最反动的、最抱极端国家主义的与最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分子之公开的和凶恶的专政形式。我们推翻这些分子的政权，也就是击破整个资产阶级的阵地，因为资产阶级与财政资本的最反动的、最抱极端国家主义的与最具有帝国主义性的分子有不可分离的阶级体系。

统一战线决不取消对反动势力的批评

有些人以为我们提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缔结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就是修正了列宁对于社会民主党作用的论断——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主要的社会支柱；同时也就是放弃了斯大林的论述——法西斯与社会民主党并非互相对立的，而是同胞兄弟。真的这样么？若是德国与奥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而是与法西斯主义互相对立的，那末，法西斯主义无论在德国或在奥国，都不能取得政权。如果不再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支柱，而成为与法西斯主义相

对立的，那末，这就是说不会有系统的对法西斯主义让步和投降了，而是与它斗争了，而且当法西斯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就不去打击共产党，反而与共产党缔结战斗的同盟以反对法西斯主义了。然而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阶级合作的一切政策，为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都证明了下述立论是正确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同胞弟兄。社会民主党之与资产阶级同盟的一切政策，促成群众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失望，便利于法西斯运动的顺利发展，这又证实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即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正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胞弟兄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所以它使中欧工人群众遭受失败，并促进法西斯的反动向全世界进攻。正因为对法西斯主义实行有系统的退却的政策，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使自己处在被追逐和被侦缉的地位；也因为这一政策，使社会民主党的千百万工人及其团体，现在均被迫而处于非法的地位。因此，不仅德奥两国的工人阶级，而且资本主义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开始与社会民主党同胞弟兄的政策分裂，转而实行与法西斯主义互相对立的政策，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要求社会民主党不再成为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全世界上正在发展的统一战线运动就在这种意义上。

共产党员若是不估计到工人阶级中及社会民主党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动，若是不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帮助该党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群众走上与法西斯主义互相对立的战斗政策的道路，并使社会民主党不继续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而为其社会的支柱，那末，共产党员就不是革命家，而是空洞的学说家。正因为法西斯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数百年来对资本主义的一个仇恨的焦点，所以我们共产党员现在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工人阶级战斗

行动的总目标。我们这样去干，不但没有把我们反对别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放在次要的地位，反而由于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会促成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形式的颠覆。

社会民主党说道，共产国际这样去干，无论如何是改变了它以前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态度，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对者变成拥护者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么？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象社会民主党首领一样，未曾绝对地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从来不象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未曾绝对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统一战线决不赞成投降政策

社会民主党人说，共产党人既然宁肯要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愿有法西斯主义，因此，共产党人也赞成“小害”的政策了（编者注：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动理论，说一般的资产阶级统治害处总比法西斯主义小些，因此无产阶级可以向它投降）。是的，我们共产党人宁肯有“小害”，而不愿有大害。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此。我们所以揭露社会民主党的“小害”政策，因为这是贩卖资产阶级民主制和直接帮助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政策。试回忆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布吕宁政府——准备法西斯主义上台的政府——时期的立场吧。当时这个政府颁布了种种法令，如减少工资，剥夺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使维马尔共和国法西斯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借口“小害”政策，而拥护这种种法令。法国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对于法国的布吕宁——杜美格政府所采取的路线，是否也是如此的呢？不是的，他们在法国作了斗争，反对法国颁布这类法令，并且依靠统

战线的斗争推翻了杜美格的政府，使法国资产阶级遭受失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布吕宁结成同盟，反对共产党，但是法国社会党的工人及共产党人却彼此团结一致，以反对杜美格，——其不同之点，就在于此。（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四五——一五一页）

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季米特洛夫论统一战线下的右倾危险

共产党的统一、革命团结性和战斗决心，不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宝贵的资本，而且是整个工人阶级最宝贵的资本。我们是决心与社会民主党及其组织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同时，我们毫不调和地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思想和实际，因此我们也就要反对这种社会民主主义之侵入我们本身队伍里来的任何表现，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将来还要这样做。……

我们应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来铲除和消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的毒，同时我们应当尽量加紧防备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它的一切具体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统一战线广泛发展的过程中，右倾机会主义会跟着增长起来的。而且现在就已经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降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队伍中的作用以及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表示调和。切不要忘记：统一战线策略乃是用具体例子来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人，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政策是正确的与改良派政策是不正确的一种方法，而并不是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实际之调和。为要使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得到成效，就一定要在我们的队伍里经常反对降低共产党作用的倾向，反对合法主义的幻想，反对那些以为法西斯主义会自动消灭和统

一战线会自行实现的自发论和自流论，反对决定胜负时的任何动摇。（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报告》，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九一一——九五页）

共产党应当极坚决努力地消灭关门主义底一切残余，因为关门主义，在现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它妨碍共产党实行自己的真正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应当加强自己的警觉性，来对付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并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底一切具体表现。要知道，在广泛地应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右倾危险将会增长起来。为建立工人阶级底统一战线和统一行动而进行的斗争，要求具体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人，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政策底正确和改良派政策底不正确，要求每个共产党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去反对抹煞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中间原则上差别的一切倾向，反对削弱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反对不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资产阶级从事阶级合作的思想 和实际，反对以为社会主义可以用和平的合法的方法来实现，反对在消灭法西斯主义事业方面以及在实行统一战线方面的自流理论和自发思想，反对降低党底作用，反对在决定胜负行动时的丝毫动摇。（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案第六节）

曼努意斯基论右倾表现于取消反投降派的斗争

为了使法西斯侵略者遭受失败，现在需要什么呢？

第一，需要坚决的反对投降主义者，一直到完全揭破他们，孤立他们，以至于粉碎他们为止。投降主义者不仅是和资产阶级妥协的妥协者，而且是和最反动部分的资产阶级妥协的妥协者，是和法西斯主义妥协的妥协者。投降主义者是工人运动中

的法西斯走狗，他们为欺骗群众起见，戴上“和平主义”的假面具。社会民主党底反动首领，在一九三三年把德国民众引到法西斯专政屠刀下，而欺骗着群众，说他们是把群众从国内战争中挽救出来。……（曼努意斯基：《国际形势与反法西斯运动》，一九三九年在联共十八次大会报告，《新华日报》馆本三〇页）

在几个共产党中，在实现工人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策略时，发现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倾向，这种倾向是表现于抹煞反对投降主义分子的斗争，表现于把所谓民主国家底作用理想化，而掩盖这些国家底帝国主义性质。这种倾向之发现——尽管它还是在萌芽状态中，——就是说明有加紧反机会主义斗争之必要。（同上书，四九页）

统一战线不能没有斗争

季米特洛夫论以斗争求团结

如果以为对反动领袖采用忠告、规劝、祈祷的方法，就能达到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这是幼稚气的想法。如果一切主张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人不进行百折不回的斗争以反对公开的和隐藏的统一的仇敌，那就不能达到这种统一。

有时候社会党员底队伍中发现这样的声音，说共产党员对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领袖们底行为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批评，就使统一战线之建立发生困难。然而如果不坚决批评那些用尽一切方法来妨碍建立统一战线的人，试问是否能够达到统一战线的建立呢？如果我们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极重要的这种问题，不公开说出全部真理，那末我们成了什么工人运动的行动家呢？

并不是那种不说或掩饰工人运动队伍中反动领袖底有害行动的人会帮助工人阶级底统一事业。谁借口于似乎为着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底利益而不去反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仇敌，不去批评那种使工人运动屈服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谁就是对于工人阶级很坏的效劳者。

谁认为既然有了人民阵线，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进行斗争反对仇视工人阶级的理论和观点以保护工人运动底原则基础和根本利益，谁就是一个不好的为工人阶级统一和为反法西斯反战的人民阵线而斗争的战士。统一战线的事业并不会由于上述那种斗争而遭损害，它只能因此得到益处。而且这一种斗争，乃是真正开展和巩固反法西斯反战争（指侵略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编者）的人民统一战线底必要条件。

统一战线必是有原则的联合

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共产党员澈底地和坚持地为建立人民统一战线而斗争时，他们所进行的，并不是无原则的联合政策，而是有原则的政策。

当我们坚决地为保护民主权利与自由而反对反动势力与法西斯主义时，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者，以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底资格来进行的，而不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改良派的资格来进行的。当我们起来保护本国人民底民族利益、保护民族底独立与自由时，我们并不变成国家主义者，并不变成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而我们是以无产阶级革命者、以本民族的忠实子孙底资格来进行的。当我们起来保护宗教自由而反对法西斯压迫教徒时，我们并不放弃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解除了任何宗教迷信的人生观。

当共产党员实行反法西斯反战的人民阵线政策，去与劳动者其他的政党和组织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的仇敌，为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民主权利、为和平与自由进行斗争时，共产党员并不忘记用革命手段去推翻业已过时的资本主义和实现使工人阶级以及全人类得到解放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需的事情。

把实行人民阵线政策去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运动干部的理论水平，与精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底伟大学说——精习这种行动指南，把上述各项彼此正确配合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学好的，而且要日常的把这件事情教导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由于看到个别树木就看不见森林”，这是不可容许的。使实际与理论脱离，使目前迫切任务底执行与工人阶级将来的前途及斗争的目的彼此分开，这是不可容许的。不应忘记：人民阵线运动愈开展，运动底策略问题愈复杂，则对于局势以及对于斗争力量对比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愈加必要，愈加要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可靠指南针。（季米特洛夫：《国际无产阶级底统一乃是目前时局底最高使命》，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二〇五——二〇七页）

曼努意斯基论只有小资产阶级才幻想不要斗争

统一战线的实质，并不在于两党（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缔结某种形式的协定，在该协定有效期内，为划分工人运动的“势力范围”起见，两党暂行停止彼此相互间的斗争：这是你的势力范围，那是我的势力范围，谁也不妨碍谁，以便彼此相安过着邻友的生活，谁也不生气，谁也不得罪谁。只有小资产阶级看重其安逸太平生活的人，才能这样提出问题，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人，决不如此。协定及公约，都是辅助的事情，而统一战线的基

本事情，是要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人共同发动以反对资本——共同的敌人，而这种发动的前提，是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转到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没有阶级斗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一大批群众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及改良派工会之内，又因为这些群众尚为他们党的纪律和工会的纪律所约束，所以必须与这些团体缔结协定，以便应用统一战线去发动群众斗争，以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六一——一六二页）

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参加民族战争？

季米特洛夫论必须以独立立场

积极干预本国的外交与国防

现时，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在那些直接遭受侵略威胁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对于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本国国防事业，应有正确的态度，这正是一个极关重要的策略问题。无产阶级及全体劳动群众，应当注意这些问题，因为本国政府，对于危害和平的法西斯侵略者究竟采取什么外交政策，它的这一外交政策究竟是有利或妨碍集体安全制，本国政府究竟是袒护法西斯侵略者的走狗，抑是采取有效的取缔他们的办法以及本国政府究竟如何保障人民不至遭受战争的浩劫等；所有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绝对不是无关痛痒的。

不关心国防问题，让资产阶级政府任意操纵这些问题，是于和平事业丝毫无补的立场。当权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一向都是把国防问题当作他们独占的事业，当作他们“神圣不可侵犯”

的事情，显然不是偶然的。必须永远消灭资产阶级这样独占国防问题的现象。

对于这些问题，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政策。无产阶级政党，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应堕入资产阶级的立场，可是同时，它却应当以自己的政纲与要求，积极干预本国政府之外交政策与国防事业。

必须为政权军队民主化与工农切身利益而斗争

工人阶级乃是最积极反对法西斯侵略而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忠勇战士，它应当将本国国防问题，与扩大工农民主权利的要求，与拥护工农切身利益的要求，最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实行政治制度民主化，只有实行军队民主化，驱逐法西斯蒂及其他一切反动的军官，只有满足工农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然后方能加强民众反对法西斯蒂侵略和保卫国家的能力。工人阶级的代表，应当赞助那些足以阻挠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投降法西斯侵略者的行为；足以防止资产阶级政府叛卖本国人民独立自由利益的具体步骤。……

时至今日，工人阶级已经应当积极而独立参加解决战争或和平这样迫切的问题了。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与改良主义者不同，工人运动革命领袖之所以与反动领袖异趣，绝对不是因为改良主义者及反动领袖注意这些迫切问题，而我们革命者，却不注意这些问题；而是因为改良主义者对于这些问题，也如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总是完全拥护资本家的利益，而我们共产党人则拥护劳动群众的利益，拥护人民的利益。

这是一个灵活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采取这个策略，也就是具体运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一般策略的方针；在目前的

国际环境中，在法西斯侵略国具体存在的时候，这样灵活的策略，是异常必要的。（季米特洛夫：《为和平而奋斗的统一战线》，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一八〇——一八二页）

曼努意斯基论民族战争的三条件：

人民战争，民主民生，反对投降派

共产国际从同样具体的立场出发以对付各国的作用，关于保护弱小民族及弱国（这些国家的独立性大受法西斯侵略之威胁）的问题，共产国际就通过了非常重要的决议。若是借口说弱小民族及帝国主义强盗的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将它们混为一谈，那是不正确的。因此，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曾宣布受帝国主义大国侵略的弱小民族及弱国，有“保护民族独立的权利”。大会以全力指明，这类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而在这种场合，共产党人的责任，便在于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与站在这种斗争的前线，而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帝国主义敌人的失败。可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第一，应当使民族独立的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如象中国苏维埃那样；应当武装全国人民，以使用雅各宾手段，用革命的办法来进行战争。

第二，为吸收全体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最广泛的与最有成效的革命自卫起见，共产党人应该以全力进行斗争，扩大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巩固工人、农民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以及争取少数民族真正与完全的平等。如果不完成这种条件，则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共产党人应该号召全体人民敏锐地警惕本国资产阶级，并组织劳动群众反对出卖祖国及人民的卖国贼。共产党人所

以应该揭穿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因为它进行战争，而是因为它进行战争不甚坚决又不甚努力，而且采用不适当的方法，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且害怕民众而与帝国主义敌人实行妥协。（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五五——一五六页）

爱尔科里论拥护民族战争

决不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

第六〔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底提纲内着重说明：参加和赞助民族解放战争，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赞助民族解放战争，并“和资产阶级暂时合作”。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因为实行这种暂时合作，就放弃阶级斗争，即是说，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合作当作改良主义的合作。况且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虽然在某个时候不得不用武力去保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可是一看见战争有变为人民战争的危险，看见工农群众象怒潮一般起来要求满足他们的阶级要求，它就总是想滚到敌人营垒中去。

因此，当我们拥护一切受帝国主义所侵略的弱小国家底民族自由，拥护一切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小国人民底进步的爱国天良时，我们是绝对不拥护资产阶级底反动政策的。我们拥护弱小民族独立的政策，只能如此。欧洲有些小国，象荷兰比利时这一类国家，它们的民族独立显然受到德国法西斯蒂侵略的武装干涉的战争底威胁。但同时，这些国家底资产阶级又压迫广大的殖民地。毫无疑问的，在这些国家内，我们拥护民族自由的政策和解放殖民地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实际斗争，是始终不能分开的。“自己要想做自由的民族，决不能奴役其他的民族”。我们根据马克思底这个指示，奋不顾身地为力谋在全世界澈底实行民族自

决原则而斗争，以此证明，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积极反对法西斯混世魔王的一个进步势力。（爱尔科里：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报告的结论，见《反对战争拥护和平》一一四——一一八页）

无产阶级是反法西斯反侵略的领导者

季米特洛夫论无产阶级的作用与责任

在创立反对法西斯侵略和掠夺的强有力的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国际无产阶级。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使得工人阶级成为这个战线的发起人、组织者、领导人。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伟大的力量。它的先进部队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战胜了沙皇制度与资本主义的黑暗势力，并建设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国际工人阶级热烈的关心着：最后粉碎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剥削与奴役的链子。它是法西斯主义与一切反动势力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是反对一切压迫、反对奴役他民族、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最坚决而最激底的战士。

工人阶级是代表它自己的民族的台柱。由于它在国家生产事业中所起的决定作用，由于它的数量、集中化与组织性，它是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最可靠的堡垒。

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唯一的阶级，武装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先进的科学，武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这个学说照耀着反对战争与法西斯力量、反对法西斯野蛮与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之路。

这一切都使得工人阶级负起历史的责任来。为了使得它能实现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组织人与领导人的作用，它需要认识它自己的力量，并善于利用这伟大的力

量来团结劳动群众。伟大的列宁的指示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说工人阶级首先要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粉碎那些以为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没有资产阶级来决定人民的命运，人民就不能过下去的可恶成见。工人阶级需要深切地觉悟到：必需坚决倡导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捷克的出卖和慕尼黑的阴谋，再一次地确切地指示出：工人阶级不能放任帝国主义当局与金融巨头，在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防问题上，无监督地一意孤行。事实向工人阶级有力地指出：要负起决定这些问题的任务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应该由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来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把人民群众仅仅看作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益的名义之下，把人民投入战争的深渊。而他们又想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头脑为所欲为地来支配人民，但是工人阶级热烈关心着，不把自己的命运、自己国家的命运，交给统治阶级的手里去决定。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已经了解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中除了工人阶级外，没有另一种力量能够负担起反对外国法西斯主义侵略的领导作用，和能够负起忠实的、坚定的、坚持到底的作用。

以帝国主义派的上层分子为首的统治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是以他们贪欲无厌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在历史上有无数例子，证明这些阶级为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财产特权，而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外国的奴役者。慕尼黑的谈判，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新而显著的例子。

工人阶级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并且也不能有其他的利益。这是从资产阶级国家内工人阶级本身的地位中所产生出来的。法西斯强盗对于国家、对于人民

的任何打击，首先就是对于劳动群众、对于工人阶级的打击。捷克例子就有力地证明出这一点。捷克资产阶级的投降分子，在把自己国家出卖给德国法西斯强盗，是起了不少的作用，他们迅速地就与自己国家最凶恶的敌人一鼻孔出气。法西斯的打击，是以全力来打击人民、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

从这里，我们就要随时得到教训。而共产党员要毫不厌倦地向群众、首先是向工人阶级，解释他们在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自己国家的事业中的作用和责任。（季米特洛夫：《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二六二——二六五页）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团结的中心

季米特洛夫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

在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因为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底变更，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在建立广大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首先注意到该国群众反帝斗争所处的特殊条件，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底程度，无产阶级在这种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

在中国，因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很大一部分领土上，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区域，组织了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强盗的进攻以及国民党实行无耻的卖国，中国伟大民族底生存，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瓜分中国的斗争中的统一中心，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统一和团结一切反帝势力，来进行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斗争。

因此，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及个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

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底这种提议，我敢代表本大会全体代表底意见，来以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底名义，向中国一切苏维埃，向中国革命人民，致热烈的兄弟的敬礼。（掌声雷动，全场起立）我们向在千百次战斗中锻炼过的中国的英勇红军，致热烈的兄弟的敬礼。（掌声雷动）同时我们很诚恳地向中国人民说：我们坚决拥护你们的英勇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决意帮助你们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的压迫，帮助你们谋得完全的解放。（掌声雷动，全场起立，高声欢呼，继续好几分钟，各国代表一致高呼欢迎口号）（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报告》，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七三——七四页）

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党员底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人民战线。为了这件事情，必须吸收极广大的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日益厉害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反对残酷压迫，为驱逐帝国主义者，为争取国家底独立而斗争；必须积极参加民族改良派所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必须努力在具体的反帝纲领上去与民族革命的组织 and 民族改良的组织实行共同的发动。

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的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

底解放斗争的团结的中心。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了自己解放斗争底利益起见，应当尽量拥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解放斗争。(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第五节)

曼努意斯基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解放和统一

中国苏维埃运动，直到现在还在主要的工业中心以外的区域发展，因而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上，苏维埃运动负有较重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竭力使苏维埃运动成为统一中国的政治中心，与领导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并在反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愿与决心捍卫祖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各派军队成立真正的合作。为建立这种广大的反帝战线起见，中国共产党向各政党各派军队提议在下述条件之下缔结共同的作战协定以反对侵略的帝国主义者：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实现政治上的自由，武装人民，组织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奴役者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反帝战线提出这样的政纲，并不是玩弄手腕。若是把保护本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事情来玩弄手腕，那简直是犯罪。可以同敌人玩弄手腕，但绝不可以对人民玩弄手腕，因为共产党人正是奋不顾身地保护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生命的。在各国，共产党人，亦只有共产党人才有权利代表人民说话，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朋友，因为只有他们用自己的命运及生命来做人民事业的代价，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末，以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即是最受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人民的子弟来说，那就更正确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事业及其民族解放的纲领，证明它深刻地了解中国苏维

埃对于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本国人民担负着伟大的政治责任，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担负着责任。只有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给以布尔塞维克的联系，只有这样勇敢地运用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战线，只有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参加作战的领导，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才能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求得中国的完整与统一……（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八八——一九〇页）

中国共产党为民族与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季米特洛夫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与反机会主义斗争

虽然有这样困难的环境和巨大牺牲，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不屈不挠地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由于它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武装起来了，维护党的统一有如生命，不害怕以布尔塞维克的态度来揭发自己的错误，在错误中学习并适时地改正这些错误，不允许在自己的队伍中混入着异己分子，把各种各色的投降者和阶级敌人的内奸驱逐出党。

但是，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党，因此它很明白了解，不管它现在已经达到了多么伟大的成绩，可是还只是走向中国人民解放的第一个严重的步骤。因此，它现在正用一切力量来解决现在阶段上自己的最严重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共产党成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锋，联合现在很分散

的中国人民的力量使中国不遭受分割和完全被奴役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尽力于停止内战及与国民党和一切政治派别一切武装力量合作来组织抵抗日本侵略的事业，正得到全世界中国人民之友的赞许、同情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作为目前条件下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其最凶恶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最好方法，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估计实际环境和确切提出适合于中国解放斗争现阶段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便利，在苏维埃区域政策上实行一些必要的改变，同时继续巩固苏维埃，因为苏维埃现时是国内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于自己所进行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一切力量的方针之坚定性与彻底性。……

党要依靠着民众的意志来有系统地为了与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任务，因为许多国民党的领袖和它的军事的政治的行动家一味仇恨共产党人，以致陷于日本的圈套，不去与共产党和红军一起反对日本强盗，反而将武装力量消耗于犯罪的“剿共”战争和军阀内战，共产党要动员全国的舆论，使一切真正的爱国者都拒绝这种亡国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要更巩固与工人、农民、一切劳动者和拥护民众利益的知识分子的联系，坚决出来拥护他们起码的权利和迫切的利益。在“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口号之下来动员他们进行斗争。

党要继续不倦的巩固红军，提高它的战斗力，因为红军愈加强大，就能更快的创立全国联军（抗日联军），就使中国人民更顺利的抵抗有新式武装的日本军阀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道路上还会遇到内部的困难。它要克服

关门主义分子的抵抗，这些分子不懂得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它同样要反对机会主义投降派；这些分子预备牺牲党与红军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把它们与其他的组织和其他的军队混合。中国共产党将光荣地、忠实地执行一切反日协定的义务，可是它不愿意盲目地相信同盟军和不愿走上投降的道路。

特别在现在环境之下，敌人在加倍努力侵入到共产党内来进行破坏党并妨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时候，中国布尔塞维克完全懂得克服这些困难的基本条件是巩固自己的党，巩固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九三六年，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一九〇——一九三页）

曼努意斯基论在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第二个支部，在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支部，就是中国共产党。它现在有××万×千个党员，它不仅和工人们，而且和广大农民群众联系着，它在知识界中，特别是在学生中，也有巨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武装部分。这个党是在多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火焰中受过锻炼的；它在过去积聚了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它有丰富的组织广大游击运动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中国现今的民族战争是非常宝贵的。

它拥有实行瓦解敌人力量的高度技能，善于深入敌人后方，和在敌军内部进行广大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现时开展得最快的，是在游击运动所包括的区域里，在日军后方。

它在巩固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保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基本条件——的事业上，作出意志坚强和行动机敏

的模范。中国共产党的强处，就是它那造就和提拔新干部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底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鼓掌）（曼努意斯基：《国际形势与反法西斯运动》四一——四二页）

根据1943年12月出版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铅印本刊印

中央书记处对贯彻执行 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 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

各级党委：

毛泽东同志于十一月廿九日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会上的讲演和十月在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不仅告诉我们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把群众组织起来)与办法(用合作社形式)可以使生产力提高一倍，可以使穷苦变为富裕，可以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可以坚持长期的抗战，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革命。而且告诉我们实现这个方针与办法的正确作风就是要有群众观点，要依靠群众，要与群众结合在一起，不要沾染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就是只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东西，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与军阀主义作风，这种毛病，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或多或少都是有的。因此，各根据地党委收到此讲词的广播后，应大量传播。并在党政军各级组织中，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

志的方向，实行一个澈底的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

中央书记处〔1〕

十二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署名是编者根据原抄件标题增补的。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下 敌后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彭德怀致邓小平电)

小平同志：

(甲)亥江电悉。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山东、华中应如何注意，待朱瑞、陈毅到延了解情况后，再告。

(乙)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彩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

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丙）太岳、中条整风生产全无反映，望注意检查督促。

毛泽东 彭德怀

十二月十六日〔1〕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落款处署名、时间是编者根据原抄件标题、时间补加的。

关于在反特斗争中坚持少捉 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康生致华中局等电)

华中局并转一、二、三、四师，山东分局，五师：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澈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

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康 生

亥感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关于学习 《反对统一战线中的 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赞扬我党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轰轰烈烈坚忍奋斗百折不回的伟大成绩，赞扬我党以坚固的马列主义为基础而在一九二一年开始产生的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发展与巩固，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

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受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

（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

（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

（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

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经过七大，我党将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大与更高度的一致，向着澈底战胜敌人解放中国的大路迈进。

中央政治局

十二月廿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一九四四年

中共中央向敌后军民致贺电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

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战斗员们，游击队员与民兵们，在战斗中负伤患病的伤病员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全体抗日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度的新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的英勇斗争致敬意，并向你们祝贺新年！

抗战六年半的长时期间，你们始终站在祖国的最前线。一百万的敌伪军，一年几十次的“扫荡”，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毁灭，特务分子暗杀放毒告密的恐怖，粮饷弹药的缺乏，许多地方还加上天灾，但是你们毫不动摇地站在最前线。你们在去年一年打了大小几千次的仗，打死五万以上的敌伪军，打退了常常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进攻，打垮与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的主力，收复了许多的失地，许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是扩大了。许多地区，不但胜利地进行了对敌斗争，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还进行了人民和部队的生产运动、救灾运动、防奸运动与干部的整风学习运动。你们这种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所

少见的；你们吸引了侵华敌人的大多数，牵制了向正面进攻的敌人，掩护了抗战的后方，保证了最后的胜利，你们的大功劳，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各国人民也已明白。你们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爱国军队的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长城；有了你们，中国才有资格与苏美英等同盟国站在一起。

在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三次会议以后，欧洲第二战场很快就要开辟了，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欧洲的胜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红军与英美盟军的一致行动下完全实现了，因此，我们中国人民打倒日寇的胜利，也就更加确定与更加逼近了。但是在同盟国对日总反攻之前，我们必然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甚至是比前更大的困难。敌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计地来摧残你们，破坏你们，但是你们是不怕困难的！你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锻炼，你们已经学会了怎样和敌人作斗争，而且正在学习着怎样更好地斗争。六年半的教训，使你们知道取得一切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团结，首先是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八路军新四军知道人民是自己的母亲，在抗战中间，不但为人民抵抗敌人的进攻，而且掩护人民的耕种收获，帮助人民的转移和恢复被破坏的家园，尽力减轻人民的担负和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根据地得到自由解放；人民也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是自己的一家人，自愿供给军队的食粮，积极参加抗战的勤务，自动进行侦察和掩护工作，普遍组织民兵配合作战；因此，你们的

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但是困难既然继续增加，你们的团结也就需要格外增强。在不休息的战斗中，一年过去，一年又开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战士，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人民的关系还有些什么缺陷，还有些什么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些吧！根据地的一切人民，也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抗日军队对抗属对抗战的一切工作还有些什么可以做得更好些吧！一切共产党员，动员起来，更好地团结全军全民，更好地把一切坚持根据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吧！在你们的铁一般的团结之下，你们今年的对敌斗争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你们的生产运动一定会在胜利的对敌斗争下得到更好的发展，你们一定会清除奸细破坏分子，把根据地十倍百倍地巩固起来。

庆祝你们已经得到的胜利和今年将要得到的更大胜利！

中华民族胜利的旗帜——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月一日

根据1944年1月1日《解放日报》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晋察冀分局 干部扩大会议应讨论的 几个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

晋察冀分局并告北局：

子华、澜涛同志并转分局各同志：荣臻、理卿同志先后来延，使中央对晋察冀过去及现在工作，有更多了解。六年来，分局同志及晋察冀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并坚持了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与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近年来在敌人扫荡蚕食更加艰苦的战斗情况下，你们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并且还把我们的力量伸入到敌后的敌后去，在一千多村庄中恢复了工作，证明你们在极困难的局面下仍能有办法坚持。但是应当认识目前国际形势虽然愈对中国抗战有利，并有于击败希特勒后紧接着击败日本的可能，但在我们领导机关布置工作，宁可放在时间较长的估计上面。而且华北是敌人力求掌握的兵站基地，其控制兵力，不会很大减弱。晋察冀区域更处平津附近，为敌所特别重视。

因此在军事上敌强我弱形势，直到全国反攻前，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上还要有在最困难局面下，和敌人熬时间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轻敌速胜观念，要更加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要认真执行十大政策，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边区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同时，必须自信我们在最困难条件下坚持了六年半斗争，经历过各种考验，克服过许多困难，创造出许多新的斗争方式，只要能够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则不仅可以继续坚持斗争，而且还可以争取一些新的发展。若果从这个方面来看晋察冀的工作，则还有若干不够的地方需要我们努力去充实与改进。中央与荣臻、理卿同志共同检讨晋察冀工作后，特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作你们这次干部扩大会议讨论的参考。

（一）在对形势估计问题上，我们觉得在某些干部中尚缺乏坚持长期斗争的足够认识，而对整个边区今天游击性的增大，如何从主力部队多抽出力量进一步加强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及认真的开展伪军工作，还有不够的地方，对边区军民愈口困苦的情形也还估计不足，同时在一部分下层干部、党员、士兵和群众中，在困难增加情况下，又已生长了一种悲观情绪（你们去年八月的组宣会议已经提到这一点），这是极可注意的。这次干部扩大会议中，要求能够在形势估计上获得一致的认识，才能保障对敌斗争的顺利开展，认真加强对游击战争、武工队、民兵工作及敌伪军工作（特别是对伪军伪组织

工作)的领导。

(二)坚持长期斗争的又一个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极大地注意发展军民生产及节用民间物力。在长期战争负担与敌人三光政策破坏、劳动力日形减少、某些地区熟荒增加、生产力大大的下降的情形之下,组织全体部队、机关及全体人民开展生产运动,以便增加人民生产及减轻人民负担(你们那里人民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觉得关于发展公私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农业生产,在党内还缺乏足够认识,因此,也就抓得不紧(合作社运动是有成绩的,今后还需开展这一工作),对群众农业生产还只限于个别问题的解决和注意以及军队帮助群众生产的方面,尚未有全般的、有计划的组织农民劳动力去进行生产运动。开展吴满有运动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部队与机关还缺乏把生产当做自己一种极端重大任务的认识,因之也就未能创造许多可能进行生产的办法,求得从生产收获中改善部队、机关的生活,同时减少人民的负担(据说有些战士因吃不饱发生不满),刺激和影响人民的生产热情。希望这次会议对于展开生产运动问题,着重地加以检讨,并根据毛主席欢迎劳动英雄会上的演说《组织起来》所提示的方针,按照晋察冀实际情形具体布置今年公私的生产运动。

(三)要坚持敌后长期斗争,必须更加依靠群众,在一切政策的决定与实施中都须经常具有坚强的群众观

点，要克服地方干部中只知向群众要东西，而不注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的作风，这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缺乏明确的尖锐的向干部提出此项任务及组织此项任务的实行。你们这次会议上必须对此加以检讨，并经常注意防止官僚主义倾向。在军民关系上，拥政爱民观念在许多军队干部中还很不够，军队侵犯群众利益的军阀主义现象还是存在。这些现象虽因战争环境，群众不多提出抗议而且时常加以原谅，但我们自己必须揭发纠正，并经常注意防止军阀主义倾向，使军民关系更加改进。今后军队要恢复苏维埃运动前期红军做群众工作传统，把群众工作看成自己经常的一个任务(作战、生产、做群众工作，应成为军队的三大任务)，这样才能增强军民的亲密关系，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

(四)对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九一决定后，从分局到地委，都是由部队军政首长兼党委书记，按这些同志的历史和能力是可以的，但必须使这些同志弄清“一元化的思想”是在于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党委应成为所管辖区域的领导中心，要注意防止只照顾军队一面，而未照顾全面，对于根据地各种政策不加深刻研究，不注意检查督促，把部队的首长制带到党内，抑制党内必要的民主，因为这将削弱党的领导力量。再从各种组织对党对上级关系来说，闹独立性的现象还相当多，各地区各部门间闹本位主义的现象也相当存在，这些证明一元化的思想在许多干部中也还未真正弄通，是值得检讨

纠正的。

(五)在整风学习问题上,我们觉得成绩还不够,首先是没有正确认识到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是我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思想上的革命”,其目的在于克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列主义的布尔色维克党。由于在整风学习中对此种认识的不够,因此过去你们那里的整风学习,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没有更好的进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把学习文件看成为一般的学习,或者是认为只须整下面的和新干部的风,或者是偏重于业务整饬,而未把整风的重点放在干部的思想改造上,这种思想改造,又必须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联系起来。每个干部,特别是犯过某些错误的干部,一定要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工作经过深刻的反省,才会获得整风的成效。我们希望这次干部扩大会也象陕甘宁边区党前年高干会一样,能够成为一次整风会议,把你们区域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运用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适当的揭发和〈检〉讨,求得在各种问题上一致的认识。这对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深入和更加发展以及整风运动的深入将起重要作用。同时分局在以后要以很大的精力组织和领导整风运动,要经常讨论此种问题。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和深入,应当

有计划的根据中央八月十五日指示方针，开始进行党内审查干部和群众中的防奸运动，彻底的但是正确的将暗藏在党内和群众中的真正日国特务奸细清查出来，同时要预防弄错及被诬陷，这是巩固党和坚持敌后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防奸运动中，除激发群众对日寇的民族仇恨外，必须在党内党外认真进行反国民党法西斯政治的教育，你们对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反动活动应加以防范，对其特务破坏罪行应给以适当的制裁，但不是公开驱逐国民党。

上述各项问题，希望在你们二月召开的干部扩大会议上联系到执行中央所提十大政策情形加以检讨，必须敢于放手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要防止过火斗争，把一切问题都提到思想认识上去，从思想根源上弄清这些问题，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破坏团结，反而可以巩固领导、巩固团结。

中央相信晋察冀边区全党在中央分局及聂荣臻同志领导下，依据过去六年的伟大成绩与坚固基础，必能完成上述一切任务，配合各根据地及全国的斗争最后战胜日寇。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 对待国民党军队 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飭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 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 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小平、漱石、林枫、子华四同志：

(一)对于坦白分子之处理，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固然有少数重要特务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来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质，并不是特务问题，他们或因问题复杂，一时难弄清楚，或因惧怕镇压，或逼于群众压力，或由于逼供信的错误，或由于特务的诬陷，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这种事实，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区别，笼统的将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

(二)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加入了特务组织，进行过特务活动，保持着特务联系，以特务工作为职业的。

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是自首后写过反共文件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没有实行，但也没有向党报告的。这一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是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公道团或其他党派，其中许多人加入我党后，没有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其中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有的因为半条心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欺骗组织，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人怀疑，甚至被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是有的，甚至在已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以上六类是根据延安坦白分子的情况，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其准确性，尚待今后甄别工作来证实。但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

合乎事实，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因此你们可以将这六类分析，当作一个方法，去细心分析你们那里的人，遇有不是特务而被误认为是特务者，必须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除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

（三）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这里要注意：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延安许多机关，在初步复查工作中，已证明新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其中有政治问题的（轻重不等）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经验值得注意。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四）关于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为了顺利的开展坦白运动，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即对于那些杀过我们人的和假坦白的人，暂时也不明白宣布，但你们绝不要通过甚么正式决议和文件。中央局及分局的负责同志也不要肯定的担保党籍，因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到解决的时期。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的不要采取逮捕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材料

与真凭实据，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央书记处

子敬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东江 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问题给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林平：

东江游击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三三制的。但在实践上既不必照国民党的形式，亦不必抄华中边区的办法，而要因地制宜，根据你们当地具体情况采取某些便于游击发展和军队转移的政权形式。如东宝^①某些区乡可开代表会者则开代表会选举区乡政府，如不可能开代表会，而其地区又经常被敌伪侵占者，则不妨组织武装工作队，统一军政工作。县级代表会亦可名参议会。县以上是否成立联合政权，视情况需要定之。选出的各级政府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三三制，一方面应注意我党领导权的确立；另一方面应吸收党外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多多参加，施政纲领可参照陕甘宁边区的纲领，加以切合当地实际的变动，各种条例当择要为你们广播一部分，但只是做参考，不

要照抄。

中央书记处

子世延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东宝，指广东东莞、宝安。

军委、总政对全山东 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罗黎肖〔1〕并总部、新四军、一二九师、五台军区、一二〇师：

你处政工会议准备讨论的五个议程〔2〕是很好的，因对你处目下情况不清楚，不能提供具体意见，现只就下列几点提出一般意见：

（一）目前整个敌后根据地及所有我们部队如何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连系，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此点应有严重的注意。因我们部队中存在着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出若干横蛮霸道的国民党作风，而政治工作部门本身的群众观点就是不足的。过去红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三大任务：作战、筹款（现在应称为生产）与做群众工作，后来变为只着重注意第一个任务，其余两个任务是被忽视或多少被忽视了。且在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对群众工作极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我们进行群众工作，单只为着军队；殊不知我们军队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顾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着群

众。因此，你们此次会议应很好的从干部思想上澈底解决这一问题，把这个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贯澈到全部议程中去。

(二)我们军队的特点，不但要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而且要会生产，这是中国革命特殊条件尤其目前敌后条件所决定的任务。现在你们的生产节约运动已在进行，并已有若干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仍必须在部队中把这一问题提到原则的认识上去。政治工作应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全体干部与战士中加强生产教育与节约教育，从思想上改造与反对那种轻视劳动与浪费资财的观念，因为真正把生产搞好并能进行节约，不仅对部队巩固才有物质保障，向群众少要东西才使军民关系更加改善，同时使官兵在亲自参加劳动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劳动观点，改变小资产阶级与兵痞的气质，干部更好地与战士生活打成一片，军队更好地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

(三)关于部队的教育问题。应当利用机会与拨出时间进行部队的教育，在教育时间分配上，军事应占十分之七，政治占十分之三。但这两者的重要性的比较上则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较大些，军事教育的重要性较小些。须纠正部队对军事、政治教育认识上的诸错误。在政治教育方针上应采取各种各样的适合情况的方式与材料，反复说明与养成几个根本思想与精神，例如战斗中的勇猛顽强迅速，平时的勤劳积极，平时战时的遵守纪律与

吃苦精神，坚定不移革命到底的决心等。教育内容上，除各种临时问题的教育外，应将共产党的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府的实际主张、制度、生活、行动、成绩、前途与国民党的及其军队、政府的实际情形与前途，两方优劣，作对比的教育；将中国妥协及亡国与中国抗战胜利建国的利害作对比的教育；将中国工农的生活状况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作对比的教育（但不公开广播，不登在大报上）。教育方式：应除上课外，可用开会、演戏、士兵演讲、讲故事、唱歌、上识字课等等。教员除首长外，可选士兵或地方党、政、民中之人员来报告，力求生动、现实。须特别注意实例教育，应汇集各种英勇的战例作教育，对学习，对生产亦当注意以实例作教育。对战例须不断收集，不断编与教。并望将所编辑的教材陆续送延安备用。在军事教育方面，政治工作须极力协助，过去那种政治工作不关心军事技术的提高应澈底纠正之。军事教育方针上要养成部队白刃战、夜战、进攻战的最高度的勇敢性与熟练、结实的技能。在教育上应养成部队有打蛮仗打猛仗的真本领。在实战时则应养成各级指挥员机动灵活的弹性的指挥，有利时须行勇猛的作战，不利时不投入战斗或干脆的撤退。在官兵教育上应着重于士兵，在士兵教育上应大大的侧重于刺杀、投弹、射击、近迫作业，对于刺、投、射及军事体育（有练力、练勇、练身之功）四者，应当每日晨夕练习。仿用中国古时练拳术，练武艺的精神与经验，

以各个教练为主，班教育〔练〕为次，排教练更其次，部队教练应更少或从略，依实际的程度而逐渐课以更高要求（如提高米达数），对士兵的各个战术动作，应以仅次于练武艺的精神而进行演练。如爬行、滚行、跃进，利用地物地形的隐蔽前进，以及学习步哨勤务与步哨顽抗等。对于夜摸教育除一般部队进行外，各部应指定一部连多学，增加夜操，减少昼操。干部教育应首先学会教士兵学技术与教士兵学战士之战术。其次为详细研究作战的经验与方法，应以高度的具体性、切实性、创造性去学会打仗的办法，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参考过去经验与参考书上的道理，根据具体条件，自己搞出道理与办法来。一定要养成我军有以少胜众（例如打顽军时），在攻击时一人能打敌三人，一班能打敌一排，在追击时一人能打敌十人，一班能打敌两排。要养成使敌不能奈何我们，执拗的找他拼刺刀的那种不怕死的作风。除军事官兵外，其余人员亦必须学习一定限度的军事知识与技能，务使人人皆兵。

（四）目前更需要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一一五师与山纵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应经过这次政工会议作到融洽无间。其办法是军队着重批评自己缺点，一一五师与山纵之间亦应各自着重批评自己，不着重批评对方，并由干部领导，在连队中发动坦白运动（经过很好准备，然后以一个星期进行之），将侵犯群众利益、想开小差及对坏人（奸细）隐迷〔秘〕不报等，一切平日不肯

说的话都说出来，然后加以很好的教育，以改正官兵关系中及军民关系中一切不良现象。至于地方的缺点，应将意见提交党政负责同志，由他们发动地方党政作自我批评，而不应由军队去批评地方。

（五）我们部队中的官兵关系还不能说是很好的，今后要作到如家人父子一样的亲密。应强调干部与战士真正生活打成一片，艰苦与共。那种只要求于战士而不关心战士生活，或只注意自己生活的现象，必须严励纠正。在管理部队方法上，应尽量运用友爱感情的力量与模范的作用。在部队一些日常生活问题上（如伙食管理、文化娱乐等），应尽量多给战士以民主，多倾听与尊重他们的意见，这对于集中，不仅不会妨碍，而且可增进战士的自觉性。连队政治工作更须改变今天所表现的脱离群众、软弱无力的状态，要真正使我们的连队政治工作做到抓紧战士的心，能实际为战士解决问题。指导员应依靠教育说服方式做到与战士经常在一起，多做个别谈话、漫谈、长谈、深谈，更重要的，不只在讲而在实做（如作战、生产、群众工作等），过去连队政治工作中许多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必须澈底予以革除，代之以真正从实际出发，为群众所需要，对工作真有效果的作法。

（六）你们这次会议最好能采取前年陕甘宁边区的高干会方式来开，检讨工作时多做反省与自我批评，要把问题提到思想上原则的高度来解决，只有这种解决才是

澈底的解决，才能真正有力的改正错误，转变工作。同时希望能利用这次会议，对各种工作多做些具体调查，介绍与奖励工作的模范与模范干部和模范连队，并以此种方法做为推动部队工作的主要方法。

(七)现在总政正在准备澈底检查我们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内战时期的也要检查，从整个政治工作方向、制度、作风来一个全面检讨，使我们的政治工作更适合于今后党的任务。望你处在这次会议中亦加以注意，并将意见告诉我们。

(八)对敌政治攻势应多组织武工队，扩大对敌的宣传战，并有计划的暴露敌暴行与扩大敌伪的矛盾，关于敌伪军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伪军上级，敌军工作目前主要是注意于争取敌军的宣传，进行思想的瓦解工作，并以多归日人反战同盟去做为有利，敌军工作部主要应集中力量作伪军工作，而对敌军工作则着重指导反战同盟的活动。

(九)民兵与游击部队的建设，应注意其特殊性，不能完全照用正规军的一套。这里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更加地方化与群众化，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应更多依靠民主与非军事的作法，干部的作用与保证党的领导，主要是使干部地方化，与成为真正的群众领袖。

(十)在分局及你们领导之下，山东八路军有很大的发展和地方党政民结合一起，建立与坚持了山东根据地，学会了许多新的斗争方法。我们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

会你们现时尚不熟悉的东西，改正现在还存在的缺点。
（此电如有不了解处望提出询问）。

军委及总政

丑微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罗黎肖，指罗荣桓、黎玉、肖华。

〔2〕五个议程是：①总结对敌政治攻势；②总结拥政爱民；③总结地方武装及小部队建设；④总结整风；⑤具体布置今后部队政治工作建设方针。

中央关于检查拥政爱民 及拥军优抗工作的指示

(此件一直发到连队与区委)

(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

从现在旧历年节中各地所传来的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的消息，我们感觉到以下几点现象，需要提起注意：

(一)拥军的消息多过于拥政爱民的消息，而且多是由政府领导，给军队送很多东西。是否拥政爱民工作，各地尚有未抓紧的？是否有因拥军工作而无形增加群众不必要的负担？党政发动民众拥军，应多注意于切实解决优抗、归队、帮助部队解决困难及精神上、政治上对部队多给亲切的热烈的鼓励，不只在多送东西。

(二)各地拥政爱民工作，很注重群众的访问，纪律的检查，损坏的赔偿，军民的联欢等事，这些都是应当做的。但同时还要利用这一运动，来深入关于革命军队本身的教育。要使不仅干部，而且是每个战士都懂得革命军队与旧军队不同的性质与任务。我们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军队，我们

军队的任务，不只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的重大任务”（古田决议）。今天具体说就是要做打仗、生产、群众工作三件事。只有使部队的干部与战士，完全弄通了上述思想，才能澈底扫除从旧军队沾染来的军阀主义倾向；才能自觉的去实行拥政爱民与遵守群众纪律，而不是简单的、形式的服从纪律。最近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的某些部队，在拥政爱民运动月中，实行以连或排为单位，学习古田会议的反单纯军事观点及拥政爱民公约，要每个人都根据这两个文件去反省检查自己，这就是连队战士的整风，每个人都坦白的揭发自己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并作出具体改正的办法，收效甚大，各地都可参考采用。

（三）在部队进行群众访问、纪律检查、损坏赔偿时，还要注意研究访问调查的方法。按普通的经验，老百姓对部队纵有意见，常常是不肯当面实说的，这就除了自己直接访问之外，还要想出一些别的能够了解民情的方法（如通过党政民众团体去了解或各个连队间相互检查等），才能使这种访问不是形式的。

总之，拥政爱民运动，是当前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各地党委切实抓紧检查，发扬好的经验，纠正缺点，务使这一运动真正达到改造战士思想与巩固军民团结的目的。在旧历年节的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月过去之后，各级党委及政治部仍须根据上述各点进

行工作检查，继续深入此两项运动尚未完成的工作，以期澈底改善军民关系与军队内部关系。

中 共 中 央

二月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 西北局减租指示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

各级党委：

兹将西北局对各地减租指示发给你们参考，其中所述原则各地均适用，望据以检查你们的减租斗争。

中 共 中 央

二月八日

西北局减租指示原文如下：

“据最近各地报导，减租运动已在各未经分配土地区域广泛展开。党政已发动群众起来，向某些顽固地主进行斗争，以贯彻减租。在此情况下，各地党应注意如下数点：

(一)应抓紧已澈底进行减租地区的典型例子，向所有应当实行减租而未贯彻的地区的农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并于春耕前，一律普遍澈底减租。

(二)凡已发动群众起来澈底减租的地区，应即注意对地主的团结。在澈底实行减租后，对地主一般的不是

继续斗争，而是注意团结他们，稳定他们，使他们不但不离开我们，且不得不靠近我们。

(三)在减租斗争中，应防止对地主采取过左的政策，如不看具体对象，一律退回三四年长收的租子，及对地主过多的罚款等。甚至个别地方已发生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都是不对的。如已发生，应适当纠正(但不能损害群众积极性)，如未发生，应预先防止，使减租斗争正确的顺利的开展下去。

(四)各地目前应即全面的检查一次减租进行情形，并具体定出春耕前贯彻减租的计划，同时报告西北局。”(此件发到地委)。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宣传部关于延安一般 机关学校政治教育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二月)

延安一般机关及若干学校一九四四年的政治教育，以配合审查干部、坚定革命立场为主要任务，为此目的，特选印关于中国问题基本常识与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文件十余篇，以供学习之用，望各机关学校领导同志根据这一计划及本单位具体情况(学习者的政治需要、文化程度、过去学习状况等)，决定学习人数、文件种类及次序，并经由各系统的宣传或发行部门向中央出版局领取文件。文件目录如下：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已出)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单行本已出)

孙中山蒋介石选集(孙蒋各时期的代表作品选集，对外秘密，印刷中)

列宁：论国家(关于唯物史观的通俗讲演，说明国家的阶级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

斯大林：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与上篇合订一单行本，即出)

马恩：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共产党宣言第二章，驳斥对共产主义的各种诬蔑歪曲）

联共党史：布尔塞维克是怎样形成的（联共党史第一、二章关于反对民粹主义、经济主义、孟塞维主义各节，说明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与上篇合订一单行本，即出）

列宁论民主与平等，领袖、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选自革命与考茨基及左派幼稚病两书，说明革命政权下的真民主）

斯大林与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附与外国工人代表团谈话摘录）

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附与德国作家路特维希谈话摘录。这些谈话都是解释对于共产主义、共产党与苏联的各种误解。以上三件合订一单行本，即出）

列宁：论共产青年团的任务（即论青年的学习问题，说明共产主义者的学习观、道德观与工作观，单行本即出）

季米特洛夫：在莱布齐法庭上演说（说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气节及对反共分子的痛斥，单行本待印）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的具体应用，单行本印刷中）

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单行本已出）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全文订正单行本，待印）

中央宣传部

一九四四年二月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政治局 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¹⁾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关于宪政问题：

(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

(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

(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大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

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中央政治局

三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读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逝世已经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

但是这个道理，国民党人士怎样看法呢？抗战期间，国民党曾两次提出宪政问题。上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八年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六中全会为回答当时国民参政会关于定期实行宪政的提议，曾决定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宪。但是这是一时的搪塞，又加以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不久就阴消了。这一次是在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象很郑重其事的决定在抗战一年后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制宪，同时，又声明要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这一次与上一次似乎有些不同。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主张从民主途径解决国共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以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故对于这种主张，不论其中所含的诚意如何，我们总是表示欢迎。

现在，我就来说说我们对于这两件事的意见。先说宪政问题。我党历来主张现时中国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自然，现时中国的宪政，也就应该是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了。可是，三民主义的定义，究竟拿什么做标准呢？我们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对于三民主义定义的阐明是最正确不过了，所以孙先生称他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要拿他来建国。我们党，对孙先生这种主张，不仅拥护，而且早在实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抗战是实行民族主义。我们在敌后坚持，在边区建设，都完全依靠民众，这就是“与民众深切结合”（国代宣言）^{〔1〕}。我们对境内蒙回诸民族，完全平等待遇，并承认其自治权，

这就是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代宣言)。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扩大游击战争,组织民兵,抗敌除奸,这就是实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孙中山:北上宣言)^[2]。抗日政权完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并行使直接民权,组织三三制的地方政府,这就是“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国代宣言)的革命民权。至于我们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劳动互助,生产节约,救灾备荒,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普及教育,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工农生活等政策,更无一不合乎民生主义的原则。根据这些道理,我们认为,不仅可以坚持抗战,而且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不仅在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得很有成绩,而且很可以推行于全国。执政的国民党不欲实施宪政则已,如欲实施宪政,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来做宪政的基础,而且要不怕面对事实,来看看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成果。

现在,各方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

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和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3〕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否则，那不是人民的自治，而是一党的官治。孙先生在北上宣言中说得好：“于会议（按指国民会议）〔4〕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这个道理，在地方自治的乡民县民省民大会中，也完全适用。对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应该给予他们以自治的权利。真正的地方自治实现了，全国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水到渠成。所以我们认为上述三个条件是实施宪政的必要前提，愿同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呼吁和争取其实现。

讲到宪法本身，我们同意这样的主张，就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国。根据这个道理，就必须承认革命民权，这种民权，就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

所说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⁵⁾”的民权。在现在说，凡抗日的人民及团体，均得享有这种民权；而凡卖国汉奸，则不得享有这种民权。次之，就须承认直接民权。这种民权，要用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新式代议制来实现他。又次，就须承认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权。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我们只有在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平等的联合起来，才能成功的“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国代宣言）。再次，必须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地方自治，应由乡县到省，省得自定不与国宪抵触的省宪，自选省级政府。最后，还须承认“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国代宣言）⁽⁶⁾。宪政必须以实现民生幸福和繁荣为目的，这才是新民主宪政的特点，而不是旧民主的宪政。综合这些原则，就是今日中国新民主宪政之所必需，也就是我们在各抗日根据地所勉力实行的。

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我们一向主张澈底修正。对于国大代表，我们一向主张重选。因为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所规定，也应该赞成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而过去的国大选举完全违背这些原则。而且是内战时期的选举，为国民党一党所包办，不合抗战时期已经变更了的情况。其成份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阶级，不能代表广大的工农平民。加以其中有大批人已叛变投敌，应予通缉

惩处，再无代表资格。所以应该以重新修改的选举法重新选举代表，而此种新选举法，不应有任何被选举权的不当限制，尤其不应以党义考试来限制，不应有候选人的指定，不应当由乡镇长来推选候选人，不应有对少数民族、边疆及华侨的不平等待遇，并且应容许各党派的竞选自由；这样选出来的国民大会，才有可能多少代表民意，多少实行民主宪政，否则，还是党治，不是民治。

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澈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现在我就来说国共关系问题。自武汉失守以来，国共关系愈变愈不经常，至去年为最紧张，但我党却始终坚持国内团结的立场，在任何时候都欢迎用政治方式合理地解决。我们和全国人民曾几次制止了内战的危机，就在去年最紧张的时候，也没有丝毫放弃我们对于团结的愿望。所以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政治解决”的声明，虽然其中含有对共产党极端诬蔑的八字由头即所

谓“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而不知正是相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英勇抗战，则民族与国家将不知要败坏到何等地步；但我们总还是愿意期待着。因为我们知道，不论从国际国内形势看，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是定了的，民主的趋势，正如日中天，中国不欲胜利则已，如欲胜利，必须先求国内的民主团结，然后才能获得国际的民主援助。抗战愈近反攻，这种国内团结，会愈感到需要。纵然破坏团结的顽固分子妥协分子，还在制造磨擦，还在准备内战，而消灭共产党的心亦始终不死，但国内外大势所趋，他们的阴谋恐终难完全得逞。因之，我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民主团结是我们与全国人民的要求，我们要求国民党保证今后再不发生有碍这种民主团结的事件。

国民党所谓“政治解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照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则谆谆要求共产党实践自己的四条诺言。我党对于自己的诺言，早已完全实践了，而且至今信守不渝。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澈底实现而奋斗”。恐怕现在全中国，还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像我们各抗日根据地是三民主义这样真正努力的。可是有些人们却说我们做的不对，好像实践了这条诺言，反而犯了罪过似的。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年来我们坚守不移，任何人找不出我们做的有丝毫不合这一条

的地方。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天天想推翻共产党，实行反共运动，实行没收农民土地的政策，难道这也算是要求共产党实行自己的诺言吗？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现在我们各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就是民权政治，全国政权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统一。可是对边区却至今不予承认，难道国民党允许承认边区的诺言，便可以不实践了吗？第四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这一条也是行之已久，并且成绩卓著，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就是铁证。可是毫无接济，新四军且被诬为叛军，取消其番号，至今尚未恢复。虽然如此，八路军新四军至今仍忍辱负重，艰苦奋斗，以至于达到这种程度：抗击了在华全部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而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不过仅占我全国兵力的九分之一。过去及现在既然如此，将来反攻之战，我们深信，是一定可以担当极其重要的任务的。

我党这种态度，我八路军新四军这种战绩，我各抗日根据地这种建设，自信是有助于团结，有助于抗战，有助于民主和进步的。国民党如果有准备反攻实施宪政的诚意，我们希望真正从“政治解决”国共关系入手，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内可以取信于国人，外可以取信于盟邦，抗战的胜利基础，才会从这里奠定。“政治解决”的

内容，应该是双方的与公平合理的，我党愿意坚守四条诺言，但是国民党与政府也应承认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并撤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国共两党果能本此基点，推诚相见，公平合理的解决各种问题，则不仅在蒋主席领导下，合作抗战的最后结果，必然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可以在蒋主席领导下，达到合作建设之目的。

我们在这个纪念孙先生的日子，热烈的希望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们很愿望国共关系能够恢复到孙先生在世之日的那样密切的合作。我们也热望孙先生遗嘱中开国民会议的那一条，能够在不久就可实现，使民主自由的宪政，真能见之实施，而不是徒托空言，造成很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局面。

一九四三〔四〕年三月十二日

根据 1944 年 3 月 14 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国代宣言”，指 1924 年 1 月 23 日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2〕“北上宣言”，指 1924 年 11 月 10 日的《时局宣言》。此处引文

与《时局宣言》文字略有出入。

〔3〕此句引文，《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6页为“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

〔4〕此处括号内的文字是《解放日报》刊载时所注。

〔5〕此句引文，《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页为“非少数者所得而私”。

〔6〕此注前引文出自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提案》中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群众 生产问题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

华中局并转各区党委各师：

春耕已到，你们应动员广大人民，一切男女老幼走上生产战场，各级地方干部，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等，均应亲自下乡，精细的去指导与组织一个村或几个村的生产，解决人民生产中的困难，发动群众高度的生产热潮。除此之外，关于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亦应加以切实的动员和组织，在不妨害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一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各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造本部队本单位的生活而斗争。华中的财政并不怎样困难，所有部队机关学校农业手工业生产所得，应一律用以改善各该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的生活，公家发给他们的经费照常发给，不予扣除。在开始时，公家并应贷予各部队机关学校一笔生产基金，那个单位生产很好，那个单位的生活就可提高，让各单位的生活水平高低不一样，以刺激各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并应特别注意改善战士杂务人员及工作人员的伙食，增

加肉食，训练伙夫，使饭菜做得适合营养的程度，以便保持健〈康〉，增强体力，减少疾病。一切浪费是应该反对的，但对于部队机关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不应再去号召节省，再去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各部队机关学校的首长，均应亲自计划与组织生产，务使今年生产能获得显著成绩，则其他困难亦将比较容易解决。

中央书记处

三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 国内问题宣传政策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师并转各区党委：

三月十二日延安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会及周恩来同志的演说，应作为这一时期我党关于国内问题宣传的基准。自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解放日报评十一中全会后，国共关系即已趋于缓和，我们为了继续团结国民党，准备对日反攻计，应该争取时局的进步，应该改变前此（去年七月至九月）对国民党公开正而猛烈抨击的态度。在那一时期那种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收到成效的。在现在时期，宣传上采取和缓态度亦是正确的，必要的。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口号及其进步内容，则在现在革命阶段无论何时均是适用的，不应放弃的。但各地为了进行时事教育，为了整风防奸，除上述政策应予指明外，在对内的口头宣传上，可以仍着重于暴露反共分子（不是整个国民党）的反动及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尤其宣传部门，应善于灵活地

配合这两者。

中央宣传部

寅马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 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 政治工作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日)

(一)谭政同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

(二)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或协助各地军队

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的宣传部与各军区、军分区、及军、师、旅的政治部应负责组织这一学习。

（四）各地应将此文件印成小本，广为散发，直到连队与区委。

根据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5月出版的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刊印

附：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

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

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会及军政干部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还在前年高干会时，我党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军队，是在

抗日民族战争中全国境内一部分最好的军队。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是在基本上完成了党与上级给与他们的任务的，是执行了党与上级的路线的。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犯这种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别，而当前的任务则是一致起来纠正这种偏向，发扬优良作风，改变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一年以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给予的任务的。

一年工作的结果，在军党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干部上下级关系上，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上及各部分军队间的友好关系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这些都是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曾经借以表现它的地方。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经过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以来，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澈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

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所有这些方面，虽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点，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较，显然是大不相同了。总而言之，部队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脱离群众为其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在上述这些改造与进步的情形之下，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部队中存在着的若干消极情绪与不良行为，现在一般均已消失，而为新的情绪所代替了。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这种热情与朝气，从去年春季开始高涨，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去年的开荒、锄草、秋收，往后又紧接着转入整训，中间经过七月间的战斗动员。其特点是：紧张性，普遍性与持久性。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进取心的。在生产中，在拥政爱民中，在冬季整训中，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成批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出现了，许多的模范班排、模范连队出现了。部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增强了。经过精简改编之后，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现象是被改变了，若干官兵脱节的现象，是被克服了。违反纪律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某些环节上的领导作风有了大的转

变，军阀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作风都受到了批判。现在极大地发扬起来的作风，是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了。

所以我们说，去年一年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作风大进步的一年。由于有了这种进步，才获得了去年一年真正伟大的成绩，获得了在我们部队中实行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简政的成绩，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如果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进步，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它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攻。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我们是怎样取得这种进步的呢？

这种领导作风的进步，其过程是从军党关系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从军队总的领导关系到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论，又是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士兵，从党员到非党员。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的进步，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去办；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是只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如果我们的同志在领导上确有毛病，而在检讨这些毛病时，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错误；那末，这种伟大的进步就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与这样快的成绩。去年一年的经验证明，凡是依照这种精神与这种方法做去

的，成绩就很大，进步就很快。反之，成绩就不大，进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如果我们要从若干错误的领导作风变到正确的领导作风，要从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表现得最典型的部队，在改变这种作风之后，就能飞跃地前进，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那里的思想改造做得愈澈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众情绪，那里的工作作风的进步也就愈澈底。

根据去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错误。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澈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

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去年，边区各地部队曾经检讨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那些至今还没有做好的，便是对于揭露错误做得不澈底，或做得不适当。

但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伤士兵，谩骂士兵。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之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慢慢进行改造。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生活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干部学好了，士兵也学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懈怠的勤劳了。总之，不论官兵，都面目一新了。这里，我引一个边区部队中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下面是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

“思想上的转变，可以部队中积极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

减少来说明。在去年三月刚整编时，党员积极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党积极分子只有三十一人。而到去年十二月，党员积极分子增加为一百六十二人，非党积极分子增加为九十五人。刚整编时，党员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党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去年十二月，党员落后分子减少为八人，非党落后分子减少为十五人。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消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法的话，那就要撤换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一定不会变好。但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中没有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

上述的这个部队，是边区部队中工作与纪律最不好的部队，这是极坏的典型。但因为揭露了错误，展开了群众的自我批评，改变了领导作风，提出了正确的积极的任务，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便很快的转变过来了。至于大多数工作基础好的或较好的部队，一经按照正确方针认真整顿，其进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见，工作的做好，纪律的维持，是建筑在领导正确与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领导正确这个条件，正如

列宁所说：“整饬纪律的企图，将不免流为空谈和虚妄。”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就要着重群众的自觉，去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一点。过去许多领导机关，对于干部及群众中发生的消极现象，不去检查领导，不去从转变领导着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从改造思想着手；并且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去从爱护观点出发促其反省与自觉，而只会用简单的处罚方法，实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只有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揭露具体的错误到督促犯错误者（包括干部与士兵）反省自己的错误，勤勤恳恳地好心好意地推动他们自动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个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

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自我批评的目的。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部队中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中，斗争目标，是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与对此偏向的自由主义态度上面，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可以联系与需要联系的），而不去强调它。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与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去年一年，我们在部队的实践中，发扬了统一领导的思想，拥政爱民的思想，生产自给的思想，提高军事技术的思想与防制奸细分子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教育与实践中，不但军

阀主义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条主义偏向也就同时受到了批判。我们的军政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已经能够不受教条主义作风所束缚，抛弃了脱离实际，专尚空谈；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那些不良作风，而懂得了遇事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并懂得了选择典型与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懂得了不但要照顾少数，尤其要照顾多数。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去年一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领导作风上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其共同结果，都是脱离群众，而教条主义则特别表现于脱离具体的实践，而以抽象的空喊与形式的整齐为满足。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还因为我们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之时，我们就从基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采取了我党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在动员的过程中，都是根据各旅各团的情况去规定各旅各团的总计划（一般号召），然后根据这种旅团的计划及各单位的情况去更具体地规定班排连营的计划，以至每一个人的计划（具体指导）。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实践经验去检查这些计划，并修正这些计划，使高了的减低些，低了的提

高些(具体指导)。在动员过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与军事工作同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每一部队中最有威信的首长的统一指导下,协同一致地去做,故无各自为政之弊。

去年许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竞赛的方式。但当群众的情绪还没有感觉到需要实行竞赛的时候,就不应发动竞赛。当这种竞赛情绪在群众中酝酿到大体上成熟了的时候,便应立即号召竞赛,并用一切力量组织这种竞赛。这种时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仅积极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准备,而且中间分子方面(他们往往占多数)与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否则竞赛便会变成少数人突出,只是少数人在做,不是多数人也能做起来的。去年生产运动开始时,有些部队发动竞赛的时机选择得不适当,发动过早,只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没有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情绪,结果这种竞赛的号召便落了空。后来照顾了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重新组织竞赛,便得了成功。在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中,凡是不但照顾了中间分子,而且照顾了落后分子的,竞赛热情就愈弄愈高,竞赛规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坚持到底,完全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不要领导方面的督促。我们必须懂得,在各种人们的觉悟程度上,中间分子比较积极分子是有距离的,落后分子比较中间分子又是有距离的,领导的任务,就是在于团结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而我们团结积极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一道儿前进。离开这个目的,积极分子就失去作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事。因此,在任何一个带群众性的运动中,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步骤上,首要的问题,是照顾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问题,要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要选择为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也能接

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适应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进度，而规定整个运动的进度。例如，我们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组织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胡青山运动，赵占奎运动（不是职工运动的赵占魁），武生华运动，冯振僧运动，冯国玉运动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先进战士与先进的初级下级干部，是本部队生产运动或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本部队战士群众所熟知与亲眼见到，容易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容易激起他们的上进心。因为群众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体会问题，不是从口号来体会问题的。如果我们的鼓动是脱离具体人物、具体事迹的鼓动，便无法使群众了解，无法激起他们的上进心。但是当我们鼓励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向先进分子看齐时，必须不忘记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特点。例如在生产的劳作形式上，必须依据体力强弱，并采取相当的自愿原则，将劳动力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内容与不同程度的劳作形式，较之平均主义的与完全命令式的劳作形式，就会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分别，我们就会要脱离群众。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办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办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单纯的惩办，甚至打骂的方法，只是一种脱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军队中一定要废止谩骂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教育感化工作，去代替谩骂与肉刑（打人），去代替单纯的处罚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谩骂

与肉刑以外的、必要的、即按照实情必不可少的正当处罚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轻易采用处罚方法。

一年的经验是很多的，我在这里讲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生产运动，练兵运动与防奸运动，均有各自的宝贵经验，我在这里没有一一说到。我所指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经验。并且也不是说，我们部队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已经全部的与最后的克服了，不，不是这样。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偏向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将它表现在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以及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的显著不良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种关系，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已经完全的最后的改善。要使各种关系获得更加完满的改善，并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根深蒂固坚强不拔的东西，我们还须继续做很多的工作。至于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教条主义作风，在过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的，但是还没有全部克服，尤其是从历史上检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还没有做。下面我就想就全军的历史问题加以检讨，而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作风两种作风的比较与分析，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比较与分析。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偏向，这里暂时不去提他。

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 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

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澈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澈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澈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也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

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成绩的情形。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许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破击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抢光烧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的成绩是伟大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检讨这些缺点，克服这种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们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统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于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東西，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战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就其积极方面说来，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敌人的政策，曾有过许多成绩。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领导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

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军队的斗争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倡导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地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视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

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其结果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争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轻视了。军队的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认为不必要了。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党政军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军队不尊重党政,军队打骂民众,侵犯民众利益的现象,以及军队内部官长对士兵的打骂现象,虽有指责,也不甚得力了。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减弱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潜滋暗长了。由于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的发展,军队的这一部分可以不照顾那一部分,主力部队可以不照顾地方部队与民兵,模范队伍可以不照顾落后队伍,从而在主力部队的若干同志中(这里军事政治后勤三种工作同志都有),生长了一股骄气,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爱说成绩,不爱说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惧怕别人批评,也惧怕作自我批评,有些则更发展到对党与上级的领导机关

闹独立性的恶劣现象。所有这些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则至今还没有改变。

在党内生活上，内战后期曾经普遍采用了过火斗争的方针，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军队中的党内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没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错误地打击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

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虽然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是存在过某些不协调的情形。在内战后期，曾经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所谓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的差别，对于军事工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这种不协调情形的来源之一。但是这种不协调，不能一概责备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有些时候军事工作人员也要负责任。

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反蚕食，

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是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所以,如果离开军队的具体任务去谈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军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绝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些同志是认识不清楚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情形,便应加以纠正。

应该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间轻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绩,优良传统,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壮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认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没有被肃清,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则是其主观的原因。一

九四二年整顿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革以来，这些缺点就逐渐减轻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这些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内战后期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当时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则军队是不会单独产生怎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们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鉴。还应知道，我们的军队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或是已经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经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应该团结一切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应使我们的同志深刻认识，如果我们不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革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就会无力巩固正当的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就会无力克服军队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也就会无力克服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恶劣倾向。反之，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中国革命的经验，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经验，都在证明这一论断。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

纯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四军古田决议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点。由于我们军队的特殊环境，我们在内战时期，曾经规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争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但是，如果放弃后二项工作，就不适合于我们的环境。在内战的初期与中期，我们军队曾经艰苦地但是光荣地执行了上述三大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根据地没有建立之前，曾经协同地方党政建立根据地，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后，又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巩固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就是在抗日战争中也是没有改变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协助当地人民，协助当地党政建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试问这样强大的民族敌人（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与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都担负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上），这样长期艰苦的战争，怎能支持呢？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提出了军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军队生活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于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争、生产与做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如果把这样三个任务，缩小成为一个单纯的作战任务，那就不能适合我们的特殊环境。

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三大任务，过去军队的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军队不走偏向，达到协和全国军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

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凡属革命军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除应强调专精自己本业，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业则是不正确倾向这一点之外，还应提倡，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同志应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则应学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准备去参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现有工作职位去做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而在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则应强调彼此的合作。不错，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因此才分为几种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是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一个目的，这些工作的进行又必须取得和谐的合作。因此，凡是能巩固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赞扬，而如果是妨碍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下，革命军队内部的争论问题，只应该是思想倾向与政策方针的原则性的争论，只应该是正确原则克服不正确原则的争论，并且只是因为这种争论，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任何的争论都应该完全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而如果是多少离开这种立场的争论与对立，就都是无原则的，是不应该允许其存在的。

在我们军队中，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了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结合起来。应该使人们懂得工农干部的长处，我们军队中有大批的革命工农干部，他们已在历史上形成为军队中一部分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骨干，正是我们军队的优点与特

点(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中也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诚可靠的,并特别能吃苦耐劳,英勇奋斗。轻视工农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时,又应该使人们懂得革命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忠诚可靠的,他们的缺点,经过锻炼(特别是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是能够改造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这样)。无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他们自己的短处,都不应该骄傲,而应互相学习其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

军队中的老干部是军队的主要骨干,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如此坚强的军队。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老干部,轻视老干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应该尊重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我们军队的新鲜血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军队的发展与壮大,轻视新干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老干部尤应随时随地,特别表示欢迎与尊重新干部的态度,以便于从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们抗日的军队,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

从地方工作中吸收到军队来工作的干部,新的与老的,工农出身的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有,这是扩大军队干部的一大来源,我们应该表示尊重、欢迎与和气地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态度。他们初来时,在工作上有些不习惯,不熟练,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善于帮助他们。

我们军队中,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原有军队干部与新来地方干部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是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

观点，是应该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

如果说对敌人是用“霸道”，那么，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予以大大的发扬。

在我们军队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去规定。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侧重，例如，在部队政治教育特别缺乏

时，应当多费时间、多费精力去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般地说来，在分配二者的时间上，军事教育应占的比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则应占的比较少些，不可拿许多不必要的繁琐的会议、会报去占据军事训练的时间。许多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工会议，则多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做。这种时间上的分配，决不能被误解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使人们懂得，认真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轻视政治工作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有些部队中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动占去了太多[了]的时间，减弱了军事训练的时间，这是应当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应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则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但革命军队的文化水平，是应该提高的，不能误认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进行识字运动及其他文化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下，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应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澈底拥护人民利益的，是以工农为其基本成分的。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从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出身，而真心愿意献身于抗日战争，真心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的那些人们，参加我们的军队。这些人们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那是会有的，放任这些缺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是排斥或歧视他们，而是欢迎他们与尊重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斗，在奋斗过程中逐渐地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于军队中的二流子(流氓)，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听任二流子习惯存在，是不对的，单纯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经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们的政策与方法不犯错误。

对于会门与土匪，也应采取逐渐地有步骤地感化与改造他们的政策，不能是单纯地排斥与打击的政策。除非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去争取，而某些会门或土匪还是坚决站在敌人方面反对我们，才可以采取某种打击手段。但在打击之后，又应继之以争取。

抗战时期，各种对敌伪斗争的政治工作，争取敌伪军俘虏的政治工作，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工作，争取广大民众加入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到军队中来的政治工作，团结地主资本家阶级和我们一道抗战的政治工作，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作得有成绩的工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都应该继续坚持与加以发扬。

如果我们部队中对于上述各项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应当加以纠正。

此外，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同时也在军事工作中)，还有几个毛病，在前面虽已提到，但是没有着重说清楚的，需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些毛病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一样地存在与一样地严重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经给了许多的改造。但是这些毛病是这样显著与这样引人注目，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来加以分析，以期唤起同志们注意，加以澈底的克服。

那些毛病呢？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他们的计划常是随时可用、随

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们只知道习惯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问题上(军事教育上也有某些相同)，我们教的东西与战士们需要的东西，有些是不相符合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门喜欢谈论国际大势与国内大势，却不愿意谈论本地本军与本连本队的大势。把这种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时又是战士群众最需要最欢迎的具体事物，抛弃不谈，却喜欢向战士们输送大批的抽象概念。又如，有些同志常常喜欢凭空教导战士们要守纪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坚决，却不愿意把现成的，活的，动人的模范人物，英勇事迹，讲给战士们听。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讲的价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无价之宝。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内容既是教条主义的，教授法、学习法、测验法也是教条主义的。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为的是要“完成计划”。学的人也就只得把听课当做一种负担，当做一门差事，虚应故事，从来也不知道要联系自己与反省自己。在测验的时候，只知算问答的分数，不知看实际的行动。这种情形，在许多部队中存在着。在这些部队中，不但对战士的教育如此，对党员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对政治教育如此，对文化教育也是如此。不重内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了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严重毛病。这种情形，就陕甘宁边区说来，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干部的思想，还是没有澈底解决的。

我们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些同志，当他们去检查支部工作、讨论支部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支部书记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会议与汇报，名曰“建立会议制度”，“建立汇报制度”。会议与汇报执行得好的，

就是“模范”，不好的，就不是模范，几乎把会议与汇报当做中心，当做一切。因此，支部忙于开会，党员忙于到会，结果是大家讨厌开会。为什么如此？因为这种会议是毫无内容的，枯燥无味的。战士们讨厌这种汇报，因为这种汇报多是消极地向战士们找岔子，反映所谓“怪话”，因此，引起群众不满。这种所谓会议与汇报，只是使支委脱离党员，党员脱离群众。象这样的支部工作，是没有法子做好的。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卫生队、运输队等等）及每一任务的特点（作战、训练、生产、做群众工作等等），去进行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于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在若干部队中是存在的，是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

有些部队中写报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上级机关规定许多报告项目与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级（特别是营连）去做去填。在此种要求下，下级只得拼命地做上去，填上去。但是这些东西的内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实用，徒费精力。上级得了这种东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与整理，结果化为废纸，无所用之。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我们军队中的许多组织形式是不合实际需要的。例如，有些政治工作机关分了很多的部与科，收罗很多人堆在机关里，结果人员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琐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真正的领导工作反而做得少了。又如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政治战士，也变成了形式上好看，实际上无用的东西。

总之，凡属不合实际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都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是指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不知道抓住中心；检查工作时，不知道找典型；解决问题时，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以至他们的许多计划，常常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早已成了日常习惯的业务，也要列入所谓计划之内，把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同时并列在一起，这样搅在一团，毫无眉目的所谓“工作计划”，完全失去了工作计划的意义。有些部队的同志不知道，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只应该有一项为当时情况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以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属之，而是同时发动做很多项工作，想在这很多项工作中获得成绩。但其结果则是一项也做得不澈底，一项也得不到满意的成绩。我们有些同志在检查工作时，可以把所有的连队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个项目都考查一遍。但是结果呢？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分析问题，没有找出事件的症结，加以恰当的解决。所谓“总结工作经验”，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样样做好，但其结果一样也做不好。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同形式主义一样，其性质是主观主义的，因为它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不是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个毛病，就是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换句话讲，就是空喊。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号召是不适当的，他们没有估计那里的工作性质，没有顾及那里的群众情绪，他们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号召是正确的，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发出的号召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二个号召接着又来，在那里，许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许多工作常常是有头无尾的。这是对工作的开玩笑

态度，极端不庄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政治工作，对领导机关，都只会损失威信，得不到任何好结果。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根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一经提出号召，就应组织实行，并在实行中，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余。如果没有具体指导，则所谓一般号召，就是自己给自己取消了。

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不是人家孤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组织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闲着。许多事是可以而且应该协同军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找人家，宁愿使工作老是抓不开。至于动员了群众的，也有这种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顾群众的需要，而是违背这种需要，不知道考察群众的情绪，而是忽视群众的情绪。从而关于领导群众的艺术问题，关于如何团结积极分子，巩固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问题，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互相配合的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与简单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变成了少数人脱离群众而孤立起来的所谓“工作”。此外，有些同志在解决问题时，不凭自己的本领，不凭自己勤于向同级、向下级、向群众去商量、去学习，借以取得知识，取得经验，而只凭自己的工作职位，只凭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坏，有时甚至毫无办法，只好拿大帽子压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义的方法。

总起来说：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我们的政治工作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过去工作中，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现在在陕甘宁边区部队中，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有很多生动活泼的创造。在长期抗战中，产生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们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平均主义，没有空喊，也没有孤立主义，他们是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应该表扬他们，应该展开每一个部队中学习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扬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即使在过去工作中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会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改正过来。经验已经给我们证明：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

根据上述陕甘宁边区部队一年工作的总结与全军历史上的一些总结（不是全部总结），使我们感觉我们政治工作中现存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应有某些修改，并加入许多新的东西进去，才能适合目前军队的需要。但是我在这里不准备来说全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问题，只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待将来再讲。并应指出，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有些还是好的，应当保留的，这里所说的修改，是指那些已被长期经验证明不适合实际需要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仅具形式而无工作内容的，有些则由于情况变化，从前合用的，现在已经不合用了。

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当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在工作中，应当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不应当留恋已经陈旧了的东西。这里的原则是：凡属便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如果某种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不便于组织与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的，就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以新的东西。例如我们从战争中，从整训运动中，从生产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中，创造了战斗英雄会议、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会议，连队军人坦白大会等，都是很好的组织形式，应当予以发扬。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连队中的会议制度与汇报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过去有些部队会议太多，一个连队每月有多至四五十次的，空虚繁

杂，徒耗精力。今后不论是属于行政的，党务的，或政治工作的，也不论是属于党员的，非党群众的，或干部的，凡属工作性质相同，到会人相同，又不妨碍机密能够合并举行的，应当合并举行；不能合并必须单独举行的，才许单独举行。一切会议，必须是有内容的，例如充分切实地检讨工作，教育同志，解决问题等。凡无此类具体内容的会议，一概取消。一切会议汇报，都应注意节省时间，会议次数不应过于机械的去规定。党员向组长，战士向班长的固定汇报制度，已成形式的东西，且使战士讨厌，应予以取消。

（二）连队工作网的作用，是为着对付奸细与逃兵。但是证以过去经验，依靠少数耳目与固定的网对付奸细，是不起多大作用的。防止逃兵，争取与巩固动摇分子的工作，是支部的责任，是所有党员及所有革命战士应做的工作，是属于一般的政治工作，不是防奸性质的工作。对逃亡分子的政策，主要是争取，是说服、教育、感化，是改善官兵关系，改善管理制度，改善连队的物质生活，从这些积极方面去解决问题。逃兵归队时，应采取欢迎态度，使他安心，禁止轻视、讥笑与打骂。过去许多工作网用反侦探的方法对付企图逃亡的分子，是错误的，反而妨碍了争取。因此，今后连队固定的工作网无存在之必要，应予以取消。只在必要时，临时布置侦察员，任务完毕，这种临时组织即行消失。

（三）连队中的十人团，在对付逃亡，巩固部队上，起过某些作用。但是由于其工作过分注意消极防制的方面，忽视从政治上去积极争取的方面。而且这种组织只有在新兵居多数的连队，或逃亡盛行的时期，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没有此种情况的一般连队中，无组织十人团的必要。只是在需要这种十人团的特殊情况下，才去临时组织之。

（四）在青年占多数的连队，应当重视青年的教育工作，过

去青年队组织曾起过某些教育青年的作用。但是，过去的青年队，由于不注重发挥青年群众的积极性，以与成年协同奋斗，往往使青年脱离成年而突出。又由于过于从外表上强调青年的组织生活与特殊教育，而连队中青年与成年的组织生活及各项教育，又大都是一致的，因而使青年队的工作，变成空虚与无力。今后不必有固定的青年队的组织与纪律，不必有固定的青年特殊教育，也不必有固定的青年会议生活与汇报制度，而应在连部或队部的指导下，开一些非固定的青年会议，借以教育青年，启发青年的积极性，并使他们与成年一道，努力于共同工作。

（五）连队中的政治战士，因无一定工作内容，应予以取消。

（六）在取消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与政治战士等固定形式之后，关于反逃亡的工作，防奸工作及青年工作，均由支部集中领导，按照实际需要，规定适当的具体办法。支部应注意利用军人俱乐部去做自己的工作，很多带群众性的工作，均应通过军人俱乐部去做。过去有些部队把军人俱乐部看成只作文化娱乐工作的机关，致使俱乐部工作内容贫乏，今后应扩充俱乐部的工作内容。

（七）由于发展了伟大的生产运动，把连队的经济工作提到比前更加重要的地位了，因此应该重视连队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工作。连队经济委员会应由选举产生，官长可以当选，但不超过三分之一。其职权为计划、组织与监督连队的生产、消费及防止贪污浪费等，为连队全体人员特别是为战士群众谋物质福利的一切必要事项。连队经济委员会应脱离俱乐部而独立，支部应经常注意其工作。

（八）改变支部与连队政治工作并立的制度。支部除接受总支委领导之外，应该接受连指导员的领导，指导员兼任支书。支

部在纯粹党务问题上（如接受党员、开除与处分党员，以及处理党内纠纷等），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得个人包办。在全连事务和政治工作方面，支部应经常与连长取得意见上的一致，并应尊重连长的意见。

（九）根据中央决定，每年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举行拥政爱民运动。全军应利用这个时间，在所有连队中进行拥政爱民的深刻教育。这一制度的规定及其认真实行，将使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获得极大的改善，全军都应重视这一方式。

（十）每年举行一次至三次以教育为目的的反省坦白运动。每个连队，在一年中择一个至三个适当的机会，每次三天至五天，举行连队的反省坦白大会，根据“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在高度的同志友爱互助精神之下，使每个干部与战士均把心中的不满情绪，打骂现象，想逃亡的心理，奸细分子勾结与破坏的现象，物质困难情形，侵犯民众利益现象，不尊重党政不尊重上级现象，以及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等，一概反省出来，坦白出来，然后由连队支部及行政首长收集起来，一面反映到上级去，一面讨论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切实办法。这种方式，现已在很多部队中证明是发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战斗情绪，提高领导威信，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消灭逃亡现象，破获奸细分子，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很好方式，上级领导机关应很好地注意组织之，应在事前有各种积极准备及精神上的酝酿，使这种大会在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不是惩罚的，而是教育的，不是冷淡的，而是热烈的空气之中去进行，使这种大会成为干部与战士团结一致的真正教育性质的群众大会。如果一年中开两次至三次时，其中有一次可在拥政爱民月内举行。

（十一）以分区以旅以团或以营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战斗英

雄、劳动英雄及各方面模范工作者的会议（如果合开时，可以总名之曰群英大会）。各种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应经过认真的选择与民主的选举，真正是广大群众所佩服的人物，并在选出及开会以后，经常注意培养他们。这些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中，大多数应从战士及杂务人员中选出，但须有相当一部分从初级下级及中级干部中选出来。在这种大会上，应给予优异者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奖励，并在报纸上予以发扬，号召群众学习他们。

（十二）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分区为单位或旅团为单位全年举行一次。代表经选举产生。

（十三）恢复古田决议的书宣组联席会议，分区或旅或团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

（十四）全营集合讲话，每月一次。一有可能，应举行全旅及全团的集合讲话。应重视此种集合讲话，把它当作提高战士情绪、统一全军意志的主要方式之一。此种讲话，由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负责人共同出席。此种讲话的精神，应是鼓励多于批评（连队集合讲话亦应有此种精神）。

（十五）报告与表格的目的，是为着反映部队及其工作的发展情形，使上级能够据以了解那里的问题所在，给以适当的指导。今后应当废止那些不分析工作发展过程，不指明问题在什么地方，千篇一律，毫无内容的报告方式，提倡能够生动地反映工作发展过程，能够指明成绩所在及为什么获得此种成绩的原因，能够指明矛盾所在，困难所在，问题所在及为什么发生此种矛盾，此种困难，此种问题的原因，以及自己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困难与问题的意见这样一种报告。少作按周按月按年的报告，多作叙述事件起讫，叙述过程发展的报告。表格也要废止繁杂而不切实用的，提倡简明而切合实用的。

(十六) 机关工作人员应以少而精为原则。并应改造某些机关工作中所盛行的那种“办公事”式，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不良作风。

我的这个报告，经过很久的积累，又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到会同志的多次座谈，收集了各方的意见，前方来的军事工作同志与政治工作同志又提供了许多意见，并经过中央同志及西北局同志的指导，才这样地做出来。如果大家认为恰当，我们就决定照此去做。只要全军上中下各级干部的思想打通了，工作成绩是会很快看见的。在整风的精神之下，我们坚决相信，全军将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神圣任务，我们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根据解放社1944年5月出版的铅印本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 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 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

华中局并转鄂豫边区党委，北方局并转冀鲁豫分局：

(一)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攻，目的在打通平汉线并控制陇海路潼关以东一段，估计敌人暂时不会退出，河南平汉路以东及河南大部地区已成敌后地区，而国民党汤恩伯等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

(二)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及国内国外各种压力之下，最近又对我党表示好感，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已应国民党之邀请前赴重庆进行谈判。目前我们在各方面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和国民党方面的磨擦，妨碍大局，此点前已通令各地。

(三)然而河南地方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现在河南党的组织与中央已断绝

关系，中央无法派人前去指导。为此，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应分担发动与指导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中央决定：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路以东之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及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豫鄂边区党委与淮北区党委负责。

（四）上述各负责党委应即切实侦察河南皖北情况，并选择河南皖北干部党员，秘密派回去进行群众工作及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抗日游击队与人民武装，以便将来能给河南皖北敌后游击战争以一般指导。但在目前我们所组织的游击队，暂时不得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党的关系亦应暂时秘密。它们一律以地方人民保卫家乡的游击队名义出现，至派回之干部党员及其所组织的游击队之具体活动及工作，由上述各该党委依照具体情形给以指导，并将情况报告中央。

书 记 处

五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发动与争取基本群众的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华中局：

华中来延干部据称：去冬睢邳铜⁽¹⁾地区即已开始了反恶霸的群众运动，如算旧帐，昭雪几十年的冤案等。最近新华华中分社又报导淮北行署发动的反贪污斗争，其内容包括公款，公地，公物，公粮及吞没大众的钱，物，抢粮等，期限从民国元年算起，并要以分半给息，土地则以每年收益计算偿还，本人死后，儿子负责等。上述的问题，如作为个别的案件，发动群众经由政府或法院依具体情况公允处理，要犯主给苦主以适当的赔偿，要吞没者吐出一部分，只要不超过可能，达到双方关系的调整和正气的伸张，则这些措施是有意义的，应该审慎去分别办理，但如作为普遍的群众运动，而党与政府公开号召，且加以组织和领导，则其弊害甚大，如淮北真在进行此种反恶霸，算贪污积年旧帐的群众斗争，那是可以引起不良结果的，应该加以纠正。

华中各地为了发动与争取基本群众，或使群众运动

更深入，其方针应该是：在新区澈底实行减租减息，在老区发展生产运动。就是说，从减租减息到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方针，应正确的澈底执行，不宜用其他办法去代替，反恶霸和算旧帐，只能限于个别的顽固家伙，期限亦不能那样长，亦不能采用减租息那样普遍的群众运动方式。华中几年的减租运动，均获得很大成绩，目前宜以生产运动号召各阶级参加，一面更能提高和保护基本群众的利益，一面也更能使中上层阶级认识我党的建设能力，缓和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而不是无限度的对他们进攻，并真心保护其合法权益。特别华中各老区在几年的紧张的群众运动之后，在策略上不宜继续紧张下去，普遍的反恶霸算旧帐，必致造成过分震动，某些方面人人自危，给予特工和二流子等以活动机会，甚至“逼上梁山”，破坏根据地的抗日秩序，而妨害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并影响各阶级间的抗日团结。请你们考虑此电后，转告淮北，按实况加以纠正，并告知各区党委查照。

中 央

卅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睢邳铜，指江苏省睢宁、邳县、铜山。

中央关于改订华中财税 政策给饶漱石、张云逸、 曾山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饶张曾：

卅日据陈毅同志报告：

华中过去几年来实行征收公粮的合理负担制度，比较把负担重点放在中上层阶级方面，于一九四二年加征用赋亦复如此，同时几年来货检税收入甚大，这些办法在初期均是必要的，而且是适合当时情况的，依靠他保证了抗战经费之供应无缺。由于贫苦工农无负担或负担少，也有助于工农生活之改善，这些均对根据地之创立和巩固，起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由于华中根据地群众斗争业已深入，根据地内部阶级关系呈露着新的变化，如贫农中农不断上升，中小地主降落或转移和出卖其土地等，雇农贫农无负担或负担很少，实际上有许多已提到富裕阶段。另一方面，某些中农和富农及中小地主负担较重，许多大地主负担比重反而是很少，同时货检税是一种间接税制度，商家获利极巨而负担特少。你们应考虑这些新情况，去适当

改订华中的财税政策。

根据华北及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以统一累进税制代替合理负担制度，则可收得下列效果：一，使负担面扩大，负担量减轻，于财政收入总额并无妨害；二，征税比较公允，可以刺激根据地的生产向前发展；三，按富力逐步累进，使根据地每一公民，均负担一定的不过量的纳税义务（免征者除外），不致有畸轻畸重之弊，这样，可相当调整根据地各阶级关系，特别是对中间势力的争取有极大意义；四，统累税办得好，才算根本扫除了旧时代的苛捐杂税遗迹，而扩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影响，你们应考虑在华中实施统累税的具体办法。

这一工作有两方面：第一，在农业累进税方面，其繁难处在于土地调查和登记；第二，商业累进税方面，其繁难处在于富力计算，如资产利润的估计；此外便是免征点，累进率和最高点的适当规定。这些均应经过极其仔细的调查研究。一般说来，在华中党与群众工作有基础的地方，只要领导得法，上述困难是可以顺畅解决的。你们可在今年秋季开始在几个中心县区试行，取得经验，事前并不发动讨论，征求人民的意见，以便明年能比较普遍实施，你们可向北方局要参考材料，延安亦可供给你们一些。

中 央

五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总政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

抗战数年来，我党我军在瓦解敌军争取俘虏工作上，是经过了努力并获得了一些成绩的。主要表现：在争取敌军俘虏中培养了一批日人干部，并在许多地区建立起日人自己的反战组织，此种组织，已在敌军中发生着相当的影响，在工作中积聚了初步的经验，这就为我们今后的敌军工作造成了新的有利条件。今后应以更大的努力采取更大的规模去进行敌军工作。估计到日本军队的民族特点，和上述条件的变化，总政对敌军工作有以下指示：

(一)决定凡有了日人干部，而这些日人干部政治上又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组织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为适应此种改变，对解放联盟与敌工部门之间的关系作如下之具体规定：

甲、敌工部分担的工作：

子、定期听取联盟关于敌军工作的报告，并与日本同志共同讨论和决定敌军工作的新方针与带政策性质的诸问题。

丑、审查与批准联盟所起草的各种工作（宣传教育、新来俘虏的处理、人事等等）计划，并切实援助其工作之完成。

寅、联盟对上级送出之工作报告，应经过自己的负责审查，并在报告上副署。

卯、日人干部政治教育的指导及援助。

辰、汇集及研究各种材料及情报，并译成中文。

巳、工作经费的审查与批准，及帮助联盟总务工作的建立与其他困难的解决。

午、负责保护日本同志的安全，特别在敌人扫荡时与工作行动中要有更多的关心。

乙、解放联盟分担的工作：

子、向敌工部门作定期的工作报告，并接受其领导与指示。

丑、有关联盟内部问题的解决。

寅、对敌军工作计划方案的提出及其执行。

卯、对于新来者及一般盟员之教育与审查。

辰、供给敌工部门关于敌国敌军方面的各种材料。

巳、处理批准之经费及联盟本身之总务工作（须通过中国干部来做）。

（二）敌军工作的方针：目前仍应着重于强化对敌军的宣传。在宣传内容上，除应利用敌军内部的矛盾与日益恶化的生活问题，以掀起士兵的不满与斗争外，更应善于抓着政治形势中不利于敌人的方面，扩大宣传，以增强士兵的厌战与失败情绪。本年二月延安日人解放联盟所通过的斗争纲领，应用浅显通俗的文字作广泛深入的宣传，以扩大联盟影响。依据日本士兵的觉悟程度，目前仍不宜于提出过高的政治宣传的口号，但利用日人共产主义团体的名义，与通俗化的表现形式，适当的宣传共产主义与启发阶级觉悟的思想，亦是可而且应该逐渐开始进行的。在宣传方式方法上，根据过去经验，应注意以下各点：

子、在宣传同盟国胜利或日本失败时，要善于利用日本消息的本身来暴露其前后矛盾，以揭破敌方消息之欺骗性，和证实我方宣传之真实性，若只照抄我方电讯，不仅会减少宣传效用，甚至会引起日本士兵的反感。

丑、各地联盟支部，最好均能发行小型报纸。这类报纸的形式与署名，可以不一定用反战同盟或解放联盟的名义，而以各种敌方已有的地方小型报纸的伪装形式出现。

寅、对于慰问袋和物品的赠送，信件的往还以及喊话、打电话等等联欢工作，经验证明是最有效果的宣传方法，今后必须普遍的更好的采用。

卯、应当善于抓着反扫荡的时机，遍写标语与广发

传单，使敌兵进入我根据地内即到处接触我方宣传。

关于宣传品，除主要依靠各地自行写制外，延安今后每星期二五两次，每次上午九点钟用日语罗马字向各地播送，此间写制之宣传品的教材，望各地按期收听并确实利用。

至于开展敌军内部及日本居留民中的组织工作，目前应即想尽一切方法去进行，但估计到敌人宪兵及特务组织之严密与狡猾，任何在敌军及日本居留民中的革命组织，必须采取十分谨慎和秘密的方法，各个秘密组织之间亦不能使之发生相互关系，而应分别的单个的与根据地内解放联盟联系。这种组织工作开始时可利用经常与敌军接近的可靠的老百姓、伪军、伪政权、或利用敌人军队中的翻译官，以及经过适当教育而后释放回去的俘虏等。在可能条件下，各地并应注意培养这类的日人干部。

(三)为更多培养日本革命力量，确定今后原则上不释放日本俘虏。但有下列情形者例外：

子、对我军俘虏政策影响尚少之日军部队，而有以释放俘虏作宣传之必要者；

丑、战况紧急或其他原因无法带走者；

寅、无教育希望者，如残废老弱妇女等。

为便于新来俘虏的处理，各地可酌量设置日人弟兄招待所，以便新来俘虏的收容隔离与进行考察，同时对于决定释放之俘虏，亦可在此种招待所内经过一定教育

后，再行释放。

估计敌后环境的困难，决定今后各地的所有俘虏，在可能情况下，一律送来延安，以便进行有系统的教育。至各地所需之工作干部，当由延安将培养较为成熟之干部陆续派出。此间并在晋西北开设有日本工农学校分校，各地送延之日人，须先送该校，经过初步教育后，再转延安。

（四）因为决定敌军工作某些组织上的改变，各级政治部及其敌工部门，对此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切不可以为今后的敌军工作经过解放联盟及日本干部去进行，而自己却可以减轻责任。根据此次由前方回延之日本同志的反映，某些地区对于他们的工作指导，与应有的信任，以及生活上的关心，都是十分不够的。在今后给他们以更大任务与更多工作的情形下，必须更多的信任他们与更多的关心他们。在生活上，必须尊重他们的民族情调，在对他们工作领导的方式上，必须采取多同他们商量与讨论的办法；除着重方针与政策的领导外，关于具体工作的进行，则应多尊重他们的意见。只有如此，才能更大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也才能有利于工作，有利于我们的对敌斗争。应当了解：认真同日本同志共同工作，并用一切努力帮助日本同志的进步，不仅为我军今日抗战所必须，而且是为我们国际共产党人替将来日本革命准备干部不可推诿的责任。过去有些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因而对日本同志产生了不正确态度的地方，

是应当认真改正的。

各地收到此指示后，应在敌工部门及解放联盟内部同时进行传达与讨论，并将执行情形随时电告。此件发到各级政治部敌工部科。

总 政

六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一)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士〔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仅在没有我党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的地方，我党才不能负此责任。

(二)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线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去〕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

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三)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四)要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必须解决下列诸项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思想：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

服从这个目标。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为了这样的目标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迅速的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广泛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或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又要使干部了解：为着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国特殊条件，城市武装起义，常常只有在响应城外进攻军队的条件下，即在里应外合条件下，才有胜利可能（例如一九二七年上海起义），而没有城外军事行动配合的单独城市起义，是很难胜利的。因此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的或者过早的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又要使干部了解：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

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该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第二，关于计划与组织：各局各委应依据自己所属地区内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与伪军伪警的具体情况，拟定一个大体计划，例如如何分工负责，如何组织机关，如何配备干部与训练干部等。应该以每一个城市（大的，中等的和小的），每一段铁路公路，每一个伪军部队与伪警组织为工作对象，都组织一个有能力的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大城市与大部队还可组织几个委员会，分头分区去工作。此种委员会不作根据地工作，专门负责组织与指导各该城市要道与伪军中的工作。此种委员会目前可设在根据地内或游击区内，如有安全条件，则设在城内。各局各区党委，对所属大城市、中等城市及重要铁路，应委托在自己直接指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去工作，各敌占县城及小城市，则在各地委或县委指导下组织委员会去工作。对于经常调动的伪军中的每一个军或师，应在适当党委指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去工作。但是同时，这种工作还应动员全党全军一切组织，多头的与分路的去进行，从支部到中央局各级组织，只要它对城市与交通要道及伪军伪警有办法去进行工作者，均应直接派人去工作，暂时不必统一，关系亦不必交代；如

各种关系在工作中群众中碰头时，则应彼此关照协助，不应彼此争夺和抱怨。这种工作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但为管理方便起见，在各局及区党委之下，可成立城市工作部门，这种部门除指导和组织城市与交通要道秘密工作外，还应指导敌区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的小型便衣游击队，借此给城市工作以便利，这种部门应驻在根据地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与根据地党政军混在一块。

第三，关于工作方向：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大局有利于我，城市与要道周围或其不远地方又有我党强大军队与根据地，这种工作将有极大开展的客观条件。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人民中，除开极少数死心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外，大多数人是能够参加或同情各种各样抗日工作的，因此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一切群众中，各界人民中，都要进行广泛而妥善的工作，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但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不应与国民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应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人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

益，不顾民族利益，肃清大城市群众中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过去我们在大城市为情报及经济工作而建立的组织与关系，仍应进行情报与经济工作。只在可能情况下去进行一些上层活动与群众工作。为了广泛造成根据地与城市（特别大城市）和要道的交通联系，并为准备夺取城市和要道的军事出发地，应在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的人民中进行充分的工作，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第四，关于工作方法：到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方法，应从总结已有经验中取得，并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但应指出：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

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应用心研究适合每一个地点，每一种群众，当时环境中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斗争形式。在敌占区，党和抗日团体的组织，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应该注意精干隐蔽，严防特务分子混入。但各种普通群众组织与群众活动，就应该公开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去进行。例如利用已有各种伪组织（新民会自卫团等），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或建立纯粹的但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职业机关与职业活动（茶馆、饭店、荐头房等）。甚至利用工厂、工房、学校、店铺，在为了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成立其中所有人员某种无定形的联盟，亦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常看到根据地附近乡村中全村人联盟，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的严密组织和分工，这种办法，应该运用到城市某些工厂、工房、学校、店铺中去。应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群众联合起来，例如减轻负担，免除骚扰，隐藏物资以及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均可以成为群众联合活动的出发点。而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欺骗作法，则大可成为我们和群众利用的合法口号。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区各阶层人民中的极高威信，亦可成为我们城市工作的有利资本，许多人以听到我军消息，与我军建立某种联系，取得我军某种证件为荣耀者，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形去促进人民的团结，但这在敌区是非法的，应该十分隐蔽的有限度的去利用。在目前，城市和要道的一切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以不妨碍

和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和合法斗争为限度。这点与根据地附近游击区中的合法与非法联系的斗争，是有些区别的，在游击区中的合法斗争，常常是为了掩护非法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而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则相反，非法斗争常常应该服从合法斗争。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利用各种合法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并利用各种合法口号去进行。各种非法宣传也是应该进行的，但应切实考虑其方法。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而在举行起义以前，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形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形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

第五，关于干部：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但应使他们吸收新经验，并在新方针下，用新方法去工作。

其次，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一些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种职业者，或党与非党干部均可。而这种干部，现在各根据地是很多的。再次，就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作工、谋事，特别是在苏北与胶东，每年有数十万人到上海、杭州及满洲各城市谋生。因此，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此外，在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干部放回去。根据地士绅到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他以某种任务和名义到城市去活动。就是根据地中因有某种政治嫌疑而不易弄清楚者，亦可派他们到敌占城市进行某种独立活动来考察他。而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的与分路的去做。

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此外，在根据地中，各级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均应切实研究与学习城市工作，研究城市的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斗争艺术，研究建立城市革命秩序，掌管城市及大的工商业，作为将来夺取与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

第六，关于经费：必须有大批经费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只要不引起干部的浪费及城市工作人员的雇佣观念，一切必须的经费，是应该充分付给的。各根据地各种组织，为了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必须开支，应准予报销，在各根据地预算中，应准备一笔充足的城市工作经费。发给资本到城市与要路去做生意，以其盈利充工作经费的办法，也是可以采用的。

(五)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中 共 中 央

六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西北 参观团的致辞、问题与答复*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一)毛主席致辞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二) 问题与答复

问 题

斯坦因先生问：毛主席能否谈一谈，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情形？

夏南汗神父问：上述问题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先生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请毛主席将

一九三六年国共谈判情形与今日谈判情形作一比较。

爱卜斯坦先生问：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以阐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谢爽秋先生问：为着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烺先生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增加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毛主席答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他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发展，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

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

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澈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

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根据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刊印

关于华中部队 准备向河南发展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陈毅
致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电)

张饶李郑：

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般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1〕亦将不守，敌由广韶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五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五师方面只宜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四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阜颖〔2〕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总之，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目前从各种有利的准备入手，请将五师四师在这方面的准备情形见告，另一面敌寇在粤汉

路大举攻蒋，目前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均构成了极宽广的敌后地区，我五师宜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指示他们就当地敌后的实情向南推进，预先占领一二线阵地也是必要的，宜调查通山通城阳新境内九宫山脉的情况，就可能作相机推进，鄂南发展是仅较河南为次的，发展方向亦请你们考虑见告。

刘少奇

陈毅

廿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衡州，指今湖南省衡阳。

〔2〕“颖”为“颍”之误。涡蒙阜颖，指安徽省西北部的涡阳、蒙城、阜阳、颍上。

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一)全军目前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一十万（各地报告数字恐有些不确实），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从背后来的袭击），则是不够用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敌人现在正向正面战场进攻，若干根据地当面敌情有某些暂时的变动；第二战场开辟，红军大举进攻，美国对日进攻更加积极等捷讯，又可长抗战之志气，灭敌伪之威风，这些条件，均使我们可能与应该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与扩大军事力量。但是就扩大军事力量一点来说，在目前时期内，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则仍然受着种种限制。一则目前人力、物力、财力仍然差不多和过去几年一样，严格地限制我们，过去精兵简政正是为着适应此种限制，现在条件基本上没有变更（上层中层机构精简方针仍应坚持不变）。二则敌人从正面回师扫荡及从满

洲抽兵入关，都有可能，战争越接近胜利，将会越困难，如同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那样，再来一个极端困难时期，不是没有可能的，还要准备对付使我们陷入更大困难的突然事变，所有这些可能的困难，我们均要事先作好精神上、物质上与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方能有备无患。三则我军多年分散游击，极少训练，尚不巩固；我军经过了七年抗战锻炼，从这一方面来说，是提高了。但是我军现在进行的是极端分散的游击战争（这是完全必要的），极少集中整训与集中作战，从这一方面来说是退步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目前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一般地不可能与不应该采取扩大军队的政策。我们的中心政策是应该抓住目前时机，除对付敌伪扫荡蚕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根据地，并以大力争取伪军伪警及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上的广大群众之外，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这不论对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种任务，则我们将来之大发展与我们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任务必会受到妨碍。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提高、深入与巩固，须特别唤起同志们注意。

（二）因此我们向你们提议，在一年内，主要是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由各局各委作出全般计划，由军区军分区负责执行，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有特别便利条件者，几个团或一个团为单位分批集中整训，无此种条件者，以营以连为单位分批集中整训，总使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训。

（三）整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方法，第一，实行群众运动的方法，改变过去少数人包办，即司令部与教员包办的作风，而变教育为广大群众自己的事业，使群众（干部、战士、杂务人员）自觉学习，自动研究，互相帮助，互相比赛；各个人，各大小单位的群众都关心自己个人与单位的教育成绩，生怕成绩落在其他同志与其他单位的后面；使到处成为操场，到处成为课堂，时间抓得很紧，人人不甘落后；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第二，实行学用一致的方法，改变过去教条主义的练兵方法。过去的教条主义练兵方法，是使书本成为教育的唯一根据，结果使教育停止在书本范围以内，把宝贵的现实经验置之不问，教者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强迫灌输，不能启发群众的积极性，表面很忙，实际上无多大成绩；学者是事不关己，反认学习是痛苦，是不必要的负担。关于过去我军的军事教育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切都是教条主义

形式主义的，其中有许多曾经是有益处的，合乎实用的，过去的书本教育对于我军有其一方面的进步性与益处。但是过去的方法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弊病，则是事实，而且没有受到必要的批判。此次练兵，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不是不要书本，而是正确地运用书本，将书本上不合实用的加以删削，而将书本上没有包括的东西（我们的具体经验）加入进去，并且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总之，练兵内容要切实实用，不是为练兵而练兵，而是为战胜敌人而练兵。第三，练兵的领导方法：动员要普遍到每一个战士，使人人都了解练兵的必要，注意说服落后分子，打通思想。要使骨干与群众相结合，所有干部与战士中的积极分子，在操场上都和一般战士一样操作，一样守纪律。要创造与发现典型例子，将其经验介绍给全体，并请有优良成绩的战士当教员，要以分区或以团为单位召开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训练一时期后，每个伙食单位用无记名投票法选出干部一人，战士二人为代表，到团部或分区去开会，总结经验，发动竞赛，奖励积极分子。关于练兵方法以及练兵内容，军委将有详细介绍，这里只指出几个方法上的要点。

（四）一年整训期内，政治工作须作一次普遍的澈底的有计划的改造，根据古田决议及谭政报告，用检讨错误缺点，发扬优良成绩，发扬模范连队的经验，奖励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与模范学习者的方法，达到改造政治工作之目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整个整训

任务的完成。

（五）上述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改造，包括全军四十七万主力军与游击队在内，均须在一年内达到大整训一次的目的。我们还有二百万民兵与更多的自卫军，他们不但是现在坚持与发展根据地配合主力军与游击队作战的决不可少与极有成效的力量，而且是将来使我军扩大一倍至数倍的主要兵源。一年大整训期内，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各局、各委及各军区、军分区，应分别作出关于主力军与游击队部分及关于民兵与自卫军部分两种整训计划，分头、分区、分期进行整训。在整训民兵与自卫军中，应总结民兵与自卫军的斗争经验，重新整理其编制，不足者扩大之，落后者提高之，缺乏干部者补充之，在不违农时及劳动与战斗相结合的原则下，达到全民皆兵之目的。民兵自卫军的整训方法，亦须实行群众运动，学用一致，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介绍典型经验，发动竞赛，开英雄大会与模范学习者大会，奖励优良成绩等。各级军政党机关对民兵自卫军工作过去注意不足者，须作自我批评；军区，军分区政治工作部门过去对民兵自卫军中政治工作的指导与帮助注意不足者，须立即加强注意。

（六）为着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时，扩大我军一倍至数倍，对于大批训练干部，应引起各级党委及各级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的极大注意，现在不论主力军、游击队或是民兵自卫军，我们的干部对于技术与战术程度，

对于练兵、带兵、用兵、养兵的能力，一般都不很高，有些则是很低的；对于政治认识与政治工作，一般都有缺点，有些则是很差的。如果还不及时加以整训，势将妨碍将来重大任务的执行。但是同时，不论在我们的主力军与游击队中，或是在民兵与自卫军中，都包藏着广大勇敢聪明与有极大发展前途的干部与士兵。我们的干部与整个军队有极大的成绩，干部水平的不高及某种落后是可以克服的。在一年整训期内，各局各委及各军区军分区应有一个训练干部的切实计划，分别在各军区军分区及县级实行。在军区者，有抗大分校，轮训当地连长连政指以上军政干部及训练由当地党政民工作准备转入军队担任连级以上工作之干部。再则，普通中等以上学校亦须加入军事教育课程。在军分区者，应办教导队，以训练军队班长排长与民兵自卫军排长两类干部为目的。前者应包括轮训主力与游击队中的排长班长及训练由当地党政民工作准备转入军队担任班长排长工作的干部，其期限由各地酌定。后者时间一月至二月，派回本地工作。在县级者应办民兵自卫军班长一级的教导队，轮训一月即归本乡，造成广大群众武装的干部。各地应自己创造多种训练方法，利用战斗与生产间隙去进行。

(七)请你们将关于一年大整训的任务，提交所属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加以研究，定出计划，开始执行。为着使这个一年大整训的计划变为群众热烈参加的运动并获得实效，必须在一次包括全根据地的党政军高

级干部会上讲通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及其实践的方针政策，会毕并应仿照去冬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例子，所有高级干部，不分文武，一律参加，下操五天至七天（身体太差者在操场旁观），造成大整训的决心与热潮。还须注意者，时间虽定一年，但是主要应抓住今冬十一月至明春二月共四个月为整训中心关节。今秋八九十三个月则须训练好一部分武工队，一部分游击队及一部分主力，准备到冬季去接替其他部队，分期集中整训。民兵自卫军的分期轮训计划，由你们酌定之。

(八)此外，在发展军政党公营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以一九四三年负担作标准)，并十分注意保护壮丁，休养民力的原则下，应按照各地须要情形，酌量吸收若干新兵，补充连队之消耗，保持各战略区军队之总数量。如果我军在一年整训期满时能够保持全军四十七万至五十万，又获得一次大整训，那就算是很大的成功。再则，本指示所提出之整训与提高部队质量之方针，不能误解为放松上中层机构的精简，也不能误解为要改变目前部队的分散游击性，须知精简政策与分散游击政策在目前时期仍是完全需要的。

中共中央

七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

(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

(一)纪念七七，向全国抗战同胞致敬！向正面战场上努力作战的军队致敬！向敌后战场的八千万抗日同胞致敬！向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致敬！向沦陷区抗日同胞致敬！向援助中国抗战的美苏英盟邦致敬！

(二)纪念七七，加强抗日战争，全国军队必须积极作战，加强团结，粉碎敌人的新进攻！

(三)西南危急，西北危急，全国人民快快起来，保卫西南，保卫西北，不让敌人打通粤汉路、湘桂路，不让敌人打进潼关，把进攻的敌人打出去！

(四)要求国民政府切实改善士兵的待遇和教育，改革军事机构，提高军纪和战斗力，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五)要求国民政府保护目前大后方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使得这个运动得到自由发展，增加抗战的力量！

(六)要求国民政府快快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发弹发

药，改进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让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河南湖南前线去，打退敌人的包围封锁与进攻！

（七）要求国民政府快快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释放叶挺军长和一切被俘将士！释放各地被捕的共产党员。释放一切被捕的爱国志士！

（八）纪念七七，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加强全国团结，立即改革内政，立即实行民主，以便澈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九）要求国民政府快快实行三民主义，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动员全国人民，打退敌人的进攻，准备全国的反攻！

（十）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党禁，允许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并在加强抗战实行民主的基础上，迅速调整国共关系，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

（十一）要求国民政府废除统制经济，取缔投机操纵与囤积居奇，实行发展农业生产，奖励民营工商业，克服经济危机，培养抗战的经济基础！

（十二）纪念七七，敌后军民要再接再厉，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阻止敌人的进攻，驱逐敌人出中国！

（十三）八路军新四军，要继续积极作战，无情的歼灭敌人，加强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更加发展民兵与游击队，更加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瓦解敌伪的政治工作，准备变成全国反攻的先锋军！

(十四)陕甘宁边区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要继续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发展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发展各界人民的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公益事业的合作社，改善军民生活，准备反攻的物质基础！

(十五)坚决实施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没有减租的澈底减租，发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驱逐日寇而奋斗！

(十六)继续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工作，全体军民团结一致，打倒日本法西斯！

(十七)一切共产党员，要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坚持实行三三制，坚持与美苏英亲密合作，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虚心学习，力戒骄傲，艰苦奋斗，迎接反攻，完成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

(十八)沦陷区的同胞们！你们解放的时刻迫近了，继续各种形式的大小斗争，反抗日寇占领者，聚集力量，加强准备，准备在必要时以武装起义来响应将来的全国总反攻！

(十九)纪念七七，加强中国与美苏英及一切联合国的团结，争取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灭一切法西斯势力！

(二十)庆祝第二战场的胜利，庆祝苏联反攻的胜利，庆祝太平洋上的胜利，庆祝印缅前线的胜利，中国军民要与美英盟邦共同动作，积极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中

国！

（二十一）给来华作战的盟军以一切帮助！援助和救护盟邦飞行人员！

（二十二）拥护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决定，坚决实行这些决定，在日前，积极打倒法西斯，在战后，保持长期的国际和平！

（二十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伟大的保卫祖国战争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二十四）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世界万岁！

根据1944年7月6日《解放日报》刊印

中央关于五师工作给 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 陈少敏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

郑、李、任、陈并告华中局：

午江电悉。

(一)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

(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们地区来。中央已令华北派部队到密县、登封、淮阳、西华一带活动，望你们由信阳、罗山逐渐向北发展。目前你们有一个团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是好的，但须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机会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能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四)中央准备派一百个以上高级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并带各种材料给你们，只要交通有办法，在

两三个月以后，即可从延安起身。

(五)望你们注意侦察河南及湘鄂赣敌友我三方情况，随时电告我们。

中 央

七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附：

关于五师工作和 向河南发展等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郑位三、李先念、
任质彬、陈少敏致张云逸、饶漱石、
曾山并刘少奇、陈毅电)

张、饶、曾并刘、陈：

关于河南战略任务指示电收到。我们对河南发展的可能和需要，完全同意来电。我们正开扩大会，主要议程是两个，方针与秋收。关于方针问题，关系河南工作，特作以下报告，请求指示为禱。

(甲)我们现在存在几个困难，确与发展河南的任务矛盾：

(一)严重的财政困难，根据现在与明年的初步预算，照现在的物价，少肆个月的给养。边币完全是欠的(吃了的)，边币价低到三分之一，财政困难成为主要危险，河南又是不好解决财政之区。

(二)地方工作落后的现象,还很严重。主要地区群众,还未组织起来。主要地区如果抽兵、抽干部太快,即有由放松而走到不得不放弃的可能。我们认为二等分区万不能因为发展河南而失去,即是说,抽兵、抽干部太早,恐地区主要部分有失去之危险。

(三)干部的数量,只有需要的三分之一,分子复杂,数年来无时间学习和教育,工作经验未经整理,工作效率亦不大。加之师级到团级长病四十人左右,最近数月已成难支持局面之势。这些问题,都有事寔和数目字,表明并未夸大。

(乙)经我们一周详细交换意见之后,认为至少在半年以内,仍应布置原地区的巩固工作为主,逐渐增加力量。发展河南,必须对财政的危机,基本上有所克服,基本区群众组织以后,才可较多转移力量到河南。如果认为这样是对的,那么,对河南工作,提议:

(一)中央多调别的力量,少指望我们;

(二)我们请中央及华中局多派干部来,以便将河南干部完全抽去。

(丙)我们拟马上组织河南工作等于地委,兵力约七个连,暂在原来信、罗两县境内推进工作,河南内地照五月指示进行。我们有河南干部三百人左右,目前至多抽三十人左右。但靠个人威信和关系,在地方能成立武装的干部,却很难找。大家都是希望新四军去才有办法,统战的好关系也少。由此看来,河南工作条件,还不能算是很容易的。是否有当,请即指示,以便贯彻方针。扩大会中详情,尚待扩大会再报。

郑、李、任、陈

午江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 大资产阶级及美英资产阶级的 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

分局：

(一)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其抗日一点上是有革命性的，应该联合的，这是主要的；但其抗日不积极，又反对民主，故其革命性不大。对其不积极抗日与反对民主的反革命一面，应该坚决斗争，但这是为着联合抗日这个中心目的而进行的斗争，是服从于联合抗日的。抗日的地主军阀亦均有这样的两面性，我们至今亦均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联合与斗争)对待之。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其留在敌占区者或买办化，或受敌伪压迫无法发展而要求抗日；其迁至大后方者，亦因受买办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的压迫而无法发展，并因此而要求民主。故中国民族大资产阶级只占极少数。以上各点均请参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二)同样，反法西斯的美英资产阶级，在其反法西

斯一点上均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这是一九四一年以后，世界的决定变化。在学习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的各种文件（如《新民主主义论》）时不可忘记此点。但美英资产阶级内部亦各有许多派别，其亲德日的派别是反动的，其联苏而又反苏、反法西斯而又反民主的派别是革命性较小的，而如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则比较着重于联苏与民主，其革命性亦较大。故美国无产阶级亦积极支持之，以共同反对法西斯与国内的孤立派、顽固派。

（三）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但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望你们告诉同志，叫他们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

中宣部

七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附：

晋察冀分局关于大资产阶级 有无革命性问题的请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

中央：

分局直属各机关与党校在反法西斯的学习中展开了四十天的大论战，大体上已告一段落，详情另报。现在有一个争论的问题还没有得出适当的结论，即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的问题，争论双方有无各执一词，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一般的提出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今天争论的重点是属于英美派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否还有一些革命性的问题。

（二）我们认为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仍是两面性的阶级，如只有妥协或反动的一面，则没有联合或保持这种联合的可能与必要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争论，有主张是把他当作用间接后备军或策略上的利用，有主张是战略同盟军。争论未解决，与革命动力有关。

（三）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武汉前后的两面性又各有不同，但有人单纯强调只有抗日或反动一面是不妥的，实在的问题是：（1）抗日是否就是革命性？有人主张抗日与民主或是有革命性，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实行法西斯反对民主那就没有革命性。（2）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抗日是否主要反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有人主张是，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所讲大资产阶级在中

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革命性；又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两重性的阶级，似乎是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也是一个疑问。

(四)地主军阀参加抗日是否有革命性，地主阶级是否有两面性。

(五)英美邱罗派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

(六)大资产阶级除带买办性者外，是否尚有民族大资产阶级和纯粹买办的区别，这一个问题应如何解释，我们还没考虑到成熟意见。因为这是属于全国性的问题，拟于请示中央后作最后答复。特此电告请示。

分局

号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曾王林⁽¹⁾同志并告东江纵队全体指战员，冯白驹同志并告海南岛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

自广州沦陷，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抗战进入了第八年度，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

我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不仅坚持和巩固了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和团结了敌后八千六百余万的人民和二百一十万的民兵并拥有四十七万的正规军，克服了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最困难时期，而且年来在地区和人口上均有极大的发展，冀东我军已挺进至热河、多伦、赤

峰及辽宁之锦州一线。一年来党的十大政策在敌后各根据地获得伟大的成效，使全体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为着坚持根据地和准备对日反攻上空前的团结起来了。

总之，不论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的胜利，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时，则我华南根据地，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国部队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为着迎接新的伟大任务，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固的根据地。

为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你们的斗争情形，望随时将敌伪友及我部队根据地情形电告。

关于冯白驹同志领导下之琼崖抗日部队，因交通中断，此间已无法联络，望你们东江纵队多方设法派人赴该岛与该部取得联系，并建立电台通讯，使华南两大根据地有机的配合起来，并力求与中央取得电讯联络。此

电请曾王林派人转送海南岛。

中共中央军委

七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王林，指王作尧、林平。

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致李先念、
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
冀察晋分局、晋西北电)

各同志：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对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四十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四个师团，蒋军近四十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有十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地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十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

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美英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导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十个师即十万人名义，其余三十七万军队，二百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

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关于收集研究 全国经济情报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组织农工业生产，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已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最重要工作之一，但目前各根据地都感到缺乏敌占大城市和大后方的金融贸易情报。例如：华中及陕甘宁边区急需知道重庆的法币政策，法币，物价，金价的涨落，又需知道平津的联钞政策，与物价运输等等，由于不能适时得到这些情报，因此在对外的金融贸易政策上，常常处于暗中摸索，被动，应付的状态，而使根据地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为了克服这一缺点，特提出下列办法：

(一)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编辑一种带全国性的经济情报，委托各根据地及办事处向一定的大城市收集必要的材料，按期编成情报，通知各根据地作参考。

(二)各根据地及办事处须定期的将被委托搜集的或自己需要汇报的情报，通知西北财经办事处。同时亦可向西北财经办事处要求代为收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情

报。

(三)收集情报地区的划分如下：晋察冀分局负责平津方面，北方局负责太原平津开封洛阳方面，晋绥分局负责太原绥远方面，山东分局负责济南青岛方面，华中局负责上海南京及陇海路东段，鄂豫边区党委负责武汉方面，东江游击支队负责香港方面，重庆办事处负责重庆方面，各地能收集其分工以外地区的情报则更好，情报不怕重复，愈多愈好。

(四)各地负责收集情报的项目随时由西北财经办事处通知，但各地最重要的责任是在收集带战略性的经济情报，例如：(甲)大后方及敌伪的货币政策，及其内部的金融秘密消息；(乙)大后方及敌后对于我有关的某项物资政策(如食盐，棉布的产运销等等)。此外，每周或按期通报几项物价以及物价、金价的涨跌及比价。

(五)为了迅速获得经济情报，各地党须在有关城市中建立经济情报的据点，这些据点的建立最好是利用纯粹的商业关系，同时也可经过党员与同情分子去建立，但必须与秘密党划分开。

(六)上述各地党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收集研究经济情报，每周或每半月或一月用专门的经济情报密码向西北财经办事处通报一次，如遇金融上重大风潮时，随时报告。

(七)各地党接到这一通知，并加以讨论研究后，首先回答我们两点：(甲)如何执行？有何困难？(乙)把自

己所希望知道的情报项目开来。

中 央

七月廿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争取教民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各同志：

关于天主教耶苏〔稣〕教教徒在我根据地及游击区的分布情形，抗战中的表现，我党对他们及他们对我党的态度，多少加入我党者及其表现，各地教堂多少等项，请加以调查随时电告。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中 央

午 养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关于发展 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敌寇进占河南，已打通平汉线，铁道附近地区的小扫荡已在进行，国民党留李品仙、何柱国、陈大庆三个集团军在敌后，企图最后坚持，估计正规军计八万，地方武装不少于十万，敌寇是否向李等大举进攻，还要看以后情况的发展，大举扫荡和暂时保留顽军以阻止我军西进，两种可能均存在。因此，此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情况均有不同，情况更复杂，我军政策应照顾敌伪友我诸方面，更灵活的去适应具体情况，成功关键取决于此。因此我们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我军发展河南，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及其边沿去建立抗战秩序，对李陈何三个集团的地区不应主动楔入，如其向我进攻才可举行严正自卫，不故意去制造磨擦。

(二)发展新区一般规律是首先着重政治宣传，争取同情，建立武装，扩大武装，以自己的军政力量扫除阻碍，使局面初定，即转入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以建立

根据地，这个步骤不宜先后倒置。关于新区武装建立和争取问题，第一，对已有不反我之地方自卫武装应建立友善同情的外围关系，长期帮助耐心争取使其能自觉自愿走我军道路；第二，坚决反我之地方武装及遭人民反对之土匪武装，如争取无效，则应坚决解决之。但对俘获人员不问首从一律采取宽大政策，分别改编或资遣之；第三，还应放手，根据当地政治条件，去建立新的武装，以扩大我军的地方势力，但不得乱发委任，自乱秩序，我军的武装发展是经过团结和争取各种新区武装的道路，反对并存政策和不培植地方武装的剃头政策。

(三)迅速发动群众抗口运动和减租息运动，是我军深入新区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应注意者，第一，我军进入新区第一件大事是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其次除在当地筹粮外，至少最初几个月应自带菜金，筹粮时每户只筹一次，至多不过二次，严禁各部队往来重复向当地人民摊派粮草，人民吃什么，军队即吃什么，不得专向人民另筹米麦细粮。我军三大纪律做得好和筹粮有秩序是我军与河南人民的最初见面礼，敌伪顽我的比较，在人民眼中第一天是从纪律和筹粮的具体行动出发的。第二，我军进入新区多半是敌伪顽等蹂躏过久的地区，人民痛苦最深，我军初到应懂得安定人心，首先给好日子过，多做好事使人人都有来苏之庆，因此不筹饷，不乱打汉奸，不捉人，不罚款，不杀一人，就是坚决的反共分子特务分子，也采取宽大政策资送出境。第三，对

新区应适时发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我军一方面要支援和领导群众的减租息运动，一方面要说服地主执行法令，采用双方协议，我军出面压成的方式，减额不应过高，宜适合双方情况，我军应以关怀双方利益的态度，以迅速达到发动群众运动之目的。

（四）新区政权，我军进入初期应委派自己的县长区长，但要善于吸引当地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出来做事，作我之助手。新政权任务在建立抗日秩序，担任初期军事需求的任务，并努力造成绅民与我军的合作，应召集有绅士参加的座谈会，许多问题都同他们商量。政府还应注意兴办几件与人民福利有关的一些建设，使人民认识新政权不仅向人民要东西，而还能替人民做些有利的事情。新政权的各级改选不宜任意举行，澈底改造应放在群众运动发动之后，国民党旧官吏应吸收其进步分子来共同办事，但不能轻易信任，淆乱人民视听，同时亦不可任意打击或逮捕拘禁造成自己孤立，其卸职家居者如申明愿遵守新政府法令无反动行为，政府应予保护，不侵犯其正当权益。

（五）我军和新政权应注意容纳和吸收当地专门技术人材和知识分子。过去在华北华中这一工作是有缺点的，我们过去所吸收的只是其中进步分子，总比例占少数，大部分对我当〔党〕是消极的，今天在河南应多注意礼遇和容纳各种知识分子替民主政权服务，给以工作机会，对一般青年给以读书机会。旧式中小学应接收逐渐改造，

使其自愿接受我党教育方针，对中小学教师待遇应有所改善。

中 央

七月廿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向河南 敌后进军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华中局并告北局、山东分局：(此电由华中转五师)

一、华中局真电悉。

二、北局已决定由太岳派二个团派〔渡〕河赴豫西工作。冀鲁豫分局已派一个营加强睢杞太〔1〕阵地，四军五师抽七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这是我党向河南敌后地区发展的初期部署。同时华中局提议在四师抽五个团兵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阵地，打通与睢杞太的联系，并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之地区。

三、四师西进部队应配置百名以上地方干部统归雪枫、芝圃率领，加以集训，然后向西开进。

四、四军三师派一部进入淮北地区。

五、鲁南军区可接收运河支队地区，以便四师向西发展；同时冀鲁豫六分区应相机派队打开微山湖西岸局面，以策应四师在南面的发展。

六、中央正在准备派一批干部分发到河南及湘鄂等地工作，最早要到冬初才能动身，各地不要等待，关于

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政策问题详另电。

中 央

七月廿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睢杞太，指河南省睢县、杞县、太康。

中央关于布置湘粤 两省工作和桂林疏散 给董必武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董：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

1、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即白毛）秘密转回湘南布置敌后各县的人民武装斗争，但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占意图的地区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党员，仍应坚守原来隐蔽待机方针不变，周、谢等动身前应训练一两星期，请若飞亦参加此训练。

2、李应吉如由衡阳撤回，仍宜深入商业，不参加秘密工作。

3、孙仁如能由川东调出，最好派回，因他极熟习湘中情形。

4、东江由此间直接电其沿粤汉路向北谋发展。

5、广州湾以北最空虚，该处几无国军，望设法通知

该处同志一方谋武装发展，另方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

6、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廖、柳^{〔1〕}三家宜多接济，以便其能早日移动。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

中 央

午有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叶、廖、柳三家，指叶挺、廖承志、柳亚子三家。

中央关于东江纵队开展敌后 游击战争给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1、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将来此项武装在名义上不一定与东江支队联系，与余汉谋部亦应避免磨擦，以便自己发展。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总此诸事统应由军政委会讨论施行，并统一其指挥。

2、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惟临委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

3、你处仍应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4、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

5、你们与潮梅闽西南最近有无联系，潮、汕附近有无发展游击战争可能，望告。

中 央

午有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请各地扼要答复十项重大问题*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

先念、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同志：

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昧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是些什么？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

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毛泽东

午俭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 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和 组织水手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毛泽东、
刘少奇、陈毅致华中局电)

华中局：

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毛、刘、陈

未江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关于克服财政 困难和生产自救问题给 豫鄂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豫鄂区党委：

未支电悉。

(一)你处财经具体情况及灾荒情况，我们不清楚，望略告。

(二)解决财政困难不外是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除整理税收外，主要应是组织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即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进行种菜、种粮、喂猪、喂鸡鸭，打豆腐、榨油、打鱼及采集各种山货和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均可克服很大的困难。改善部队机关的生活条件，各地均有很好经验，望你们仔细研究。如果部队缺乏土地生产，即可在人民自愿条件下合伙，将部队劳动力和肥料加在人民土地上，因而对所增加的收获，部队能分得若干成。其次，适当的进行对外贸易，组织公营企业，亦可增加一些收入。在节流方面，则需澈底进行精兵简政，将一切不必要的人员马匹裁减，机关部队单位合并，

组织编余人员去专门进行生产。其次，则为进行节省，减少浪费。至于根据地经济困难，则须执行正确的税收、金融、贸易政策，并动员人民来提高生产，才能解决。

(三)关于灾荒问题，应坚决实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应提出生产救灾，大家互助，渡过困难，政府以一切方法保证不饿死肯自救的人等口号去动员组织党内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应批评眼睛向上、专等政府救济，不自生产，坐吃山空等观点。目前应以一切方法，动员一切男女老幼部队机关去抢收秋禾，补种晚禾及番薯豆子等，特别应普遍大种蔬菜，采购各种蔬菜种子广为布种，并将蔬菜晒干，留作冬春食用。又须多种麦子菟豆等，以便明年春末能有收获。其次应普遍采用代食品，如可食之野菜、山花、山果等，储存糠秕瓜果皮及一切可以代食的东西，准备春荒严重时不致饿死人。再次，要防止灾区根据地粮食外流，向无灾区及敌友区购进粮食。政府应设粮食调济所，不使奸商操纵粮价，但不要限制粮价，以免引起黑市及粮食外流。对灾民应普遍实行以工代赈，组织一切待救济而又有劳动力之灾民开荒、开滩、开渠、打坝、打井及进行各种手工业等，并实行贷款、贷粮给灾民去进行商业运输，赚脚价及作小买卖等。如太行山贷给一家一斗粮食几斤棉花，令灾妇纺纱交公家收买，即可维持一家生活。又如贷给灾民一部粮食，路费，要灾民到敌区运粮来根据地卖亦可维持生活等。又要动员灾区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互助互济，奖励私

人亲友间的互助，表扬慷慨捐输者，推动士绅名流组织募捐及参加我们的各级救灾委员会。但须严格防止强价抢粮与吃大户等现象，因这将引起粮食隐藏，粮价高涨，市场停滞及破坏私人借贷与妨害生产等。还要妥善处理因灾荒而发生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如家庭不睦、离婚增多、偷盗抢劫等，均将减低生产情绪。应进行调解，促进家庭和睦及建立群众防奸防盗公约，互助监督。对于敌区灾民，也应进行生产救灾的宣传，揭破敌人制造灾荒的罪恶，并须防止敌人驱使灾民到根据地就食的阴谋。

（四）上述各项生产救灾工作，是很细密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必须深入下层，调查研究，吸取群众意见和经验，并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决定来进行，才能切实有效。粗枝大叶，官僚主义，则必扰民有余，救灾不足，必须教育各级干部改变这种作风。关于太行山救灾经验，准备整理后公开发表，望予注意。

中 央

八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 答新华社记者问*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一)梁^①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如果说去年十月国民党宣布了政治解决的方针而没有进行谈判，现在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去渝以后才开始了谈判的话，这样说，关系是比以前有了一点微小的改进。可是，梁先生又说：“谈判了三个月之后，国共问题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了。”我可以负责声明，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举例如我们要求政府恢复渝延间西延间电台通信，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等事，都未见有任何解决，更不用说停止封锁边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事了。

(二)梁先生认为：“根本解决问题困难很多”，又说：“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这完全是一种给国内外关心两党谈判人士一种错觉的说法。实际，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我们从西安事变以来，即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

实行民主，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循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一切政治问题。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我们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要求他坚决抗战与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的要求。但是国民党统治人士与政府的观点，则完全两样，他们始终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至今仍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用一种自大和武断的精神，只强调别人应无条件的拥护政府，拥护统一，而不许问这种统一是否对抗战民主团结有利。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三）梁先生又认为：“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梁先生此话完全与事实相反。国民党所希望于中共的，是实行其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所宣布的四项诺言。七年来，我们已经切实的实行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中，已经详细的说到了这点。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究竟在那里呢？一句话，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

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障碍所在。

(四)梁先生所说的过去三个月政府和中共的谈判经过，也与事实大有出入。林伯渠同志五月二日到西安后，即与王世杰、张治中两先生作初步商谈。林提议以我在三月十二日演说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要循民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问题为商谈的根据，张王不愿。张王主张先就两党目前有关的军事及边区问题商谈。对于编军数目，林提出现在分散在各敌后游击区的正规军四十七万七千多人，都是久经对日作战有成绩的部队，请政府立即予以编整。为了使问题容易解决，请先给以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但张王只主张编四个军十二个师。关于边区问题，张王主张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中央法令，林提出区域及现行民主制度不变，实行三民主义。关于党的问题，林要求须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关于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但一切都应按有利抗战的原则来解决。关于撤除边区军事经济封锁问题，张王允先对于商业交通予以便利等等。西安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如此。林与张王最后一次会谈时，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以备参考，然后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这个意思已在记录上注明了。林就在这个记录上首先签字，但王张未签。记录既系综合双方谈话的意见而成，显非林之一方意见，且又未经双方中央所批

准，自更不能作为预备协定，这是稍具常识的人都能明了的事，而梁先生却企图指鹿为马，混淆听闻，实在令人遗憾。

（五）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志偕张王两先生飞往重庆。二十一日，我党中央即有复示给林伯渠同志，嘱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其中主要内容，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三条：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关于编军，为委曲求全计，请政府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给以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关于地方政府，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自治政府。关于封锁和进攻我军问题，请政府撤消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敌后我军的军事进攻。关于盟国援助问题，请政府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按正当比例分配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此外，尚有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停止在

报纸上对中共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无理检查，恢复重庆西安两办事处电台，允许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往来渝延间、西延间的自由及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等等。该提案于五月二十二日送交张王，张王以条文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转呈政府。林为尊重张王意见，转报我党中央请示。旋由我党中央复示，在文件上只写关于全国民主政治及编军、停攻、停封锁等十二条，而把请求政府停止特务反共破坏活动等八条改为口头要求，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张王亦于同一时间将政府之提示案交林转告我党中央。但张王仍拒绝向政府转呈我党提案，嗣经多日争执，张王始于六月十五日复函称，已将我党提案转呈政府。按双方提案实有极大距离，在政府提示案中，一、关于我方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撤消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军事进攻，按比例分配盟国援华物资，停止特务活动，停止造谣污蔑，恢复电台通讯，停止无理检查报纸，允许渝、西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走路自由及购买生活物品自由等项，一字不提；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的数十万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限期集中使用”；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

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四、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交还久已离开该地不知何往的所谓“各省政府”接管；五、要求取消各抗日根据地为了抗日需要而发行的必不可少的地方纸币。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甚远，我党中央曾邀请张王两先生来延安商谈。林伯渠同志要求回延安报告谈判经过，以使我党中央根据其报告，对于政府提示案作正式之答复，张王则称现正在请示中。三个月的谈判经过，就是如此。而梁先生竟谓：“中共并未回答政府条件，反而提出十七条对案，经过修改后改为十二条，这些条件和三个月前在西安谈判所同意的有显著不同。”这完全不合事实。事实上，我方提案在先，彼方拒绝接受，我方为委曲求全计，将提案二十条改为书面十二条、口头八条，于六月五日交付张王，彼方提示案亦于同时交付林伯渠同志，并且我们已屡次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意见相差甚远。且我党第一次提案是二十条，非十七条，后分为书面口头两部分，乃是我党中央为委曲求全而这样做的，并非“回答政府条件”。梁先生竟然抹煞事实，用意何在，殊属费解。

（六）梁先生最后说：“目前正在处于泯除蒋委员长的条件和共产党的对案之间的分歧”。我党也希望真能很快的泯除这种分歧。梁先生再三声言，肯定中国不会再有内战，这是我党所十分欢迎的。但可惜目前事实，尚与梁先生所谈不甚一致，例如：

一、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即使在最近数月，亦尚有零星的袭扰情形。

二、在华北，自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阎锡山的第六十一军即取得敌寇同意，最后更订了协定，从汾西地区渡过汾河，侵占汾东地区，向我决死队、八路军大举进攻，直至现在，还未停止。

三、在华中，国民党李品仙部队最近仍不断向我鄂中、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进攻，而这些部队正在为牵制敌人向我平汉、粤汉两路进攻而战斗着。鄂中根据地最近正因营救了两个美国飞行人员得到了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的谢函。

四、在华南，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今年曾先后救出六个美国飞行人员，可是这个区域的东江游击纵队，于五月间，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罗懋勋部两千余人的进攻。

这些就是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的证据。

总之，依照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期待着这些的。

根据1944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梁，指梁寒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

自五月底中外记者参观团来边区后，接着便有美军观察组十八人奉史迪威总部之命先后来延，并将分赴前方。同时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亦派欧高士少校及一士士经五战区前往我鄂中五师地区，担任前线侦察。综合此种情况，中央特作如下通知：

(一)由于我党政军民的努力和国民党统治人上的日益反动与无能，目前两个中国（新民主的中国和法西斯化的中国），在抗战营垒中的对照是更加明显了，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国际间统一战线地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但须指明，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

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所以我们的外交，又已经是半独立性的。同时还须指明，外交工作正是我们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我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应该对于这项工作开始予以注意予以学习。如果大家承认八年来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的发展，那么，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

（二）国际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就国家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但目前不应希望过高，目前美英苏外交的重心仍是放在国民党方面，且就英美内部言，也有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存在，即在其政府中亦复如此，而英又较美为差。故我们对其政府及其来往人员不应看成一模一样，而应有所研究和分析，因之在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的也适用于国际统战。不过在目前且因外交原因，凡愿与我们来往的英美人士及其军事人员，顽固保守分子总还占少数，且其顽固又常常是只反对其国内共产党，而不反对我们者，故其情形又与国内顽固分

子有别。因之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即遇顽固分子仍应诚恳说服给以好的影响。这次记者团中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本来对我成见颇深，但经我们争取，他即表示好感，拒绝国民党利用他反共的要求。

(三)国际统战政策，在目前最主要的应是外交政策，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二十一条是我党外交政策的总纲，目前实施原则，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我们欢迎同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信，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对敌军民宣传，我们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我们实行政教分离，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父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父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在救济方面，我们欢迎美英加拿大等给我们以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

时我们更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必须算入和承认这拥有八千多万人口，而且遭敌蹂躏最甚的地区的救济。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这一切，就是我们目前外交政策的具体步骤。

（四）为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不犯错误，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曾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五四”到大革命，惧外观念虽曾一度被民族高潮冲淡，但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即在抗战时期，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故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也就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新人典型。这种新人典型，已经在敌后在边区广大军民中不断的成长，而且已为国际朋友所开始认识，我们新民主的中国人应该坚持着这样立场，不致有所偏颇。

（五）在外交工作本身，我们目前应注意的是：（1）一切应争取主动，切勿陷于被动，更不应有求必应，而应有所取舍，或有所轻重，凡我所能而且愿意使外人知道和参加的事，可由我主动的有计划的加以布置，即使是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可使其自动的先向我们提出，例如军火援助，国民党天天向他们噪咕，要这样那样，我

们则暂不提，反而引起他们的尊敬，向我们先提，虽然目前因国民党反对事实上还难办到。各地见到盟国人员，不可一见面就问他要东西。（2）我们执行政策，进行工作应坚定不移，事前应周知博访深思熟虑，但一经决定和宣布之后，便应力求贯彻主张，这样方易取得外交胜利，尤其是军事外交，更应肯定坚定，当然这是指原则性的问题，若在技术方面，则又应当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3）关于文件材料及谈话内容，可告者应力求真实，不可告者应力求隐蔽，其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拒绝答复和供给，其不便答复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4）外交态度宜谨慎坦率，一方面勿失去警觉，另一方面勿吞吐支吾。（5）招待方法要守时守信，朴素热烈，一方面切忌铺张，另一方面也不可冷淡。（6）各地一切对外交涉和具体协商，统应电报中央批准后方得进行。

上述各项，凡有国际统战关系或外交工作的地方，均应向干部中传达，并进行讨论，以求一致遵守。

中 央

八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关于建立 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及五师：

(一)你们接到已微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后，对该项工作之具体布署及进行情况如何，望即电告。

(二)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上述干部决定后望即电告。

(三)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

(四)各地城市工作之进行情形及其经验教训和你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望随时报告中央城市工作部。

(请军部转一、二、三、四、七师及浙东)

中 央

九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 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晋察冀分局：

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决定：

(一)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二)三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冀热边冀中的电可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进行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 央

九月四号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 给山东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山东分局并转胶东区党委：

(一)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责成山东分局与胶东区党委，各组织一满洲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之力量，来开展满洲工作。

(二)两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胶东的电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 央

九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林董王：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其进行办法为：

一、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二、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

通过，我仍可向国内外宣传，你们估计此次参政会能否提出此项提案，望即告。

三、龙与华〔1〕商定的五条，可用，依其提议可由五方面代表商谈。我党此项主张如同意，可从各方面进行推动，以代替攻守同盟之请，因为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下届参政会如扩大名额，我们提议重新加入救国会（如沈陶张史〔2〕等），并增加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如愿增加中共名额，望先商定数目再商人选。

五、延安及敌后待你们致张王信稿到后，再定发表办法。

中 央

申支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龙与华，指龙云与华岗。

〔2〕沈陶张史，指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史良。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 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各位先生！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要我报告国民政府派张文白、王雪艇两先生与中共中央派本人双方谈判的经过，本人对此感到十分兴奋。

国共两党关系应该公平合理的调整，在现政治情况下为十分紧要的事情，不仅参政会同人注意这一问题，全国人民也十分关切。我今天要报告的就是我们与张王两先生四个月来谈判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大致有七个重要文件，主席团已印发各位，可请参考。

这次谈判，本人从延安出来抱着满腔热诚，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并很高兴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不期而晤。我们的谈判是在很友好的情形下进行的，迄今为止我们双方的谈判在原则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虽然我们的谈判尚未最后决定，但四个月来，还无结果可以报告。^{〔1〕}

谈判的重要问题

一、我党要求立即实行民主政治

二、希望解决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的悬案

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第一个是全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在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必须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日寇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是有力量的，它正在我国境内作最后挣扎，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严重形势。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战胜日寇的力量是有的，不过没有团结起来，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今天非常迫切需要将这全部力量团结起来、发动起来。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全国力量，来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民族国家的灾难。我们主张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共所提出的十大纲领，这三大纲领真正实行，就能团结全国力量。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曾说过：“地无分南北，民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党中央在抗战初期就主张实行民主，动员人民，实现全面全民的抗战，不应该是政府与军队片面抗战。我们对立即实施民主以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的意见，抗战以来是一贯如此主张，这次谈判也是这样提出来的。

其次，我们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这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问题。

我们在敌后抗战八年，军事政治形势有很多变化。在抗战初期，当时八万红军，政府只承认编了三个师，奉命出动，渡河入晋作战，并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我们组织些敌后游击挺进队，挺进敌后作战，我们自己看来，几年来在敌后艰苦作战，做得还好。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在晋、冀、察、热、绥、辽、鲁、豫、苏、皖、浙、鄂、粤等省敌人占领区作战，粉碎了许多伪组织，建立了许多抗日政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能够飘扬在敌人后方。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先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同时，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管理和指导这些抗日政权。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它党派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使边区的人员商旅能够有行动交通往返上的自由。

谈判的重要分歧

- 军事问题：我党请先给五军十六师番号，政府只允四军十师，并须“限期集中”，编余部队“限期取消”。
- 政权问题：我党要求承认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

为地方政府。政府则要取消。
党的问题：我党要求给抗日党派公开合法地位，
民主自由应有保障。政府对目前情形，未见有何改善。

我们党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国民政府曾有一个提示案给我们，张王两先生要我们照中央提示案来办理，但这两者中间的差别距离很大，以至谈判到今毫无结果。本人现在仅略举几个较大的分歧之点来加以说明。

首先从军事问题来说，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部队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它，增强它，首先应该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西安谈判时我提出请求政府暂编六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表示困难接受，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提案请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政府仍不愿答应，只允编四军十个师。

特别是政府提示案中的编余部队“限期取消”，及已编者“限期集中”二点办法，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因为这些部队是敌后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的抗日武装，他们正是执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民无分男女，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

责”的号召。限期取消就等于不要敌后人民抗日，把敌后解放区再交给敌人，这自然是不应该的。

再从对敌后民选地方政府的分歧之点来看。敌后的各抗日政府，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政府由人民选举，领导着敌后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是有很大成效的，我们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些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其所管辖的地方政府，而中央提示案则要取消，这是从抗战利益上不可理解的。

再次关于党派的公开合法地位，与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自由的保障等问题，依目前情形而论，并未见有何改善。我们略举几例来谈：言论自由问题，政府已表示言论尺度放宽，而实际上我们敌后近几个月来打了不少大胜仗，攻克了很多县城，这战报每月呈送军令部，始终未能发表，送《新华日报》也是被扣；再如人民身体自由，政府自八月一日宣布实行保障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再要求释放叶挺将军，他既非共产党员，去新四军更为政府所劝请，不应该拘禁他。我们要求释放自香港沦陷返粤被捕的廖仲凯先生公子廖承志。此外还有很多政治犯身囚监中，我们也要求释放，但都未能做到。

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我党信守不渝

对敌斗争、三三制、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等政策，都是澈底实现了三民主义。

还有，张王两先生给本人的信中也曾责备我党不实行四项诺言，这一点也要加以说明。我们去年十二月曾在延安开会认真检查，检查结果，更证明我们对四项诺言确实完全做到了，信守不渝。譬如拿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来说，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实行表现在努力抗战、齐心协力打击日寇，以及对边区境内各民族平等地位的尊重上面；我们对民权主义的实行，表现在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民选政府，实行三三制，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等一切自由上面；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正表现在陕甘宁边区军队和机关的生产运动，减轻人民的负担，由前年二十万担公粮减到今年只征十六万担，我们不把公家的负担，全部压在老百姓头上。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年来我们坚守不渝。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中，我们是一方面保证交租交息，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我们帮助私人工业的发展，并发展合作社，做到公私兼顾，公私两利。我们也早已实践了诺言，从无也从未曾想过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事情。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求全国政权之统一”，这在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切实在实行民权政治，我们并不曾另立中央政府，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民选政府为它所管辖的地方政府，我们

是赞成统一的，中国也必须统一，但统一必须是民主的统一。第四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责”，我们对此也是实行已久，我们的军队在敌后艰苦作战的成绩就是证明。我们的部队几年来从未得粒弹一饷的接济，而仍坚持敌后战争，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凡此事实都足以说明我们已经实践了诺言。张王两先生曾指责我们立法监察的不独立，但是我们在司法方面已做到切实保障各阶层人民的人权财权和地权等等，我们完全依靠人民来执行弹劾政府，所以我们那边绝少贪污渎职事件发生。

虽然，双方的距离还如此远，可是本人可以再度声明，中国共产党是一贯坚持团结抗战方针，耐心的期待政府观点的改变。

谈判经过真相

西安谈判纪录，是双方的意见，约定双方签字，张王没有签字，倒说是我个人意见，显然不合事实。

现在，本人再来说明一下自西安到重庆与张王两先生谈判的经过。自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以后，我们在延安，听到了很高兴，非常赞成。因为自民国二十九年新四军事事件以后，两党

关系很僵，我是参政员，也因封锁而不能出来。我们请军委会驻延联络参谋打电报出来，表明我们愿来重庆，继续谈判，经政府复电同意后，本人因负边区政务，尚需布置春耕关系，直到四月底才能动身。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一共会谈五次，本人初见张王两先生，主要先请示政府的政治解决究竟是如何解决法？以及向他们报告边区情形。张王两先生一再要我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我当时提出以本年三月十二日国父诞辰周恩来同志的演说作谈判基础，张王两先生不赞成，他们提议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我认为也可以，因先报告了中共领导下军队的数目，并向中央可以答应给我们编多少？张先生要我讲，我说请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认为太多，只同意四个军十二个师，以后会商几次，到最后一次会面时谈话，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纪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当时我就照我们双方原先约定的首先在这纪录上签字，但张王两先生未签，纪录系综合双方意见而成，张王信里〈说〉只是我个人意见，显然不是事实。

到重庆以后，我党中央即来电报提出二十项意见，由我于五月二十二日交张王两先生，请其转陈国民党中央，张王两先生认为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不肯接受。本人为尊重张王两先生意见起见，向我党中央请示，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改为口头要求，〔2〕由本人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两先生，张王两

先生同时将政府提示案交给我，但对我党中央提案则不允收转，一直争执到六月十五日，才复信称已转呈政府，但解决办法仍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谈判遂呈僵局。

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先生曾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来问我，我于七月二日有谈话发表在新华日报，表示我党的态度是只要对于抗战团结与促进民主有利，我们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部长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我党周恩来同志于八月十三日曾发表谈话，⁽³⁾说明谈判并无结果，并解释此事责任并非在我。但我党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曾来电请张王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张王两先生说此事可以商量。两党谈判的经过情形大致如此。

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救急办法

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人民
团体代表的国事会议，成立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最后，我应当声明：中国共产党很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现在敌寇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我们中国的抗战要保持今天的国际光荣地位，要打败日寇，要得到永久和平，都不能坐待盟友的奋斗，需要更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需要团结

与动员全国力量，才足以停止敌人的进攻及准备力量配合盟邦的反攻。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几天参政员诸先生的各项询问，也正说明了我们的机构的机构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合今天抗战的要求。因此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根据1944年9月17日《新华日报》刊印

注 释

〔1〕据另一文本，此句为“我们的谈判尚未能作最后决定，因此四个月来，还无结果可以报告。”

〔2〕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口头要求八条是：

一、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二、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此等诬蔑与侮辱的称号，过去都是暗中流行，近更公开见诸报纸。

三、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变本加厉，中共

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停止，妨害团结，实甚且大。

四、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造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追悼会广告与追悼会经过，但王实味等确无所谓枪毙情事。似此完全造谣，有意诬蔑，应请飭令更正，并制止再有类似此等情事发表各报。

五、据确息西安一带特务机关，准备于外国记者到西北时，沿途伪装各种人物与伪造各种证件，向外国人告状，借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闻特务所捏造之中共罪状，共达十余项之多，似此不但阻碍团结，而且有辱国体，请政府制止彼等伪装伪造。彼等如何布置，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制止，难免引起不快之后果。

六、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例如禁登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作战消息、禁登中共文件等）破坏该报发行，实行威胁定户，扣压邮寄等情事。

七、请政府放还在三原被政府军队扣留，前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一百零一箱。

八、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

[3]周恩来谈话即本册所选《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时间是8月12日，8月13日是《解放日报》刊载时间。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自林伯渠同志与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两氏在西安开始谈判以来，已四月有半，在此长时期中，虽中共中央及其代表十分宽容忍耐，委曲求全，但由于政府方面对错误政策之顽固不化，对谈判缺乏诚意，玩弄手段，以致谈判毫无结果，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即使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谈判经过已在参政会报告，参政会并决议组织视察团来延，四个半月来之国共谈判由此告一段落，因之，可以把过去的谈判加以概括的评论。

四月下旬，林伯渠同志赴渝之时，正是日寇在中国大陆发动攻势之始，观乎历年来国民党之错误的误国政策：军事上消极观战，依赖盟国打日本，政治上专制独裁，经济上垄断专卖，文化上压迫钳制，中国共产党中央预见到中国抗战阵营在日寇新进攻之前，将遭遇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重大危机。为避免此项危险局面计，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同志赴渝。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之立场与方针，明显地表明于六月五日提交

国民政府的意见书中，该书开头即说：“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问题。……”从意见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对于局势的冷静清楚的认识，对国家民族的重大的责任感及大公至诚的态度。至国民党政府方面则相反，对于目前危局，熟视无睹，轻率乐观，对于贻国家民族于如此危急之局，毫无引咎自责之意。在整个谈判中，抱着自大与武断之精神，企图以国民党一党一派之私利，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而强迫他人服从之。一看六月五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十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十万人，其余三十七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

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四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论到在谈判中双方的态度，中共方面一贯真诚与委曲求全，而国民党政府方面则夜郎自大，耍些无赖手段。他姑不论，即举中共中央意见书之提出而论，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一日电林伯渠同志提出二十条，二十二日林送张王，张王称“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接收。中共中央得悉后，减为十二条，而以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六月五日，张王仍拒绝转达政府，经多日争执，始允转达。即此一端，足见中共中央为尊重对方代表之意见，不惜委曲求全，酌量减少了正式条文，而政府代表则充分暴露了无赖面目，因为如实转达对方之意见于所代表之机关，是任何谈判中充任代表者

之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谈判而又拒绝转达对方之意见，这是任何谈判中鲜见之事例，此种态度，除称之为无赖或流氓手段外，无以名之。

此外，政府代表张治中氏及蒋介石氏本人在参政会中一再声言：“中央政府所求的只是军令政令之统一”（张）。“我们中央屡次表示只求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蒋）。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声明：我们是最坚决地拥护政令军令的统一的，但是这政令必须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政令，这军令必须是有利抗战的军令。相反，如果这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这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则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决不能服从，亦决不容许其统一的，中国人民是严肃地鄙视这种反革命的“统一”滥调的。问题的核心就在国民党政府今天的政令军令正是这么一种东西，政令是法西斯的政令，军令是失败主义的军令。要用这么一种政令军令去统一一切，非特是缘木求鱼，而且如果统一了，那就会招致亡国大祸。远姑不论，即以谈判进行期间之事实为例，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薛岳，都是所谓忠实服从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的，结果是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丧师失地，涂炭生灵，贻笑天下。反之，被国民党诬为“破坏军令政令统一”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在天天打胜仗，天天收复失地，这就是真正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统一。这种鲜明的对照，证明了国民党政府“军令政令”之毫无价值。因之，今日欲谈军令政令之统一，必须澈底

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欲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必须澈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必须澈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把那些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赶出去，由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政令军令，使其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及人民的意志。必如此方能真正挽救目前的危机及争取抗战胜利。必如此，方能谈得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必如此，军令政令之统一才与国家民族有利。关于改组现在抗战不力腐败无能之国民党寡头专制政府一点，林伯渠同志已于其在参政会报告中提出，可谓恰恰时宜。林同志八月三十日致王世杰、张治中两氏信对于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之批驳，亦完全是合乎抗战、团结与民主原则的。延安人上仍希望张王二氏来延视察与谈判。至参政会推选之五位参政员^{〔1〕}来延视察，交换意见，是很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之意。

附：

国共谈判双方来往文件

四个半月来国共谈判之经过，详情已见周恩来同志八月十二日与本社记者之谈话（本社八月十三日电）。八月上旬以来，谈判实际上已陷于停顿，虽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同志一再催询政府代表及约请张王二氏来延，但政府方面始终回避推延。政府

代表张治中氏在参政会上之报告，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氏七月二十六日之谈话一样，对谈判经过歪曲事实，混淆听闻。关于此类歪曲意见，除周恩来同志八月十二日谈话所驳正者外，有林祖涵同志八月三十日致王世杰张治中一函严予驳正。兹将此次谈判中，双方提出之两人文件及双方代表在八月间之信件，发表于后：

一、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

（此件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由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面交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

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已历七年，中共谋国之忠诚，抗敌之英勇，执行三民主义，实践四项诺言，拥护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先生抗战建国之始终如一，均为有目所共见。惟目前抗战形势极为严重，日寇继续进攻，而国内政治情况与国共两党关系，尚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兹率直牖陈如下：

（甲）关于全国政治者：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关于两党悬案者：

(一)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请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接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一九四〇年以来，政府即无子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状况请予改变。

(五)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六)请政府飭令军政机关撤消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飭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飭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等，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九）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

以上各条，仅举其大且要者，中共方面诚恳希望我国民政府予以合理与尽可能迅速之解决。诚以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今年可望获胜，东方反攻日寇，明年必可开展，而目前则日寇正在大举进攻，威胁抗日阵线，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将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放下坚固之基础，愿我政府实利图之。

二、国民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

（此件亦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由国民政府代表
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
兹以林先生祖涵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作以下提示案：

（甲）关于军事问题：

（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二）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三）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四）该集团军之人事问题，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五）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致给与规定发给，

并须按照经济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六)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七)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战区之内的部队，应归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整训指挥。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一)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二)该行政区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三)该行政区公署直隶行政院。

(四)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可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六)该行政区内之组织与规程，应呈请中央核准。

(七)该行政区预算，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八)该行政区暨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均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与财政部协商办法处理。

(九)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丙)关于党的问题：

(一)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

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

三、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 致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

自五月三日弟等与先生晤见于西安，往复商谈，至今已逾三月。自六月五日弟等以中央政府提示案面交先生，为时已两月有余，迄今尚未得到中共方面之切实答复，此等情形超出弟等意料之外。政府在提出提示案以前，特命弟等赶赴西安与先生晤谈至两周之久，借以充分洞悉中共方面之意见，用意已见慎重。政府提示案之内容，不但对于去岁中共代表林彪师长所请求，基本范围已全部容纳，即对先生最近在西安所表示意见，亦已大部容纳。这是事实，只须将有关文件略予比较、分析，即可知。然立意政治解决既为中共所表示赞同，团结与统一又为中共所宣言拥护，弟等今兹实不能不敢请先生向中共主持诸公，剖切敷陈，促其接受政府提示案，并速予答复。至六月五日先生交来中共方面十二条意见，弟等于六月十五日业就政府指示及弟等观感，以书面送达左右，兹因先生一再敦促弟等为更详尽之答复，因将政府意见再为先生详谈之：

（一）十二条意见中之第一、第二、第三条，涉及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与地方自治诸事。对于此类问题，政府提案中业已剖切申示两点，即在抗战期内励行中共暨一切党派所已接受之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但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确，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于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

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复为异日增加纠纷而已。盖“民主政治”云云，其他云云，中共过去或今日之所信，恐未必与国民党员乃至一般民主主义者之所信为一事也。兹愿与先生告者计有两点：

(1) 中央政府之既定政策，曾在依抗战之进展，胜利之接近，与大社会之安定，而逐渐扩大人民自治之范围，促进地方自治。

(2) 政府希望中共于接受提示案后，随时提出关于励行抗战建国纲领之意见，并积极参加参政会及宪政实施协进会之工作，诚能如是，彼此之观点当不难渐趋一致，国家之真正统一与团结庶几可以实现，政治解决云者，其根本意义亦即在此。

(3) 十二条意见中，涉及军队编制数额，军队驻地，军饷军械者条。十八集团军过去规定编制，原为四万五千人，政府提示案允许编为四军十师，确属从宽核定。带兵官自行扩编军队，其事原不可为训，且政府正励行精兵政策，一般军队，均在裁减单位，于此时期独允许十八集团军扩编为四军十师，自属委曲求全之至。关于军队驻地，政府亦正考虑至再，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则，一面规定在未集中使用前，受所在地战区司令长官之整训指挥，原则与事件实情兼顾。倘如中共所提意见，抗战期间内军队防地，概为现状，试问中央何以计划反攻或指挥作战。至于军饷，提示案中业已允许第十八集团军享受与一般国军相同之待遇。军械之供给，政府当随时视反攻之需要与各军所负之任务公平合理分配。

(4) 十二条意见中，列有一条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陕北边区问题，政府愿予考虑，并已于提示案中，提出十分宽大之办法，借以容纳中共之意见；

至其他任何地区之行政机构，自当依照提示案之指示，由各该地省政府接管，以免分歧而杜流弊。

（四）十二条意见中，尚有若干要求，或则与事实不符（如要求中央停止攻击中共某某军队），或则与事理不合（如对中央在陕北办报等事设定某某条例），弟等已向先生口头声明，兹不赘述。至于十二条意见中所提解除陕边之“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及释放若干人犯两项要求，弟等已向先生口头声明，俟此次商谈获有切实结果后，当予考虑。总之政府对于中共方面之意见，实已尽可能范围予以容纳。至于政府之根本意愿，则在军令政令之贯彻与统一。中共提出十二条意见书时，既未将服从中央军令与政令化作条款之内，即书面之引言亦未将中共对于此一问题之今后态度为割切鲜明之表示，弟当时不敢转电者大意在此。嗣因先生口头声明谓：中共方面对于服从军令政令决无问题，弟等乃敢以先生之口头声明与十二条书面意见一并转陈政府，此又弟等亦愿附带郑重声明者也。尚此布达，诸希惠察。

王世杰 张治中

八月十日

四、 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致国民政府 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

雪艇、文伯先生勋鉴：

八月十日来函，对敝党十二条意见所作之答复，于收到之后，即转电延安。以往返电码多有错误，校正费去一些时间。兹将敝党中央命弟奉复的意见，转告如后，敬请再转达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来函说：政府提示案已交给中共两月余，“尚未得中共方面之切实答复”，殊出先生等“意料之外”。并说：这个提示案，已能“大部容纳”中共之意见，内含有责备我方无理拖延之态度。应该声明，这是完全不合事实与错误的见解。因为弟已在屡次会谈中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已经提出的书面十二条及口头八条，在原则上相距太远，无法接受。比如在政府提示案中：

(一)关于我方所恳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等项，一字未提。

(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顧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数十万正在抗战的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集中使用”。

(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

(四)对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取消。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如此之远，但敝党中央仍不愿谈判停顿与破裂，曾命弟邀请两先生去延安商谈，或要弟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求获得继续商谈之途径，使问题终能“有利抗战团结，有利促进民主”的原则，而得到合理解决。两先生对于延安之行，已称在请示中。弟之回延，亦希望能于旬日内实现。

国共两党关于全国政治问题及两党关系之谈判，并非自这次弟与两先生谈判开始。远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六年之间，敝党曾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实行民主，实行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从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的政治问题。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我们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要求他坚决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的要求。为了求得国民党中央政府能够接受敝党的建议，接受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敝党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曾提出了保证实行四项诺言。八年来，这四项目诺我们早已完全实践了，而且至今还在实行，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中，已经详细的说明到了这点，可以参考。八年来，敝党中央又不断派弟与周恩来、董必武、林彪诸同志，耐心的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周董两同志驻渝已有数年，始终未能得到结果。究竟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那里呢？不能不指出：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诸公的观点，和我们及全国广大人民的观点，有着很大的距离。政府负责诸公，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我们希望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但是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八月十日来信，可惜均不能符合这些期望。比如：

（一）关于全国政治制度问题。我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实行名符其实的地方自治)，正是反映今天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正是今天为着团结全国力量，认真准备反攻，必须立即实行的措施。如能这样做，不仅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而且对国民党也是有利的。然而两先生来信，仍坚持“中央之决定政策”是要在抗战以后才能实行宪政，实行民主。批评我们所提民主要求为“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认为于实行无其益，“徒为异日增加纠纷”。但照我们的经验，在敌后那样的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遍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反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立即实行宪政，而不推在抗战之后。

(二)关于中共所领导的四十七万七千正规军队之编制、防地与饷械问题，如果从这个军队过去抗战的成绩与今天准备反攻的需要来说，他们在八年来的敌后艰苦作战的环境中，坚持与发展了敌后三大战场(华北、华中、华南)，建立起许多坚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了八千八百余万的人民，组织了二百二十余万的民兵，抗击了侵华绝大部分的敌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他，装备他，增强他，首先就应当全部承认他，才为合理。我们在建议书中请求政府“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是为着谈判更容易接近。关于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及盟国援华物资请求公平合理分配等，这是配合抗战需要与无可非难的。而政府提示案的“限期集中使用”的办法，是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两先生八月十日来信中强调反对带兵官“自己扩编军队”与反对军队防地维持现状，责备我们不守军令的统一。但两先生恰恰忽视了一件平常人都

懂得的真理，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是在抗战中，我们所扩编的军队，是在沦陷区，发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的防地都是在敌后，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与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如果我们反对在沦陷区发展人民抗日武装，或企图削弱消灭这个抗日武装，以及想使敌后解放区的人民抗日武装从该地离开，这一切，都会在客观上成为有利于敌的。

（三）今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其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敌后抗战，就是实行民族主义。抗日政权，完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有一切自由和权利，并行使直接民权，组织三三制的地方政府。我们又实行劳动互助，生产节约，救灾开荒，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普及教育，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更无一不合乎民生主义的原则。由于我们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澈底实行了三民主义，所以能团结全体人民，克服一切困难，长期坚持抗战，并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象这样的抗日民主政府，就应当承认他成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就应当给他们以地方自治的权利。象这样政府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就应加以奖励，提倡，推行于全国。这才是真正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应采取的态度。但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八月十日来信，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与各种有利抗战的民主设施，则要求取消，也是不利于今天敌后抗战的需要的。

总之，促进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迅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

国民党诸公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才能使一切走上轨道，才能停止目前敌人进攻，实行将来的全面反攻，也才能建立战后的国内和平合作与国际和平合作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来希望国民党当轴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其旧有的政策，才能打开目前政治上的僵局与完成盟国共同期望的神圣事业。我们这里绝没有乘国民党形势不利而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更没有利用国民党处境困难而拖延不愿解决（有些无知的人正在如此散布谣言），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必需实行的东西。

我们在爱护、帮助国民党进步，而不是在冷眼坐视国民党的困难，耿耿忠言，定为国民党贤达所鉴察。希望两先生将上述意见，再向蒋主席及贵党中央转述。时乎不待，望早决策。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忠实执行四项诺言，忠实实行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团结，与政治解决的方针，以期待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回答。敝党中央所提邀请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一事，不仅表示敝党不愿使谈判破裂之诚心，而且想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人员亲到边区看看，我们是怎样忠实实行四项诺言与澈底实行三民主义，我们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建设，是很可以为全国实行民主参考的，想因此使双方谈判更易得到解决。未识两先生对此已商得政府及贵党中央同意否？盼能早复。敬颂勋祺。

林祖涵

根据 1944 年 9 月 20 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五位参政员是：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二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十二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1〕}七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六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2〕}。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3〕}、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一百二十哩。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宾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土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

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分，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八九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八月下半月与九月上半月，连克五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郛城战役，解放村镇六百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十六哩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

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十六哩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三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郚城、长兴四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千五百方哩。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做“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澈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是加强武装。

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根据 1944 年 9 月 23 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全县，旧县名。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2〕永明，旧县名。今湖南省江永县。

〔3〕怀集，原属广西省，今属广东省。

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 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华中局：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推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耀〔跃〕汇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耀〔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

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

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需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六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六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六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理〔法〕，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中 央

中感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如何解决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周恩来讲演）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国庆日子，正当着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感触，也有许多话要说。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节节胜利，不久便可直捣柏林，太平洋战争亦着着前进。可是，我们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却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为什么我们正面战场这样不能配合盟国胜利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有敌后战场的胜利呢？这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我们必须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

现在中国正面战场，是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河南战役，四十四天工夫，失掉了四十五个城市。湘桂战役，又连失长沙、衡阳、零陵、宝庆、肇庆、梧州等这样多的大城市，敌人现在已逼近桂林，威胁柳州，甚至昆明贵阳亦成为敌人窥伺的目标。沿海战役，温州、福州相继失陷，从此沿海较大的港口，都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一连串失败的事情，为什么今年会连续发生呢？为什么

在日寇已经转入不利的形势下发生呢？这绝非偶然，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所造成，这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因此，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遂在敌人进攻的面前，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军事方面，国民党当局是历来只许政府抗战，不要人民抗战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发动人民抗战，便被诬为“武力割据，违抗军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对人民决不动员，不组织，只有捆绑勒索，于是壮丁越来越少，军队越打越弱，政府也就越抗越没劲了。尤其近年来，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常政策，因此我们在敌后积极抗战，便被诬为“奸党奸军”，加以破坏进攻，而他们在正面战线，却消极观战，决不出击；敌不来则通敌走私，鱼肉人民；敌小来则勉强应战，敷衍门面；敌大来则节节败退，一让千里。其尤甚者，是一面标榜抗战，迷惑人民，骗取外援，牺牲盟邦，企图以此坐享胜利的果实；另一面则信使往还，暗通敌伪，企图以此在目前和缓敌人进攻，加紧敌后扫荡，在将来则预留妥协余地，以便外抗盟邦，造成均势，内压人民，进行内战。这种极端矛盾的两面政策，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不被戳穿西洋镜的。所以英国邱吉尔首相，对于国

国民党政府这次严重的军事挫败，不能不认为“极大遗憾”，不能不认为“是最大的令人失望和烦恼的事”。而美国罗斯福总统也公开声明援华物资由每月二、三千吨空运增加到每月二万吨空运，是一个优异的成就和伟大的事业，以驳斥国民党政府那种以援华物资不足而打败仗的借口。其实，打败仗是由于援华物资不足么？不是，绝对的不是。汤恩伯、薛岳的部队，不都是装备了美国的枪炮么？何以败得那样快，那么惨？胡宗南的部队，不是装备了更多的美国枪炮，还带坦克么？何以潼关以东的一仗，打得那样坏？何以胡宗南现在还保存着那么多的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部队，不开往抗战紧急的前线，而专门用来封锁抗日的陕甘宁边区呢？并且，也不是非有美国的物资援助，便不能打胜仗的。河南战役中，能够守虎牢关、守洛阳而打得较好的，偏偏不是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汤恩伯军队，而是没有得到美国枪炮的地方系军队。敌后战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抗日军队，不仅被国民党政府阻挡住，得不到盟邦的物资援助，便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从未装备过我们的敌后部队，但我们却偏偏能在敌后存在、发展和胜利。另一方面，史迪威上将指挥的在印緬的中国军队，有了美国的枪炮坦克的装备，不也是打得较好么？可见，中国人民和军队，绝不是不能打胜仗的，而且很英勇很坚韧的打着，这就是我中华民族抗战七年多的伟绩。正面战场之所以连打败仗的缘故，绝不是人民和军队不行，而是国民党

政府及其指挥者的错误、自私和无能所造成。所以我们主张争取外援，但这种外援必须结合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有作用，才有力量。我们也主张盟邦的物资援助加多，但这种物资必须装备那能够打仗，而且打得很好的部队，才能打退敌人，反攻敌人。否则，援助愈多，损失愈大，保存实力的也愈多，最后不仅不能得到抗战的胜利，而且反会增加内战的危险。这点，我们盟邦美国的舆论似已有同一认识。美国报纸，目前公开指出华莱士副总统及纳尔逊、赫尔利之相继来华，是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说：“如果给中国人民以粮食和装备，它能够担任象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好的战斗任务”的。

这种西洋镜，现在不仅在外国戳穿了，而且还在国内招致了不可弥补的失败。河南战役所以失败得如此之快之惨的，就是因为汤恩伯胡宗南军队专心一意的反共反人民，所以敌人一来，仓惶失措，稍一接触，便溃乱四散，这证明，反共反人民与抗战，是绝不能并存的，尤其是暗通敌伪，反共，反盟邦，与抗战更不能并存。远者如去年豫北之战，刘进、陈孝强因为预得蒋鼎文指示可以通敌打共，等到敌人打来仍想以反共为缓冲，结果庞孙投敌，陈孝强宁可不受八路军之助去打敌，而甘于公开投入敌垒来反共。近者如今年衡阳之战，守城将领明明知道庞炳勋、孙殿英、陈孝强等虽投敌，不仅未受国民政府通缉，而且还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盟邦虽不断以空运增援衡阳，但当局仍怪外援不够，等到衡阳

不守，何能单单责备方先觉等不能死节，还不是上边早给他们暗示了投降的出路么？语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上边可以暗通敌伪，我下边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投降？现在既可以两面投机，将来又可以卷土重来。抗敌有罪，投敌有功，这就是军事失败主义的实质。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是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绝不容许有多党政治、人民民主的。因此我们在敌后解放了八十三万七千多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九千万的人口，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便被称为“奸区”、“伪府”，绝不承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只有党治，绝无民选。各级参政会，由县而省而全国，都是指定的。各级官吏，由保甲长直到国民政府主席，都是党部委派的。而这些指定，委派，又为国民党少数统治集团所包办，党内广大党员及民主领袖是得不到这种权利的。所以，与其称为党治，毋宁称为寡头专制。还有，国民党当局是一心一意实行法西斯主义政治，而拒绝实行三民主义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在边区，忠实于我们自己的诺言，努力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对敌斗争，三三制，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政策，便被诬为“进行赤化”、“违抗政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钳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纵使官僚资本破坏民业，致造成目前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甚至革命的三民主义，即在国民党内，也不容许宣传，

联共容共主张，更被禁止传播。这种政治，请问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什么？

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长增高，还会更加严重。我们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眼看着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这光明胜利的前途上，横梗着这种种危机，真是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这一主张的具体实施，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下列步骤：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澈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

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的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只有这样的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如果仍欲以一党包办，伪造民意，即使由国民党再来一次决议，提前到抗战期中召集所谓国民大会与制定宪法，那仍然是党治，不是民治，仍然是伪宪政，不是真宪政。满清末年，不也是玩过伪装准备立宪的把戏么？结果何补于当时的危机？！今日如再重复这一教训，自毁事小，误国罪大。又如果不变更一党专政的实质，不变更现在执行的各项错误政策，即使国民党政府肯邀请各方参加，那仍然是请客式的一党政府，决不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九一八”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也曾召集过国难会议，不也曾请过党外人士参加政府么？结果何补于当时的投降政策？！又如果统帅部不容许各主要军队的代表参加，不服从众所公认的政纲及各党派联合的政府，而仍然排除异己，制造内战，即使国事会议开了，联合政府成立

了，那仍然会成为有职无权的伴食宰相，一筹莫展的傀儡机关。民国初年，熊希龄号称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五四”以后，胡适之的好人政府主张，都因军人不能服从政治，军事自外于政府，结果何补于军事独裁？！北伐期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受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的指挥，结果遂造成军事独裁，断送革命。

由此可见，我们所主张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澈底的统一。如果统一于一党专政，统一于军事独裁，那便是假统一，结果别的党派被排除，别的军队被吞并，不服的起来反抗，打败的散之四方，于是祸乱相寻，内战频仍，还有甚么统一可说？民国三十三年历史，还不够寻味么？

同样，我们所拥护的军令政令的统一，也必须是有利于抗战的军令，而不是那些失败主义的“军令”，必须是合于革命三民主义的政令，而不是那些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抗战七年多，我们深入敌后，在外援断绝的条件之下，既受敌伪的反复扫荡和烧杀，又遭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夹击，始终屹然不动，坚持至今。我们不仅没有如国民党当局所料，为敌伪顽三方面的夹击而消灭，而且还能够生存，还能够发展，还能够胜利。难道这是偶然么？不，这决非偶然！这是由于我们所服从所拥护的是抗战军令，是民主政令，所反对所违犯的是失败主义的“军令”，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只要肯打敌人，能打敌人，并懂得怎样去打敌人，我们是绝不会被消

灭，而且会继续胜利的。只要肯倚靠人民，属于人民，为着人民，我们是绝对能生存，而且会继续发展的。因此，我们敌后战场才能与正面战场失败的相反，得到连续不断的胜利。

我们看，在最近半年内，截至九月为止，中国正面战场沦陷了十万多方公里的土地，而我们敌后战场却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五万方公里的土地。正面战场丢弃了四千多万的人口，而敌后战场却又解放了四百多万的人口。正面战场失掉了一百零二个城市，而敌后战场却又夺回了八个城市。正面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而敌后战场却又扩大了十万正规军。单单拿这几项来做比较，已经够说明我们敌后抗战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抗日的部队，是多么有功于国家民族，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是多么有负于国家民族了。照道理讲，我们不仅应该要求惩办豫湘作战失败的那些主要负责将领，而且还应该请求奖励敌后作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将领。可是，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已成惯例，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是，中国人民是知道应该赏谁，应该罚谁的。并且，依照国民政府最近交给我们的提示案，还要我们取消数十万的抗日部队，取消敌后解放区的一切民选政府，这真是没有道理之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两个取消要求，那就等于帮助了敌人，那才真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呢！可是，敌后抗日部队，敌后人民政权，就是这样可以命令取消的么？谁也

知道，这是绝对不应该，不可能的。

我们看，敌后解放区的胜利，究竟有多大？截至本年九月为止，综合华北华中华南十五个抗日根据地的报导，敌后各解放区现已拥有被解放的人口达九千万，占沦陷区人口(二万零七百八十万)的百分之四十三。敌后各解放区所收复的国土，约八十三万七千余方公里，占敌后总面积(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余方公里)的百分之六十六。敌后各解放区所夺回的城市，现在已达到二十八个。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五十七万，民兵游击队约二百二十万，地方自卫军则有数百万。在这些解放区内，共有民选县政府五百九十一县，专员公署八十五处，民选的边区政府及行署十二处。以上各项，陕甘宁边区均不在内。敌后我军所抗击的敌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河南战役以前，为日军侵华全数(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的百分之六四·五，为伪军全数(约七十八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五，合起来则为百分之八十四。在目前，虽由于敌人增加兵力于湘桂、粤汉、平汉三路，向中国正面战场作深入的进攻，但敌后我军仍继续抗击侵华日军(据已明位置的三十三三个半师团计算，另有六个师团位置不明未算入)的百分之四十九·五，几近半数，而伪军情况则没有变化，合起来尚为百分之七十六·四。敌后我军经常围困或袭击的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约有三十八个，为敌占大城市四十五个的百分之八十五。敌后我军

经常逼近活动或进行破坏的铁路线，约达九千六百多公里，为敌占铁路线约一万公里的百分之九十六。敌后我军完全控制的海岸线约八百公里，经常有我活动的海岸线，约六千五百公里。总起来说，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发展起来的抗日部队五十七万正规军及二百二十万民〈兵〉总计起来，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建立起来的五百九十一县地方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以这样有功的抗日部队和广泛的人民政权，它已经是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旗帜和行动指标。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会灭亡。谁要想“取消”这个力量，谁就抹杀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就等于断送了全中国。

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承认敌后解放区的数十万正规军、数百万民兵和各级民选政府，并且直到现在，国民党军队还不断在各地封锁进攻，企图消灭这些敌后抗日部队和民主政府。即在目前正面战场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用以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也还有五十六个师及其他地方团队，人数达七十七万五千之众（华南尚未计入），而进攻侵扰的事件始终未停；因之，内战危机，亦依然存在。我们坚决要求全国人民、同盟国家和我们一道有效地制止这种内战危机，要求国民党取消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行为，以便将我们全国力量都能用到抗敌的战场上去。

还有敌后我抗日部队，在此七年多奋勇血战，除了

抗战初期领了一百二十挺轻机关枪和六门反坦克小炮以外，从未得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任何轻重武器的装备，即弹药、被服、粮秣、经费以及各项交通、卫生器材的供给和补充，也在一九四〇年起全部停止了。甚至连英美红十字会捐助的一百零一箱药品，也在三原被军事委员会没收了。因此，我们部队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完全是倚靠于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自力更生的成功。但为着今天更有效地消耗和牵制敌人的进攻，明日更有力地配合盟国的反攻起见，我们有充分权利要求国民政府以应得的军火和物资，来装备和供给我们部队，我们更有充分权利要求同盟国将援助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及一切器材和物资，按照抗[抗]击敌伪数目的比例，以大部分供给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一切抗日游击部队。我们英美盟邦应该知道，没有中国敌后抗日部队的参加，不仅在中国战场进行反攻，成为不可能，即连目前欲制止敌人的深入进攻，也成为不可能。我们可断言，拿敌后我们军民的力量、成绩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如果再加以盟国的装备，我们必能达成更高的战斗任务。

现在当魁北克会议之后，英美盟邦正在加增其注意力于中国战场。在重庆刚开过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主席曾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而参政会又决定派遣五位参政员来延视察，我们除表示欢迎之外，愿乘此国庆纪念，再一次重申我们上面的主张。

我们认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到的唯一正确方案。

我们继续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全部抗日部队和各级民选政府，坚决反对取消敌后数十万抗日部队和民选政府。

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所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与委托林祖涵同志口头提出的八条，仍应成为今后国共谈判的根据。

我们继续邀请并欢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来延视察和谈判。我们认为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但必须在不违背抗战、民主、团结的大原则之下来解决。

时机太紧迫了，我们切望国民党当局，全国爱国志士，全国人民，奋起急图，扭转时局的关键，抗战幸甚！国家幸甚！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 再致国民政府代表 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

雪艇、文伯两先生大鉴：

九月十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

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五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全国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澈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绝不是请客式的、不

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九月十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澈底解决。

(三)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四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五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六月四日（于六月五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十二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八条，才是敝党中

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做不友好态度，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四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的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罢！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

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 祖 涵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根据 1944 年 10 月 29 日《解放日报》刊印

军委关于准备对付 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 给邓小平、滕代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邓滕同志并告山东平原及五台：

申感电悉。华北有纵横六条大铁路，有连云、青岛、塘沽三个军商港，有公路如网，有冀鲁大平原（利于大兵战场），有东北依靠，有日本本土屏障，交通便利，空海易与陆军配合，在苏联不出兵满洲条件下，是日本陆军在大陆决战最理想战场，在华南因日之海空均劣势，运输困难，内地交通仅粤汉路而被破坏，将来盟国在粤闽登陆，日军可能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抵抗，以拖延时间，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然而使敌最感头痛的，是共产党八路军许多民兵游击队，这些抗日力量，不仅直接危害日军作战，而且是英美在华北登陆最好帮手，因此在决战开始前，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与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但目前日寇忙于准备美在菲岛登陆，隔断南洋，力求迅速打通安桂交通，华北敌军减弱，伪军动摇，我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

伸入根据地内之伪军、顽军及敌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敌人扫荡时破袭交通要道与袭击较大城市在外）。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利用冬寒认真练兵。新发展区域及减租减息未深入地区，继续深入减租息斗争。减租息已深入地区，注重各种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巩固军民团结与社会团结。在太行北岳山区努力增加子弹、炮弹、手榴弹、地雷、无烟抛身〔射〕药及炸药生产，隐蔽储存，以为将来严重不能生产时用。对伪军上下层工作均须加紧。这些工作做好，就是预见困难，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条件。以上意见，望斟酌实施。

军委毛、朱

酉寒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巩固 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北局、平原、太岳：

皮徐^{〔1〕}申陷电，你们西冬转来于西文阅悉。

甲、已决定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及七七零团、警二团约千六百人，十一月初由延起程，照来电经太岳往河南。

乙、太岳派两个团入豫西，我们意见：A、铁道与伊河间之洛〈河〉水深，两岸淤泥亦深，不易随便徒涉，如遇敌顽进攻，不大便于机动，在冻冰前似不宜用大兵，在不妨害中条山发展与巩固情形下，派政治军事较强的干部，率一个小团进入该区，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巩固已有同情武装，先求站稳脚，部队小给养亦易筹。B、太岳区目前极应巩固中条山已得阵地，积极发展汾河以东(三角地区)沁河以西广大地区，特别豫北之沁、济、温、孟四县，山西之垣、平、芮三县，以及黄河与铁道间(估计有被敌控制之地区应广泛利用合法形式及建立

隐蔽根据地),使华北与中原密切衔接。

丙、太行、太岳、平原区,今冬整军期间,尽可能充实小团,并每区补充两个大团(共六个团),根据目前发展情形,似有必要与可能。

丁、解决河南新区军队给养问题,在根据地未具规模以前,可采取以下临时过渡办法:A、按每亩产量抽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未减租以前,由地主出,减租以后,农民确实得到减租利益时,东佃各半。B、或者照国党田赋征实办法,每两粮银应征公粮若干,但无论那项办法,均须比以前国党及现在敌伪统治民众的负担要轻与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请当地士绅及富、中、贫农代表商讨上述办法或其他更适当的办法。总之力求与地主不要过早搞破脸,使自己站稳脚,如与地主过早搞破了脸,基本群众又未发动起来,将增加我们许多困难。C、在根据地建立有初步头绪时,即应筹办征收出入口税,以保障根据地物资与帮助部分解决财政问题。其征税原则:1、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抽重税甚至禁止出入口。2、对敌利小,对我利大,则抽轻税,甚至免税。3、对敌我均有利,则按我需要缓急,定出适当税率。D、为避免混乱保障安定社会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稳脚,须禁止乱打汉奸乱罚款,军队须由最高司令部统一发给临时粮票,给粮户作为收据,对部队内部须按人数给以应得粮票,以免重复过去浪费。以上意见提供你们及皮徐同志参考,并望将你们意见电告。

（北局转皮徐）。

中 央

西 寒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皮徐，指皮定钧、徐子荣。

军委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 问题给郑位三、李先念、 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郑李任陈：

申艳电悉。

(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

(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玉树声、刘子久、陈光〔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王、戴、刘、陈等在一个月內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

(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

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 委

西寒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四师工作 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

华中局并转淮北区党委及韦、吴⁽¹⁾：

(一)四师西进部队已获得极大战果，目前应以巩固已占地区为主要任务，应即迅速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吴信元及其他投诚的部队与地方发展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若干独立团，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使其担负地方守备任务，以便主力能迅速进行新的任务。

(二)四师在豫皖苏时代的武装政策中有一些是错误的，如并吞过多的部队，处理胡晓初部队的失当等。应切实研究过去的经验，凡来投我之部队其领袖及其干部愿意进步者，均应切实忍耐的帮助其进步，不得随便撤换及调动。我们派去帮助工作的干部，应诚恳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工作，不得有盛气逼人，锋芒毕露的态度。

(三)路西应即成立地委，由区党委配备得力干部，应利用秋收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并立即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等，以便迅速组织与团结人民，巩固我

军的社会地位。

（四）如果能利用伪军关系在商丘、宁陵、柘〔柘〕城之间派一个小部队去活动，建立一处跳板以与水东打通联系，那是有战略作用的。如有可能，应设法求其实现。

（五）最近顽军一部已由涡河北进寻求你们作战，应准备集中必要兵力将其击破，并歼灭之。

中 央

十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韦、吴，指韦国清、吴芝圃。

军委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 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华中局：

梗电悉。

(一)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一、二两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归粟统一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

(二)新四军(除五师外)在最近的任務，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望你们加以考虑并预作准备。中央为了协助新四军完成任务，准备在明年春季派遣数百个干部到新四军(长江下游)工作。

(三)发展河南是已经确定的方针，但现在只能逐步发展。首先建立巩固〔固〕阵地，然后向前推进。你们在津浦路两部队，已有冀鲁豫区南下水东之三个团，可以配合作战。

(四)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十分注意发展宁波、

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

军 委

酉敬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央关于发展广东游击战争 等问题给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

林平同志转军政委临委：

甲、目前战局重心在桂，但西北江已成敌人进出之路，邓龙光集团调退广西、李汉魂省府保安团向和平集中、余汉谋后方虽向西移，但其兵力仍留路东；因此，西江南路在目前最为空虚，敌占地区亦较东江为广。如桂柳不守，粤桂湘边国民党亦难屯大兵。如此种估计不变，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络，应成为目前重要任务之一。

乙、为实施上述任务：一、应从东江纵队抽出得力军政干部，经过中路游击队帮助，向西江加紧发展抗日武装，推广游击区域。二、选派得力同志，往南路帮助周楠及当地组织，发展敌占地区武装游击，并继续派人打通琼崖联系，告以与延安电台先行明码联络。三、中路游击，应采取分散发展，多游动，少刺激，避免过大损失。四、北路游击，应仍依山地发展，避免与余汉谋部过早冲突，并力求和缓。五、潮汕方面如纵队中有本

地下级军事干部，抽二三人派回与当地组织联络，恢复并发展分散的游击小组，以保持此海口附近的活动，很有必要。六、着眼于敌占汕尾及扩大厦门占领的可能性，你们应经过香港及闽西南两处组织关系，布置汕尾厦门漳州的秘密工作，以为将来准备。七、一切布置，应仍以东江游击区为中心根据，不要因此放松这个区域的巩固和发展。

丙、一切工作以武装的发展和胜利为基本条件。照目前四千五百人数目，在向西发展中，希望半年内能扩大一倍。

丁、各路领导，可均组织军政委员会分会，由东江军政委员会统率之，惟东江不必再组分会。

戊、对外号召组织和联系，依各地情况自订适当的名称（如抗日游击队或解放军均可），不必强求一致。在目前分散发展中，动员人民，执行政策，亦均由武装组织直接进行，力量较大而较巩固时，可建立县乡村民选政权，但不必急于建立各地联合政权。

己、对外发表党的宣言，可用广东省委名义，内容可着重号召全省人民武装起来自卫，反对内战，以免全省沦陷，不必套抄中央口号全部。

庚、统战工作，可用曾王⁽²⁾名义，向各方通函，并利用英美外交关系，向外传播我们抗战成绩与地方军队合作主张。如有可靠社会关系，可经过李章达（或经过邱映芙彭泽民）去找李张蒋蔡余等联络。

辛、临委仍管理国民党区域秘密工作。各地组织仍不宜恢复，继续以单线或个别关系领导，在关系隔断地方，仍循可靠线索去求联系，无线索时，宁断勿急。在沦陷区以武装组织为中心，联系地方党员，但武装没发展到的地方，亦不宜过早暴露，而游击地方亦应保留若干秘密党员，以便存在。

壬、临委下设城市工作部，专管港澳广汕厦及广州湾等城市工作，并研究其情形经验报告中央。

癸、中央正在计划试派几个军政干部经上海香港到你们处工作，望你们调查港沪交通情况及可能电告。此电到后，望将讨论及执行情形陆续电告。

中 央

酉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2〕曾王，指曾生、王作尧。

中央关于巩固津浦路 以西地区并向水东发展 给张云逸、饶漱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

张饶：

宥午电悉。

(一)淮北路西部队击败王毓文之进攻后，估计顽军暂时不会大举再次向我进攻，我应利用目前时期迅速巩固涡河以北阵地并迅速打通与水东的联系。主力部队经过短时休整后，应迅速部署，分头进行涡河北岸的群众工作及执行打通水东的任务，不应长期集结耽搁〔搁〕时间(如顽军很快向我进攻，我临时集中亦是来得及的)。至于如何具体部署，由前方韦彭吴张根据情况决定，你们不要规定得太具体。

(二)八路军南下部队应即配合四师一部执行打通水东的任务。

(三)军部与淮北区党委应迅派大批干部去路西，建立地方武装与政权及进行群众工作，须知巩固路西地区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工作，如有可能，邓子恢同志到路西

去工作一时期是有必要的。

中 央

十一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延安协定草案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
与中国共产党协定⁽¹⁾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 国 国 民 政 府 主 席 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北 美 合 众 国 大 总 统 代 表 赫 尔 利

(见证人) (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

附：

一、赫尔利致毛泽东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延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

我的亲爱的主席：

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

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

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供献。

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民主中国的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

美国总统代表

美国陆军少将

赫尔利

二、赫尔利带来之五条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为着协定的基础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

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 释

〔1〕此件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商定的，蒋介石未签字。

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的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的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日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之见证。

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

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 泽 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于延安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关于东江、琼崖 工作给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林平同志：

(一)同意戍真电所述各项。

(二)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好输送干部给你们。因此派往西江的部队及干部能多一点为好。你们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向广西与南路。

(三)嘱咐去琼崖的人，将中央对冯白驹同志及其整个部队致慰问之意带去，并告诉他们的任务有二，第一，派得力部队向南路发展，和你们取得联系；第二，占领整个琼崖。

(四)你们须办一大的训练军事政治与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短的几星期，长的三四月毕业，分批集训，主要向广西方向派遣。

中 央

戍寒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 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冀察晋分局：

鉴于内战时期的肃反教训，抗战初期某些地区乱捉乱杀的错误，鉴于去年延安抢救运动时，在实行正确路线中，发生的过火行动，因此各地对于审干反奸工作，要采取谨慎态度。澜涛来此，知分局同志能掌握此种方针，这是很好的。目前工作情况如何？望你们将成绩缺点经验教训电告我们。

为使正确方针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不致在运动开展中发生毛病，特将下列问题提起你们注意。

(一)分局应速将九条方针的条文，中央今年几次反奸指示，西北局高干会反奸报告，中央社会部审讯条例等文件，多多印发给各地区、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的干部和党员，配合冀察晋抗战初期的反奸教训及这次工作中的经验，进行广泛深刻的教育，使党员干部搞通思想，掌稳政策，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应耐心经常的进行，采取整风的方法研究文件，

以民主的方法吸取群众的意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工作，务使九条方针的每一条都能深入到群众中，贯澈到实际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二）在党校和分局、军区、行署各机关中审查干部，更要特别慎重，不要将反对公开的国民党特务（如郝胜符之流）的方法，使用于党内审查干部，也不要将反对公开的国民党党部的方法，使用于三三制政权中的非党人士。因此，党校及各机关的审干及反奸工作，不要采取单纯的反特务斗争的方式（这样很容易产生简单化的毛病），而应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坦白运动的党内方式。行政人员训练班，不要发展为反省机关（这样很容易产生扩大化的毛病），而应成为一种整风学习的教育组织。一切机关、部队、学校和地区，不要将审干反奸与坦白运动分离起来，而应将坦白运动当作审干反奸的主要形式，以党内整风反省的姿态，达到坦白生活、道德、工作、思想、政治、党派、变节、特务等各种党内党外问题。分局务将这个方针继续贯澈下去，对于一切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须随时注意。

（三）在坦白运动中，应提倡说老实话，宣传“是则是非则非”的口号，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干部中

强迫坦白，指名坦白、过火要求、不坦白特务不过瘾的“左”倾情绪，同时反对坦白者哗众取宠、混编乱造、夸大其词。对逼供信偏向，及时注意，即便个别现象也不要轻易放松。对于坦白了特务和变节的分子，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混乱了自己的队伍。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逼供信错误，可以有意识的放松一时期，或暂时按他所讲的作一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秘密侦查，这样如系好人则便于团结，如系坏人则便于麻痹。对于一切坦白材料和口供，绝不可轻信，必须用周密的调查研究具体分析的方法，分清其中有真有假有冤枉有夸大各种不同的性质。因此，一切被审查的人，无论他坦白党内党外问题，均应进行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这是审干反奸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你们已经进行过坦白运动的机关学校及进行过反国特群众运动的地方，是否已经开始。

(四)经常检查和警惕有无肉刑与变相肉刑、车轮战、打骂、捆吊、污辱等等犯法行为发生，实现逮捕人犯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并不得超过嫌疑分子百分之三的制度。根据具体情况订立反奸纪律，在群众中公布。

(五)随时防止和纠正老的工农干部对新的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与报复情绪，正确估计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特务只是极少数，不要将他们的思想问题与特

务问题混为一谈，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军队更要极端严重的注意，许多知识分子，从抗战以来，在军队中在战斗的环境内出生入死多年，当审查他们时，绝不要忘掉这个重要根据。对他们的方针是既要详细审查，又须关心爱护，二者必须统一。〔1〕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廿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此指示，同时发给山东、太行、冀鲁豫、湖北、华中、晋西北等处。

中央关于 华中军事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华中局：

(一) 戎虞给各师信及二十日关于发展东南部署，均同意。但还须令七师开辟芜湖、当涂、高淳、南京地区工作，造成将来能够占领芜湖的条件。

(二) 粟裕南进后，可以成立苏浙皖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斗争。

(三) 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须再加兵力。

(四) 各根据地机动兵团抽走以后，应由老的地方独立团，提升若干为机动兵团，再由老的独立团留一部分作底子，成立新的独立团担任地方守备。八路军暂时没有部队抽调南下，师级干部明春延安可派几个到新四军。

中 央

戎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附：

一、华中局给粟裕、谭震林、 黄克诚、邓子恢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

刘少奇同志：

兹将我们致粟、谭、黄、邓一封绝密信内容告诉你，请审查指示。

近数月来，国际、国内政局，均有重大而显著的发展。首先是苏联，已将德寇全部逐出国境，红军目前已越过自己国界，在几个国家的辽阔土地上作战，且已深入德寇巢穴。同时，英美盟军，在完全解放了法国之后，又已越过比、荷、卢边疆，深入德国本土。意大利战局亦有进展。轴心国所奴役国家的游击战争，与各种反抗运动和各被解放国家的民主反法西斯运动，正如怒潮般普遍汹涌开展着。这不但确定准备希特勒速将覆没，而且决定了今后国际新民主运动不可动摇的趋向。远东局势虽由于国民党节节溃败，使日寇最后失败，将较过去一般人们合理的估计，可能要更加延长一些。但由于美在菲律宾登陆的胜利，及大举轰炸台湾和日本本土各地等，预示着盟军在中国海洋登陆的时间，日益接近。同时，由于我党我军在敌后胜利坚持，事实上已经控制着绝大部分对将来反攻日寇的决定意义的战略基地（如沿海岸线，及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特别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使盟军在击败日寇的实际任务上，有要求和我党我军密切合作的需要。我党我军的政治威信和影响，在全世界与全中国各

阶层人民中是飞跃的发展着。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因为占有全国政权与正统和合法的地位，且掌握着在全国武装部队的绝大部分，故对抗日曾经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蒋介石一贯执行依靠与等待外援，和一贯采取积极避战与消极抗战的失败主义方针，一贯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主义政策，已经在全世界与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出腐败堕落的真面目。蒋介石最近对我党谈判，仍一味敷衍。对我军与后方人民，仍坚持其高压政策。对英美苏，仍用流氓恐吓欺骗手段。对日寇汉奸，仍采一面应战，一面勾诱的方针。这不但证明其顽固反动，到了完全不可救药的境地，而且也暴露蒋介石反动统治，已经日益接近无法维持的地步（最近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强调评击，与大后方人民反法西斯与争民主运动，已经快要接近爆发点，就是明显的例证）。日寇在此次大战与中日战争中，虽一度逞其凶焰，但现在已渐至趋向没落与最后失败。日寇自身，亦已显至丧失其胜利信心，而企图把前途与出路寄托下列幻想上面：即压迫蒋介石参加轴心国战争，增加形成反攻的困难，以便求得在廉价条件下与英美议和。或希望英美与苏联团结破裂，以便从中取利，确保其所获赃物。近来，日寇加强对我沿海一带的控制，与打通平汉和从安南直达武汉的铁路交通，就是为了预防盟军登陆，阻止盟国从大陆上反攻和压迫蒋介石投降的救死方法。以上，是目前国内外时局演变的概括情形。就目前整个时局发展趋势而论，蒋介石如果不愿接受盟国舆论，与我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的要求，实行改弦更张（目前并无此象征），又不愿接受日寇条件，公开退出战争（目前仍存在着此种可能），则国民党军队，必继续遭受严重挫折，整个平汉粤汉路东，不久即将沦为敌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可能发生严重危机，势难照旧维持下去。

根据上列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我们对华中工作方向与布置，应提出新的估计和考虑。华中一方面为日寇统治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全国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集中地区。另方面，为盟军在华登陆首先必争的地带（特别是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及沿海沿江一带）。同时，华中为全国精华，为国民党与我势在必争的地区。如果我们在敌寇继续进攻，与国民党继续溃退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加强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武汉与沿海一带工作，能够争取时间，迅速完成发展河南，控制中原，与发展东南，控制苏浙的任务，这不但对将来配合盟军反攻，而且对粉碎蒋介石反共内战阴谋，均将起着决定的意义。因此，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和适应目前时局迫切要求，对华中发展方向，与各项工作布置，有下列的计划，盼你们同样加以考虑，并速将你们意见用密电告诉我们。

第一，华中目前发展方向：一面向南，即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一面向西，即发展皖北、河南，控制中原。

第二，向南发展，须由新四军独力担任。我们准备由粟率两个主力团南下，配合十六旅，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进一步与浙东打通联系，相机向南发展全浙。随之，尚须从一、二、三、四师增调几个团南进，完成任务。

第三，向西发展，须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共同负责。除目前四师之主力，与三师七旅，担任向豫东、皖北方面发展外，于必要时，尚须从三师再抽一部参战，完成任务。

第四，发展步骤，应采取逐步发展的方针。即于每一战役胜利后，即当发展群众运动，与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和建设党的组织。于建立巩固阵地后，再向前推进。

第五，对淮南巢南桂顽方面，一方面随时作大规模自卫战的

准备。另一方面，又不主动的去刺激桂顽。但桂顽对我有任何小规模进攻与蚕食，都应设法给以必要的报复和打击，以阻止其气焰。如果我们能将桂顽向我大举进攻的计划推迟到几个月以后，则对各方面均有利。

第六，为着应付向南，向西发展任务，我一、二、三、四各师地区，应加强下列基本工作：

(一)对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应作具体布置和检查。特别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徐州、海州与沿海洋、沿长江，沿铁路一带，必须立即布置工作与发展游击战争(已经布置了的，须经常检查)。但我们估计，敌人在反攻前夜，对上述城市与地区，可能特别加强控制。因此我们对上述地区工作，亦应力求隐蔽持久，切忌表面铺张。

(二)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要做到主力机动抗敌，可以就地坚持的目的。各师主力，应加以适当的充实和补充，并力争时间整训，和准备随时可以机动参战。

(三)大胆提拔地方干部，坚决抽调大批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干部，进行训练，准备分配地方兵团，与发展新地区工作。各地区应即开办建设公学(或建设干部学校)，广泛吸收各根据地内青年工、农、知识分子入学训练。如没有成百成千经过训练的各方面工作干部作准备，则无法应付目前和将来空前发展的局面(华中局正计划开办建设大学中，计划另告)。

(四)加强党与群众工作，这里特别要求加紧完成整风、审干、防奸。并从发展生产运动(发展和巩固劳动互助与各种合作社运动)中去团结根据地各阶层群众，与完成基层政权，即改造工作。使各根据地的工作达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五)整理公粮，税收，准备明年普遍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

与积蓄大量物资。必须确保大发展中经济与物资的需求（华中局计划研究一、三师盐棉运销与适当调整各根据地的财政税收）。

（六）加强时事政治教育，扫除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任何幻想。从思想和政治上，加强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认识。

（七）经常要有反扫荡的准备与继续保持精简状态。

（八）经常检查总结各种政策实施情况，与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向。必须从各方面贯彻党中央正确方针，及克服偏向，才能团结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为巩固现有根据地与发展敌后新地区而斗争。

第六〔七〕，各区党委，为着完成上列方针和任务，对各地工作，须作新的具体布置。华中局对各地个别具体要求与指示，当另函告。

华中局

十一月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二、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 部署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央：

粟、叶文日抵达军部，谭因路西大扫荡无法前来。兹将发展东南的初步部署报告如下，盼指示。

甲、由粟裕先率三个团（一团、特一团、四团，共计七千人），及党政军干部三百余人南进，配合十六旅，进占吴兴、长

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作为控制天目山全部之前进阵地。

乙、俟上项任务初步完成后，即由陶勇率特四团，过富春江东进，与浙东部队打通联络，以求控制会稽山。当陶勇部进到浦江地区时，即由特四团参谋长舒雨旺及江如枝（四六团主任，三北游击战争时浙南县书），率一个营，协同浙东部队一营（必要时须增派），进占宁海以东之象山地区。并以象山敌后为基地，沿海岸南下，进至温州地区，与浙南龙跃处打通联络，以开展温州南北沿海之游击战争。并相机由阮英巨率一部兵力，经浙南返闽东，以打通至闽中曾镜冰处之联络。

丙、加强浦东地委领导，决定苏中四分区地委正副书记陈维达，顾复生，前往工作。并由天目山方面派队深入杭嘉地区，开展工作，并打通与浦东之联络。为发展苏常太地区，已由苏中派出短枪队百余人，工作干部卅余人，前往工作。并已组织苏常太地委，以钱敏负责，现和青浦之浦东工作取得联络。为加强镇、丹、武地区工作，已由苏中派短枪队百余人，及长枪队三百余人，作为该区基干武装。并已组织镇、丹、武地委，金柯负责。其工作，于向东与苏常太，南与太隔〔滬〕地区打通联络。沪宁铁路沿线工作，即由上述两地委负责。宁波由浙东，杭州由苏南，南京由淮南，分别负责。上海，除各区党委动员关系，开展工作外，主要由华中局直接负责，并派专员驻浦东，就地指导上海工作（上海工作布置，当另电告）。

戊⁽¹⁾、由于二师路西情况严重，谭一时不能偕粟南进（罗近半年均病，现仍离职休养中）。我们本准备从三师抽调部队到二师，担任监视桂顽，以便从二师抽调两个主力团，在明春继续南下增援。候明年春季，尚可从苏中抽调三个团（内52团）担任南进任

务。

己、由于西进、南下，同时并进，孙良诚进入华中，亦须给以打击，我们已感到主力与主要干部不够分配的困难。不知可否由八路军派两三团到淮北路东，以便三师主力接防苏中淮南，使一、二两师主力可大部担任南进任务。可否从八路军或中央抽调几个师级军政干部来华中工作。

庚、我们提议，组织江浙指挥部，以粟为司令员，谭为政委，刘显势为参谋长。在谭未南下前，粟以司令及华中局代表名义，统一指挥苏南浙江部队与苏南及浙江党的工作。天目山局面打开，再考虑如何恢复六师，与建立浙江部队的指挥机关问题。

申〔辛〕、我们提议，叶飞、锺期先〔光〕参加苏中区党委为委员，叶为书记，陈丕显副之，张潘〔藩〕为参谋长。

壬、南进部队七千人，分批渡江。为秘密，分次分路出发。又布置需时，故须延期到下月上半月前，始能完成。如果在此期内，发生扫荡，则恐还要延长一些。

华中局

廿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原件无丁项。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 原则立场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
周恩来致王若飞电)

若飞同志：

(一)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周致赫信中提到准备发表五条即是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至于赫在五条上签字及赫毛交换信件，我们自始即无发表之意。我们所想发表者仅是我们向蒋建议之五条，因蒋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无法实现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开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此点待包瑞德回来再和他商酌。

(二)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三)中央在三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

委员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说。以上意思请告包瑞德或台维斯。

毛 周

亥文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

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

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这里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那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

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那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

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于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的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助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

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

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横蛮，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的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澈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

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澈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宝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

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

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根据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刊印

中央关于五师财经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郑李任陈^①及区党委、师部各同志，并告华中局：

(一)支电悉。你处财政困难的实情，我们仍不清楚，请将你们财经工作的现行办法详细电告，供我们研究后，才能提供意见。

(二)我们想到你处是处在分散游击环境，依照敌后各地经验，在这样情况下，经济供给的完全统筹是办不通的，统一政策领导下由分区分散自筹的办法却证明是较好的办法，例如师部只发直属队，各分区由专署负责，甚至各团亦可有各县负责分筹，以你们地区之富庶丰饶，实行就地分散自筹自给，只要地方党政与军队，能同心协力实行党政军一元化，是一定有办法的，应动员地方党部，地方政权，群众团体，首先而且坚决的负起保证军队供给无缺的责任，多作说服教育工作，达到一致为解决供给困难而奋斗，在打破统筹办法之外，供给待遇标准全师一律的办法，也应废除。师部对全师，只负抽多补少的调度调剂和政策上的指导责任，这一办法不知你们是否实行，如未实行可立即照做，如已实行，其困

难何在，请即电告。你们要不怕下面发生弊病，先让下面自筹，取得经验，吃饱之后，再作政策上的医救。

（三）华中、华北的部队，供给大部分解决，均依靠征收公粮。你们要立即就地建立公粮制度，要各部队与当地人民商量拿出粮食供给军队，以公平的标准民主乞求的态度去办理，并要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均出粮税，此外要说服部队不完全吃大米，养成吃杂粮的习惯，与老百姓同等，这样使老百姓所出粮额不多，而部队食用告足，在游击区公粮征收后，仍可分散由人民保管，要吃时再到各家去取。

（四）你们还应准备迎接明春的大生产运动，部队和机关均应参加生产，或拨出一部分组织生产队（部队）或大部分参加生产，（如后方各机关）。生产办法：发展手工业，或开荒，或与人民合伙共地耕种，在军民兼顾原则下分配收成。敌后经济供给的重心应放在发展生产上面。只有在人民中间的生产量大规模增加之后，财政问题才能得充分解决，请你们根据湖北实情去灵活应用这一原则。各分区的税则，对外贸易，和入口货物应在统一对敌斗争的原则下，视各地实况进行适当管理，你们应发行独立的边币，财税办得好，仍是解决困难的一个主要方向。

（五）你们还可考虑移兵就粮的办法，把中心区的兵力和机关学校移到边沿区去，移到粮食丰饶的新区（如三分区），把中心区的机关人员大批精简出来派到新区去

发展，师部区党委及边区政府应合在一起办公，成为一个领导机关，而将大批人员派到各分区去加强分区工作，让各分区独立工作，独立解决问题，为了防备桂顽，在应援便利的条件之下，部队亦可作适当分散，如必需四个团住在大悟山，即可实行生产待机的办法，对每个团由公家发一批资本，让他们有计划进行农工商业生产，从自给三月或半年到全部自给可开始试行之。但粮食仍须由公家发，鼓励各团的生产积极性，全部收入归他们支配，其他部队亦可试行此项办法，你处既要移兵就粮，向外发展，中央除派王震率一个旅去湖南外，是不宜再派兵到你处了，你们亦不必派多兵到江南。

(六)反恶霸斗争，不宜做为群众运动去普遍发动，宜就具体事件，妥善处理。解放区的正规的群众运动路线，是从减租减息，改造乡区政权，组织农民，组织自卫军及民兵，到发动大生产运动，只要在农村中确定了工农优势，如生活改善，群众组织起来，政权武装在握等，不宜将群众引导到普遍反恶霸的道路上去，遇有具体恶霸事件或土劣事件宜交司法部门处理，以宽大精神调解双方达到昭雪洗冤，使苦主得到适当赔偿为已足。

(七)由中央或华中局拨款帮助五师，这均是临时办法，恐仍无补大局，一切仍靠你们就地自筹，你们党政军应协同一致为解决供给困难而奋斗，应大胆信任现有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可靠的，特务分子只有极少数，党政军民应打通思想，消除隔阂，提高全体干部的积极

性。

（八）全党全军均应以郑位三、李先念两同志为首的集体领导之下，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领导机关必需一元化，如有争论，取决于位三同志。

中 央

亥 巧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 释

〔1〕郑李任陈，指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

关于扩大解放区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致程子华电)

子华同志：

亥文电悉。

(一)敌对蒋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

(二)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

(三)沦陷区扩大，如我党能执行正确政策，便可使现有军队获得巩固，并可在新发展地方扩大军队。

(四)豫湘粤浙四省明年可能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已抽出六千军队及干部分赴豫湘。

(五)河南发展，胡宗南汤恩伯两部又南调十余师，此间已不感威胁，不须再增兵。

(六)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毛泽东

亥巧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 分析与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十一月间，罗斯福代表赫尔利将军来延，其目的在调停国共关系，我们和他商定了一个向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其内容以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中心，并派周恩来同志偕赫尔利去重庆和蒋谈判，蒋拒绝这个协定草案，反而要求我党交出军权，而以允许我方一人加入政府，一人加入军委会作官为条件。我们坚持联合政府主张，谈判无结果，但未关闭谈判之门。

(二)蒋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家，大学教授及许多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我党在国民党区域人民中的威信，极大地提高。

(三)蒋的全部正规军，包括杂牌在内，已降到不足二百万，中央军的战斗力已极大下降。

(四)蒋及国民党镇压人民更加厉害，成都发生殴击学生大惨案，引起各界公愤，万余学生游行示威，为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

(五)国民党区域民生凋弊，财政恐慌，土匪蜂起，自发的农民武装暴动不断发生，多至数百股，小者数十人，大者万余人。湘西一股万余人坚持两年之久，蒋派大军进攻，屡战屡败。

(六)许多地方系军队对蒋早成半独立状态，特别是云南、四川、广东三系，近数月来更加不满。

(七)蒋已密令白崇禧，要他在华中发动对我党的军事进攻，其目的在打给日本人看，缓和日本对蒋的进攻。蒋对日本人暗中勾结近日增多，其目的也是缓和进攻。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

(八)上海一带敌占大城市的资产阶级近日更多向我党靠拢，傀儡政府中人员向我输诚者增多，各地伪军叛日降我者增多。

(九)我党军队又有发展，现已达六十五万，明年可能达到一百万，民兵也有发展，明年可能达到三百万。

(十)我党及中国解放区在国际上的地位已提高，外交关系之门已打开了。

(十一)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十二)许多人赞成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不称政府），以便加强解放区工作，影响大后方及沦陷区人民，

促进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但时机尚须考虑。

（十三）对日战争时间将延长，可能还有数年之久。我党须利用今后两年增强抗日力量。一九四五年方针见之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演说，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第一，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内战时期，我党不懂得发展生产，也不懂得节省人力，以致后来精力枯竭，不能持久。鉴于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充分注意发展生产与节省人力，使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各地须立即利用冬季，准备明年春耕，并确立明年全年的军民生产计划。第二，如果我们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普遍建立地下组织，就可保证将来的继续发展，组织广大的地下军，并占领大城市。在解放区工作的人们为烦忙工作所束缚，产生了不甚注意沦陷区地下工作的弱点，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克服此种弱点。只有我们占领大城市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最后胜利者。第三，如果我们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扩大解放区的面积与人口，就有可能依据新地区的人力物力扩大我们的军队。除向豫湘浙等省派遣大批军队及干部创设新地区外，各地均应有

步骤地努力扩大自己的新地区，并十分注意保育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切勿滥用与浪费。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没有这一条件是不行的，那时至少要有大批小城市与若干中等城市在我们手中，并且许多军队还应自己从事生产自给），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

（十四）一切主要政策，各地大都上了轨道。但在这些政策中，尚有部分的执行得不恰当。一切决定于任务的提出与政策的恰当，精密地掌握政策的执行，十分重要。

中 央

亥 有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致罗荣桓、黎玉电)

罗黎：

(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二)每一地区，从开始减租到全部澈底完成减租任务，大体要经过三年时间，还要抓得很紧，稍为放松，即难完成。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文教工作，大体也是如此。要有这些时间，全体干部才能学会，全体群众才能发动。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

(三)人民生产工作，希望加强注意。

(四)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

(五)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

(六)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须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

可种。

毛泽东

亥有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附 录

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延安各界正开盛大的群众大会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在前线与后方各地，日内均将召开同样的大会。全国人民对于我伟大民族之获得国际地位的平等，正在兴奋热烈地进行庆祝。本报愿乘此机会，一述中国共产党与废约运动。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大体上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帝国主义者残暴侵略，中国腐朽统治者卖国求荣，中国国际地位日益下降的阶段，后一阶段为中国人民民族觉悟生长、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发展的阶段。这种划分是大体上的，因为在前一阶段中，也曾有过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前夜的护路斗争等等民众的反抗运动，而后一阶段中，亦曾有过“九一八”后汪精卫的不抵抗主义与投降主义。然而基本上是可以作这种划分的，因为前一阶段中虽然有民众反抗运动，但这种运动是自发的、民族觉悟程度不高的、组织散慢的、目标不清楚的、屡仆屡起的斗争，只有在后一阶段上，中国人民才清楚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的桎梏，才有高度的民族自觉，才有鲜明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才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民斗争的政党，及全民族的团结奋斗，以致能够进行神圣的抗战和取得目前废约的成功。后一阶段上虽曾有人如汪精卫之

流和我们民族死敌日本帝国主义者，谈和平、谈共荣、讲妥协、签条约。可是民众义愤终于焚毁了这些纸张，爆发了伟大神圣的祖国战争。这两个阶段底分水岭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之诞生。中国共产党，是认清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及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个政党。当在中国尚有许多人士迷信“威尔逊宣言”和期待“列强援助”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一个政治宣言——一九二二年五（七）月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上，以“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为题，而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榨取中国的本相”，指明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事实上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战斗口号。并于同年六月第一次对时局宣言中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债款，完全收回管理”之要求，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矢。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曾大声疾呼倡导民族民主的联合战线，两年之后这一联合战线结成了，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改组于广州，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政纲，其中有一条是：“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之口号已成为民族民主联合战线的口号，全国人民的口号。自此以还，民族斗争日益澎湃，由“五卅”而省港罢工、而北伐、而占领武汉、而收回汉口租界。不幸中途变生，功败垂成。此后十余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着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光

辉旗帜。当汪精卫之流窃据要津，高唱“不抵抗主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及签定屈辱条约时，中国共产党却坚持地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宣传、组织和实行以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此后，中国共产党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结成奔走呼号，乃于芦沟桥事变之后，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了全国抗战，恢复了国共合作，五年以来坚持不屈，用能屡挫暴寇，使中国一跃为世界四强之一，而获得了今日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与平等新约之签订。

从这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它是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倡者，是这一主张始终不屈的坚持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议者，是抗日战争中站在最前线的英勇战士。而共产党之能够首先认清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提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之正确的口号、方向、道路、方法，乃是因为它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它掌握了集几千年人类思想大成的理论与方法。正是马列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去了解周围环境，判明祖国所处的危急状况，认识奋斗的方向，提出战斗的口号。正是马列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发扬中国人民反抗外敌的光荣传统，走出狭隘的排满口号，抛弃“列强援助”的幻想，而走上广泛的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马列主义及掌握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乃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灯塔。

（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底倡导者，而且是争取这一口号实现、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实现的主要的方法——民族统一战线底倡议者。中国共产党早就看到，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斗争，才能求得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历史事

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远见之正确，大革命时代与抗战时代，不论对内对外都是中华民族近百年史上最光明最充满希望的时代。目前废约之成功，将来抗战之胜利，均唯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赖！

(三)虽然如此，在今日废约成功之时，中国共产党却并不以此自炫。它深知在这事业上，政党倡导之力固然不可湮没，然而这个成功，总的说来，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民，唯有人民，乃是这一光荣史诗的作者。政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它的领导只是把人民的公意“集中起来”为口号、纲领，又“坚持下去”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运动。任何政党只有在能够与人民一起正确反映与集中人民的要求而又不折不挠坚持这个要求，才能成为运动的胜利的领导者，反之，就会成为可怜的失败者，历史的丑角。所以，若问：这是谁的成功？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首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我们衷心地崇拜我们伟大人民的力量底雄伟，而要更深入民众，加强与民众的联系，正确反映民众的要求和坚持民众的要求。人民——这是中华民族求得自由平等底力量的源泉和保证。

(四)正如我们在中共中央二十五日决定^{〔1〕}中所看到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热烈庆祝废约之成功，另一方面，却强调争取抗战胜利之重要。废约和平等新约之订立，固然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成功，可是，这还不是民族解放底澈底实现……因为必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中共中央决定)。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着我们的的大好山河，不击败它，不把它赶出中国境外，则一切平等条约的规定，便不能实现。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当前

的急务。在欢欣庆祝之中，我们应更“坚定军民抗战的信心，号召军民驱逐日寇，为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我们已经有了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我们还需战胜日寇的民族战争的胜利，我们需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全国军民，全国同胞，为抗战胜利而努力呵！为澈底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呵！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指本册所选《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1943年1月25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

一九一九年，由于绝大多数战前旧工人政党政治破产的结果，组织了共产国际，它底历史任务在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底学说，使其不为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分子所庸俗化及曲解；在许多国度里，它曾帮助先进工人底先锋队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帮助他们动员劳动群众来保卫他们底经济和政治利益，来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所已准备的战争之斗争，来保卫反法西斯主义主要堡垒的苏联。共产国际曾及时地揭发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作为希特勒匪帮准备战争的武器底真正意义。在战前，共产国际早已不倦地暴露了希特勒匪帮在外国的卑污破坏活动，他们是以所谓共产国际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叫嚣，来掩饰这些活动的。

但是在战前，早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

世界各国发展之历史道路底深刻差别，它们社会制度底殊异，它们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与速率底不同，以及最后，工人们觉悟与组织程度底各异，也决定了每一个别国度工人阶级面

前问题底不同。

过去二十五年事件底整个进程、以及共产国际所积累的经验，已经明确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符合于工人运动复兴初期需要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日益不能适应这个运动底增长和每个国度内日益复杂的问题了，而且还证明了这个形式甚至成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工人政党底障碍。

希特勒匪帮所掀起的世界战争，使各国间情况底差异更加尖锐，它在成为希特勒匪帮暴政承受者的国度与团结在强大反希特勒联盟中的各爱好自由人民之间，划下了深刻的界线。在希特勒匪帮集团的国度里，工人、劳动者及一切忠诚人民底基本任务，是用一切想得出的办法，从内部颠覆希特勒匪帮底战争机构，帮助推翻应负战争责任的各政府，这样来协力击败这个集团。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度里，为求最迅速地摧毁希特勒匪帮集团和建立各民族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合作，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先进工人们底神圣责任，是用一切方法来支持这些国度政府底作战措施。同时，不能忽略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各个国度，也有它们自己底特殊任务。例如，在希特勒匪帮占领了的、和丧失了它们国家独立的国度内，进步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底基本任务，是开展正在成长为反希特勒德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武装斗争。

同时，各爱好自由人民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战争，已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他们不分党派、不分宗教，团结在强大的反希特勒联盟底队伍中。这个解放战争更加明显地说明了，为最迅速战胜敌人所需要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是能够由各个国度工人运动底先锋队，在自己国家的体制内最好和最

有成效地实现的。

一九三五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估计到国际形势及工人运动中所已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各支部在解决它们面前的问题时，有更大的伸缩性和独立性——，那时就已强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决定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时，需要“从各个国度底具体情况及特殊条件出发，同时一般地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底内部组织事宜”。

在考虑和批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队伍的决定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遵循了这种原则的。

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者底学说指导下，从不主张保存已经变为陈旧的组织形式；他们永远是使工人运动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服从整个工人运动底基本政治利益，服从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底特点，及由这些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各种问题。他们记得伟大的马克思底榜样：马克思曾将进步的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联合会底队伍中来。而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它底历史任务、奠定了欧美各国工人政党发展底基础以后，马克思鉴于创造民族的、工人的、群众性的政党之日益增长的需要，就实行解散第一国际，因为这个组织形式不再符合这一需要了。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从上述各项考虑出发，并估计到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底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且因在目前战争过程中曾有若干支部提出解散国际工人运动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事实，但由于在世界战争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乃由执委主席团自身提出下列提议，再经共产国际各支部加以批准：“解散国际工人运动底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一切同道者集中他们底力量于多方面的支持与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各人民及国家底解放战争，以便加速摧毁劳动人民底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与附庸。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哥特瓦尔德

季米特洛夫

日丹诺夫

科拉洛夫

柯泼莱尼格

库西宁

曼努意斯基

马尔梯

皮克

托列斯

弗洛林

爱尔柯利

（签字）

此决议为下列各国共产党代表所同意：

比安柯（意大利）

多罗列斯·伊巴露丽（西班牙）

勒蒂宁（芬兰）

波克尔（罗马尼亚）

拉柯西（匈牙利）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拟定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

论共产国际底解散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昨日本报发表了两个重要文献：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和中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工人运动底国际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散了！这是一件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曾经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国际组织，这个继续着第一国际底光荣传统和第二国际战前最好时期的传统，领导着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集中的战斗组织，今天需要解散呢？它的解散对于目前的世界局势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往前发展将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着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组织形式是采取什么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其他原始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在解决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时，第一，不把运动束缚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否认绝对正确的对于革命运动一切阶段都适用的组织形式；第二，他们对于组织形式要求作无条件的历史的考察，必须从运动发展的当前阶段的具体环境中去观察组织形式之是否适宜；第三，他们认为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政治利益的，组织形式是为每个特定时期的具体历史环境及由此直接产生的任务所决定的。从这个观点看来，就可以懂得，任何组织形式由于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能够从促进运动发展的形式变成为它

的桎梏，这时候，旧的组织形式必须改变。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历史，鲜明的说明了这点。这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组织形式的观点，永远是共产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领导原则。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在“共产党底组织建设，他们工作的内容和方法”这一提纲中开始就说：“（一）党底组织应该适合它的活动的条件和目的……（二）不能有绝对正确的不变的共产党底组织形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在前进中经受着不断的变化，它迫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经常找寻自己组织底最合适的形式。……”

明乎马克思主义对于组织形式的这个基本原理之后，对于共产国际底解散就不会诧异了。就会懂得“共产国际底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中共中央）了。

共产国际产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时候战前的旧的工人政党绝大多数叛变了社会主义，政治上完全破产了；在欧美各国（除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这时候，既很薄弱，又没有广大的联系与组织，不能有力地来抗击机会主义的叛卖和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而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胜利、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将阶级斗争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这些条件在工人运动面前提出了在各国组织和旧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截然不同的新型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迫切需要，和在全世界组织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国际组织，以领导和帮助新兴的薄弱的各国共产党之迫切需要。共产国际担负着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出世了。在其存在的二十五年内，共产国际不仅帮助了各国工人阶级底先进分子团结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扶植培养了这些政党的独立战斗的能力和创造的天才，使他们能够最好地和最有成效地解决各个国家面前的极复杂的任务。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史上得到最鲜明的例证。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有其深刻的根源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的党之所以能够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变成为全国政治生活底重大因素，所以能够在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独立地创造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对于这一点，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是曾经有过重大作用的。可是，如果在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在各国党创造和形成的时期，以及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各国革命斗争的任务比较单纯的时期，集中的国际的中心是必要的、合适的，能够促进运动发展的话，那么，在世界局势激变，各国工人运动面前的问题愈益复杂多变，而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创造的独立作战能力的时候，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显得陈旧了、不适宜了，它的继续存在将成为运动发展的障碍。试设想一下，今天的世界状况，那是怎样一幅花样复杂的图画啊！今天的世界，有着以铁与血搏斗着的希特勒匪帮及其同盟者的侵略集团与伟大的爱好自由的民族的反希特勒同盟；在这对抗的营垒之旁站着若干中立国家。不论在侵略集团之内、反侵略同盟之内、中立国之间，各个国家的地位亦是极不相似。以侵略集团说，德国是完全的主人，日寇是半独立的希特勒同盟者，意大利是附庸，罗、匈、芬则是喽罗；以同盟国来说，有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的英、美，半殖民地的中国，殖民地的印度，暂时沦陷失却国家独立的法、比、捷、荷等国；以中立国说，有亲轴心的西班牙，亦有土耳其和瑞典，有在德国四面包围中的瑞士，亦有远离战场烽火的南美国家。姑不必论各国内部情况的天壤悬殊，工人运动主观力量的各不相同，即就这个复杂万分的国际关系和状况来说，要由一个国际领导中心来集中地解决一切

国家的各种问题，是如何不可设想。一九三五年的共产国际七次大会鉴于国际形势之日趋复杂，就已经决定了使各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和特殊状况来解决本国的各种问题，八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已经成长到能够不犯重大错误地正确地决定其本国的内外政策的水平了。运动发展的客观条件，使得国际范围内的集中领导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其主观条件，则已成熟到使这种远离本国的中心的领导成为多余的了。这样，旧的形式底抛弃，只会使新的内容更顺畅的发展起来，使运动更向前提高一步。

从上所述亦就可以明了，这个英明的措施，将必然会使得各国的工人运动更进一步的发展，使得各国共产党能够更切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和历史情况来解决本国革命运动面前的任务，而使它更能成为与千百万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民族的工人政党；使得它的领导干部及全体党员在提高了的责任感的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地依据本国的条件来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而提高他们的创造才能。我们可以期待，在今后，各国共产党不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不论在革命实践上，将会有迅速的飞跃发展和伟大成就。至于各国工人阶级底休戚与共利害相关的意识，那么，恩格斯关于第一国际解散所说的：“甚至没有暂时已经变为桎梏的形式的国际联合，亦会继续前进的”，在今天更加切合的。

对于目前的世界局势，它的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目前的世界局势正处在摧毁希特勒暴政的决战的前夜；毁灭希特勒主义及其亚种，乃是今天头一等的任务，一切力量应该集中于完成这一任务。而希特勒的情况愈加危急，他的政治和军事的地位愈加无出路，那么，他愈加想挑拨分裂同盟国的营垒。在希特勒匪帮

手中的挑拨工具之一就是“反共产国际”这个幌子。在战前希特勒就以“反共公约”作为准备战争的工具，而在目前四面楚歌的环境中，戈培尔辈又声嘶力竭地叫喊莫须有的“布尔塞维主义的危险”和“共产国际干涉各国内政的阴谋”来找寻脱逃死亡的出路。共产国际底解散给了希特勒匪帮以当头一棒，使他们的“反共产国际的公约”落了空。这几天轴心宣传的慌乱，柏林发言人对“反共公约”将来如何之只能回答“将来自知”，已经充分暴露了轴心集团之周章狼狈。相反的，同盟各国朝野的交口称誉，证明了此举对于盟国团结和促进澈底摧毁轴心集团的胜利之到来的重大贡献。

总之，共产国际底解散，是为客观主观条件的变化所准备了，历史条件成熟了，新的内容生长了，已经陈旧了的，变成桎梏的旧形式之抛弃，只会使新的内容更迅速更顺利地茁长怒放。共产国际底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大的责任感，更大的自信心，更大的创造性，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革命斗争的先锋岗位上来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工作，来加强与千百万人民的联系，来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借以服务于抗战建国大业，首先最迅速地摧毁我们民族的死敌——日本法西斯及其德意同盟者！战斗罢！中国共产党人！胜利是我们的。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去年宣布以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去年有二十八个国家庆祝这一个节日，纽约曾有五十万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联合国胜利在望，全世界对于这个节日的庆祝，必定更加热烈，更加盛大。

人类的命运，现在处在决定的时机。决定人类命运的，乃是此次大战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次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野蛮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我们中国进行了对日抗战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势武器在敌后坚持至今的游击战争，乃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国六年的抗战，诚如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把持国柄，勾结轴心，对外屈辱，对内反共，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作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这种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起就主张的对日抗战乃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主张屈辱投降的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是何等可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我们庆祝联合国的胜利，庆祝人类正义之胜利，也庆祝中华民族的强盛，庆祝抗战的胜利。

反对法西斯，不仅为了人类的现在，而且也是为着人类的将

来。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乃是两个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了。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总统与英首相同拟的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人类的四大自由，这就是言论与信仰的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联合国日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在去年今日的演说中，再一次强调了维护人类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说：“信仰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与敌人之主要分野。”又说：“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类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气、日光、面包与食盐之不可须臾或离，剥夺人类所有此等自由，则彼等必将无法生存，剥夺其一部分自由，则其另一部分必将枯萎”。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维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则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纮一宇”〔1〕的并吞，对内则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党员所参加的地方政权中，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并把民主政治的原则具体化，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并坚决主张：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这不仅对于现在的抗战有很大好处，对于将来的建国有很大好处，而且对于全人类也有很大好

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为我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我国的一切设施会对全人类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影响。

可是，正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时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在我抗战营垒之内，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

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说。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和“盲从领袖”的调调。这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象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反对太平天国媚事反动清朝的反革命传统，继承了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术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份。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

这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污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污蔑了中华民族。

当我们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扫清这个毒素，当然也决不容许它在中国猖獗起来，以致将来再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地步。

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加紧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的主要的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主要的应是为着动员人民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是为着反封建。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斗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

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

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这就会大大的增强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这就会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促进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会帮助奠定将来的世界和平，和独立的新中国之建成，这才会更加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而对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贡献。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八纮一字，日本神道教用语。“八纮”，泛指世界。八纮一字，意谓兼并全世界成为一个国家。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已经得到各国共产党的一致赞成，而于六月十日经过国际主席团的决定实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整个看法，在五月二十八日已经有所论述，现在专就中国从这件事所应得出的教训，再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共产国际的解散，至少应该使所有中国人进一步认识(或者是从新认识)三个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解散，应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新的认识呢？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中间，它曾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发展条件，但是条件尽管改变，马克思主义却总是向前发展着。二十四年前共产国际的成立，曾表明这个发展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又到了一个更新的和更高的阶段。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为什么都赞成解散共产国际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今后将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继续发展，是有着一致的坚强的信心；这就是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之将在全世界继续发展，乃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抵抗的现象，而决不以任何国际中心的存在和帮助为其必要前提；这就是告诉我们，中国有些人过

去和现在说是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或特别不适用于中国，其所以还存在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者，就因为共产国际的活动云云，这是一种何等的浅见。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并不依靠某种国际性的组织形式，而可以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得到发展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受国界限制的**科学**，正如地球绕日的学说之不受国界限制一样。革命（这是科学应用于具体国家的**具体结果**）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但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科学**（这个一切先进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必然输出，也必需输入。还在几百年前，明末清初的那些最反动最守旧的昏君和暴君，就已经开始懂得了接受欧洲近代科学的必要，因而改进了几千年来“固有文化”的阴历。辛亥以后，虽然象袁世凯这样愚而好自用的专制魔王，也还知道定“舶来”的阳历为“国历”，以迄于今，未见中国因此丧失半点利权。若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则今日中国自中华民国之“民国”、国民党之“党”以下，各种输入的大小制度办法名目，何止千万？若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又不同，则俄国人列宁接受了德国人马克思的主义，大家试看究竟俄国有没有因此而成为德国的“附庸”，如完全“发扬”了独裁者凯撒以来“固有文化”的法西斯意大利那样？老实说，如果腐败的沙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的俄国，没有幸而变为富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则岂但俄国今天确乎要成为德国的附庸，四强弱了一强，即其他三强之命运如何，也正在不可知之数。若说马克思主义尽可适用于其他国家并使其真正富强，唯独中国是例外，中国有孙中山主义，而孙中山主义是与外来科学思想不能相容的，这就更荒唐了，这就并不是诽谤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诽谤本国的孙中山主义了。谁都知道，正是孙

中山先生本人，第一个觉悟到国民党改组以前的固有方法不好，因而决心学习俄国革命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方法”。民国十三年孙先生给蒋介石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澈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其长，则各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在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

在这里，孙先生不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否和应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做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对于当时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地墨守固有方法，顽固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降心相从”的人，也做了公允的评价，这些结论和评价，都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所一一证实了。

共产国际的解散，使我们对于国际主义也可以有同样进一步的认识。国际主义，并不是共产国际存在的结果，而是共产国际存在的原因。如果这个真理，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有些人还是看不清的话，那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就应该完全看清了。觉悟的人类，有这种国际组织也好，有那种国际组织也好，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国际组织也好，其不分国家民族而

团结一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他们无论有一种什么形式的国际团结，总一定自始至终，忠实于其本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也是极其显然的。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个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无奈有些人硬象看见了什么似的，硬说一个国际组织对于一个民族是如何如何的“不妙”。那么看事实吧，以前美国共产党曾不得已而首先退出共产国际，这对于美国共产党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对于（比方说）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国际团结又有什么影响呢？唯一可说的影响，就不过是证明了那些造谣者的破产罢了。

中国现在还有人要趁这个“最后”的机会，伪善地“称赞”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国际主义特别是苏联的国际主义的“结束”。共产国际的解散，确如斯大林所说是“恰当和适合时宜”，而这种宣传，却应该说是极不“恰当和适合时宜”的。这种宣传极不恰当，因为第一，这些宣传者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再一次忘记了孙先生的遗教。孙先生正是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里说：

“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推到全世界，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

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

可见孙先生自己，就是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于一身的人。第二，这些宣传者自称是国民党人，却忘记了从大革命到抗战，受苏联的国际主义最慷慨最大量的帮助者正是国民党。第三，这些宣传者甚至拙劣地引证斯大林的意见，承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揭破了希特勒匪徒关于所谓‘莫斯科’意欲干涉其他国家生活并使之‘布尔塞维克化’的谎言”，然后又紧接着说，莫斯科过去确是意欲使其他国家布尔塞维克化的，这在逻辑上就不免使自己与希特勒的区别糊涂起来。这种宣传又极不适合时宜，因为第一，现在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说公理与强权的国际战争时代，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都已经联合一致，向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并肩作战，并且正在为最大限度地加强这种战时的和战后的国际团结而努力，因此就应该大大提倡国际主义，而不应该稍微减弱国际主义。第二，即使对于法西斯集团国家的人民和士兵，也只应该大大宣传国际主义，来打击法西斯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争取他们走到反法西斯战线方面来，而不应该相反地和法西斯的反国际主义宣传回流合污。第三，在中国来说，加强国际主义的宣传更是迫切需要，因为中国的抗战正在最困难的时期，不但急须开展瓦解敌军的斗争，尤其急须取得同盟国以更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来给予我们更大的军事援助，在这个时候来宣传中国民族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有何矛盾，与整个反法西斯国际战争的利益有何不相调和，当然是非常有害，应该立刻“结束”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又使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而切实消除过去一切关于它的误解和妄说。今天再没有人能够抹煞事实，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了。审查

一个政党的民族化，应该有些什么标准呢？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与这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本心的拥护；应该看这个政党的主张是否适合民族和人民的需要，能使其达到自由幸福的目的；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确实一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相信和能否发动本民族的人民的创造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赖或等待外援；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而不是坏的，早已过时而应该抛弃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从这所有的标准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最民族化的政党，在中国所有各政党中，它应该考第一名。

共产国际解散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推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国际与国内团结。中国国内团结的中心关键，就是国共两党间的关系。不可讳言的，这种关系今天还有很多缺憾。同样不可讳言的，过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借以反对共产党的理由，就是中国共产党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现在这个“理由”已经消灭了。因为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国际主义而加以反对之不能自圆其说，我们也在前面讲过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迅速地将两党间的关系予以调整和改善。国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利于日本法西斯，但是环顾国内，一方面虽有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和其他英勇军民的艰苦奋战，虽有陕甘宁边区的积极发展生产，援助前线，改善民生，一方面却是大后方的民生憔悴，士气消沉，这种险象，起于亟待全力准备反攻的今日，真不禁使我们忧心如焚。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国内团结能够增进，一切问题都还是不难解决的。国民党人既然十分欢迎

斯大林五月二十八日答复英记者的信，那么，他们当然是准备实现斯大林关于加强反法西斯各国国内团结的希望。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诚心努力与国民党人协商，来共同实现斯大林的希望，并且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实现蒋委员长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谈话，实现民国二十七年三月的抗战救国纲领，实现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和对共产党“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的诺言。果能如此，则国内困难必可克服，抗战胜利必可促进，中国就算是没有错过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条件，没有辜负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件大事了。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

——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一)

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一八四〇年以前封建制度下的我国，是一定要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推动着人们去消灭封建制度，建立民主主义的新中国，造成生产力顺畅发展的条件。由于我国生产力很低，国家就很贫弱，帝国主义就来欺侮；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着人们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要使民族强盛繁荣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一切社会进化的动力，也是近百年来我们民族所进行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基本动力。这个动力是如此强大，除非任务解决，谁想消除它都是枉然。

太平革命到辛亥革命，整整六十年，我国志士仁人，断头流血，推翻了满清政府。然而，满清政府虽然推翻了，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并未除去，生产力还是不能顺畅的发展，封建势力依然统治我国，帝国主义还是侵略我国。为什么在别的国家，用推翻皇室和建立共和的方法，就足以替资本主义的顺畅发展开辟道路，而在我国却不能呢？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访问各国之后，得出结论说：革命

的失败，是由于“方法不对”。究竟不对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解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指出其应有的特性说：“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的、以及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除了客观的原因以外，还有主观的原因，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方法不对”，换句话说，就是用了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而还没有用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

辛亥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已不适用于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胜利，就是说，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要实行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但要有一个革命的、愿意与无产阶级联盟的资产阶级政党，还要有一个愿意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有了这样两个政党的联盟，并与其他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澈底胜利，才能给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顺畅的道路。

如果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那末，一个革命的、愿意和无产阶级联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一个愿意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党，

它们的出现也是不可抗拒的。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犹之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谁要想取消共产党，就如同谁要想取消革命的国民党一样，都是违反历史发展的笑话奇谈。谁如果当真要来试试，谁就一定大倒其霉。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历史发展还将继续证明它。

（二）

五四运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在政治上 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与以前各个革命运动不同之点，就是有那开始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参加以至领导。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孙中山先生检讨了过去革命的经验，定出了三大政策——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扶持工农运动，这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新阶段，是完全符合于中国人民在这一阶段上的要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这也是完全符合于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有了一个愿意与无产阶级联盟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又有了一个愿意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两党实现了亲密的合作，第一次大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起来，我国民主革命史上就出现了黄金时代。

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我国民主革命中应有之事。孙中

山先生是主张平均地权的人。满清光绪末年国民党办的《民报》上,就以“土地国有”列为六大政纲之一。但是一九二七年,当革命运动发展到必须实际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代表就不惜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屠杀来对付革命的基本群众和共产党。国共分裂,既非共产党人所主张,亦非忠实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所主张,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代表的一意孤行。这就使革命半途而废,这就酿成十年内战,最后几乎招致亡国大祸,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形之下,革命运动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共产党挺身而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使之不致平白断送于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之手,乃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共产党的牺牲奋斗,存亡继绝,保留中华民族的一点元气,保留第一次大革命的一点遗产,那末,今天中华民族是否还能屹然存在于世界上,列于四大强国之林,是很可怀疑的。在这十年惨痛的内战之中,共产党人与忠实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一样,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抱有深刻的义愤,这种义愤是正当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共产党同志,在个别地方或个别时期,由于过分的愤慨,以致感情用事,得罪了中间人士。共产党方面,已经严厉批评了这种主观主义。这是共产党的一方面。在国民党的一方面,革命的国民党员对当时国民党领导者的正确批评,虽然很多很多,但当时的执政者,对于这些忠言,却至今未见接受了什么,反而辩护其当时的一意孤行,似乎违反孙中山先生遗教乃是正当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是深为惋惜的。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首先倡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显然的,当时还要进行内战,不仅抗日不可能,就算“备

战”也不可能。如果说当时继续内战即所以对日“备战”，那就是汪逆精卫“攘外必先安内”的汉奸理论，实无一驳之价值。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为了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不咎既往，这种惊天动地的义举，给了日寇和汪逆精卫的阴谋以粉碎的打击，铺平了团结抗战的道路。接着，中国共产党完全实现自己的诺言，实行三民主义，取消暴动政策，苏维埃制度改为现行民主制度，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在敌后坚持最艰苦的游击战争，牵制敌寇在华一半兵力，以至于今。甚至在皖南新四军被反共分子包围缴械并宣布新四军“叛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以相忍为国，力谋团结抗战为务，使我伟大之中华民族不致沦为朝鲜台湾。这是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一方面。而在国民党的方面，虽有汪逆精卫的叛国，全党愤然开除了汪逆的党籍，坚持抗战，这是很好的。二十七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也是很好的。内战的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就使得日本法西斯强盗无法灭亡中国，就使得神圣的抗战能坚持六年之久，而且还要坚持下去，就使得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盟各国对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我国被公认为四大强国之一。

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二十二年的经验是什么呢？这个经验就是，在半殖民地的情况下，我们民族的盛衰，系于国共两党的政策，及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两党的政策正确的时候，即是说，在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同时共产党实行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之时，两党的关系就好，中华民族就强盛，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抬高。反之，如果国共两党中任何一个党，破坏团结，则中华民族立即衰弱下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立即降低。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国共两党有最亲密的合作，革命

的发展就最顺利。十六年以后，国民党实行“清党”，内战发生了，国共分裂了，革命也就失败了。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从新合作，虽然不如第一次合作那样亲密，反共分子还闹过两次磨擦，但就足以进行伟大的民族抗战，直到现在。由此可见，为长期历史实践所证明的真理是：为了中华民族，国共两党只应团结，不应分裂，团结越好，中华民族也愈加强盛，反之，分裂则将招致民族的大祸。

(三)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二十三岁的诞辰。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已经进行了足足六年。国际形势对于抗战非常有利，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这是今天好的一方面，对于这一点，谁也再不怀疑。但另一方面，六年的持久抗战，消耗了国力，今天我们遇到空前未有的困难，这是坏的一方面。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大家都要求有个对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早已预见这种困难的到来，首先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下列的政策：（一）精兵简政，组织民兵，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增强抗战力量；（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克服经济困难，提高军民抗战信心；（三）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以减轻阶级对立，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四）建设和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以期群策群力，一致对敌斗争。这种政策的进行，现在已经得到初步效果。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论环境说，是比任何地区更加困难，但经验证明了，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抗战依然可以很好的坚持下去，人民依然可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我们认为，这种政策，不仅可以施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在其他地区也一样可以实行。

我们根据二十二年历史的经验，根据最近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深刻的相信，如果国共两党能够更加亲密的合作，如果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则困难虽然严重，国事无不可为之理，日寇无不可胜之道。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抗战阵营中有一小部分人，竟提出另一种骇人听闻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认为（不管说话的词句是如何避开法西斯三字），中国必须实行法西斯主义。这种人公然赞美希特勒，公然学着希特勒的口吻，喊什么“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倡什么“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盲从领袖”，公开拒绝实行民主，说什么“宪政时期谈不到”。尤其值得骇异的，是公然以新的内战来威胁全民族，说什么“军政时期不能停止”。

为了战友之谊，为了民族大义，让我们给这些人以诚恳的忠告：

第一，法西斯主义，是行不通的。在外国，强国则有德、意、日的例子，弱国则有波兰、罗马尼亚、阿根廷、泰国的例子。在中国也不会例外。况且，经过这次大战，民主阵线是要胜利的。至于人类，因为过去对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估计不足，没有听共产国际的号召，及早就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以致现在损失几千万生命和几万万万万的财产，但是吃了一次亏以后，现在也会变得聪明些了，现在谁要提倡法西斯主义，他不但会变成中国人民的公敌，而且会变成世界人类的公敌的。做这样的公敌，弄得身败名裂，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第二，要请这些人冷静一点，替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想想。

中华民族要的是抗战，再也没有人喜欢内战了。喜欢内战的人，大都跟了汪逆精卫当汉奸去了，这些汉奸倒的确喜欢内战，因为内战的结果，我国一定灭亡，这是十分肯定的结论。你既然还是中国人，何苦要中国发生内战，何苦要中华民族遭到新的危机？而且，即使你喜欢内战，你有什么把握人民不起来“予及汝偕亡”？

第三，老百姓要点民主，在满清和北洋军阀时代，要犯杀头之罪，但是现在犯什么杀头之罪呢？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民主，结果一切困难都能克服，试问有什么不好呢？大后方贪官污吏发国难财，军队给养不足，社会颓风日长，人民困顿流离，这种不幸事件，报上登了不少，早已引起广泛的要求民主的呼声，连扫荡报都主张“借脑袋”，为什么不可实行些民主，加强团结，整饬吏治，挽救颓风，消除不幸事件，以便克服困难，加强抗战力量呢？

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忠告这些提倡法西斯主义和鼓吹内战的人，你们的主张要不得，如果不改，是会自焚其身的。忠言逆耳，请你们好好冷静考虑。

你们的主张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太平革命以来九十余年，只有主张民主的人会胜利，绝无主张专制独裁的人会胜利的事实。“五四”以来二十余年，只有国共合作对民族有好处，从来未见国共分裂对民族有过好处。希特勒登台十年，固然曾经一时趾高气扬过，但是可以看看他今天怎样了，还不是只有死亡一条路？

你们说，似乎再来一次内战，把共产党打掉，就可以“进行实业计划”。这是要骗小孩的吧？实行封建专制的，前有满清政府，后有袁世凯、曹吴军阀，他们谁没有答应过一个“实业计划”呢？试问现在何处去了？希特勒答应德国人，并吞了全欧洲之后，德

国民众可以如何如何，然而现在呢，德国壮丁当了炮灰的已经将及一千万人。法西斯主义者的“诺言”，其结果就是如此。你们想以渺渺茫茫的“几十年的实业计划”，来欺骗青年去进行亡国灭种的内战，不免会弄巧成拙的吧？如果想想将来大批民族之花为你们的空头支票，象飞蛾扑火一样去毁灭，你们自己如有天良，也不能无愧的吧？

老实说，现今世界，牛皮是不大好吹的，大家都是有些初步常识的人了。不信，请看看牛皮大王希特勒戈培尔的下场。

抗战是要坚持下去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根据历史证实了的经验，我们认为，如能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中的一切困难即可迎刃而解。如果国民党同志准备实现这一条，我们共产党人是竭诚欢迎的。我们早在二十七年我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中，就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过亲密合作的建议。可是这个提议，数年以来未能完满实现。相反，近来那些拥有重兵和大队特务的人，曾经杀过对方大批的赤手空拳的人，并对此种惨杀毫无改悔表示，却叫对方依然束手待毙，这只能欺骗小孩子，这种欺骗自以少做为妙。自己被北洋军阀骂过“割据”与“破坏统一”，现在自己照着北洋军阀的话来骂共产党，敢于诬蔑抗日的民主根据地“封建割据”，诬蔑共产党人的坚决抗日行为为“破坏统一”，并且威吓着要进行内战，这种威吓吓不了人，亦自以少做为妙。老老实实在执行三民主义上，在抗战和建国的工作上，多做些有益之事，爱惜六年的合作局面，不要轻易毁坏罢。我们共产党的手，总是伸着的，我们希望得到回响。

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坚持的，因为中国的解放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上就很具体的把这个新中国的道路指出来了：“第一，

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的原则之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

我们相信，孙中山先生奋斗一生，乃是为了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翻遍中山全集，也找不出一句话，可以证明孙先生要建立一个什么法西斯专政的国家的。我们相信，忠实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同志，会同我们一起，建设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规定的三民主义国家。那些企图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如果有人说你忘本，你将何辞以答？

共产党，如同革命的国民党一样，是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要想消灭他是办不到的。想办法曲曲折折的来消灭他，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国共两党更加亲密的合作，来克服困难，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我们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

祸国殃民的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王稼祥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抗战已满六年了！

当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提供了抗战应循的正确道路与抗战中应该实行的政策。在六年抗战的过程中，共产党又把这个道路与这些政策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充实起来。

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就坚决的不动摇的遵循这个抗战正确道路与实行这些抗战的正确政策。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敌后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到现在，而在敌后坚持抗战比之大后方坚持抗战要困难到不知道好多倍。

共产党所指出的抗战正确道路与抗战中正确政策早已在我党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表现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敌后抗战的实践中证实它的正确性。抗战的正确道路，归纳一句话，便是全体人民的抗战，全体民众的抗战，而不是只照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利反而违反人民公益的抗战。

人民抗战的正确道路要求实行能够真正发动民众结合民众的政策。我们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这些政策。首先，我们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各阶级各阶层都能合作参加抗战。我们实

现了民主，实行了三三制政权，实行了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保障了人权，以便同心同德，共同对敌。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军事政策，使武力与民众结合起来，解决了征兵的困难问题，又建立了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相结合的局面，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实施了正确的军队政治工作，做到了在敌我武器不平等的条件下能够最有效的打击敌人，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争取敌伪军的伟大效果。我们又实行了抗战中应有的经济政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发展生产，奖励私营公营生产，结果，民力得以生息，抗战供给得以维持。而当敌后抗战进入更困难的阶段，我们又实行了精兵减〔简〕政，以便减轻人民负担；实行了根据地领导一元化，以便增进抗战效能；实行了拥军和拥政爱民运动，以求得军民更加一致。凡此诸端均为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所坚决实行，而结果收到伟大的成绩。虽然敌后抗战之困难已经十分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为“豆腐块”，与大后方完全隔绝，几年来毫无经费、弹药、医药的补充，敌人仅在华北的封锁线之长已有万里长城之六倍，敌人在华兵力总数之一半是压在八路军新四军肩上，虽然困难重重，然而我们坚持到现在，军民奋发，不断取得胜利。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出抗战的正确道路与抗战正确政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革命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中国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一起，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有其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由于全体共产党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坚决奋斗，不顾牺牲，是由于共产党所领导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全体人民与其各阶层都是诚心的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当着共产党找到了抗战正确道路而在敌后顺利的坚持抗战，抗击了在华日军之一半的时候，凡关心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前途的人，一定觉得高兴。然而反共分子则不然，他们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私利所蒙蔽，固执着自己不正确的抗战道路，看见共产党能够坚持抗战，便觉得如临大敌，坐卧不安，日夜在研究打击共产党的方案，找寻破坏共产党的方法；不讲团结，而专找磨擦；不实行民主，而鼓吹法西斯独裁；不讲究军民一致，反而抓兵欺民，军民距离更远；不减租减息，实行孙中山的土地政纲，反而加重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仅存之土地继续丧失；不讲究扩大生产，反而因为垄断政策物价政策之结果，而使生产缩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方之安定成为问题，民变之风蔓延，军队之战斗力减弱，投降之军官增多。这一切都是反共分子实行不正确的抗战道路的结果。

当着反共分子实行不正确的抗战道路收到了悲惨的结果时，于是又想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以图挽救自己的危机。他们想出了国家统一的口号，污蔑抗日根据地为“封建割据”，要求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同时又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惜儿戏抗战前途，以军事进攻为威胁，以言论进攻造舆论，欲使已经很困难的抗战中国更加分崩离析，更加糜烂破碎而后快。

当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决战与胜利的前夜，当着中国抗战胜利在望、同时又处于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应当指出，现在是中国解放斗争历史最关重要的时候，也是我们为中国解放而奋斗的人士应当最负责的日子。

在这样严重关键，我们中国会：

团结则存，分裂则亡。

实行抗战的正确道路则胜，固执错误的抗战道路，则抗战局

面会更恶化，失败的危险是没有取消的。

在这样负责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中或者“立功”，或者“犯罪”，或者“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人民是好的裁判官，决不是几句“我是统——”“你是封建割据”的澜调所能解决的。

× × ×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斗争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也正因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了正确的道路，所以它便较容易的找到抗战中的正确道路。

回顾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理解到，为求得中国的澈底解放，必须解决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所提出的三个课题：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民族解放；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以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除中国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压迫，把生产力提到更高的阶段，以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人民的社会解放。前两个课题的解

决是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后一个课题的解决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来制订自己的政纲，把中国民族彻底解放和三大课题的解决，放在唯物的现实的与科学的基础上，而不让其解决方案停留在主观的空想的与公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三个课题或者说三大任务是彼此联系着的，但是每个课题的解决中，参加的阶级力量不一样，因此必须在民族解放道路上的每个阶段，具体的估计情况，分析阶级关系，来制订它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的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二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并且是在和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有过陈独秀投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又有过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苏维埃运动时期中，有过盲动主义，李立三路线及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战时期中又有过新的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没有找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或者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是小资产阶级冲动，以愿望当政策，

跳过革命的必经阶段，以为中国解放的三大课题立即可以同时解决，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克服与反对这些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壮大起来，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个斗争中生长起来。

毛泽东同志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订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反对了张国焘的反对国共合作，同时又反对了陈独秀主义，在湖南下乡调查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大革命失败后即手创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确定了苏维埃的各个政策与红军的战略战术及红军军政工作办法，又抗击了李立三路线及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战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又提供了抗战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党内党外对抗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错误思想，反对了党内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战路线的投降主义，写作了出名的小册子《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等著作。在最近又发动了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以教育共产党人更好的掌握马列主义，更好的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既不象那些简单抄袭书本搬运理论，把理论当教条而自命为马列主义，把主观主义当作马列主义，也不象那些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来投机，抄袭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古书，同时偷运一些外国最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论为中国“本国货”，把封建思想与

法西斯主义当作中国民族解放的理论。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

请看俄国布尔塞维主义——列宁主义是怎样发展的，来当作我们的一个例子吧！列宁自己说：

“一方面，布尔塞维主义于一九〇三年是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只有这个——革命理论底正确，不但是由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明，而且特别是由俄国革命思想界的迷惑、游移、错误和失望底经验所证明。大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五十年内，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处在空前野蛮与反动的俄皇专制压迫之下，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如渴思饮，它用了惊人的奋勉精神与慎密态度来探索欧美关于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世纪里，受到了空前的痛苦与牺牲，表现了空前的革命勇气，它表现难以设想的努力，它专心致志从事探究，它在半世纪里经过训练、实验、失望、审查、参照欧洲经验等等折磨，它真正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才获得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所以革命的俄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其国际联络之频繁及其对于各国革命运动底形式与理论之熟悉，为世界任何各国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固的理论基础上所产生出来的布尔塞维主义，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实际历史。这种历史经验的丰富世界上没有伦比。因为在这十五年内，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多的革命经验，革命运动各种形式——合法的与非合法的，和平的与激烈的，秘密的与

公开的，小组的与群众的，国会主义的与恐怖主义的种种形式——彼此交替，都没有这样迅速和复杂，任何一国都没有在这样短促的时期内，积聚这样多的现社会一切阶级斗争底形式、方法以及斗争所带的色彩；而且因为俄国底落后与沙皇政府的残暴压迫，这种斗争特别快地成熟起来了，特别迫切和顺利地领会和采用了相当的欧美政治经验底‘新发明’。”（列宁：《左派幼稚病》）

这是俄国布尔塞维主义产生的过程，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俄国革命经验相结合，便产生布尔塞维主义，列宁主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成长，也与俄国布尔塞维主义有了同样的过程。

中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与二十世纪，由于中国的落后，外有帝国主义的相继侵入，民族独立丧失，内有满清及军阀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近百年来历史都充满着民族解放与革命的斗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战争。同时百年来中国进步的思想界也同俄国一样在寻找革命理论，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号召旗帜，义和团以原始民众暴动为其色彩不用去说他，后来又有康梁立宪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欧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他们也都同俄国一样都费尽心血在欧美的“新发明”中寻找挽救中国解放中国的革命理论，也是经过失败、痛苦、经验与教训之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看见了俄国共产主义挽救和解放了俄国之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共产党人就是这样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这用不着说明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也深刻认识了马列主义这个革命理论之作

用，承认中国革命非学“俄国方法”“非以俄为师”不能成功。所谓“俄国方法”便是布尔塞维主义的革命方法，所谓“以俄为师”，便是以列宁主义为师。这是孙中山先生经过失败与痛苦的过程后而认识到的，虽然孙中山先生并未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可惜的事，然而他在晚年能够进到认识“俄国革命的好方法”，已经是难得的可宝贵的事。

由于中国的落后，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的七十年，在布尔塞维主义出现后差不多二十年，中国才找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主义之思想，便建筑在这个马列主义的坚固的基础上。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自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共产主义也已经有廿二年的实际历史，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压迫之残暴比之俄皇政府有过之无不及。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之丰富，斗争形式之复杂，民族的、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破裂与再形成；城市的、乡村的；合法的、非法的；对外的、对内的；武装的与和平的。武装斗争延长了二十余年，革命是在战争中；这些斗争形式不仅很快的交替，并且有时在中国不同地区同时进行，这些斗争形式之复杂也至少不亚于俄国，假若不是更复杂更错综的话。所有这些都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实他的理论与经验，创造出建筑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共产主义。可是，中国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是落后的，与欧美是比较远隔的，中国共产党一产生后便全部投入革命的热潮，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产生后还经过曲折，经过经验，经过成功与失败，经过克服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主义更加生长起来成熟起来，这是不奇怪的事，也是必然的事。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当着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经验日益完备的时候，反共分子又觉得不安，想出了一些借口来反对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其最流行的便是：“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与机会主义，这是共产党自己承认的，可见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不适合于中国民族的解放。”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德国人马克思和俄国人列宁的理论，因此不合国情的。”

这又是极端浅薄的说法，这是剥削⁽¹⁾中国落后，这是以人民民族解放意识之提高来进行投机事业。

任何一个革命的理论，任何一个革命的政党都是在外部内部的斗争中形成起来壮大起来，有时是处于占少数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在创造自己的理论与政党时，是在工人运动中，在第一国际中，反对巴枯宁、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勃朗基主义，反对拉沙尔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列宁与斯大林创造布尔塞维主义与联共党，是在反孟尔塞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就说国民党的历史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其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方面是正确的，然而也经过了内部斗争，民国元年反对了宋教仁和汪精卫的投袁路线，可是孙中山当时在国民党内是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民国十二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又实行了自我批评，确定了“以俄为师”，反对了当时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分子。同样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主义是在反对与克服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这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检查错误，克服错误，正表示一个政党的严肃性，也表示这个政党的进步与老练，怎

样能够作为反对这个政党的理由呢！

至于说马列主义是“从外国输入”，这仅仅是利用中国的落后，利用中国与外国的隔离，和以民族意识来作投机生意，这是上面已经说过了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为基础，但仅仅是基础，它对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搬运的公式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列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它必须而且已经创造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民族解放的问题，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上三大课题的理论。并且，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抗战的烽火中，对于“外国东西”一般的可能产生“排外主义”（一切外国东西都是不好的）与“洋奴主义”（一切外国东西都是好的），但共产主义者是澈底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民族解放的坚决战士，“排外主义”与“洋奴主义”决不能安到共产党人的头上去，“排外主义”是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封建遗毒的守旧主义的本色，至于“洋奴主义”又恰恰是买办资产阶级应有的身份。孙中山不是吸收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晚年吸收列宁主义的“好方法”而形成他的三民主义吗？现在反共分子不是在偷运德日意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及压迫民众的方法吗？

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

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五日

根据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疑为“利用”之误。

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 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

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各部院长官，各地方长官，各抗日将士，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及全国同胞公鉴：

正当我全国民族团结抗战已经坚持了六年，愈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主动权已经转移到苏英美同盟国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帮，已迫近最后失败的时候，不意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竟有一部分丧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纵队，出来响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汪精卫、王克敏的反共号召，宣称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他们包围军事长官，企图将原在抗日阵地的军队转变为反共内战的军队。他们现正积极策动内战，怂恿军事长官，调动队伍，进攻边区。最近一个月来，除原驻陕甘宁边区周围，担任封锁边区的十余师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近日又从河防阵地，抽调抗日大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根据确实消息，第一军主力第七十八师，第一六七师，已从华阴、渭南开到邠州、淳化，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三师，已从韩城、郃阳开到洛川，第五十七军之第八师，已由西安开到中部，第十六军之重炮兵营，已由河防开到耀县，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亦已开到淳化。除上述业已开动之部队外，尚有很多军队，正在待命出动。陇海铁路，咸榆公路，西兰公路，兵

车运输，络绎不绝，居民惊骇，奔走相告。为了配合此种军事行动，西安的反共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长著名托派汉奸张涤非，竟敢公开在西安召集会议，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国官方通讯机关之中央社，也将此种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于七月六日发出广播，通告中外，以为发动内战之舆论准备。内战危机，千钧一发。敌人第五纵队与中国反共分子此种丧心病狂的举措，如果实现，不仅将破坏全国人民六年以来辛苦坚持的抗战大业，并且将严重损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行动。日寇第五纵队包围军事长官，准备发动内战之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他们此种举动，不仅背叛我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同时也背叛了同盟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们此种举动，实际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义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战营垒内的亲日派汉奸，因为在此种时机发动内战，除了牺牲民族利益，是绝对没有其他结果的。

在过去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他曾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释放蒋委员长，达到全国的团结抗战。他曾指导了八路军中新四军中及地方民众中的共产党员，团结全体军民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了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的兵力，而没有得到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新四军甚至被诬为“叛军”，但是新四军至今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着英勇的抗战，而且至今仍然拥护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的“叛变”行为。这是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乃至日寇汉奸，无不知道的。八路军在华北艰难百战，不予奖励，反予妨害。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仅有的后方，少数留守部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全世界都无此种模

范军队。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都有说话机会，都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使他们各得其所。现在边区已经成了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在抗战中过着民主自由与丰衣足食的生活，比较大后方的惨淡情况，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国民政府怎样至今还没有实行承认边区的诺言，但边区政府却始终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我边区人民对于这样忠实于民族解放利益，这样坚持团结抗战，这样替边区人民做了无数好事的中国共产党，是竭其全力给予拥护的。对于边区现有的一切民主进步设施，认为不仅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坚持抗战的可靠力量，是全国人民所同声称道的模范建设，我们将誓死保卫这块地方，不许日寇及其第五纵队的阴谋活动来加以破坏。

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于死地。指挥特务，盗窃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明日亦何尝不可以发布讨伐令，解散八路军。凡此反常之行为，实属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抗日胜利。惟恐民族获得解放，惟恐人民获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现。另一方面，对于投降敌人背叛祖国之三十三三个高级将领，却一个也不责备，也不声讨，有时还替他们曲予辩护。对于象吴开先那样受敌人派遣到我抗战首都进行卖国活动的著名大汉奸，却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许吴逆仍挂国民党中央委员之名，逍遥

法外，自由自在地进行阴谋活动。对于象张涤非那样的日寇第五纵队，在西安假造民意，声言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活动，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给他们广播消息，企图以此欺骗人民，准备军事进攻的舆论。对于今天大后方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情隔阂，民变蜂起等危险情况，则不但不思所以变计，反而一味高压，若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变之不扩大。华北庞炳勋、孙殿英诸军之复灭，其原因乃在于庞、孙领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秘密命令，尽一切力量准备进攻太行山区域之八路军（八路军已获有确实证件），丝毫不作对日寇战斗之准备，致使日寇乘虚袭击，束手受缚，叛国降敌，不敢声张，反替庞孙作辩护之词。我华中及山东之新四军八路军，苦战奋斗，敌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限期东进，务求消灭八路军新四军而后已。共产党则称之为“奸党”，新四军八路军则称之为“奸军”，试问天下有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么？今日何日？不是正当日德意法西斯国家已面临失败危机，我们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为了与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需要更加加紧自己抗战行动的时候么？为什么竟从抗日前线撤回大量军队，要来进攻陕甘宁边区呢？这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国人呢？抗战时期，只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条唯一的战线，不应该制造第二条国内战线，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内战一开，兵连祸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为什么这样痛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而那样不痛恨我们的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呢？撤了河防大军来打边区，难道就忘记了日本人么？那时日本人从剿共军背后打来，你们怎么应付呢？庞炳勋、孙殿英的复辙，你们难道完全忘记了

么？

我们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开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我们竭诚向国民政府呼吁，向蒋委员长呼吁，向胡宗南副长官呼吁，向正在准备进攻边区的一切官兵呼吁，向全国同胞呼吁，请你们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我们竭诚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进行内战的军官和士兵，共凛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祸，鉴于过去十年内战之惨，不要打共产党，不要打八路军，不要打边区，不要枪口对内。胡宗南副长官曾云：“剿共是无期徒刑”，这是一句真话。请你们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再打十年内战，能打得出什么结果呢？何况内战一开，敌人乘虚而入，中国马上就会亡国，那里有十年时间，许我们从从容容的打内战呢？我们要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汉奸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张涤非，并惩治其破坏团结抗战的反革命活动。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逮捕日汪密使吴开先，并予公审。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明令讨伐通敌叛国的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毕载宇、吴化文、柴子恒、厉文礼、杨汝贤、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杨光有、王瑞亭、赵星彩、于光辉、侯如镛、杨志希、赵瑞、杨诚、李长江、徐继泰、杨仲华、吴漱泉、王劲哉、苏振东、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任兰圃、赵天时、薛豪平、于怀安、金亦吾等三十三个将级军官，并移华中山东一带剿共之师去剿伐他们。我们要求全国爱国同胞一切抗日党派帮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上述各要求。

我们的口号是：

- (一) 坚持抗战，反对内战！
- (二)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 （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四）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部队进攻边区！
- （五）要求政府撤消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前线抗日！
- （六）要求政府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
- （七）要求政府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
- （八）要求政府审判日本奸细关开先！
- （九）拥护中国共产党！
- （十）誓死保卫抗日民主的边区！
- （十一）坚决实行三民主义！
- （十二）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
- （十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五纵队！
- （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

根据1943年7月10日《解放日报》刊印

起来! 制止内战! 挽救危亡!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解放日报》社论)

正当全国同胞兴高采烈庆祝抗战六周年的时候，正当盟国朝野纷纷来电庆祝我国坚持抗战的时候，正当边区军民巩固河防，努力生产和教育，力谋克服困难，丰衣足食，准备力量，迎接反攻的时候，忽然来了个晴天霹雳，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消息传来，爱国之士，扼腕太息，全国同胞，忧心如焚，南宋末日的亡国景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

内战危险的紧迫，一方面表现在特务机关以及国民党官方通讯机关中央通讯社的活动。特务机关的反共活动，是经常在进行着的，从未受过政府方面任何制止，而这一次居然由中央通讯社代作喉舌，公然叫嚣着所谓“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与日本强盗和汉奸汪精卫如出一吻！另一方面表现在边区周围非常奇怪的军事调动：国家养兵，所为抗日，人民负担，不为不重，现在黄河对岸，即是日寇，而河防大军，却纷纷调向边区周围，其中有第一军的主力七十八师和一六七师，有第九十军的五十三师，二十八师，有第五十七军的第八师，有以盟国供给我国的重武器武装起来的炮兵旅和炮兵营，并且传闻边区周围正在广筑飞机场，为轰炸边区之用，于是边区南线，连前共计集中了十六个师的大军，而抗日的河防阵地，却完全空虚起来。照目前的情形看来，似乎一切布置已经就绪，只待命令一下，内战立即爆发。

抗战已经六年，日寇深入中国，潼关对岸的风陵渡就是日寇的据点，全国同胞正在行将到来的胜利曙光的鼓舞之下咬紧牙关苦撑抗战，为什么在这样紧急的时候，还会发生丧心病狂的内战挑拨呢？

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我国抗战阵营中，有一部分人，他们乃是日寇的第五纵队，他们乃是希特勒东条的孝子顺孙，他们要做法西斯，他们看见现在的国际形势，对于他们的祖宗希特勒东条极端不利，对法西斯极端不利，因而生怕自己的祖宗倒台，要想些办法来挽救法西斯死亡的命运，于是不惜丧尽天良，尽力挑拨内战，硬要致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的境地。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可能的解释了。

这批日寇的第五纵队，这批法西斯匪徒，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治代表以民脂民膏豢养的特务份子！

这批反共特务，这批法西斯匪徒，在二十八年冬和三十年春，曾经一手制造过两次反共大磨擦，曾经师秦桧诬岳飞的故事，诬蔑英勇抗战精忠报国的新四军为“叛变”，并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之下把新四军军部缴械，军长叶挺将军与大批爱国志士至今仍在囹圄之中，我们英勇的新四军，在被宣布为“叛变”两年有余之后的今天，还在敌后坚持抗战，还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在拥护和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还在拥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过去一年中新四军的战绩，作战四千八百余次，毙伤俘获与反正投诚的日伪共达四万八千人，这种战绩决不亚于任何忠勇抗战的军队。英勇的新四军以自己的血肉写成的这一部悲壮史诗，是旷古少有，中外罕闻的，凡是稍有人性的人，应当为之感动。但法西斯匪徒，日寇的第五纵队，是连最低限度的人性也没有的，他们有的是十足的兽性。

反共特务为了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向其祖宗尽忠尽孝，发动了这两次大磨擦。但是，他们的阴谋诡计，受到中国人民的抗击，受到了同盟各国正义人士的反对，始终没有达到他们破坏抗战实现投降的目的。

但是，现在这批日寇第五纵队，这批丧尽天良的特务，这批法西斯匪徒，更加变本加厉，要做出比之以前更大的罪恶来了！自从日寇推行所谓“对华新政策”以来，被日寇捕去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居然能坐了飞机“逃”回重庆，而未闻有任何处理，三十三个将级军官叛变投降，反戈攻打抗日军民，而未闻有任何处理，大后方许多刊物公然提倡法西斯主义，未闻有任何处理，这种种倒行逆施，明眼人早已深致诧异。汪逆精卫在沦陷区到处组织“剿共委员会”，而特务份子又不失时机，在大后方到处响应，今年三月以来，所谓“共党份子自首运动”，各地方的特务报纸盈篇累牍的登载，亦未闻有任何处理。一切反共宣传都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都是有人授意的，证据确凿，抵赖不得。敌人第五纵队这一连串肆无忌惮的罪行，这一连串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投降阴谋，到了最近就登峰造极。他们乘着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居然提出“解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取消边区”等口号，并且动员全国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要进行所谓“谣言攻势”。

好大胆的奴才！好猖狂的匪类！堂堂的中国共产党，是你们能够“取消”得了、能够诬蔑得了的么？要“取消”共产党的，是你们的祖宗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他们曾订立过反共公约。但是，就连你们的祖宗，都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你们的大哥汪精卫，也想“取消”共产党，但是他也达不到目的。你们这班小奴才，躲在抗日阵营之内，想以阴谋诡计来达到你们的祖宗所

达不到的目的，有点不自量力罢！你们在西安，以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就能强奸民意，“取消”中国共产党么？你们嫌自己的行为还不够无耻么？你们以为能够支持六年神圣抗战的中国人民是这样软弱可欺，以致你们几个卑鄙齷齪的败类就可以随便强奸民意，达到你们的反革命目的么？

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你们这班奴才所能够诬蔑能够“取消”的么？你们的祖宗东条和你们的大哥汪精卫岂不老早想“取消”过了么？可是，这里建设起了光明灿烂的新社会，建设起了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模型，这里对于一切赞同抗战团结的人，人人有民主，人人有政权财权人权的保障，这里而且人人丰衣足食。你们的祖宗和大哥都无法取消边区，你们这班小奴才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还想取消八路军么？那就老实告诉你们，二百个东条匪首也不行，何况你们这班丑类！

明白的告诉这批法西斯特务，告诉这批日寇的第五纵队，你们不要想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决不会饶恕你们这批蠢贼，放过你们这批害虫。不但中国人民不会放过你们，世界人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要投降，你们就干脆点滚蛋吧！你们要想当秦桧、万俟卨、罗如楫，可惜现在已经不是封建专制的时代，你们永远无法为所欲为！

这一批法西斯匪徒，这一小撮反共特务，这一队日寇的第五纵队与汪逆精卫的应声虫，就是内战的挑拨者，就是谣言的制造者，就是团结与抗战的破坏者，就是卖国投降的阴谋家。他们的阴谋手段，是想发动新的内战，这样来使抗战大业功败垂成，使我中华民族陷于亡国灭种的地步，使同盟国四强之一的中国陷于覆亡，这样来断送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行将到来的胜利，

挽救全世界法西斯匪徒垂死的命运！

这批敌人们第五纵队所极端小心准备的内战，这个历史上的滔天罪行，现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处在最紧急的日子里！如果内战发动，兵连祸结，全国必致糜烂，日寇必然坐收渔利，长驱直入，达到其灭亡中国的企图！

起来吧！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还来得及制止内战的爆发，还来得及挽救危亡！起来吧！不要损失一秒钟，时机是稍纵即逝的，多少懈怠一点，敌人第五纵队法西斯匪徒们的阴谋就可能招致中华民族不堪设想的损失！

我们共产党人，老早已经多次声明过，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拥护中国境内的抗日政府与抗日领袖，坚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我们绝对不愿意打内战。我们的目的，就是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但对任何法西斯匪徒的任何挑衅，必须坚决彻底地打回去，借以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和胡宗南先生，体恤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生灵，追念中华民族五千年悠长久远的历史，顾及后世子孙永远无穷的福利，珍重我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中崇高的国际地位，当机立断，命令集中边区南线的大军，归还抗日的岗位。

我们希望国民政府，重整抗战阵容，对于此次破坏团结，挑动内战的祸首日寇第五纵队份子，处以严刑，对于“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言论，明令禁绝，对于三十三个投敌将领，明令讨伐，使抗战军民，人人自奋，国内团结，借以巩固，粉碎日寇的“对华新政策”，使抗战大业树立在必胜不败的基础之

上。

我们作此文时，我们的血在沸腾，我们不禁潸然泪下！我们记起沈钧儒先生的诗：“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自从朱总司令七月四日与七月六日致电胡宗南与蒋介石先生呼吁制止内战危险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七七”六周年纪念的时候，边区形势极度紧张，延安三万民众，举行大会，发表通电，响应朱总司令的主张，并提出名正言顺的要求：（一）要求政府撤消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二）要求政府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三）要求政府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四）要求政府审判日本奸细吴开先。同时，在通电中，延安民众大会号召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中国。自从大会通电发出以后，边区各地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热烈响应，人民对于日寇第五纵队的罪行表示最深刻的义愤。从千百万人民中发出的这种壮烈的正义的呼声，就把日寇第五纵队特务匪徒的阴谋拆穿了，这些匪徒所小心准备的“闪击”也因而被事先暴露了。这些渺小的害虫，由于原形毕露，理屈辞穷，而更觉得胆寒了。相反，广大的人民，对于当前的危险，却有了警惕，有了准备，动员了自己的力量，因而造成了胜利自卫的先决条件，不致受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但是，能不能说内战危机已经过去了呢？完全不能。不但内战危机的根源仍旧存在，而且每一分钟都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这就是因为，在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执行延安民众大会所提出的四条要求，其中关于撤退军队一项，不但原有包围边区的

军队未撤动一兵一卒，就是新从河防及西安一带调上来准备作进攻主力的军队，亦未闻有撤退消息。

内战危机，决不是凭空而来的，这是由于国民党的队伍中，有一批汉奸第五纵队，有一批法西斯匪徒，他们看见自己的祖宗希特勒、东条将要灭亡，拼命想法挽救其祖宗的命运，因而丧心病狂，挑拨内战，要使抗战大业功败垂成。越是国际形势好转，越是反法西斯力量胜利，他们就越是着急，越是拼命挑拨内战。完全不是偶然的，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学习满清康熙的“圣谕广训”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强迫人人诵读。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这本“经典”公开威吓说：“军政时期不能停止”，而其所谓“军政时期”，即是指“剿共”内战而言。这本“经典”，对抗日则轻描淡写，但却要强迫全国人民人人诵读。从这本书里，可以看见什么呢？可以看见：我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在日寇第五纵队的包围之下，现在是异乎寻常的醉心于实行法西斯专政，醉心于“剿共”内战，公然主张“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由此可见，最近内战危机的发生，其根源历历可寻，而要想根本消弭内战危机，则除了澈底铲除日寇的第五纵队外，再也没有别的道路。这些害虫一日不铲除，则内战危险一日存在，反共的“闪击战”时刻可以爆发。越是国际形势对我国有利，对日寇不利，则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活动将越发着急，越发猖狂，内战的危险也将越发严重。

延安民众大会，除了要求撤消包围边区的军队以外，还要求惩办特务机关，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和审判日本奸细吴开先，乃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些要求的达到，乃是消弭内战危机

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我们说是最低限度，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叫人相信，国民党是真正在一心抗日，真正不要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不再来问问国民党人：

第一，你们对于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为什么不肯惩办呢？难道他们对抗战有功么？可否请你举出事实，证明那几百个反共特务大队做过一件有利抗战的事情，让我们人民心服呢？据我们看来，特务机关从抗战开始起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好事，恰恰相反，他们只在反共反人民的反动事业上用功夫，他们里面什么乌龟忘八蛋都有，成了包庇奸细藏垢纳污的渊藪。很多鼎鼎大名的特务头子，投降敌人，替东条匪首与汪精卫大汉奸服务。他们平日食国家俸禄，无一人为国家尽节，一经招引，立即投降，并且尽率其特务小喽罗，无须改组机构，就能为敌服务，而敌人对他们也信任不疑。我们请问：这样的特务机关，有什么资格食国家的俸禄？有什么必要豢养他们？现在他们企图发动祸国殃民的内战，制造白日见鬼的反共谣言，提倡“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谬论，你们为什么还舍不得惩办这些忘八蛋？

第二，你们对于三十三个投敌叛将，为什么不肯讨伐呢？写个讨伐令，在时间上说，用不到化一点钟，在政治上说，划清敌我界限，足以振奋士气，教育国民与军人的爱国精神，寒敌寇汉奸之胆，提高我国国际信誉，利益非常之大。过去不这样做，已经不好。现在，延安民众大声疾呼的提醒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做呢？你们在口头上也爱说什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难道容忍大批叛国军官；毫不责备，毫不声讨，这就叫做“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么？难道这些叛国行为，倒是符合于你们所说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么？

第三，你们对于日本密使吴开先，为什么不予逮捕审问呢？吴开先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奸细，被日汪捕获，讲好条件，纵令回渝，实施勾引，仍然押其妻母于上海。你们不把吴开先逮捕审讯，反把他待如上宾，究竟是为了什么原故呢？你们这样对待吴开先，人们就怀疑你们一面抗战，一面又与敌人秘密勾搭，实行这样的两面政策，正和你们一面讲什么“精诚团结”，一面又实行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政策一样，你们对于人民的这种怀疑究竟怎样解释呢？

我们诚恳地向一切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注意这些极端严重的问题。撤退准备进攻边区的军队，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审判日汪密使吴开先，这四条都是在精诚团结与民族至上的原则下所不能不办的。

在全国人民方面，应该大声疾呼，起来督促国民党实行这四条，如果这四条做不到，那末，抗战危机与内战危机是不会消灭的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评《中国之命运》

陈 伯 达

（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觉得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国之命运》既是以蒋介石先生的名义出版的，就因蒋先生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此抗战处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大家想蒋先生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东西，应该是对于如何准备对敌反攻、配合盟国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有所指陈。因为尽人皆知：今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是抗战，而不是其他。但大家读到《中国之命运》后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

那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人们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关于抗战问题，在全书二一三页当中，只占了十二页半。全书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一言蔽之，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因此使人们大失所望。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素来鄙薄那种掩盖自己政见的人，蒋先生并不掩盖自己的政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蒋介石先生此书是不同意的，我们既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有责任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出来，以求国人之审察。蒋先生也说过：如有人对国民党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那末，好罢，我们就提出意见来和作者及读者商讨，这应该是完全必要的事。因为蒋先生此书所讨论的，是关系于中国之命运，关系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故不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而且是每个中国爱国人民都应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的。近日国民党方面竟在图谋“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国国民党指导的中央通讯社业已公开发布了这个消息，可谓到了怪论百出的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自然不能默尔而息。但这种怪论是有根据的，只要一读《中国之命运》就可找到这种根据，因此使我们更加不能默尔而息。本文所批评的，限于书中的几个根本观点。至于书中的其他观点以及对于许多观点的详尽批判，只好俟诸另文及别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读者乃至任何爱国人民如果对本文有不同意见，我们希望提出辩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怕辩论的就不是真理。无数的国民党刊物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批评得一塌糊涂，我们至今还没有回答。现在就以蒋先生此书为契机，发表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罢。

(一) 关于中华民族

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按照作者的见解，则孙中山先生称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又不是无的放矢吗？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

我们请研究一下：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出自何经？据于何典？这是从哪里考证

出来的？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凡此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才能理解的问题，作者违背了这点常识，故弄得毫无是处。在此问题上，作者还提出所谓“婚姻的系属”，但是我们也请研究一下：难道汉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记呀，这段历史曾经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就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汉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吐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

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按照作者关于民族的解释和历史的渲染，则全部中国历史，必须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

蒋先生说：“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们也请研究一下：根据前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曾经那末残酷，那末无情，如果现在按照作者所说，那又将作何解呢？是的，历史上汉民族在反对异民族侵入的时候，是有两种人的根本分别的，一种人是广大民众，他们流血牺牲，抗拒外患，是保卫祖国与光复旧物的基本动力；另一种人则是一些腐败的统治者，他们在异民族侵入面前，时常采取“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天子之尊”向异民族的侵略者称臣、称子、称侄、称孙，而每年贡纳很多银帛、杀戮抗战的大将，以求取得其宠幸〔幸〕（最好请看五代和宋朝的历史吧）。这些皇帝和臣宰们时常拿出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法宝来驾驭人民，大概他们对于异族侵略者的这种行径，也就算是实行了他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德性吧。但是，这些行径，对于我们民族，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民族的斗争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后的历史结果，民族的斗争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要存在。我们现

在所进行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战”。不仅如此，在人类大同还没有实现以前，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但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比如：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今天，满民族在事实上也已同化于汉民族了。但这决不是由于什么汉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于他们在内地和汉民族混居，汉民族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后来并且在政治上，都比较他们先进，比较他们占优势，而在人口数量上也较优越，这样就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地同化起来了。

现在是科学昌明的世界。民族历史必须按照科学去解释。法西斯主义曲解民族历史、削改民族历史、捏造民族历史的伎俩，决不足为训，如果拿这种东西作为国民的教本，就会愚弄国民。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我们汉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弱的民族，正应和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进行平等的民主的联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们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汉族主义去欺压国内其他弱小民族，那就会给敌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事业。这是每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所应该注意的。

中国和外国的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总是盗窃“民族”为私有，好象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请研究一下：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如果没有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民众，我们民族从何处得到衣食住，从何处组成抗战的军队，又从何处有文化？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

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既然劳苦大众是民族的主体，那末，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把劳动人民看成至下，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国家看成至下吗？

谁是民族的主体？答复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的力量问题，才解释得了我们民族的组成以及过去所以衰而复兴、亡而复存的问题，才解释得了如何准备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即要不要动员民众、实行民主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抗战后中国谁才应当为主人翁的问题。在几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许多文献，曾给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却把“少数人士”和“德性”当成民族的决定者。这就是我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关于中国之命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点。

（二）关于中国历史

我们继续说中国历史，特别说一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吧。中国历史应该是民众的历史，因为没有中国民众，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国历来和自然界战斗，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民众历来创造一切幸福，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了一切幸福。中国劳动人民和民族的苦难战斗，但是在过去，一切果实却被少数统治者窃取而去，而自己则仍落到最受苦难的结果。每当中国民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民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

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统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民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满清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三合会组织的蔓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民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满清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

清代中叶，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国的长城。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国抵抗力的软弱，是由于满清朝廷一方面在国内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民族牢狱，另一方面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

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则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淮勇的成功”。不是吗？请研究一下：太平天国曾统治了许多省份，时间十余年，和外国人也有来往，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有和什么外国订过不平等条约，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气，组织了“戈登常胜军”，使太平天国内外受敌，而陷于失败吗？如果太平天国获得胜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

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国，发扬了民气，创立了国防，则外国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们这样多的国耻。所以我们说，湘军淮勇的成功，就是民众的失败，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

应该介绍孙中山先生的两段话：

其一：“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便非提倡民权不可。”

孙中山先生的话，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遗训在其信徒中的被遗弃，不是很可悲的吗？

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其所以要把旧中国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无孔不入地剥夺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的血汗，使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因而使国民经济不得发展起来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方法从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权，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机及其政治活动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吗？不加改造的旧中国，如何站得起来？如何能够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战争中不求进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够最后战胜敌人？然而不幸，《中国之命运》的作者竟把这样的旧中国写成“黄金世界”：海禁开放前旧中国的经济是发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风气伦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几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末好，为什么打不过外国侵略者，而且要时常与当时的敌人作城下之盟，订立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呢？本书的自相矛盾，这又是一件。

为使读者明了起见，把作者所描写的中国古代“黄金世界”抄

列于下，读者一见，就知全是妙文：

关于经济：“我们立国的基础，本是农业。全国的农业，除边疆省区外，分布既不失均衡，故全国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远。政府对全国交通的计划，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经济的趋势，虽起自河流而倾向海岸，然而建国的成规，并不见有什么偏枯的现象。”（——五九页）

关于“社会组织”：“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以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实际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六一，六二页）

关于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六二，六三页）

关于“伦理”：“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

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六七页）“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教，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明。”（——六九页）

狗彘休哉！使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乐世界！但是，既然旧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是那末好，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提出了“农业中国、工业日本”，那末喜欢保留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呢？既然旧中国的保甲制度是那末好，是那末对人民有利，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为全世界所不及，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提倡中国“固有文化”、“东方固有道德”呢？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真的爱起中国民族来，所以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些“好”东西，来破坏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吗？历史的真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来发现，有的则虽愚夫愚妇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之所以特别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一切腐朽的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绞杀中国历史发展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自觉的工具。蒋先生竭其全力去颂扬这些东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蒋先生所喜爱的这些东西，日本法西斯也喜爱，难道也是“口之于味有同嗜，耳之于声有同听”吗？至于蒋先生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我们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为篇幅所限，暂不详论。

(三)关于中国近代思潮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喜欢中国人保留中国各种旧东西，不喜欢中国人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近代化——就是说，不喜欢中国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进的东西，不喜欢中国人有科学、有民主、有自觉；因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进的东西，因为科学、民主、自觉这类东西，会使得中国变成近代的强盛中国，就不利于侵略者。所以，不平等条约是成为中国人接受和发展西方先进的东西的桎梏。但是《中国之命运》的作者的见解却相反：好象因为有了不平等条约，才使得中国人接受了欧美先进的思想，所以不平等条约是不好的。特别对于五四以来的各种新文化，作者极尽了谩骂的能事，所谓“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其重点就是对此而说的。

什么是五四运动呢？请让我们先引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段话：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澈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澈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因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阶级，又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

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则是澈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澈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建立了伟大的功劳。”

所以，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自我觉醒的伟大新纪元。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六年来的大抗战。五四运动之所以遭受一切反动派、反革命派的痛恨，其故即在于此。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受苦受难，并在中国培养一批洋奴才（从曾国藩、李鸿章起，到现在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在中国的一切徒子徒孙为止，这批洋奴才始终为外国侵略者服务，不因为他们主张中国旧文化、旧伦理、旧道德，而就可以说不是洋奴才）。但另一方面，却又迫得中国人民从迷梦中惊醒起来，迫得中国人民要去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用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及其在中国的奴才。中国人民的先进者反对旧中国的黑暗的、残酷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便利于外国侵略者及其狗奴才；中国人民的先进者接受外国先进的光明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利于外国侵略者及其狗奴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中国的革新思想，从太平天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起，便已开始了。谭嗣同的“仁学”，对于中国旧伦理旧道德的网罗，即作了一次勇敢的冲决。那时思想的反动派，西太后的奴才，如叶德辉、张之洞等类人，便已在这种革新运动面前哭泣咒诅，他们都一

致说：“伦理”、“杀道”是永远不变的。这种见解，一直到现在，仍成为中国一切汉奸、一切反动派的衣钵。五四运动形成了思想上的群众运动，就使得许多顽固派、反动派、洋奴才都惊骇得不知所措，表现了新力量的不可抵抗。然而历史运动是曲折的，有的继续前进了，有的中途停止了，有的变节向后转了。始终成为新文化的中流砥柱和冲锋陷阵的战士，只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方向，永远不变，永远不妥协，是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伟大体现者。

《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这样写道：“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只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各国的学说，既不断的变迁，所以他们无论那一派的持说，也是不得不随之不断的变化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治，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我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请研究一下！世界各国先进的思潮，确实有不同的，因为有一种进步思潮（比如民主主义）反映某一种进步的时代（反封建时代），为某一定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所需要；又有另一种更进步或最进步思潮（共产主义）则又反映另一种更进步的时代（反资本主义时代），为某一定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所需要。近代中国处在全世界大变革时代，中国内外各种关系、各种阶级、各种社会人物的斗争错综在一起，因此，那怕在同一时候，世界各种不同的进步思潮，都可能为各种一

定的社会阶级代表所接受，并形成一定的合作。比如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就接受西方林肯等人的民主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后来又接受了某一部分俄国革命经验（孙中山说过“以俄为师”），而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方面在一九二四年后就形成了彼此的合作。这是对民族极有利的，大革命业已证明了。又比如：中国还有其他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都反映了一定的阶级或阶层，而根据其需要，也可能在一定时候及一定问题上和共产主义形成一定的合作。这是对民族也有利的，许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是否“切于中国国计民生”，必需以民族利益民众利益为考验，除此以外，一切就都是诡辩。蒋先生在此公开反对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实在可怪之至。一切法西斯国家以及汉奸汪精卫，不正是每时每刻都在狂吠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吗？蒋先生此书一出，难道不怕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汪精卫辈引为同调，而使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觉得可惜，觉得齿冷，觉得丧气吗？

其次，世界各国不但有进步和革命的思潮，并且也有反动反革命的思潮，因为中国既然有进步与反动，有革命与反革命，那末，世界的反动反革命思潮，也就会被某些中国人所欢迎，所崇拜。别的远的不说，举一个最浅近的事实，国民党官方出版的《三民主义半月刊》和《中央周刊》，不是正在大大宣传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并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尊为世界“六大领袖”之二吗？这还是公开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太臭了，太违反民族利益了，太不利于同盟国了，太为德意日这类匪帮张目了，所以有些人也就不便明目张胆公开挂法西斯主义

的招牌，而用各种掩蔽形式去贩运法西斯的私货，到处拍卖。这不仅是有一些国民党官方中小人物如此做，就是大大的人物也竟然如此做，这难道不是天下共知的吗？

又其次：说“各立门户，入主出奴”，每一个人亦应该自己想想的。中国有一位大人先生，当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大革命时候，认为联苏对他是有利的，于是自己就跑到苏联去请教一番，并派自己的儿子到苏联去留学，并宣称“中国革命必须受第三国际领导”；后来反共了，反苏了，于是到了东京，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宣称中日联合之必要；于是又进了“外国的”基督教；后来希特勒在德国登台了，就又赶快派遣了自己的儿子及大批党徒到德国去留学，学习法西斯主义。货币靠外国，军械靠外国；有整整十年，还依靠这些去专打革命的中国人，而计划这种战争的，却又是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德国人叫塞克特，是德国国防军的领袖；还来了一个德国警察厅长，专门传授特务方法。抗战了，货币、军械还是都靠外国，连仗都想专门依靠外国人去打。这些都是什么？不正是所谓“入主出奴”的思想和行为吗？这不就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吗？

至于要说到共产党：那末，倒也可以算一算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思想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但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决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工作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中国民族中国人民而创造了的各种进步力量，完全不是靠“外国”起家的，没有一件军械是靠外

国帮助的，也没有靠过外国钱，作战战略也全靠自己。一切都是“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抵抗日寇在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从来不妄想外国人替中国人打仗。在中共势力所及的地方，更从来没有和外国人订立过一条或半条的不平等条约，例如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协定之类。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和行动，到处为中国人民所欢迎，因为是符合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更从来没有今天依靠这国，明天依靠那国，“入主出奴”，翻云覆雨的事。上述的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指导的结果。这真是一个十全十足的“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中国人自己的革命政党，在中国，再没有可以和它相比拟的了。

中国从来显然有两种文化传统思想：一种是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国一开始时候，太平天国与孙中山就是代表前者，曾国藩及现在中国的一切反共反人民分子就是代表后者。不管太平天国有外国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却是真正代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英雄；不管曾国藩满口旧中国的仁义道德（五伦五常），却仍是双重的奴才！满奴才和洋奴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从来以至洪秀全、孙中山一切优良的革命的传统，而一切反动派则继承曾国藩、叶德辉的传统。反动派想取消前一种传统，保留后一种传统，而我们则正相反。关于中国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分别，就在这里。

（四）关于国共关系

蒋介石先生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抹杀了各种主要的历史事实，而且对于忠勇为国的中国共产党做了极其“忍心害理”的

诬蔑。书中这一部分是具有绝大挑拨性的文字，想由此煽动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仇恨。这一页重大的历史，关系中国的命运太大了，不可以不表而出之。

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进行改组，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孙中山先生僻处广州一隅，革命旗帜不鲜明，甚至实力不出大元帅府一步，军、政、财……一切权力都握在假革命之名行反动之实的军阀手中，而国民党更无一处有健全的革命组织，足以为革命的辅翼。就是在这样时候，在孙中山先生的英明远见要求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援助的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就挺身而出，援助了孙中山先生，益以苏联在各方面的援助，遂使得国民党改组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完全崭新的局面。

首先在革命旗帜方面，在革命政纲方面：当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并没有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来限于反满，在反满以后，民族主义早已缺乏内容。即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所写的“中国革命之经过”，也如此表现。这是历史事实。全部中山全集可以作为历史的证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没有反帝，中国就将永远不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更将沉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明白揭出反帝革命的旗帜，进行反帝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运动，这是使中国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指标。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在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东西，此种旧民主主义并没有包含澈底地反对封建社会制度、解放广大劳动人民的内容。必须明白揭出反封建的口号，才使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有了新的

内容。中国革命民众必由此始能重新获得革命的方向，而动员起来。中国国民党必由此始能重新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而和革命民众结合起来，获得革命的新生命。请问：谁首先给中国民众提出了这个明确的革命政纲？谁帮助了孙中山先生把这个革命政纲变成国民党的政纲？请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是谁？请问：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即和民众疏隔起来，为民众和青年所冷淡，而改组后情形就大不相同，国民党又开始和民众联系起来，国民党又开始为青年所注意，这是不是因为有了新的政纲，有了这反帝反封建的政纲？而国民党之所以有此，除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明远见以及一切真正赞助孙先生这个英明远见的国民党人之外，是不是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应该归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之命运》的作者是亲身经过这一段历史的。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一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其次：在国民党改组前，国民党的组织情形又如何？那不是几乎一切都被军阀、政客、贪官污吏、地痞、流氓所把持所垄断的吗？那不是既无革命的组织、又无革命的宣传的吗？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是都关在党外吗？但改组以后的国民党的组织情形便不同了：直到清党为止，国民党的组织情形变得有生气了，成份改变了，国民党的组织变得真象是革命的组织了，因而促进了大革命的胜利。请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帮助所规划的功劳是谁的功劳？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一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又其次：在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所指挥的军队；有那支算得起是革命的军队？有那支能打得仗的军队？

中山先生进行多少年的北伐，有那次北伐成功了？可是，在改组后，情形不同了，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学校建立起来了（开始创意组织这个学校的是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和俄国顾问，当时《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并不认识这个学校的重要，还不愿当校长呢），由此革命军队也建立起来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样就很快地两次打败了陈炯明，又打败了杨希闵、刘震寰，最后得以进行北伐的战争。当时这种革命军队的建立和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中山先生摸索了几十年，没有摸到门径，但一旦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苏联合作，几年之间，便有如此伟大的军事成就。国民党势力之所以得到武汉南京，所以有今天，是谁之功呢？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蒋先生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不象其他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好吧，就看历史吧，历史是做判断的公正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帮助是那末大，那末起决定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后国民党所有的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完全是分不开的。就说打仗吧：两次东征，几路北伐，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无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牺牲了多少！蒋先生在为黄埔同学录写序言的时候，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人所流的血和国民党人的血是分不开的。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究竟用了什么“报德”呢？在统一广东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既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于是就打算到那本来是他所依靠的共产党人身上了，为着达到其打击的目的，就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所谓中山舰事

件，这事件据作者说是共产党阴谋的，但历史教训是很多的，希特勒焚烧国会，不也说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阴谋吗？当时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所以举行这个三月二十日的罪恶的阴谋，第一步就是为的造成借口，以便把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从黄埔军校中，从国民革命军中的主要工作职位上驱逐出来，并为的实行在国民党内限制共产党人。当时进行这种阴谋的人，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破坏统一战线，正是以为他们诚实可欺而进行的。请问：这就是“道义”吗？这就是不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吗？这就是不“利害自私”吗？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然而，制造三月二十日事件的阴谋的人，还没有准备就在那时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因为他还没有到达南京，还有利用共产党人之处。现在姑不论当时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业已开始造成许多重大错误，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主张国共合作，拥护北伐的路线，显然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个路线的正确，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参加了北伐的战斗，当时威振中外的各个主要的国民革命军，充当党代表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其大多数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吗？中共党人并在全国南北各地组织民众，组织便衣队，组织上海工人三次起义，来响应北伐军，因而造成了中国空前的大革命。大资产阶级代表一方面觉得还有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必要，使得自己可以到达南京，获得全国的地位，另方面则早已准备下一旦到达南京，获得全国地位的时候，就要实行清党大屠杀。当时共产党人的错误，就是太老实了，没有在帮助北伐、发动大革命的时候，同时注意大资产阶级这种反革命的残忍阴谋，而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的罪恶，就是在于实际上帮助了大资产

阶级这种反革命阴谋的顺利实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开始的清党运动的悲惨，在全国历史上找不到前例，即在全世界史上亦找不到前例：无数忠勇为国的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至国民党内真正忠实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主义与三大政策的人，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流血在大资产阶级刽子手的刀下。同胞们！同志们！这就是昨日同盟者的“道义”！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公”与“诚”！这就是不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这就是不“利害自私”，而老实被杀的人倒是“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倒是“利害自私”！呜呼！吾谁欺，欺天乎！

我们许久没有谈起上述这些事了，我们在抗战中，真是相忍为国的。可是蒋介石先生竟然又提起这些事来，并对共产党加上各种忍心害理的诬蔑。真的，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有正义、有血气的中国人，如果不提起这件事便罢，若是提起这件事，就会热血涌上心来。因为这是血债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流了血的呀，这是全国无数革命有为的青年和工农劳苦群众流了血的呀，这是全民族精华的血呀！自清党以来，死在国民党刀下的人，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蒋介石先生说：“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蒋先生发出的问题是可笑的，然而含有重大阴谋在内的：这就是要说共产党是和汉奸汪精卫有勾结。好吧，我们来说历史！大家知道：在大革命过程中，不但当汪精卫还革命的时候，有过“汪共同谋”，同时当蒋先生还革命的时候，也有过“蒋共同谋”。当汪精卫还革命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和他同谋呢？正如当你蒋先生还革命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和你同谋呢？至于说到“利用”，那末历史的事实既

然那样清楚，谁存心利用人还不明白吗？共产党人无“利用”什么人之必要，而只是认为在对革命有利的条件下，有和一定的人们合作之必要；而另有一种人则确是存心利用共产党人的，对他有利的时候就利用，一等到他得了地位的时候，就拿了朋友去屠杀，这里包括汪兆铭，也包括蒋介石。

这里倒要问问蒋先生：“九一八”以后，汪兆铭是和蒋先生同谋很久的。汪兆铭在“汪共同谋”的时期，并没有签订卖国协定，也没有跑出去当汉奸。但在汪蒋同谋时期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铭当了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卖国政策，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又发表了“睦邻”宣言，因此还和日本交换了大使。抗战后，蒋先生当了国民党总裁，汪兆铭当了国民党副总裁，并被国民党中央委任为参政会议长……而他竟从重庆逃往南京，当起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来。这一切同谋的内幕，我们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蒋介石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兆铭利用蒋介石呢？还是蒋汪互相利用呢？

关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裂，后来绵延十年的内战，蒋先生认为“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这实在未免太看轻作者自己、而太看重了汉奸汪兆铭了。请研究一下：宁汉是怎样分裂的？岂不是因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开始的“清党”么？“四一二”清党的“一手造成者”是谁？岂不就是你蒋介石先生么？当时汪兆铭到武汉投革命之机，是在宁汉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后，而不是在宁汉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前，帝国主义与南京反动政府共同威胁武汉，汪精卫就由动摇而反动起来，到了那时，汪精卫的清共不就马上赶上了你蒋介石先生的清共了吗？

总观作者这一段的深意，似乎以为假如没有武汉政府，则共产党早已一网打尽，早就没有什么“共产党问题”了，因此，作者感到怅恨。可是，作者错了，无论在任何场合，共产党是杀不尽的，死不完的，中国共产党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史早已证明过了。

蒋介石先生还罗列了一大篇关于共产党的所谓“罪状”，但那些所谓“罪状”决不能任凭蒋先生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去。多年来所结集的百数十万民族精华的生命，东征北伐的大动力，蒋介石先生尚且不惜加以杀戮，要编造“罪状”，有什么费事？还谈什么“良心”？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要杀戮必须把被杀戮的人的功绩完全改成罪状，这当然也是“残忍阴谋”中应有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忧患，早已看穿了这批自称代表“仁义道德”“固有德性”的人们是怎样一种刽子手大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仁义道德”呢？男盗女娼呢？如见其肺肝矣！

这是不错的：“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重了”。但刽子手们的悔祸之心何在呢？

十年内战，始祸者是谁呢？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被迫得去为自卫而战，这也不行吗？难道真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难道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要象羔羊一样、不能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反而甘心去受骗、受捕、受刑、受戮吗？让农民得到土地，使得他们可以很好发展自己的生产，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中所做的工作，同时也就是我们“大逆不赦”的罪名，但这果然是“罪”吗？为全民族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谋福利，我们是有罪吗？“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农村”者是谁呢？请查阅你们官方自己在十年中所发表的

数目字吧，你们每天总发表昨天在那里那里杀“匪”几百几千几万，今天在那里那里杀“匪”几百几千几万，这所谓“匪”者无他，我“和平农村”之和平农民是也。所谓“剿匪军”者，这里烧一城，那里烧一地，大炮也，飞机也，机关枪也，这些外国所供给的东西，都集中起来轰炸“我国和平农村”，甚至连“我国和平农村”在田里的稻谷，都要设法加以烧毁而后快。这就是“公”！这就是“诚”！这就是“仁义道德”！

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众在一起，艰苦奋斗，领导红军突破“围剿”，终于保存了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精华，锻炼了一支身经百战的民族大军，能够在伟大抗战中抵抗在华敌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支持了中国半壁河山。向使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共产党所锻炼出的这支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抵住那样大数目的敌人，能够独立挡住敌人的进攻么？如果国民党军队不能独力挡住，则敌人不就早已长驱直入重庆、昆明、西安、兰州么？中国安得有今天？中国安得被列为四强之一？而国民党当局诸公亦安得仍然安安稳稳地坐在重庆？

蒋先生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但是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天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可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亦不可设想。中国共产党生来就是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而它帮助人做好事，本来也没有自夸的必要，但是许多狠心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采取“过河拆桥”的手段，而且还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共产党人还有一张嘴巴，驳斥这些反革命的诬蔑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心为国，是天下共见的。在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人屡次向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战。但有的国民党人以自己的自私度人，却以为这是共产党“走头无路迫而出此”的结果，可是，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趁火打劫”，而且为着民族团结，不记清党之役和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毅然决然主张释放蒋先生。但蒋先生虽被释放了，却还是要设法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以怨报德”——总是资产阶级的哲学。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实现，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驰赴疆场，深入敌后，战功卓著，名满全球。但国民党人对之采取了如何的态度呢？不但封锁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而且仍然在那里大批的捕共产党，杀共产党，骂共产党，打共产党，派遣大批特务钻进共产党中来，企图这样内外夹攻，使得共产党完全“消灭”。甚至在敌后，国民党人领导的军队不打日寇，而去专打那种打日寇的八路军新四军，形成与日寇共同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局面。然而这些都不叫做“机巧权术”，都不叫做“残忍阴谋”，都不叫做“利害自私”，而却是叫做“至公”，叫做“至诚”，叫做“不自私”呢！

对于上述这一切，我们也是因为“相忍为国”，许久都不愿见之口舌和笔墨。但蒋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中既然如此集矢于中国共产党，近日国民党又经过中央社发表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消息，同时准备武力进攻边区，我们对于是非真相，如果再要缄默，则不但对不起无数流血牺牲的共产党员，而且也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中华民族，对不起二十二年的历史。

《中国之命运》的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这是全书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实质上说来，即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其中心思想，就是国民党即中国，中国即国民党。法国专制暴君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思想是完全复活了。此章对于全国国民和青年，字里行间，充满了威胁和利诱，要他们都一致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对于共产党则充满了杀机。特别其中所说的“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显然是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说的。作者说：“大家如果不肯澈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首先请研究一下蒋先生及国民党当局诸公的“宽大”。我们很不了解：一直到现在，还在捕共产党，杀共产党，骂共产党，打共产党，派遣大批特务钻进共产党，这些是否就叫做“宽大”？好吧，就说是共产党一万个该杀，但是，共产党以外的许多党派，许多社会集团，许多文化组织与经济组织，一切无党无派的公正人士，一切纯正的青年甚至一切真正爱国不愿反共的国民党员，他们总算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纠葛了，他们得到过什么“宽大”呢？他们有发表自己思想的自由没有？他们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读书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要求民主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要求不当特务的自由没有？那些国民党人例如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等等几千几万的人们，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没有？不说政治，来说经济吧，在大后方，农民没有要求减租减息的自由不用提了，最近连工人也没有获得工资的自由也不用提了，但是中小工业资本家有没有发展自己经济的自由？各种小生产者有没有发展自己生产的自由？不是一切都垄断干净了吗？垄断得使他们得不到血本，因而使生产逐渐衰落了吗？难道这一切也都叫做“宽大”的吗？

但是蒋先生及国民党当局诸公的宽大是确实有的，这就是对于土豪劣绅的宽大，对于贪官污吏的宽大，对于几百个反革命特务大队在全中国境内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宽大，对于日本第五纵队的宽大，对于汪精卫汉奸群的宽大，对于日汪奸细陶希圣、吴开先的宽大，对于三十三个投敌将领的宽大，对于洋狗坐飞机的宽大，对于孔令仪小姐携带大批嫁妆坐飞机到美国去结婚的宽大……好了，蒋先生及国民党当局诸公确实有了无数的宽大。但是试问这些宽大对于国家民族有什么利益呢？除了尽情尽量地破坏一切抗日人民的积极性、自信心、自尊心与创造力，除了把国家民族引入绝路，还有什么别的结果没有呢？

其次，请研究一下“变相军阀”。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拒敌人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国民政府不发枪，不发弹，不发饷，而他们竟能如此作战，这是史无前例的最勇敢的民族先锋队，这就是“变相军阀”吗？八路军新四军出自民间，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自力生产，而又为民众所爱戴，这就是“变相军阀”吗？如果有人硬要加以“变相军阀”之名，则试问：这种“变相军阀”对于国家民族何害？对于人民何损？反之，不是越多就越好吗？不是越多抗日就越有力吗？不是越多人民就越有保障吗？我们倒要查查中国境内的真正军阀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的东西，不都是真正的军阀吗？真正的军阀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跋扈已极，却敢于辱骂共产党人为“变相军阀”，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再其次，研究一下“新式封建”。比如陕甘宁边区吧：这里有民主政治，这里有人民的安居乐业，这里有军民的一致热烈发展生产，不断出现劳动英雄，这里的人民与人民，政府职员与民众，军队与人民，大家都相亲相爱如一家人，这里在短短

几年之间，便一扫过去在军阀官僚党棍特务统治下的荒凉与贫困，大家逐步走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就是“新式封建”吗？如果有人硬要加以“新式封建”之名，则试问：这种“新式封建”对于国家民族何害？对于人民何损？反之，不是越多就越好吗？不是越多就是三民主义实现得更广吗？不是越多就是中山先生遗嘱更可以在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吗？

我们又要查查中国境内的旧式封建了，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比秦始皇还厉害百倍的寡头专制政治，几百个横行全国的反共特务大队，这不是中国式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政治吗？

我们不知道蒋先生所说的“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是否即是指非内战不能解决。若然，我们敢为民族请命！为人民请命！难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还不够惨吗？

蒋先生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蒋先生全书的精神，可以“对内”二字概括之。但是我们知道：今日大好江山还沦陷敌手，就使英美已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那些东西都在沦陷区，不战胜日寇，一切就都是空话。抗战前途还极多艰难，今日基本问题显然是对外——即共同对日，而不是对内——即准备内战。蒋先生提出或者是“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或者是“诈欺虚伪，毁法乱行”八个字，而且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但是有问题还是要请问的：制造磨擦，发动内战，“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是否即“精诚团结”？降敌叛国者不加讨伐，抗战有功者不加奖赏，贪污横行，豺狼当道，封建遍地，专制自私，是否即“奉公守法”？威胁利诱青年去做特务，要他们钻进共产党，钻进国民党

以外的一切所谓“异己”党派，“异己”集团，钻进一切民众团体，钻进文化界，教育界，经济界，要他们不做正派人而做两面派，是否即“诈欺虚伪”？拒绝实行三民主义，拒绝实行抗战建国纲领，而且所做的适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相反，是否即“毁法乱行”？在此抗战时期，不出于这二年之中，要在国内“决定命运”，是否意味着要在今明两年之内组织国内战线，消灭一切“异党”？我们是希望蒋先生给我们解释这些问题的，因为我们晓得：自从有了法西斯主义或公开地或掩蔽地在中国出现以来，字典上就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了。如果《中国之命运》竟然成为内战的工具，则蒋先生将何以自解于国人？无怪自一九四三年三月间《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几个月来，人们纷纷传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着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二年决定命运”，原来在书中已写得明明白白了。

是的，确确实实有一批大人先生正在阴谋进行取消八路军（新四军早已被取消了）、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行动，正在准备大内战，甚至命令其特务——狗彘不食的托派匪类在西安公然提出解散共产党，而且由中央通讯社为之传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还尽有自己的明智的头脑与沸腾的热血，他们将继续发挥其大无畏的精神，为着坚持抗战、反对内战而斗争，为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而斗争，为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为着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斗争，为着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解放中华民族而斗争。同时，正是为着这些，当着反动派敢于进攻他们时，他们也必须准备自卫。我们愿意告诉一切阴谋家，中国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消灭不了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幸福与光明是消灭不了的！中国

共产党存在的二十二年历史，就是活生生的证据。中国一定要走进步的与光明的道路，中国一定不要走倒退的与黑暗的道路，谁在这条道路上敢于碍手碍脚，谁就一定要碰破其可怜的小小的头颅。

说共产党人是“自私”的吗？中国共产党人为着民族与人民，弃家离井，随时随地可为人民的利益抛掷自己的头颅，而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会拿取人民的血汗积累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没有一个发洋财或发土财的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处为人民工作，但决不是做官，更不想做大官。谁是“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谁是“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请研究一下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吧！除了那些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之外，其中多少人刮削民脂民膏，多少人把民脂民膏变成个人的财产，多少人本来还一无所有，但一朝大权在握，就马上银钱累累，荒淫无耻，尽富尽贵，这不是天下人所共见共闻的吗？

呜呼！“公”也，“诚”也，“不自私”也，一切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现在确确实实有一批大人先生正在想假“公”、假“诚”、假“不自私”之名，解散共产党，要取消边区，要准备进行大内战！如果不是“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不是“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试问又是什么呢？

（五）为中国民族前途呼吁，为中国民众、中国青年们、孩子们呼吁！

战后的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五周年宣言，已明白指出了。但是读了《中国之命运》，我们有许多疑惧，应该及早提出正义的呼吁，而这个呼吁，和今日关于反对分裂内战、坚持团结抗战的呼吁

恰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之命运》在政治上是以旧专制主义为其楷模的；作者这样称颂清朝：“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又说：“返观我们中国历代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按照作者的说法：“自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从外国的学说。于是有些人士，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我们知道：民主思想输入我国，引起了我们国民大开了眼界，起来作推翻专制政体的斗争，而中山先生曾经是这样的战士，照作者看来，这些都是白费的了。因为中国老早就有“法治”了。这岂不是说：如果没有不平等条约，中国政治上旧的一切都已尽善尽美了。这种见解，不仅有背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而且违反今日中国人民的希望，违反了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作者又说：“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就是说：不但不要新民主主义，并且也不要旧民主主义，而对于民众又不许其自由，则这不是法西斯主义与旧专制主义的混合——新专制主义是什么？则这不是中国式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是什么？作者所谓“民主制度”，不过是这种法西斯制度或新专制主义制度的别名罢了。（法西斯德国不是还叫做“德国共和国”吗？）

其次，作者把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的学说）完全向反动方面去解释，而称赞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称赞了孔子诛少正卯。孔子的愚民哲学，居然被公开

捧出来了。孔子诛少正卯的残忍阴谋，章太炎早已揭穿无遗，不料蒋先生在今日各大多数同盟国提倡思想自由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竟然主张诛杀思想上的异己。蒋先生已给一切不相信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即新专制主义的人们发出信号了，他要把一切这些人们都当做少正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一个“诛”字。

《中国之命运》第六章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其基本内容，就是：其一、反对民主政治，其二、反对思想自由。这真是中国政治危机的所在，中国国民精神（思想）危机的所在。

大家知道：中山先生积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其所得的中心思想是唤起民众。而这点和《中国之命运》的中心思想正相冲突。或者是拥护民众，或者是反对民众。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革命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的基本问题，是民族与反民族的基本问题。唤起民众的中心问题就是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发扬，而反革命路线必将一概加以否认，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被绞杀。这也是现在中国国体（在其实不在其名）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政体的问题，又是民族生命、中国前途的问题。

我国之所以衰弱，所以被外国人欺侮，是由于民众被专制政治所压迫；如果在抗战以后，我们民众仍然还要继续受专制的压迫，则中国仍将不能转弱为强，仍将不能达到解放，一切建设都会无望。这不是我们的危言，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早已证明过了。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代表在大后方所进行的特务教育，所采取的对待青年的手段，是极端悲惨的。青年们纯洁的心灵，没有根据自己的生活和理智去选择思想的自由。不仅如此，还有人用“左倾”思想做钓饵，去钩引某些青年，特别是去钩引那些

活泼有为的青年，等到他们不及提防上了钩钩之后，就立即强迫他们签字发誓到共产党中、到一切所谓“异己”势力中去当特务，有的并须要以他们的家庭或某种亲属为质，否则加以格杀。这种方法甚至施行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们。一切情形完全出乎有理智的人类思想之外，其残忍阴谋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这些东西没有分别，甚或过之。这就是他们的“爱护青年”，“不利用青年”！这就是他们的仁爱真诚！我们敢向全国同胞大声疾呼！这是对于青年们孩子们的虐杀！这是中国青年旷古未有的精神大灾难！这是我们中国民族的精神大灾难！我们不知道《中国之命运》作者的所谓“真诚笃实的风气”是否就是这样的风气？要知道这样的风气是由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宣传机关、教育机关、组织机关、以及三青团部直接主持的。

现在听说《中国之命运》订为大后方青年们孩子们必读的“圣经”了。一定要把假造历史、曲解历史的东西和叶德辉那套什么中国伦理圣教是世界第一的衣钵，强迫灌输到青年们孩子们的头脑中去，真是“居心何忍”！这不真是可悲可叹，而大大足为我们民族前途担心的吗？

我们要为中国民族前途呼吁，为中国民众，中国青年们、孩子们呼吁！也为我们中国的后代呼吁！要求蒋介石先生，要求一切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要求一切抗日党派，要求一切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反对新专制主义！让中国民众得到自由的呼吸吧！让中国青年们、孩子们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理智去选择思想和追求光明吧！救救青年！救救孩子！救救我们民族的后代吧！让中国不再回到专制、内战、黑暗、屠杀、特务——这一类的旧路吧！让以民众为主人翁的新

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诞生出来吧！中国万岁！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 罗罗，彝族的旧称。

论 时 局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时评)

目前国际时局的发展，和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那批大人先生们的自私自利的算盘是矛盾着的。

中共中央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明确地指出目前的世界局势是：“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并指出：“只要欧洲大陆能够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则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是毫无疑义的。”而“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的失败与世界各民族的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最近几星期来世界战局的发展，更加证明了我党中央这一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一带粉碎德寇的“夏季攻势”，并向奥勒尔线举行红军的夏季攻势，均获得新的伟大胜利。同时，英美盟军又在西西里登陆成功，这一切均显露了同盟国的无敌力量和轴心国的日暮途穷。由此发展下去，法西斯的垮台必不在远，这已成为无可置疑的定论。

可是奇怪得很，中国抗战营垒内一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狭隘利益的大人先生们，他们虽口口声声说中国也属于同盟国，有时也替苏英美盟邦的胜利说几句好话，然而他们的内心，总是在馨香祷祝德意法西斯不要垮得太快。他们幻想着今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势”还会获得一些胜利；欧陆第二战场不会建立，或至少不会早日建立。他们甚至仍然梦寐以求于所谓“日苏必战

论”，希望日寇进攻苏联。他们对日寇的算盘是：以苏联的陆军打日本的陆军，以英美的海军打日本的海军，以苏英美的空军打日本的空军，中国则保存实力，坐收成果。只待日苏战争爆发，他们的手就可以空闲起来，可以放手大打共产党。六七月间的调兵遣将，急急忙忙地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除了投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以为中国共产党可以“使用压力，迫其分化”之外，是还想投这个德日两国“夏季攻势”之机的。

我们愿意忠告这些沉醉于幻想中的大人先生们：你们的算盘是打错了。你们可以冷静地看一看，你们的幻想还有那一点没有被冷酷的事实所推翻呢？

首先，看一看苏德战场的形势吧！希特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迟至七月五日，才算在库尔斯克、别尔果罗德一线发动一次攻势。他在狭窄的阵线上，集中了庞大兵力，什么虎式坦克、佛第兰德炮车等最新式武器都拼拼凑凑地拿出来使用。他企图一举楔入苏军阵地，包围和消灭库尔斯克方面突出地带的红军。然而结果究竟怎么样呢？狼奔豕突的法西斯匪徒，处处碰到红军的迎头痛击。他们支付了惨重的代价——坦克二千九百辆、炮车一百九十五辆、卡车五千辆、飞机一千三百九十三架和七万余法西斯官兵的生命，但是终于无法前进一步。不出一星期的时间，英勇的红军就把德寇的攻势打垮。并且不给敌人以片刻休息的机会，接着便来一个有力的进攻，在两星期内，推进五六十公里，三路进迫奥勒尔城郊。现在红军攻势，正在广大的战线上扩展着。发动了对红军的夏季攻势而惨遭挫败的德寇，现在只得高嚷着“这次战斗，是久已准备好了的苏联夏季攻势”，而实行着自己的“弹性防御”了。那些希望德寇“夏季攻势”能够胜利的人们，曾经无耻地说：“夏季攻势是和德国相连、而和苏联不相连的名词。”

然而战争的进程偏和这些人开玩笑，德寇的所谓“夏季攻势”不出一星期就被打垮，而苏联的夏季攻势，则是真正的攻势，具有方兴未艾之势，奥勒尔即将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苏联既能守，又能攻，而德寇则攻既遇到惨败，守亦不能自固。“夏季攻势”这一名词过去似乎为德寇所专有，可是现在这个名词已经永远和纳粹匪徒分离，而和苏联红军相连起来了，和英美盟邦相连起来了。这件事真使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大失所望，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须知这批大人先生们的失望，就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类的胜利，让一小批人永远失望下去罢，谁叫他们沉浸在那些不但完全不合事实，而且带着反革命的自私自利的幻想里面呢！

关于欧陆第二战场是否会开辟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西欧和南欧的形势。在西欧，过去三个月中，英美空军在德国工业中心地区投弹在三万吨以上，这种轰炸现在仍在以毫不放松的姿态继续进行着，这岂不是不但为了摧毁德寇军事工业，而且为了替盟军在西欧登陆打开道路么？在南欧，盟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和继续进军，这不是它在南欧登陆的序幕吗？西西里岛以“设防巩固、不可攻克”著称，而盟军从地中海各根据地（北非、马尔他岛、班泰雷利亚岛等）跨海进攻，最短距离亦不下百公里，盟国大军竟能克服困难，在该岛登陆成功，而且不出半个月，已占领全岛之大半，轴心兵无斗志，狼狈奔逃，退守西西里东北一角，其全部就歼之期，已迫在眉睫。这一战役不是说明英美盟军已有充分的登陆作战经验，其士气非常旺盛，而轴心军则天天后退，其士气非常衰落吗？那些幻想欧陆第二战场不会开辟的人们，也许会这样想：去年没有开辟，所以今年也不会开辟。对这些人，我们不妨请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今天欧洲形势的新特点：“目前是在苏英美三国第一个联合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

在苏英美三国的陆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的时候，苏联从东线英美从西线举行第二个第三个更伟大的联合作战，给予德意法西斯以最后决定性的打击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中共七七宣言）红军在东线的进攻和英美在西西里的进攻，正是苏英美第二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伟大的第三个联合作战，我们估计必然会要到来，而且可能是很快的到来。不错，由于去年第二条战线没有开辟，苏英美战胜法西斯的决战，推迟了一年。同盟国家和世界反法西斯人们对于这一历史的教训，是深切了解的。现在他们都恳切地盼望“在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他们正在为这一目标加紧战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这批大人先生们，真是“嗜好与俗殊酸咸”，他们的希望和判断，总是和全世界一切正义人士相反的。他们以自己的自私自利的经验当作方法论，以此去衡量世界上的一切事件与一切人，这种方法论就是阿Q方法论。阿Q根据他自己的极端狭隘的经验，从乡下跑到城里，乡下叫板凳城里叫条凳，他说，城里的叫法是错的；乡下煎鱼放葱片，城里煎鱼放葱丝，他又说城里的煎鱼法是错的。我们的这批大人先生是不愿意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他们以为罗斯福、邱吉尔也和他们一样不愿开辟第二战场。结果呢？结果也必然会使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失望。但这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们好的不学，专门要学这种狭隘经验主义的自私自利的阿Q方法论呢？

我们的大人先生们提倡的所谓“日苏必战论”，也和上述两个问题具有相同的性质。不错，日寇对于苏英美三国巩固团结、对德意实行决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这个决战“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德寇在势穷力蹙之际，当然也极希望日寇攻苏，以期减轻苏联加在它身上的重担。中共中央

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对于这个问题也估计到“日本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想进行侵犯苏联的冒险行动”，并且日寇在“满洲”的军备至今没有任何的减少，因此我们至今仍不能说日寇侵苏的可能性已经完完全全地过去了。然而事情是日益对于日寇不利的。在前年莫斯科危急与去年斯大林格勒危急两个时机中，日寇不敢发动侵苏，那末，在今年苏德战场上德军的所谓“夏季攻势”已经让位给红军的真正的夏季攻势，欧洲第二战场快要建立，日寇攻苏的时机益见不利的时候，日寇是否愿意为希特勒火中取栗，甘心把自己的脑袋向苏联的铜墙铁壁上去撞，遭受比张鼓峰、哈桑湖悲惨百倍的结局，这就大成问题了。何况美国生产力猛进不已，在太平洋上进行巨大反攻的威胁，使日寇日夜戒备，坐卧不安。即以造船吨数而论，日寇一年所造，只抵得美国的一个月。在南太平洋上，日寇空中劣势显著暴露，连日以来美机数百成群轰炸日寇各根据地，予以重大损失。自新几内亚至新乔治亚绵亘数千公里的岛屿世界中，美国海陆空军稳打稳扎，步步进逼，为将来的大进攻准备有利阵地。在中国战场上，正面战事虽然毫无生气，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机会主义政策，然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人民游击战争，却每天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活跃着，使日寇无法巩固其所谓“兵站基地”，后顾之忧，与日俱增。日寇在这样几面受敌的困境中，他若还敢向苏联进攻，那就无异是自促其更快地死亡。观于敌酋东条抑制极端少壮派的行动，和他在中国、南洋各地仆仆风尘，目前日寇的大部分力量，似乎是化在准备对付美国的大反攻上面；日寇正在开足矮步，与美国竞赛军备，仍苦望尘莫及。因此，引领盼望日寇在今年夏季侵犯苏联，以便自己完全腾出手来打击中国共产党的那批大人先生们，其算盘未必那么如意。他们在红军七天击破

了希特勒的所谓“夏季攻势”，英美又于七月十日攻入西西里的时候已经冷了半截，因此，他们自己在六月及七月上旬所积极地神秘地准备着的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反人民的“夏季攻势”，也有偷偷地暂时歇手之可能，虽然，一切抗日人民不应该有一刻放松这种注意，即是说，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随时准备着对于中国真正抗日的革命力量举行袭击的。

我们还要问问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就使日苏打起来，你们真的就可以放手开辟国内第二战场，毫无牵挂地拔去共产党这个眼中钉，然后坐收抗战的渔利么？世界上的算盘是没有这么如意的。日苏即使打起来，日寇在中国的这点兵是不会撤走的，中国是它的所谓“高度结合地带”，又称“兵站基地”，岂肯轻易歇手？中国既有一个对外战场，又开一个对内战场，左右开弓，你们自己就有好结果么？决无什么好结果的，只会使中国灭亡得快罢了！从古至今，采取两面政策的人们未有不失败的，俄国的资产阶级与英国的张伯伦就是前例。

但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老早就带着矛盾的两面性的。在抗日期间，这种两面性，表现在他们一面抗日，一面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政策上。在抗日方面也是两面的，一面抵抗日寇的进攻，一面则抵抗得不积极，并且还时常和日汪密使勾勾搭搭；在反共反人民的方面，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与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乃至希特勒、墨索里尼，有其共同点的。在对共对人民方面，也有其两面性，即是从内战时期的单一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蜕化为抗日时期一面利用共产党与人民，一面又打击共产党与人民的两面政策。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明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期间的这种两面性，他们就无法建立自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的革命

的政策，而将使自己的头脑陷于不清醒、陷于麻痹、陷于右倾或左倾的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抗战期间，克服了党内同志间各种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思想，而使得自己的政策纳入完全清醒的完全正确的轨道上，并将一步也不放松地坚持这种政策，直到争取抗战完全胜利与民族完全解放的目的地。全党同志都应注意研究时局，研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动向，研究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政策的动向，而使自己的头脑完全清醒起来，坚决执行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抗日的最后胜利与民族的完全解放是没有疑义的。

本文刚写完，接到墨索里尼已于七月二十五日倒台的消息，这是整个法西斯反革命时代归于结束的开始，这是整个轴心国总崩溃的开始，欧洲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本文来不及详说，当于另文加以分析。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八(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六十二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五十六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百分之十。其详情如次：

第一，日寇侵华全部兵力，就一九四三年六月份材料，共计二十七个半师团，十五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如以两个旅团折合一个师团计算，共为三十六个师团兵力。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者为二十一个师团，占总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国民党军队所抗击者为十五个师团，占总兵力百分之四十二。此种比例，仅就分布状况计算。如按作战实情计算，则共产党军队所抗击者较上述数目还多些。至于海南岛、广九路区域共产党游击部队所抗击的敌军，尚未计算在内。

第二，华北敌军十一个师团，十个独立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合计为十七个师团。共产党军队(八路军)抗击了百分之八十三，国民党军队仅仅抗击百分之十七。计：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柴山)，分布于大同、归绥、朔县、集宁地区。第二十七师团(原田雄吉)，分布于天津秦皇岛段北宁路沿线。第三十六师团(冷本)，分布于晋东南沁县、晋城、潞城地区。第四十一师团(清水规矩)，分布于天津、沧县、献县地区(主力近有南调讯)。第

五十九师团(柳川),分布于山东泰安、淄川、惠民、丘县、寿张地区。第一百一十师团(林村),河北定县邢台段平汉沿线、及德石路西段。独立第一旅团(小松),河北河南交界之沙河、淇县、大名、林县地区。独立第二旅团(中田),察哈尔万全、阳原、蔚县地区。独立第三旅团(毛利末广),山西忻县、五台、繁峙、宁武地区。独立第四旅团(津田酒),山西榆次、孟县、辽县⁽¹⁾地区。独立第六旅团(奥村),北平附近。独立第七旅团(正井义人),山东河北交界之德州、庆云、蒲台⁽²⁾、章丘地区。独立第八旅团(喜田),河北石家庄、邢台、广宗、宁晋地区。独立第九旅团(池上贤吉),冀中衡水、武强、饶阳、晋县地区。独立第十五旅团(田中信南),河北定兴、定县、平汉路两侧。

以上共六个师团,九个独立旅团,全部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所抗击。

以下五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为共产党军队(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之敌军:

计:第十七师团(酒井康),江苏砀山、淮安、赣榆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七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三十。第三十二师团(石井衣雄),山东济宁、滕县、临沂、莒县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八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二十。第三十五师团(板西,又谓是柏壬),开封、新乡、滑县地区,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三十七师团(长野义佩),晋南三角地带,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三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六十九师团(井上真卫),山西临汾、离石、清源⁽³⁾、沁源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七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三十。独立第五旅团(内田银之助),胶东半岛,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七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三十。独立骑兵第一旅团(榜相),归绥、包头、固阳地区,共产党抗击

百分之二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八十。独立骑兵第四旅团（左久均为人），河南山东交界之永城、太康、民权、城武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四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六十。

第三，华中敌军十二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合计十四个半师团。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四十七，国民党军队抗击百分之五十三。计：第六师团（神田正钟），武汉、黄冈、黄陂地区。第十五师团（酒井直次，有被击毙讯），南京、镇江、高淳、巢县地区。第五十八师团（下野·霍），鄂中汉川、云梦、潜江地区。第六十师团（小林元），上海镇江段京沪路沿线。独立第十二旅团（允影），苏中阜宁、宝应、江都、海门地区。以上四个师团，一个旅团，全部为共产党（新四军）所抗击。

第十三师团（内山英太郎），宜昌、沙市、当阳地区。第三十四师团（大贺茂），南昌、德安、安义地区。第七十师团（内田孝行），浙江金华、桐庐、嵯县地区。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

以下六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为共产党（新四军）及国民党所共同抗击。计：第三师团（山本三男），豫南信阳、湖北孝感、随县、礼山地区，共产党及国民党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二十二师团（太城三治），沪杭甬铁路沿线，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二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八十。第三十九师团（澄田睐四郎），鄂西钟祥、荆门、江陵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二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八十。第四十师团（青木敬一），湘北岳阳、鄂南通城、大冶、咸宁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三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六十八师团（中山淳），南浔路北段及九江、蕲春沿江，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三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一百一十六师团（武内俊二郎），湖口、芜湖沿江，共产党抗击百分之四十，

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六十。独立第十三旅团（早渊），安徽合肥、蚌埠、滁县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六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四十。独立第十七旅团（高品彪），湖北沔阳、监利、华容、石首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三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七十。

第四，华南敌军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计：第十八师团（牟田口廉地）之一旅团及第五十六师团（渡边正夫），滇西腾冲地区。第五十七师团（中野莫光），广九路沿线。第一百零四师团（菰田彦一），广州、从化、三水地区。独立第十九旅团（松井贯一），粤东潮汕地区。雷州独立旅团，雷州半岛。以上大体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但广九路及海南岛地区，中共领导之游击队亦抗击了敌军一部分。

第五，目前日寇在华军队，均不足编制定额。各师旅团之间，亦均参差不齐。约计敌目前在华兵力三十六个师团，只有六十万人左右。国民党三百余万依靠外援并借全国财富所供给之军队，抗击日军不过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只有五十万人，凭借甚劣之装备（政府不予补给）与各个财富甚差之抗日民主根据地，反而抗击了日军三十五万人。此外，尚有伪军六十二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叛国降敌伪化的，一般地国民党是不打这些伪军的，几乎全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为共产党所抗击。

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就和各同盟国配合作战上说，究竟是共产党起了大的配合作用，还是国民党起了大的配合作用？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了。

根据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 辽县，旧县名。今山西省左权县。

[2] 蒲台，旧县名。位山东省中部，黄河北岸。辖区划归今博兴县和广饶县。

[3] 清原，旧县名。位山西省中部。辖区与原徐沟县合并为今清徐县。

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全国伪军六十二万余人，大部为国民党军队所伪化，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仅在广东方面有约六万伪军任其自生自长，除共产党打了一部分外，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兹将伪军情况概述如次：

全国伪军除伪正规军外，尚有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全国伪正规军三十二万七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人，共计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人。计华北伪正规军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十七万八千人。华中伪正规军九万四千八百人，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华南伪正规军二万三千二百人，伪地方武装三万六千八百人。除华南伪军外，华北华中敌后全部伪军皆在敌寇之驱策下不断的配合敌寇对共产党“扫荡”与清乡。数年来，伪军参加正面战场向国民党军队作战者，只有一次，即一九四三年夏季湘北鄂南之战，有伪武汉行营直属之一个师（第二十九师）参加。华北华中伪军对正面战场一贯是和国民党军队和平相处，对共产党军队则配合敌寇积极进攻。因此，华北华中全部伪军共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人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占全部伪军（包括华南）百分之九十强。而国民党方面所牵制（不是抗击）者，仅华南伪军六万人，不过占全部伪军百分之十弱而已。何况华南伪军中，亦有一部分为共产党之游击队所抗击，并非全部被国民党牵制。

甲 华北方面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总兵力约六万人。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以上七个集团军，均位于冀东之迁安、遵化、丰润、滦县地区。第四集团军陈志平，位于鲁西之东平、东阿、长清地区。第六集团军齐荣，位于保定地区。第八集团军徐贯一，位于胶东平度地区。第一百零二集团军高德林，位于冀南豫北之安阳、邯郸、武安地区。教导集团军田中，随总部住于北平。该部为华北伪军中战斗力较强，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在鲁西之定陶、菏泽地区率部投敌。现总司令部设于开封，辖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兵力约三万人。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均位于濮阳、东明、考城^{〔1〕}地区。该部投敌后，积极配合敌寇，向共产党进攻，其战斗力亦为华北伪军中之较强者，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一九四三年春季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率部投敌。现辖三个师，总兵力一万二千人，全部仍在原地区活动。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该部原为国民党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在豫北陵川^{〔2〕}地区率部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现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总兵力二万五千

人。总部设于汤阴。所属各部，分布于滑县、淇县、林县地区。编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二师副师长，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现兵力四千，位于鲁南临沂、郯城地区。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兵力四千三百人。该部为骑步兵混合，位于绥远⁽³⁾固阳地区。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国民党骑九旅之团长，于一九三三年率部投敌。现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总兵力三千人。位于绥远百灵庙地区。

八、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后被敌杀害)。白逆原为国民党之师长，于一九四〇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现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总兵力二千人。位于绥远之固阳、百灵庙地区。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杨诚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团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现第一师位于武乡，第二师位于崞县⁽⁴⁾，军部位于太原。总兵力五千一百人。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国民党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一九三八年率部投敌。现辖两个纵队，活动于山西属离石、中阳、太原地区。总兵力三千人。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总兵力三千人。活动于归绥、固阳地区。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

第二两师，全为国民党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总兵力四千五百人，活动于包头地区。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活动于豫北之武安⁽⁵⁾、内黄地区，总兵力三千五百人。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一九四三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现位于遵化、迁安地区。战斗力比华北其他伪军较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伪小股正规杂牌军尚多，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一九四三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师长，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山东诸城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郝逆原为傅作义部之特务营长，抗战后率部投敌)。以上各杂牌军，直属各省敌伪长官指挥，总兵力四万二千人。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乙 华中方面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部队分布于南京、杭州、天长、合肥、扬州等地，各驻一个师。总部设南京。兵力共一万五千人。编制装备略同国民党。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率部投敌，该集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分布江苏之泰州、江都、靖江地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一九四一年三月率部投敌），一九四二年十月被扣，番号被取消。所辖四个师另一独立旅直属伪绥署指挥。部队分布于江苏之东台、盐城、如皋、南通一带。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分布于江苏之泰兴、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地区。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兵力三万四千人。编制装备，与伪第一方面军同。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共一万人。部队分布于湖北之随县、应城、信阳⁽⁸⁾、云梦、咸宁地区。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现辖伪保安第三师，活动于鄂南之天门、汉川地区，兵力三千。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总兵力一万五千人。部队分布皖北之宿县、亳州，苏北之沭阳、灌云及豫东之太康、商丘等地。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一九四二年夏季率部投敌。现驻苏北灌云地区，兵力三千八百人。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二千人，担任浙东杭甬铁路沿线守备。第十三师丁雪山部，已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第五战区第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长，一九四一年八月率部投敌。部队驻皖中无为地区，兵力二千人。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兵力一万人。装备战斗力为伪中央军之冠。

十、一九四三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因尚未查明投敌后之番号，故未列入。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四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一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

丙 华南方面（包括海南岛）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头。兵力六千人。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总兵力一万七千二百人，分布于广州、南海一带。

三、华南伪地方军三万六千八百人。

以上华北华中伪军共五十六万余人，全部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一枪不打。只有华南伪军六万人，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但共产党亦抗击了一部分。

* * *

由此可知，蒋介石先生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十六个师团共六十万敌军中，国民党仅仅抗击十五个师团，计二十五万人(百分之四十二)，共产党则抗击了二十一个师团，计三十五万人(百分之五十八)。至于那六十二万伪军，几乎全部都为共产党所抗击。很明显的，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已亡了，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根据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考城，旧县名。位河南省东部。辖区与原兰封县合并为今兰考县。

〔2〕陵川，属山西省。

〔3〕绥远，旧省名。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4〕崞县，旧县名。今山西省原平县。

〔5〕武安，县名。今属河北省。

〔6〕信阳，属河南省。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昨日本报发表了两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即《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这两个文献以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澈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无耻谰言和荒谬宣传，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真理：即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没有了中国。

近年来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外进行了无数的狂妄的荒谬宣传。在国际宣传上，便是拚命宣传国民党抗战的“丰功伟业”，似乎今日反法西斯盟邦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国民党对日抗战之赐。不信，请看蒋介石先生今年“七七”告国民书，他大言不惭地说：“这一年来，在浙赣、在滇西、在苏鲁、在冀察、在大别山、在太行山、在各战区、以至最近在鄂西的战斗，牵制了日寇凶横的侵略军队，使他不敢窥印度，不敢侵澳洲，也不敢向北跨越阿留申群岛，以切断美苏联络（注意：此处留下了西伯利亚一个缺口，暗示日寇可以进攻苏联），在此时期，我们盟邦圆满执行战时生产的计划，顺利增强各战场的战力，因之（！），纳粹侵略者继斯大林格勒一役败衄之后，复大败于北非。”好一个丑表功，好一个大牛皮！原来斯大林格勒与北非的大胜利，竟也是由于国民党牵制了日寇得来的！可是，事实是铁面无私的，查一查看，到底国民党牵制了多少日寇军队呢？数字告诉我们：总共不过十五个师团，二十五万人，还不到斯大林格勒一

个战役所歼灭的纳粹侵略者三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七十三。

跟着这一宣传而来的就是：“中国不能赤手空拳作战……中国需要更多的武器和军火”，“中国既为联合国之一员，自有权利期待美国供给军火”，“飞机，飞机，更多的飞机”之类的叫喊（上引语均系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美国说的话）。不错，中国不能赤手空拳作战，可是，请问，第一，抗战以来，盟国所供应的军火，算起数目来不可谓少，这些军火难道牵制这区区二十五万敌人就消耗光了么？第二，中国不能赤手空拳作战，难道八路军新四军就能赤手空拳作战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一粒弹一支枪也不供给呢？八路军新四军既是抗日军队之一部分，亦自有权利要求政府供给军火啊！问题中心不在盟国供给不供给军火，而在供给了的军火用在什么地方去。如果美国的飞机不用来轰炸东京、大阪、平、津、沪、汉的日寇，却用来屠杀甘肃、伊盟、贵州、渭南的人民，如果苏联的军火不用来杀敌，却用来武装包围边区的部队，那么，怎能怪盟邦要求中国提出不作内战之用的保证呢？六年来，盟邦将近十六万万美元的借款援助，只不过牵制了敌人十五个师团，而且还天天喊要援助，要军火，要飞机，这不是所谓“三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么？

在国内宣传上，便是污蔑八路军新四军为“游而不击”，称之为“奸军”“叛军”，辱骂共产党“组织武力，割据地方”，是“新式封建”，是“变相军阀”，称之为“奸党”，并且大肆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事实胜于雄辩，两个文献所列举的数字与事实，完全粉碎了这种荒谬绝伦的无耻宣传。

事实证明了：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而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游不击。事实指明：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抗击了日寇二十一个师团，三十五万人，占百分之五十八，国民党仅

仅“抗击”日寇十五个师团，二十五万人，占百分之四十二。共产党抗击了伪军五十六万，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六万。两项共计，共产党抗击了敌伪军九十一万，国民党仅仅“抗击”与牵制敌伪军三十一万。但是国民党拥有三百余万军队，相当好的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则连游击队在内不过五十万，不到国民党的七分之一，装备尤为落后。国民党抗战以来得到盟邦的援助计苏联三万万美元，美国七万四千七百八十万美元，英国一万万一千八百五十万英镑的各种借款；共产党则非特毫无外援，而且国民政府不发八路军新四军一文薪饷、一粒子弹。国民党现在统治的地区（沦陷区不计）尚存十多省，二万万以上人口，共产党则其所有抗日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均在敌后，人口不过二千余万。不仅如此，共产党军队的作战地区，是国民党军队远在五六年就抛弃了的敌占区，那里据点林立，碉堡密布，而自己却无巩固后方，其所以能坚持者，全赖依靠人民，不惜牺牲，进行昼夜不息的战斗；去年一年（抗战第六年）八路军新四军大小战斗计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次之多，每日平均七十五六次。这难道就是“游而不击”么？而国民党军队呢？依凭着战壕工事，依靠着大后方，实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平时全线无战事，发发“无战斗之战报”；敌来则仓惶溃退，纷纷投降，敌去则广发捷报，大肆喧嚷。这当然不是国民党军队将士，贪生怕死，相反，国民党军队中确有许多真诚卫国的热血男儿，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的不游不击政策，以致军心涣散，士气消沉，许多热血男儿，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种事实，早已喧腾于国际论坛，敌寇亦毫不讳言，说国民党军队“已逐渐由抗战向观战转移”。这难道还不是不游不击么？

事实证明：不是共产党是“新式封建”和“变相军阀”，而是

国民党反动派是老式封建和道地军阀。污蔑共产党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的无耻妄人，其所持唯一理由为“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但是问题却在组织什么样的武力，割据甚么人的地方。共产党组织的是抗日的武力，割据的是日寇占领的地方。中国现在不是在抗战吗？既然在抗战，为什么不要组织抗战的武力？中国不是半壁河山已经沦陷了么，不是要收复失地么，为什么不能从敌寇占领地方去“割据”几块抗日根据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不是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说过的么？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敌人而“组织武力”，并从敌人手里“割据地方”，这不是实行“守土卫国之责任”是什么？蒋介石排除异己，敌视人民，既不愿意承认人民组织的抗敌武力为国军，又将行政院三百三十三次会议上已经通过的承认边区的决议不予发表，自己不实行诺言，却来骂边区为“割据”。所有抗日游击队与抗日根据地天天请求蒋介石给予委任，他却死也不委任。他却凭借他自己委任自己的权力（人民是从来没有委任过什么蒋介石的），扩充军队至三百余万，却总共不过牵制了三十一万敌伪军，不游不击，守土无能，抗战不力，卫国无术，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不“组织武力”，那么，九十一万敌伪军又叫谁去抗击？如果共产党不“割据地方”，则非但敌后全部沦亡，再没有招展中华民国国旗的干净土，而且南渡君臣能否偏安巴蜀，不早已成了问题吗？这种“组织武力、割据地方”，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假如没有共产党，假如共产党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不去“组织武力，割据地方”，或者学蒋介石一样，组织庞大武力，割据庞大地方，而守土无能，卫国无术，拥兵自卫，据地自私，抗战不力，遗〔贻〕误国事，那么，中华民国不早已完了么？

蒋介石又称共产党为“封建”，八路军新四军为“军阀”。则试问什么是封建？什么是军阀？以政治表现简单的说，封建是专制独裁，摧残民权；军阀是把持军队，残民以逞。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民主政治，设立了人民普选的参议会和民选政府，贯彻了减租减息，废除了封建奴役，人民有抗日的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政权是三三制的，努力于抗日、生产、教育。军队是志愿募集，用以打击敌人的。试问这是军阀么？这是封建么？国民党呢，在自己统治的区域中，实行一党专政，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新专制主义，实行保甲制度，取消了一切人民应有之自由权利，封建地租，原封不动，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政治是一党政治、特务政治、专制政治。士兵是捆绑来的，军队是用以铲除异己，镇压人民的，对抗战是不游不击的、是完全消极的。试问这不是封建是什么？这不是军阀是什么？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公开宣传孔孟道统、曾胡衣钵，难道不是事实吗？所有事实都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才是封建，才是军阀。而且是祖述孔、孟、秦始皇以至西太后的传统的老式封建，是承袭中国近代军阀开山祖曾国藩、胡林翼以至袁世凯、张宗昌（蒋介石曾当过张宗昌的排长）的衣钵的道地军阀。不过还找来了一批“外国”的法西斯主义，充实一番，中西合璧，造成了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又名新专制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万万取消不得，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大骂共产党为“奸党”“奸军”，想必他们自己是“忠党”“忠军”了？可是问题是在什么是忠，忠于什么？今日之中国，忠奸之界，惟在抗日。抗日者忠，忠于民族。那么，请看事实：国民党以三百余万大军，十六万万美元之

外援，加上全国之财富，仅仅对付日本十五个师团，还是依靠了共产党的助力，依靠了共产党抗击九十一万敌伪军，否则除抗战初期抵了几下之外，恐怕连一个师团也打不了，早已逃之夭夭，变成流亡政府，或者早已降敌，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不信，请看事实：国民党在共产党抗击了九十一万敌伪军这种绝对有利的条件下，它的高级军官仅仅在两年内，投敌叛国者，竟有五十八人之多！国民党中央委员投敌叛国者，自副总裁以下竟有二十余人之多！全国伪军六十二万，绝大多数是由国民党军队变成的；汉奸吴开先堂哉皇哉坐飞机而来，日谍陶希圣居然校阅蒋著《中国之命运》，……凡此一切，都是“忠”么？“忠”到连三十一万敌伪军也打不了，降将如毛，降官如潮，敌探满朝，可谓“忠”也已矣！至于共产党，以仅仅五十万军队，在全无一点接济之下，与九十一万敌伪大军血战，但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指挥员，没有一个投敌的中委，没有一连一排叛变为伪军的军队，没有一个日谍汉奸能在共产党统治区域逍遥法外。……凡此一切，难道是“奸”么？如果是“奸”，那么，这是对昭和天皇东条首相汪精卫委员长的奸，对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奸，但对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解放事业，则是继往开来存亡继绝的大忠大孝，这难道还不清楚么？

虽然如此，我们尚不忍说，国民党人都是奸党，因为在整个国民党中，确还有热血爱国忠实于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人士在；可是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呢，我们却不得不说是准奸党，即近乎汪精卫之党，准备当汉奸之党，因为不仅汪记政府，汪记军队，汪记国民党，均是由这个同一的国民党出身，而且在这个国民党中现在还有人每天由蒋记加入汪记，另有大批人还正在准备着摇身一变，把自己变为张精卫、李精卫。

至于中国共产党呢？那么，事实证明了：（让我们套几句《中国之命运》来作本文的结束吧！）“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国民党与民族主义

——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民国十三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发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新解释民族主义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这是国民党对民族主义最正确的一次真释。我们试取这一尺度，考量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兴中会，上书李鸿章及北京总理衙门，要求清廷改良政治，开发实业，尚无所谓革命主义。十二月，在香港与排满团体辅仁文社合并，正式成立兴中会，开始标明“驱除鞑虏，创立合众国政府”二大宗旨，民族民权主义从此萌芽，中山先生也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一九〇五年，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两团体，组成同盟会，革命势力扩大，终能成就辛亥革命的大功。可是由于中山先生当时的民族主义，内容止限于排满，因而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对鸦

片战争以后，中国新的强大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主观上不仅未曾意识到，而且引以为可信赖的好友，政治上经济上寄以高度的希望。一九〇〇年中山先生致香港总督书，列举“平治章程”六则，其中有请各国公使当中央政府顾问，各国总领事当各省自治政府顾问及“公权利于天下”等条文。民国元年，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政府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之权利”。民国三年，致大隈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之二十一条，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八年，发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欢迎外国广泛投资，实现“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凡此都说明中山先生在与共产主义者合作以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并不合于中国民族革命的实际要求。

正因为如此，所以民国元二年，三民主义止存一个民生主义的名目，民三成立中华革命党，只又添上一个民权主义的名目。但由于民国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中国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在中共及苏联共产党的援助之下，中山先生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最先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任务，旧三民主义就此变成基本上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三民主义。十二年一月一日的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对新的民族主义的初步认识，十三年一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才明白规定民族主义的内容，并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由于国共两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军阀统治等口号上的合作，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在全中国蓬勃的发展了起来，国民党因而获得空前的果实。由此可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国民党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不可能有革命

的民族立场。

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大革命的力量，一到南京，立即投降帝国主义，疯狂地实行清党大屠杀。他们一面投靠帝国主义，一面保存民族的空口号，新三民主义为之扫地无遗。他们所谓“民族主义”，别有谬解。二十三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里，曾说“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为国忘身，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次第收复，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综览一年以来之经过，益使吾人深信民族意识之发扬，足以战胜任何艰难之环境也。”以反共反人民为“发扬民族意识”，确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极端狭隘的偏见。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代替国家民族的利益。所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实际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至上，国民党反动派至上，真正的民族利益自然被看作至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必须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国民党反动派得政以来，一联串祸国殃民的罪行，其总根源就在于此。民族危机愈益加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表现也愈益明显。

国民党反动派奠都南京，首先解决南京惨案，道歉赔偿，表示对帝国主义甘心屈服。十七年蒋介石由南京率军北伐，攻克济南，日寇故意启衅，中国军队立即奉令撤退，忍受极大的侮辱和屠杀，造成“五三”惨案。惨案之血未干，蒋介石转身即进行内战，为了牵制冯玉祥军东出陇海路，反而自动要求日军暂缓撤兵。不久，又秘密承认西原借款，取得余额作内战经费。欧战中，日本夺取青岛，发现袁世凯帝制阴谋，因而敢于提出二十一条；此次日寇既知蒋介石勇于内战，毫无民族道德，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也并不是偶然的。

“九一八”以前，日寇制造万宝山惨案，中村失踪事件，一

步紧一步的试探南京政府的态度。当时以蒋汪为首的南京政府，正在醉心“剿共”，通令东北防军“避免冲突”，这使日寇更无所畏忌了。“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指示张学良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一面电请国联解决东北事件。中国失地，自己不但不收复，而且下令扩大制造，制造了又指望国联“公理之解决”，岂非怪事。二十二年，蒋介石在抚州对中路军训话，最能够代表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东北失守的态度：“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试问这一切疯狂的措施和荒谬的言论，是不是还有些许民族主义的气味呢？

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侵略，极尽“逆来顺受”之能事，而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却又极尽其残杀压迫之能事。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所谓“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实际上，抵抗的对象是人民，安内的对象是抗日先锋中国共产党。为了抵抗人民，不惜勾结日寇，竭力破坏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二十九军、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的英勇抗战。为了抵抗人民，颁布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办法”、“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敦睦邦交令”等等，宗旨不外是：凡宣传抗日者，均为“危害中华民国”，危害中华民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全国革命志士，热血青年，犯救国罪被杀被禁锢，何止数十百万。为了安内，军事统帅蒋介石竟至以死自誓，不剿灭共产党不止，下令剿共部队：“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搬运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赤地千里”的惨祸，铁石人也要下一滴酸泪，国民党反动派却是毫不动心的。为了安内，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国

军事教官专门讲授“剿共”办法，灌输法西斯主义，使大批国民党党员放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义而去盲从最反动的法西斯欺骗，民族思想之斫丧，莫此为甚。国民党当局摧残民族有生力量惟恐不尽，仇共仇人民的心理，发展到不可想象的程度，这是不是还有些许民族主义的气味呢？

再看他们所说的“攘外”。蒋介石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中，公然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现在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他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的问题，这样，他不能在东亚做盟主，也就不能并吞我们中国。”这是何等露骨何等无耻的殖民地奴隶思想！中国被日本占去不要紧，世界各国会来替中国“攘”日本的。在世界各国没有出来打日本以前，“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如果不待时而动，昧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一点也没有！”“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把日本描写到如此可怕的程度，自然不必谈抗战，自然只好让日本夺去东三省热河，自然只好日本要什么给什么，自然只好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及其他出卖祖国的秘密条约，毫不吝惜。反正世界各国会代替中国打日本，“我们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复兴民族”的。把自己的国家认为“公共殖民地”，堕落卑鄙至于此极，是不是还有些许民族主义的气味呢？

“九一八”以后，中国就在这样黑暗混乱的状态中渡过了六

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助长了日寇更大的侵略野心，终于爆发“七七”芦沟桥事变。

中国广大人民抗日的怒潮，愈压抑愈趋于高涨，连国民党军队也卷进去了。双十二事变，证明蒋介石坚决不抵抗、全力剿共的主张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中国共产党本其团结抗日一贯的宗旨，排难解纷，谆谆劝告，西安事件得到和平解决，铺平了抗战的道路。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是真心悔祸的，内战的暗影仍徘徊未去。由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中国人民对国民党的继续施以压力，“七七”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被迫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不少军队在南北各战场上确是表现了可敬的民族精神。殉国将官不乏其人，士兵舍身奋战，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可惜国民党当局不能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墨守旧法，专作阵地战，反对游击战术，又不愿了解中日战争的持久性，企图结集兵力，拼命一战，速战速决。这种战略指导上的失算，增加不少可能避免的牺牲。尤其是不肯发动民众，惟恐人民自动起来参加抗战，〈对〉一些民众团体，不是包办，就是暗派特务，进行破坏。压抑人民抗日积极性，摈之于抗战事业之外，军队不但孤立无助，士气也自然随而低落。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更是包藏祸心，口头讲“精诚团结”，实际却暗派大批内奸，企图瓦解共产党及其军队，以逞其借抗战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对非嫡系军队，经常布置在前线，不给必要的补给，迫其逐渐衰耗溃败，最后竟至取消番号；对嫡系军队，待遇却完全相反，装备给养，兵员补充，无不特别从优，但是不以抗敌，而以抗共抗民抗异己者。这种私心用事的办法，必然削弱抗战的力量，削弱抵抗，也就助长“交涉”的抬头，所以“七七”以来，所谓“和平”

之门从不关闭。战事刚开始，汪精卫再度发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滥调，蒋介石还希望争取“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的和平。开战不久，就接受德大使陶德曼的议和条件，继又赞同借用外力制止中日战争，幻想重演“三国还辽”的故事。这都说明国民党当局被迫抗战，内心主和，如果获得“光荣和平的条件”，国民党反动派放弃抗战，出卖民族，早就成为事实了。

武汉陷落，国府迁都重庆，“和平”声浪，愈益嚣张，并不因汪逆出走，稍减声色，而且因汪逆帮同劝降，更形热闹。“远东慕尼黑”的不断策动，“议和”、“诱降”、“直接谈判”、“间接建议”、“秘密接洽”、“公开调停”等等不祥名词与事实的继续出现，国民党当局动摇恐慌，不可终日的窘相，显然可见。“和”已成为重庆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只在于如何“和”。二十八年二月，路透社发表一个中国官员的谈话：“讨共问题，将成为一争点，此一错综事件，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方法。”这句话的实质就是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中日和议早可以成功。正因国民党反动派急于议“和”，必然着重反共。于是有一套又一套的“溶共”、“防共”、“限共”、“灭共”等阴谋，有枪杀、暗害、活埋、囚禁、迫令自首变节等暴行，有军事攻袭、特务破坏等毒计，每一次的反共高潮，也就是每一次投降的高潮，反共与投降，成为一件事的两方面。由于反共的失败，更进一步的勾结敌伪，协力动作，例如拥兵三百万，主力用在对内，战场上仅仅面对着日寇二十余万人，实行“观战”。降敌将领多至六十人，一般都是“曲线救国论”的信徒，却被国民党当局称为“忠贞不移”，“继续奋斗”。伪政府汉奸头子，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多至二十人，其他党政要人又有二十四人。汪逆伪政权的特务组织，由国民党反动派帮助组成，缔结“反共同盟”，吴开先及各色“劝

降大使”，尤其是最近日寇四次诱降以来，纷纷“脱险”回返重庆，国民党报纸一律予以赞扬欢迎。这些事实，不能不令人怀疑重庆与南京，究有多少区别？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如此方便而又频繁，究竟中间还有多少界限？是否先反共后投降或先投降再反共的“争点”尚待商决？是否今日重庆的问题只在何时全面的公开的正式的投降？如果是这样，我们实在不忍想象，但是政象事实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尤有进者，以中国抗战最高统帅、民主同盟国四大领袖之一的名义为号召的蒋介石，于抗战形势如此危急的今年，发表一本《中国之命运》的著作，其中论点竟俨然与日寇如出一辙。例如日寇要中国停止抗战，《中国之命运》关于抗战与反攻的具体办法就绝对不提一字；日寇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之命运》也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日寇反共，《中国之命运》也郑重地声明二年之中解决内政问题即中共问题；日寇宣称“废除治外法权”及“交还租界”，中国已得独立自由，《中国之命运》也说不平等条约已经取消，对外奋斗之民族主义已成过去。这本书被全中国人民全世界正义人士所反对，只有日寇赞为“方向没有错误”的“名著”。抵抗者在思想上已经与侵略者合流融化，是不是还能有抵抗的行动呢？中国是否还算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民族主义是否还应该存在并发扬？对这些万分严重的问题，《中国之命运》的答案是与中国人民的答案完全相反的。这本书自己宣告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死刑，而民权民生二主义则早已死亡，早已被宣布为不需要或过时，那末国民党到底还有什么“主义”呢？这不是国民党有史以来的大危机么？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历史本来很短，只在改组以后到北伐初期发展过，抗战时期本来应该恢复

了，不幸恢复的很少，破坏的更多得多，正因为抗战时期，故其所造成的罪恶，亦比过去时期更不可饶恕。但是国民党当局至今却仍然毫不觉悟，直到这次十一中全会，还在进行着所谓“民族危机确已渡过”的欺骗宣传。国民党反动派用民族主义的幌子欺骗中国人民到了这一步田地，难道今天还不应该加以揭穿么？

中国之所以能发动抗日大战，而且坚持到今天，将来还要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有反帝反封建的政纲。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才会有国民党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正当“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共中央就提出抗战的意见，以后继续为民族生命痛切呼吁，要求在停止内战、开放民主、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团结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无动于中，进攻更急。二十三年，中共中央领导红军主力经二万五千里艰苦长征，以求迂回曲折地达到抗日前线。但是国民党军队追踪袭击，堵塞抗日道路于前，拒绝中共中央与红军将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再三再四呼吁于后，直到双十二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更表示了伟大英明的政治远见，莫与伦比的民族忠诚，才使一场大风暴得以平安渡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成功，民族的危机得以挽救，而抗战亦才得以实现。

“七七”事变后，军事上政治上中共坚持正确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在全国各地，奋斗不懈。七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合于民族利益与抗战要求的，因此得到了伟大的成功与广大的拥护，而与此相反的主张，得到的则是惨痛的失败与无情的唾弃。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收复广大失地，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敌伪，因

而掩护了正面战场，也掩护了大后方。六年来全军战斗六万三千次，第六周年平均每天作战七十六次，杀伤敌伪军六十三万人，抗击敌军三十五万人，占全部侵华敌军总数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五十六万人，占全部伪军百分之九十。国民党当局不发一枪一弹，反诬为“奸军”“叛军”，而加以袭击、围剿、暗害，甚至不惜与敌伪夹攻。试问国民党三百万大军能不能提出战斗的真实数字与八路军新四军作一比较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绝大部分变了伪军，其在正面的，三年以来据统计只应了九次战，平均五、六个人才能打敌人一个人，而且还不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这是什么原故呢？

共产党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投降的将军或中央委员，而国民党今日的叛将如毛，降官如潮，又是什么缘故呢？敌人称“共产军为皇军之大敌”，要进行“百年圣战”，他敢不敢向共产党说一声“和平”？而相反地为什么他们就毫不疲倦的专对着国民党公开诱降呢？

谁是中华民族忠实的卫上？谁是中国人民光明的救星？谁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真正实行者，事实是最公正的裁判人，在这里需要有虚心的客观的态度，单靠造谣吹牛，招摇撞骗，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坚决站在民族立场上，愿与任何中国人携手，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早已结成血肉相联的关系，有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就可以保证不至于灭亡。反共反人民反民族，三者是一件事，谁反共谁就要被人民驱逐，走上死路。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回想一下，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什么样子？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以后，又是什么样子？你们在抗战以前，对于日寇，不是害怕到以为三天就会亡国

么？国民党获得共产党的合作之后，不是反而抗战已经七年，胜利在望了么？共产党的劝告是应该接受的，共产党的帮助，对国民党是有大利的。两次合作的经验，足够证明这一真理。因此我们对国民党当局寄予唯一的希望，就是必须恢复和改组到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曾接受过的共产党所提出的那个民族主义，依靠民族自身的力量，为民族的独立自主而奋斗。必须放弃以“公共殖民地”自居的卑劣观念。“以苏联的陆军打日本的陆军，以英美的海军打日本的海军，以苏英美的空军打日本的空军，中国则保存实力，坐收成果，只待日苏战争爆发，他们的手就可以空闲起来，可以放手大打共产党”那种妄想如果不放弃，结果只会是悲观失望，结果只会走上叛国投降的死路。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民族主义而造成的“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已经十二周年了！十二年来，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没有悔祸改过，反而一连串演着误国祸国辱国的罪行，甚至有发展到叛国的征兆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摆在我们的眼前，全国人民赶快起来加以制止呵！我们在此还要寄语国民党内真正的中山信徒，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眼看中山手创的国民党要被反动派断送了，还可以隐忍不挽救么？为要证明你们的民族立场，就请你们和人民站到一起来共同为民族效力。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保存它的民族主义的一线生机，也才能保存它自己的一线生机！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 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全边区农民们、工人们、战士们、及一切机关学校的同志们!

我们一百八十五个人，是从边区农村里、工厂里、部队里和机关学校里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代表。我们来到延安开会是为了交换生产经验，互相学习本事，好在明年更大规模地发展边区生产。在开会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那么热烈地招待我们，指导我们，和我们握手，请我们吃饭，把我们看的象自家兄弟姊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实在高兴，实在欢喜。在旧社会里，咱们受苦人是被人看作牛马的，可是现在劳动却变成光荣了。自从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打日本，发展生产，咱们才翻了身，再不受人压迫，还做到丰衣足食，有吃有穿，现在又当了劳动英雄，处处受人尊敬。想想从前，看看现在，咱们怎能不感谢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呢?!咱们怎能不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和各位首长呢?!在大会闭幕的时候，让我们向毛主席、向朱总司令、向高司令、向贺师长、向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们说句心里的话吧：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

在毛主席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底下，今年一年边区的生产可是发展结实了。咱全边区一满开了一百万亩荒地，多打了十六万石细粮，安置了八千户移难民，改造了四千五百个二流子，种了十五万亩棉花，打了六十万驮盐，运输牲口比去年增加了十五六倍，办了许多象南区合作社一样的群众合作社；咱们的部队，一面对敌作战，一面自己生产，结果有的做到了部分自给，有的已经做到完全自给，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咱们的机关、学校也自己努力生产，结果自给了由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七十六。咱们的工厂自己制造了许多日用必需品。这些大家在生产展览会上都是看到了的。咱全边区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作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象这样美满快乐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象这样热火朝天，大家动手的群众生产运动，我们从来没听说有过。这是那里得来的呢？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全边区人民努力劳动的结果。

今年的生产虽是很有成绩，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年年防荒早，夜夜防盗贼”这句俗话。为了应付战争，防备灾旱，我们明年更要加劲生产，更要多打一些粮食。政府提出“耕三余一”的任务，我们号召全边区老百姓加倍努力，做到“耕二余一”，就是说，咱们种两年庄稼，要长余下一年吃的粮食，好来有力量消灭日本鬼子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好来防备跌下年成。

我们在二十天大会商议的结果，觉得要办到这个任务，必须实行毛主席的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必须作到：

第一、普遍发展变工、札工。全边区的农村都要向淳耀县的

白塬村学习；他们把全村七十二户男女老少和牲口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节省出三千个人工和驴工，每家比去年多打了一石粮食。都要向延安的吴家枣园学习；他们把全村十八户的人力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多打了一百二十石粮食。都要向安塞的马家沟学习，他们组织了全村的人力、牲口变工，开荒任务超过一倍。

第二、实行移民政策，增加新的劳动力。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赤水⁽¹⁾的冯云鹏学习；他今年安置了一百七十四户共六百多个难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切困难，建立了十四个自然村。都要向郿县⁽²⁾的徐克瑞、延安的马丕恩学习；徐克瑞一个人从绥德号召了五十多户移民搬到郿县。新来的移民难民都要努力生产，向赤水县的王向富、胡文贵学习，他们移来一年，就作到打粮一二十石，有吃有穿。都要向盐池的高仲和学习，他移来一年，打盐二千五百驮，折合粮食一百三十石，作到丰衣足食。

第三、明年要把全边区的二流子都改造成好人，一面由政府督促，一面由群众劝说。我们号召全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盐池的刘生海学习，他过去是个二流子，没吃没穿，老婆也要离婚，自从前年春上转变之后，努力生产，到现在已经有九个牲口，打了二十多石粮食，被选举为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劳动英雄，并且帮助两个二流子转变过来。

第四、发动能劳动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劳动妇女都向米脂的郭凤英学习，她和男人一样，她能种庄稼，又会纺织。

第五、多开荒地，深耕细作，增修水利，发展副业。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延安的吴满有学习，他今年一家开了三十二垧荒地，多打了四十石粮食。都要向绥德的刘玉厚、刘培润，

安塞的杨朝臣，延安的申长林，曲子的孙万福学习；他们多积粪，多上粪，多种，多锄，溜崖，盘畔，早起晚回，辛勤劳动，多打粮食。都要向志丹的马海旺学习，他自己利用空闲修好二十多亩水地，又推动全村修成六十亩水地。都要向清涧的白德学习，他一个村喂了几百条猪，开了四个粉房，还发展了其他副业。

第六、多种棉花，发动妇女纺线。凡是能种棉花的地方的老百姓，都要多种棉花，都要向吴堡的郭秉仁学习；他今年种了一亩地的棉花，收了四十四斤净花，还收了三斗芝麻，一千斤萝葡、蔓菁，并推动全村平均每家种棉花一亩。全边区的纺织妇女，都要向绥德的刘老太太学习；她除了自己努力纺线之外，还组织了一百八十多户妇女纺线。都要向绥德安锦城学习；他组织了附近六十里内的妇女纺线，一共赚了二百多石米。

第七、办好合作社。全边区的合作社，都要向延安县的刘主任学习；他办的南区合作社，给老百姓谋了几千万元的利益，老百姓人人喜欢。都要向淳耀^[3]的田荣贵学习；他在四个月内从一个乡的合作社发展成一个县的合作社，从一万元股金，发展到八百万元股金，为老百姓谋了许多利益。

第八、组织运输队，多运盐出口。盐是咱们边区的重要的出产，要繁荣边区，就要大量运盐。全边区的运输队，都要向延安县的刘永祥学习；他在南区合作社帮助下，利用公盐代金，组织了七百多条牲口的公私合作运输队，运回食盐一万八千驮。不但省下老百姓去驮盐，而且凡是出公盐代金的人，都能分到很多红利。

第九、我们一面努力发展生产，一面还要节省粮食、储存粮食、多种洋芋，拿洋芋代替粮食，少制酒，小造糖，不要糟

踹粮食，遵守政府法令，不准粮食出口。并要学习关中劳动英雄张清益的办法，到处发起义仓运动，救济困难，防备荒年。

明年我们的部队也要加紧生产：从半自给走到全部自给。我们号召部队中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习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这些劳动英雄们的榜样，一面时刻准备消灭敌人，一面又不放过一点时间努力生产。他们有的一天开三四亩荒地，有的一天挖一百多斤甘草，是我们全体代表最佩服的劳动英雄。我们的工厂里要创造出更多的赵占魁运动者，每个工人都要学习赵占魁、袁光华、李凤莲等劳动英雄，学习他们努力生产，增加成品，爱护工厂，节省原料。使我们边区做到日用必需品的完全自给。我们机关学校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学习黄立德、佟玉新，要和他们一样努力生产，节省公物，使机关学校经济能达到半自给。

我们除了用一切力量和办法加紧生产以外，我们大家还要“夜夜防盗贼”。“盗”就是日本鬼子，就是时时威胁边区准备袭击我们的反动派；“贼”就是汉奸、特务的暗中破坏。我们若是不防备他们，这些“盗贼”会破坏我们的边区，破坏我们劳动的结果，破坏我们幸衣足食幸福快乐的生活，叫我们重新作牛作马。因此我们要训练自卫军，展开防奸运动，人人学放枪，打手榴弹，安地雷，盘查放哨，清查坏人，不让一个破坏分子混在边区。在这里，我们号召全边区的老百姓，都向葭县〔4〕的阎开增学习；他亲自送他儿子去当民兵，为了保卫地方，保护公家工厂，他日夜不睡地查哨侦察，他领导群众破获了特务，捉拿了扰乱边区的反动便衣队。都向米脂的冯光祺学习；他为了保卫边区，自今年四月起就没有在家里睡过觉，他自告奋勇领导着一支自卫军，他曾破获了特务机关和破坏分子准备暴动的阴谋。

他们两位，一方面是努力生产的劳动英雄，一方面又是自卫军和防奸的英雄。每个劳动英雄都要向他们看齐，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他们学习。

我们到会的代表们，都有决心把我们自己住的村乡变成模范村、模范乡。吴满有同志已做出计划，要把他的乡明年创造成模范乡，我们大家一致响应他。我们彼此已经定好互相比赛，看看那一个能争取得到这个最光荣的胜利。我们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学生、机关工作人员都来互相竞赛，看谁在生产运动中走到前边。

现在天下大势正在大变化，日本鬼子快要垮台了，咱们的抗战快要胜利了。可是抗战前途还有许多困难和危险。让我们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明年更加努力，大家组织起来，加紧生产，保卫边区，做到家家户户丰衣足食；来迎接抗战的胜利吧！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1943年12月17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 (1)赤水，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位于淳化、旬邑、耀县之间马家山地区。
- (2)鄜县，旧县名。今陕西省富县。
- (3)淳耀，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位于耀县西北庙湾地区。
- (4)葭县，旧县名。今陕西省佳县。

敌后军民的道路——战斗 与生产结合起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最近敌后开了两个大会。晋西北在一月初举行了劳动英雄大会，晋察冀北岳区在二月中举行了战斗英雄模范大会。这两个大会，各有特点，北岳区的大会，是在整整三个月反“扫荡”大战斗之后举行的，反映战斗情绪更为深刻。这两个大会，又有其共同之点，就是把战争与生产结合起来，把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这个共同之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共同之点指出了方向，即是敌后吴满有运动的方向，也就是敌后军民的方向。这两个大会，指出了敌后军民的道路，因而值得非常重视。

敌后的抗日战争，自从武汉失守，敌寇回师敌后举行残酷“扫荡”以来，其发展过程，是道高一丈，魔高一丈，极其尖锐与残酷。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迫使敌寇不得不停止正面进攻，抽兵回师，企图以“扫荡”来毁灭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百团大战以后，敌人乃施其最残暴的兽性的战法，即所谓“三光政策”，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其直接作战对象，除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力而外，连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亦包括了进去，连吃的粮食、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养的牛羊、用的工具，以至水利、肥料都成为日寇野兽们所要毁灭的对象，

在这种情形之下，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就不得不起而自卫，他们首先学习战斗，涌现了神枪手刘二堂、爆炸手李勇等非凡人物。从前年下半年起，敌后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及发展民兵、发展游击队的政策，于是民兵运动与游击队运动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巨大的开展，表现了非常伟大的力量。应该说，如果没有民兵与游击队以与主力军配合，要对付敌人的“绝灭扫荡”是很困难的，要战胜象敌人对晋察冀北岳区那样的三个月大“扫荡”是不可能的，要想打破敌人的“扫荡”“蚕食”，不但保持抗日根据地，而且把敌人挤出去、扩大根据地，更是不可能的。

从去年一年敌后的战绩来看，民兵与游击队的作用非常伟大。他们的武器，只是地雷、手榴弹、步枪和别的原始武器，但由于它们围绕在主力的周围，得到主力的帮助和教育，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和熟悉敌伪的行动规律，由于他们的爱护祖国保卫家乡的热忱与积极的行动，因而在有些地区，民兵与游击队的战绩是不亚于正规军的。日寇的“三光政策”，已经激发了敌后广大人民起来自卫，起来报复。在血与火的锻炼中，老百姓学会了打仗。

我们手里没有敌后民兵与一般游击队战绩的完善统计。但仅就已经知道的来说，已经是非同小可了。例如山东的人民武装，去年一年中作战八千八百五十二次，毙伤俘敌伪六千八百〇九名；晋察冀某分区，民兵去年一年作战三百六十九次，毙伤俘敌伪三百八十名，炸死敌酋井手大佐；太行民兵去年一年作战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九次，毙伤俘敌伪一千一百三十二名；太行武东一个县的民兵，去年八月一日统计，六周中毙敌伪三百九十名，平均每日十名；晋西北民兵，去年九月份统计，半

年来作战一千二百零八次，毙伤俘敌伪六百六十五名；苏中三分区民兵，去年夏收两个月中，作战三百零八次，毙伤俘敌伪六百七十余名。依此估计，去年一年中敌后民兵与游击队所歼灭的敌伪，必不少于二万人。

就民兵与游击队的活动来说，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他们或则单独作战，或则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春耕时保卫人民春耕，秋收时反对敌人抢粮，并到敌人碉堡脚下去抢收。在敌人进攻时掩护老百姓转移，进攻敌人时则挖毁封锁沟墙，甚至包围敌人据点，打下敌人据点。民兵最使敌人胆战心惊的，就是地雷战，不知道多少鬼子官兵，在民兵的地雷爆炸中丧命，民兵的地雷甚至放到敌人碉堡的门口去。在民兵中出现了无数英雄：晋西北有张初元、徐力强、石连胜、王德兴、崔三娃、赵尚高、段兴玉、薛光钦、郭来子、路五小、李赞森等，民兵英雄殉国的则有李玉儿、阎四虎、曹文平、王贵子、李振英、刘桂元；晋察冀的民兵英雄有李勇、郝秀金（女），已殉国的有安永昌等；山东人民武装代表会所奖励的民兵英雄，有张恒谦、二月（乳名）、孟宪福、任传福、臧西山、栾宗礼、王永双、朱德秀、阎士义、吴继翠（女）、刘曲功、申维法、张三楞、刘麻子、吴敬增、刘震、徐君曾、高春明、杨振城、谢丁方、王明昆、毛守勤等。

敌后人民一方面学习战斗，一方面就渐渐学会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在太行区武乡蟠龙线上，群众发明了“游击生产”的方法，群众说：“在敌人面前要组织才能办事儿”，于是就把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敌人赶一赶，我退一退，你在前面打枪，我种后面的地，你到老巢内去了，我再种前面的”，“握紧锄头，拿紧枪，赶快干一场，田庄战场。”在山东滨海区，民兵展开集

体生产，莒南某村十余户贫民，去春参加民兵后，即集体开荒四十八亩，赣榆青抗先队员二十二名，合力开荒十二亩。晋西北临县等地，组织以民兵为中心的变工队，临县五区某村劳动力参加变工队的占百分之九十，一区某沟参加变工队的劳动力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晋西北民兵英雄劳动英雄张初元，更是劳力与武力结合的范例，他在民兵的组织上来了一个革命。

张初元的民兵组织，是把自然村的民兵，分编在变工组里，变工组组员要住得相近，以便发生敌情时大家好照顾。春耕和锄地时，那一组民兵多，那一组就大一些，耕牛也强一些。打场时，编组以场为中心，按每一场邻近的人数来编。民兵提出不让敌人抢去一条牛的口号，变工组则报以不荒民兵一垧地的行动。早晨天一明，民兵和变工组都吃过饭，变工组便下地务庄稼。每天有一定数量的民兵出去活动。村口山头上也有自卫军的了望哨，若发现敌情，民兵就鸣枪警告，大家就预备，如情况紧张，民兵就都爬山警戒，山下的人们就赶紧把牲口藏起来。张初元把全村的人民这样组织起来后，就解决了很多问题，民兵的地有人耕了，民兵爬山时家中牲畜衣物有人照料了，敌人抢去的粮食前年为五十石，去年只有二石了；省去牛工七百二十个半，人工二千五百三十二个，而且生产搞好了，收成增多了。张初元的出现，是敌后的一件大事，说明敌后人民，不但学会战斗，而且开始学会了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

从前，战斗会妨碍生产，现在战斗与生产能够结合起来了，敌后的民兵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就会更加减少人民在敌寇“三光政策”之下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相当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反过来，敌寇的损失将因民兵的发展而增大，敌寇的掠夺将愈益感到困难。

军队方面，在敌后坚持抗战将近七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武装斗争方面已经学得很好了。无数的战斗英雄象邓世军、安全福那样的范例，应该大大加以提倡，来巩固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并且进一步来发扬它。对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非凡重要的，是补习另外一项工作，这就是生产工作。在去年，太行军队中的生产热潮是很高的，没有这个生产运动，要想克服天灾和敌人的“三光政策”给我们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太行的部队机关，已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举行了生产动员大会，规定今年要保证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菜蔬自给。在其他地区，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也在开展起来。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大会致毛主席和朱彭总副司令致敬电中说：“部队要学习三五九旅，贯彻朱总司令屯田政策。”在其宣言中说：“子弟兵里的战斗英雄和模范，要成为拥政爱民与生产的模范。”这些话，不仅对于晋察冀是对的，对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样是对的。

两个大会指出了敌后军民今后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不论军民双方，都要把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使敌寇的“三光政策”完全归于失败。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 一九四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暨 一九四四年工作基本方针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西北局委员会通过)

甲、前年高干会后，一九四三年是边区工作大进步的一年。高干会所确定的方针和任务，经过一年的努力，基本上已经实现并获得很大的成绩，最显著最主要的成绩是：

一、生产运动发展成为真正广大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在人民生产方面，减租减息、变工扎工、创办合作社，改造二流子，安置移难民，改良农作法，植棉、运盐、水利、妇纺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吴满有运动发展到全边区并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大大地丰富了它的内容，出现了更多的吴满有式的劳动英雄，创造了吴家枣园、白塬村、马家沟式的模范乡村；在自给工业方面，由于工厂整风、防奸、精简及推行赵占魁运动，使各工厂产量空前提高，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日益增多；在部队机关学校生产方面，部队生产成绩最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使一部分部队已能完全自给，大部分部队也可半自给并向完全自给前进。机关学校生产也有新的发展，大部分达到了部分自给，并给以后的发展定下基础，在部队机关和学校生产运动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所有这些生产成绩，不仅使边区党政军民均已达到或走向丰衣足食的道路，而且为政治、军事、文

化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造成许多新的积极因素，使党政军民空前团结，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

二、与生产运动相辅而行的，是整风、审查干部与防奸运动。从整风进入审查干部、又从审查干部发展为社会群众的防奸运动，都获得很大成绩。经过整风相当的克服了党内与无产阶级思想相敌对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过审查干部与防奸运动，严重的打击了日本和国民党瓦解破坏我党的特务政策。二者都大大的教育了干部和党员，同时也大大的教育了广大群众，过去曾经流行党内的自由主义已被粉碎，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达到空前的巩固，党内党外也更加团结。虽然在防奸工作中还发生一些左的偏向，而整风与防奸又都是长期复〈杂〉的斗争，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但去年一年的努力已给了我们丰富的经验，并为我们今后斗争创立了巩固的阵地。

三、去年我们另一个重大成绩就是军事建设。一年来边区部队依据高干会和军政干部会的精神，进行整编、深入整风、发展生产、拥政爱民、练兵习武、巩固部队、都有显著的成绩，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党关系也有很大进步。边区部队基本上已克服了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大大的提高了军事政治质量，改变了过去的面貌，同时地方人民自卫军，经过去年冬天普遍的整理与训练，也有了若干成绩，使正规部队和人民自卫军在保卫边区和建设边区中日益成为坚强的力量。

四、在政权工作方面，去年我们也有很多成绩。政府实行简政、领导人民生产、减租、拥军、防奸、自卫、进行中等教育与司法工作检查，并在这些工作中揭发了和基本上克服了官僚主义以及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旧型正规化，自由主义，对党闹独立性等），使政府更加与人民结合，使新民主主义政治得到更

高度更深入的发展。

五、最后，我们实现了党的领导一元化，基本上克服了对党闹独立性和党政军民互相关系上闹本位主义的现象，使一切组织和政策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大大的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保证了党的各种任务和政策能够在统一步调上进行并获得成绩。这是边区党的建设上的提高和发展。

乙、去年边区工作所以能获得很大成绩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实行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领导方向和领导方法。首先在前年高干会上及其后党政军民各系统由上而下的整风，解决了干部的思想问题，把各种纷歧错杂的错误思想加以清算，并使全体干部觉悟和找到全部工作的中心环子，这个中心环子就是生产；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发展生产是边区现时条件下唯一正确的方向。生产改变一切，它不只是解决我们财经问题的困难，而且产生了许多积极的东西：生产使党政军民丰衣足食，生产造成党政军民团结的物质基础，生产发动和组织了广大群众，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创造了许多新型的模范人民〔物〕；生产更加提高了党在党外人士中的威信，巩固了三三制政权；生产打垮了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使党与群众更加亲密结合；生产还使我们创造了克服困难的雄厚力量，有了保卫边区的物质基础。总之，生产运动已经改变了和改变着边区的面貌。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基本教训。但去年的生产成绩及其他工作成绩，不是在我们开了一个高干会就能完全实现的，而是在高干会及其后继续深入整风，解决了干部思想问题和抓住了工作的中心环子后，我们还接着做了许多具体领导的工作，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深入下层，调查研究，具体布置，随时检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冲破一点影响全局，领导群众又向群众学习，实现了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

号召与具体领导相结合，在这中间提高了群众，也提高了党员干部，使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大为减少，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日益增长；使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的思想倾向和作风大受打击，而群众观点和群众方向在各方面大大加强，使党与群众更加结合。没有这一套具体领导，把高干会“集中起来”的任务“坚持下去”，则去年一年中如此巨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基本教训。一九四四年的工作，必须把这两条继续坚持贯彻下去，将是我们取得更大成绩的基本保证。

丙、但在一九四三年工作中，我们还有不少缺点，甚至还有个别严重的缺点，主要的如：

(一)生产运动虽有很大成绩，但在财政金融方面，却有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使得去年下半年以来财政金融发生经久不停的紊乱现象，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因此就不善于掌握政策。即在生产运动中，部分的也还有缺点如生产的组织性还不够，党政领导不经常和不深入，形式主义和自流主义的毛病还存在等，阻碍生产运动的更大发展。

(二)在审查干部和防奸运动中，由于领导上抓得不紧，和没有很好的掌握党的政策，在许多地方还发生了一些“左”的偏的〔向〕，使防奸运动的继续深入与开展受到阻碍，使某些有关联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三)在军事建设上有些工作也还未能更普遍深入下层和提高到思想上完全自觉的程度，特别是部队政治工作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还没有澈底转变，存在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残余。

(四)在政权工作方面还有官僚主义的残余待继续克服，特别是司法及国民教育方面的旧型正规化(即国民党化)的毛病还

待澈底改正；此外三三制政策的注意与优抗归队工作，去年是很不够的。

(五)在党的领导中还有主观主义及官僚主义的残余，阻碍党领导一元化的贯彻和工作的更加深入。各级领导者在检查自己工作的时候，应当看到我们的成绩，但绝不可为成绩冲昏头脑，绝不可拿自满情绪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相反的应该严格的深刻的检讨自己的缺点，并在今年工作中坚决克服，使工作更向前发展下去。

丁、一九四四年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应当是：

第一个任务是发展生产，在去年生产成绩的基础上更大规模的组织与发展人民及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在组织起来与深耕细作两个基本口号下，人民生产任务要争取耕三余一两年完成，并帮助抗属及退伍军人发展生产建立家务，机关部队生产任务要从部分自给向大部及全部自给发展，并把力行节约和丰衣足食配合起来，以达自卫备荒的目的。同时必须用全力来改善财政金融状况，从扩大税收、力行节约、发展生产、整顿贸易等方面，有计划的解决财政金融问题，实现财经领导一元化，在思想上政策上和组织上澈底加强和改造财政金融机关的工作，并动员全党干部研究和学习如何在经济战线上与敌人做持久复杂的斗争。

第二个任务是军事建设，在军事建设上首先是加强部队工作，部队工作应抓住澈底转变政治工作这个中心环子，继续推行生产、训练、防奸及拥政爱民，更加改善战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巩固部队，更加改善官兵关系及军民关系，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真正实现精兵主义。地方党政在军事建设上的任务，一方面是加强拥军，把优抗归队工作完全做好，使拥军工作经常化和

实际化；另方面对自卫军工作应继续加强，大大的提倡民间革命英雄主义的尚武精神，克服自卫军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等毛病，把自卫军工作与生产防奸拥军等工作密切配合起来，使自卫军成为正规部队保卫边区的有力助手。

第三个任务是继续审查干部和深入防奸运动，应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对去年一年来的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首先要分清是非，务要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把错误作反革命看待，并由此取得经验，然后进入第二步工作，一面对甄别后的坦白分子分别适当处理，一面在更精细更隐〔稳〕重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和展开防奸工作。今年在审查干部及防奸运动中，应切实纠正各种“左”的偏向，使所有干部能精细的研究和掌握毛泽东同志九条原则的指示，将是审查干部及防奸运动胜利展开的保证。

第四个任务是增加干部战士及人民教育，首应加强在职干部教育，高级干部应继续加强对党的历史及理论的学习，中级干部应加强对党的政策学习，低级干部应注重文化学习，干部教育学校应澈底加以改造，国民教育学校，亦应逐渐求得改善，使其完全与边区实际及目前需要相适合，军队中应有计划的加强战士的军事政治教育，人民中应普遍提倡识字教育并充分发挥去年和今年春节期间各种大众文艺形式的社会教育，使与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相适应。以上所述各种教育，都应与去年边区各种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使不论理论的文化的军事的政治的各种教育，都能配合当前的实际运动进行。

第五个任务是在今年工作中还必须提出加强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去年一年是被疏忽了，是不对的。经过去年一年工作，党外已涌现出了更多的积极分子，使更多的人更加倾向我

们，边区党政军应团结这些非党人士在自己的周围，特别是各级政权应注意团结非党人士（一般的说，只要不是坏人，就应团结他，当然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今年下半年应更有计划的召开范围更广大的劳动英雄大会和参议会（同时举行短小精干的高干会）并准备明年全边区的选举运动以巩固与扩大三三制。同时对边区外部的统一战线工作，边区党政军民也应时时注意进行之。

戊、要把上述各项工作做好，就需要有更坚强更统一的党领导，因此在今年工作中必须更加贯彻党领导一元化，必须更进一步加强思想政策领导与实行具体切实的领导，必须更加发扬全党干部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有计划的吸收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到党内来，必须使党与广大群众更加密切结合。不论党政军民系统，不论宣传、组织、防奸各部门，都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完全与上述各项中心任务配合进行，并为这些中心任务的实现做到尽自己所应有的努力，党政军民及党的各部门都必须详细总结去年工作并提出今年工作计划提交西北局讨论，使全党在完全一致的步调上迎接一九四四年的任务。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

(载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解放日报》)

自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后，太行区即认真周密、澈底执行了这一政策，并能根据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及当前具体任务，不断地改进与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从一九四二年到现在，该区已进行了三次简政，且得到了不少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兹特报导于后，以供各地参考。

简政的方针与办法

一九四二年初，晋冀豫边区抗战五年，人力物力消耗极大，财政经济发生着很大的困难，战争日益残酷频仍，各种组织机构许多已不适合于当前战争的要求。为着坚持敌后战争，为着积蓄力量与准备反攻，乃根据中央精简指示提出简政方针，其具体办法：第一，裁汰骈枝机关，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确定政民全体脱离生产工作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第二，纠正头重脚轻，充实下层，提高干部质量，增强工作效率；第三，废除一切繁文缛节，建立简便工作制度，提倡朴实计算与管理的作风；第四，反对浪费，肃清贪污，节省民力。但在五月“扫荡”后，又鉴于组织机构还不够精干，不能适合于当前的“扫荡”新形势，因而又提出二次简政，其方针是进一步的缩小上层机关，足够的充实下层，培养各地区之独立工作能力，其具体办法：第一减少边府专署两级人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加强县

区两级；第二减少边府事务，加强专署县府职权；第三着重改革机构，实施重点是强调适应战争。到四三年一月，又鉴于二次简政后，总数上虽减少了很多，然还有些机关仍比较庞大，各系统强调垂直，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于是又提出第三次简政，其方针是适应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加强区村工作，加强一元化的领导，用各种方法减轻人民负担，密切群众联系，加强对敌斗争。具体办法：第一，大大减缩边府专署两级机构，合并性质相同机关，放弃一些次要工作，抓住中心环节；第二，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第三，抽调大批干部，充实下层，加强薄弱部门及游击区敌占区工作，提倡干部降级使用；第四，保存培养干部，以作今后准备。

机构紧缩与行政区的划分

区村机构的改革，第一次简政是实行大区小村制，村干部大都脱离生产，但在五月反“扫荡”中，实际经验证明，这种制度不适应于残酷的游击战争，因农村战争行动，多以自然村为目标。我们村指挥部，却都放在行政村，干部也都集中于主村，于是战争一来，自然村陷于无领导的状态，行政村也困于孤立而无法坚持，且全行政村，人地辽阔，开会不易，妨碍了民主的发扬，各种问题也不能即时发现与解决。组织重叠，亦助长了官僚主义的作风。因此在第二次简政时，又改变了大区小村制。变更村组织，节省人力，如和顺仪城全村二百户八百人口，村干部就有一百人，且又都不支差，说话人多，做事人少，战时互相推诿，工作无人负责，于是适当的缩小区的范围，争取村干部多不脱离生产，将村政委员会之民教合并，取消除奸委员，设立公安员，财粮仍旧，除大村庄及工作复杂的村庄设各

委员会外，一般只由几个负责人组成村政委员会就可。这样实行的结果，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且便于战争的领导和节省了民力。在三次简政时，因着重领导一元化的加强，区村机构无大变化。

县以上的机构的改革：第一次简政是着重减少人员，组织机构变动不大，第二次是为要再度缩小领导机关，减少日常事务，合并同类部门，于是专署县府民政教育合并了，财政粮食合并了，税务贸易局合并了，建设科取消了，另外为统一战时勤务工作，设立了抗战勤务科，为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中心工作及强化工作上的统一与配合，又成立了办公室。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中心工作之推动力量与对敌斗争。第三次简政是强调一元化的领导，各机构更进一步的调整，边府民政教育合并为第一厅，财政建设及粮食总局合并为第二厅，取消太行卫生处抗院，合并三个中学为联中，专署县府更加强化了办公室，将各科合并为第一、二、三科。这样实行的结果，统一领导加强了，工作也就更为有力了。

在编制区划中所发现的问题是：（一）专署兼县使专署事务增多，削弱对各县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妨害所兼县工作之深入，遗〔贻〕误战争，利少弊多；（二）各科林立固然不好，但只图简单混合为一，而取消了部门工作，特别是合并教育系统，取消建设系统，致对生产与教育工作，受到相当的损失；（三）简政中也未免过大强调一面，如一次简政时片面注意缩减人员，对考虑工作重点以配备干部注意得不够，更重要的是对如何加强区村工作人员分散领导群众游击战争的问题没有想到。二次简政后，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有了改正。如在敌后斗争中山地行政村一般以直径不超过七里至八里为适宜，百户以下者为丙等村，百

户以上者为乙等村，二百户以上者为甲等村，三百户以上者为特等村，村干部一般不宜脱离生产。区的范围，以十五至二十个行政村为适宜，面积一般应以一千到一千五百平方里较恰当，村庄稠密，人口集中地带，其划分当不以此为限。

人员缩减与干部调整

人员的减缩，从总的方面说，简政前如果作为一百，三次简政共减少了原有数将近百分之五十一（这只是政府行政系统的减少比例，如加上各种地方组织，民众团体学校，各种后方机关以及过去制度外之吃公粮与半脱离生产者来计算，减少比例远过于此）。

从各级人员减少之比较来说，是着重减少上层并充实下层，第一次简政从上到下普遍地减少了，区村两级变动较小，县级减少亦较小，专署级较多，边府一级最多，第二第三次简政，主要是减少上层，例如若将第一次简政后的人数与第三次简政后的人数拿来比较，第二第三次简政村级调整了组织，人数无变化，区级在三次简政后，人数有适当的增加，比一次简政后，增百分之四二。县级在三次简政后为百分之一〇三，也比一次简政后增百分之三，专署则比第一次简政后人数又减少百分之五十七，边府又减少百分之六十六。

从干部与杂务人员的比较来说，历次减少是着重杂务人员，例如专署级一次简政后，新编制杂务人员人数，相当于干部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一，到三次简政后为百分之五十；县级一次简政后，杂务人员相当于干部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六，三次简政后为百分之四十。区级一次简政后杂务人员相当于干部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八，三次简政后为百分之三十九。经过历次简政，各

级组科中的杂务人员所占比例已经是很小了。

干部调整的基本原则是精干上层充实下层，因职设人，不因人设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降级使用。以边府的调整为例，派到专署区的，第一次简政时为四十五人，第二次为一六四人，第三次为八十七人，派到各级直属局的，第一次简政时为五十六人，第二次为七十二人，第三次为一三六人，派到学校培养的三十四人。经过历次简政，各级干部比前得到了合理的使用与调整。在调整中曾发生过如下的问题和缺点：第一是本位主义。若干机关和干部只顾自己方便，总想给自己增加或保留一些人员，口头上拥护精简，实际上托故不让调动，或者有因机关合并，将本机关的生产节约所存全部浪费。第二是个人主义。有些人对自己的马匹勤务表示抗拒不让精简，或者表现“要减都减，不减都不减”的平均主义观点，有些被减的人表示悲观消极，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甚至痛哭涕流。也有轻视被减者，未被减的自豪自骄的现象。这些表现，都是说明对精简政策缺乏正确认识，在领导上思想动员也不够深入，对精简下来的人员安置不够迅速，个别不够妥当。因而精简前后，机关呈现混乱，干部情绪动荡。二次简政因着重于机构改革，干部情绪没有多大震荡。到第三次简政时，因已有两次的经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与混乱状态，基本上是克服了，不过还有个别同志无条件的要求到后方学习，或一味企求个人物质享受而想调到工商部门工作，但在总的方面，三次简政是进步的多了，主要的缺点是精简下来的人员没有尽可能的组织到生产里面去。

生 息 民 力

由于人员的减少和机构的紧缩，便大大的节省了经费，也

就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如四三年的公粮征收，比四一年就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三。同时对人民劳动的服役，有了严格的规定，村半脱离生产的干部，每月耗费时间不得超过八天，不脱离生产的干部，每月不得超过五天，群众服役每月不得超过三天。实行的结果，以榆次十个村的统计为例，在简政前每日村公所服务人员为九十六人，简政后则为二十八人，每月共节省民力一千八百个。在支差方面，根据边府拨出牲口的统计，四一年三月到九月，共要六六九二三头，平均每月为八三六六头，四二年三月到九月，共为一二九三头，平均每月为二〇六头，现在是除征收公粮时由群众运送一部外，所有机关部队平时食粮，全由自运。各地岗哨，已由划定边防线制，代替了一般的形式岗哨，且又确定了民兵的冬训制，以求不违农时，更反对民兵只顾活动，不事生产的单纯军事主义。

在另一方面，我们各级人员，不仅大大实行节约，学习与群众同甘苦，吃糠吃菜和吃代食品，且积极的更进一步的实现党中央的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指示。

领导作风的改进

随着简政工作的实施，政府的领导方式与作风，也得到了改进：

第一，是领导一元化的加强，各系统的林立与平分春色的倾向，基本上已经克服了，三权鼎立的思想也相当地纠正了，同类机关合并了，一些次要工作放松了，主要负责干部能多考虑些工作领导问题与抓紧中心工作了。

第二，提高了各级政府独立工作能力，适当扩大了专署县府的权限，划清了各级职责。所以在更频繁的反“扫荡”与反蚕

食斗争中，能够独立工作，粉碎敌人分割封锁与蚕食的阴谋，且上下职权分明，专署县府即可自己解决问题，因而就相当减少了上层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的作风。

第三，提高了领导质量，增大工作效率。就以边府而论，数次简政虽把一倍以上的人员减少，但工作任务并未减轻，且树立了朴实与艰苦的作风，一个人做三个至五个人的工作，同时在注意掌握政策方面也大有进步了。

第四，加强了干部劳动观念。一切自己动手，提倡节约与生产模范。简政后虽然杂务人员很少，但都能愉快的共同劳动、共同生产与做各种勤务工作。

第五，树立了干部群众观点，特别是四三年北局会议后，更强调了深入下层、深入群众，对克服政府中的官僚主义，收到了很大效果。

随着客观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的发展、领导机构的改进，最近重新建立各级政府内建设系统与加强教育工作人员，以及政府的领导方式和作风也是不断的改善着。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

中外记者参观团各位先生：

为应各位要求，并使各位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形起见，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一般介绍。

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敌后战场的情形。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假使某些先生们要求更深入的来了解敌后抗战的实际，我可以在另外的机会再和各位作一个共同研究，现在只做一个极其简单的介绍。我的介绍的范围是：多说现状，少说历史；多说军情，少涉及其他方面。

我的介绍分为四项，即：

- (一)敌后战场的敌情；
- (二)敌后战场的伪情；
- (三)敌后战场的友情；

（四）敌后战场的我情。

现在来说敌后战场的敌情。

我们关于敌情的知识，还不很令人满意；一则敌军变动频繁，二则我们的侦察工作还不是很强的，对于敌军的番号、编制、装备、移动的时日和方向等，不免有某些地方不能做肯定的说法，要先向各位声明一下。

我想把今年三月份的敌情材料，即敌人以一部军队进攻豫湘以前的敌情材料，把那个时候的敌军态势，作为基本态势，加以说明，然后说到尔后的敌情变化。

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每一个战场，又分为几个抗日根据地。这三大敌后战场的敌情是和友军担任的正面战场的敌情互相联系的，故须从整个敌情中分析我军与友军分担抗击的情形。

根据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材料，日寇在华兵力共有三十四四个半师团，约五六〇、〇〇〇人。

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计有九个师团，八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为十四个师团，约二二〇、〇〇〇人。八路军抗击了一一·七五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百分之八十四强；友军仅抗击了三·二五个师团，占百分之十六弱。其分布区如下：计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柴山）^{〔1〕}，分布于大同、归绥^{〔2〕}、灵邱、朔县地区；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待查），河北徐水、定县段平汉沿线及冀中地区；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柳川梯），山东济南、新泰、泰安、寿张^{〔3〕}、邱县、平原、德州、惠民地区；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石井，又汛清水夫），山西榆次、孟县、

阳泉、沁县、长治、晋城地区；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付昌德），北平、天津、古北口、定兴、易县地区；第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林方太郎），河北新乐、邢台段平汉沿线及德石路西段；独立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淇志雄），河北河南交界之沙河、淇县、大名地区；独立第二旅团（旅团长松甫丰一），察哈尔⁽⁴⁾万全、阳泉〔原〕、赤城、怀来及河北涿源地区；独立第三旅团（旅团长小垣），山西忻县、五台、繁峙、宁武地区；独立第七旅团（旅团长吉川），胶济路西段两侧及清河地区；独立第八旅团（旅团长吉本峰太郎），冀东地区；独立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天津、德州段津浦沿线；宫上旅团（番号待查），山东济宁、滕县、临沂、莒县地区。

以上共六个师团，七个独立旅团，全部为八路军所抗击。

此外，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坂西利八郎），开封、滑县、新乡、博爱地区，八路军与友军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义雄），晋南三角地带，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三蒲），山西临汾、沁源、离石、岚县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七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三十。独立第五旅团（旅团长吉田银），胶东半岛，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独立骑兵第一旅团（旅团长津田武二郎），绥远包头、固阳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二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八十；独立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小原一郎），河南山东交界永城、太康、民权、城武⁽⁵⁾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四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六十。

如果要问：你们抗击的百分数怎样得出来的呢？这是根据敌军联队分布态势及其活动范围来计算的。例如第三十七师团共有七个联队（三个步兵联队，四个特种联队），其中有百分之七

十兵力，在风陵渡、运城、垣曲一带与友军隔河对峙；有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在浮山、翼城地区，对付我八路军。但是当着敌人对我太岳区进行季候“扫荡”的时候，那敌人（第三十七师团）所使用的兵力就比百分之三十的数目还要大。

以上是华北敌寇在今年三月以前的基本态势。

在华中敌军，计十六个师团约二六〇、〇〇〇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五十九点五（九·五个师团），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五（六·五个师团）。计第六师团（师团长神田正中），在武汉地区；第六十师团（师团长小林述七），上海、武进间京沪路沿线，及浙江嘉兴、长兴地区；第六十四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三），江苏溧水、溧阳、如皋、阜宁、宝应地区。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新四军所抗击。

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茂），南昌、九江、瑞昌、安义地区，全部为友军所抗击。

以下十二个师团为新四军及友军所共同抗击，计：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豫南信阳，湖北孝感、随县、礼山⁽⁶⁾地区，新四军及友军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鄂西沙市、沙洋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田中之一），南京及安徽合肥、蚌埠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八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二十；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太田），浙江金华、兰谿、东阳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九十；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澄田沫四郎），宜昌、当阳、江陵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四十师团（师团长未详），鄂南咸宁、通山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六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下野一霍），鄂中鍾祥、云梦、沔阳、

潜江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第六十一师团（师团长不详），皖南芜湖、宣城、广德线及芜湖至湖口沿江，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六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川岛），徐州、东海、淮安、砀山⁽⁷⁾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八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二十；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中山崮），湘北岳阳、鄂南蒲圻及沿江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七十师团（师团长西胁充吉），杭甬铁路沿线，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四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六十；第一百一十六师团（师团长和尔吉隆），武昌鄂城间沿江两岸，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

华南敌军约有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八〇、〇〇〇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约抗击了一个师团，占百分之二十二；友军抗击三个半师团，占百分之七十八。计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地）之一个旅团及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在滇西腾冲地区；独立第十九旅团（旅团长松井贯一），在粤东潮汕地区；独立第二十二旅团（旅团长宋山），在雷州半岛；以上二个半师团，全部为友军抗击。以下两个师团，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友军共同抗击，计：五十七师团（师团长中野莫光），广九沿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百分之七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三十。第一百零四师团（师团长菰田彦一），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此外尚有海南岛的全部敌人，均为共产党所抗击，未计算在内，因为电讯中断，目前敌军数目不明，估计有一个旅团。

以上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国共两党军队抗敌的具体情形。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

十五点五。

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以来，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兵力，向中国正面战场进攻。依现有材料来看，敌寇新增侵华兵力，已知番号者有十个师团，或者尚有一部分今天还不知番号的，总之至多不过十几个师团。同时，原来在华作战总兵力三十四个半师团中，三月后调往南洋一个师团（三十五师团）。因之，目前在华总兵力为四十三个半师团（滇西一个半师团在内），或者略多一些。

此次在中国新增加的已知番号的十个师团中，有四个半师团参加正面作战，即是：第二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九师团，坦克师团，坦克旅团；有五个半师团在敌后填防，即是：第四师团，第十三旅团，第十五旅团，新编第十师团，特务旅团（旅团长福冰），申板旅团，在石家庄的某师团，铃木旅团，山本源旅团。

在这一期间，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同时有调动，如第一一〇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共抽三个师团，移到正面战场。

但是，敌寇在华北所抽出的三个师团的兵力中，其第一一〇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在已为新编师团所接替；独立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现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旅团原在晋南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其原第六十九师团临汾、汾阳等地防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及特务旅团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似已调南洋），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地区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这一地带的机动兵力并未减少，而仍保有一个机动旅团（第十五旅团——驻阳泉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

岚峰所接替。

由此可见，敌寇在华北敌后战场，虽然抽走了一批兵力，但其防务同时又为新的兵团所接替。这决不是如外间某些人上所揣测的说是华北敌军抽调以后，已成一空地似的。那里担负在共产党八路军背上的兵力，仍和原来的情况相同。

应该指出：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前，日寇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寇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残酷的进攻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只有几次战役性的进攻，并无战略性的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时间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个政策，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战局所以失败的原因。此种情况，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变，使正面战场能够配合敌后战场的作战，而结束过去的那种完全不相配合的局面。

关于敌情的介绍，大致就是如此。

现在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伪情。

这里，我先要感到惭愧，因为中国七年抗战，一面是全国绝大多数军民在庄严神圣的抗战与牺牲，一面又有一部分人，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人，卑鄙无耻的投降与作伪，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耻辱，必须予以洗雪。可是今天的伪军在敌后战场已有七十八万之多（伪警察、伪民团还不在于内），成为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一个大敌。所以值得介绍一下。

中国伪军在一九三三年冬长城抗战的时候，就有所谓李守信、王英两部伪军（李守信是国民党骑兵第九旅的团长，王英是绥西地方武装），这是抗战以前的老伪军，现约二万人。

抗战初期，平津沦陷，齐燮元起来组织靖安自治军，当时仅四个连，到一九三八年发展到五个团，直到现在，有十二个集团军，辖三十六个步兵团，共约六万余人。

自汪精卫投降以后，华中伪军开始大发展，如李长江、杨仲华两部四万国民党军队，改变旗帜，整个投降。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

中国有这样多的伪军，各位也许会惊讶起来，可是这完全是事实。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会有这么多的军队投降？原因当然是可以找到的。在找原因时，或者有人要说：一九四二年那时候的形势，有：

（1）日本在南洋正在得势；

（2）苏德战场的红军还未转入进攻；

（3）日本对华采用所谓“新政策”，因为日本正有事于南洋，感觉兵力不足，乃强化汪政权代管敌后，又提倡南北合流及渝宁合流等口号。

是的，这些确是那时的情形，但是这些并不能作为大批中国军队投降的真正原因。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

我们认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不团结、不民主与赏罚颠倒，对全国军民投下一个巨大的暗影，动摇了颇大一部分军民的胜利信心。如果不指出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在敌后，同样困难，共产党能够支持，绝无叛军，国民党则不能支持，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叛军。

关于我们政府与我们统帅部赏罚颠倒一事，只要指出一件事就明白了：山西的决死队和华中的新四军，自始至终是英勇

抗战的，但是这两部分军队，却曾被我们的统帅部在派遣大军袭击，并杀死与俘去成万的官兵，又下令通缉与审判其首长，以后便宣布他们为“叛军”；但是，国民党军队真正叛变了几十万，将级军官达六十七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如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夏楚中、公秉藩、陈孝强、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我们的政府及统帅部却不审判，不讨伐，不宣布为叛军，反而和他们勾结，给予任务，要他们去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游击队。请你们看看，这是怎样一种颠倒过来的赏罚呵！抗日者有罪，叛国者无罚，请问怎能振奋士气，又怎能叫人心服呢？

一九四三年冬，汪逆宣布南北伪军统一指挥。将全国伪军重新编制，并加以整练。经过此次编整以后，全国伪军有了比较完整的系统。

总的说来，全国伪军可分为伪正规军及伪地方军。伪正规军的数量约有三十八万多，伪地方军约有四十万，共计全国伪军约有七十八万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国民党军队投敌的，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此外尚有许多伪民团、警察，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一并计入，当达九十万以上。

这许多伪军在敌后起了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许多伪军为敌人负担了什么任务呢？大概说来是：

- (1) 配合“扫荡”；
- (2) 守备据点；
- (3) 进行清乡；
- (4) 补充缺额。

前三项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一项，例如敌第三十七师团自

一九四三年春季以来，补充三批伪军：第一批三百余人；第二批由石家庄补充来一、五〇〇人；第三批由介休补充三千人。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对付共产党的。

你们看，昔日的“友军”，现在倒转枪头打自己的同胞了。

根据我们对敌伪斗争的经验，证明由国民党投降的伪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是特别坚决的。例如孙良诚在冀鲁豫，庞炳勋在豫北，吴化文在山东，都是明证。伪军中有许多人是继续受了我们统帅部的命令，加紧进攻共产党的。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就有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人员经常联络，授与反共命令。而庞炳勋在投降敌人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布于世以后，我们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先生，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赞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因此敌后伪军的大量增加，对我们坚持敌后战场及准备反攻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今天特别需要把敌后伪军情形，作一个简单介绍，唤起大家注意。

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所有伪军，几乎全部都压在共产党身上，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只有极少数伪军，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例如在南昌附近及杭州附近之伪军，不应算入中共抗击的范围之内，但是也不能算入国民党抗击的范围之内，因为国民党是不打伪

军的。

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之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三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向河南、湖南、广东的正面战场进攻，两党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个变化。但增至这三省举行进攻的部队，最多不过十几个师团，这个变化，也不算很大。

至若敌后战场以及一部分正面战场的友军和我军的关系，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磨擦。曾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只有一九四三年七月间的一次（胡宗南将军调动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因为中外舆论干涉，未爆发战争；其余两次，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使用的兵力均近十万。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在山西进攻决死队（阎锡山长官所属的部队，亦称新军）与在太行山进攻八路军。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安徽进攻新四军。此外，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军事磨擦，则从未间断过。即如目前山西的中条山（阎锡山长官所部），湖北的鄂东、鄂西、鄂南，安徽的皖中、皖东、皖南，浙江的东面，广东的广九沿线（以上均国民党所部），我们的友军无日不在剿共战争中。这种抗日战争中的国内战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四年半（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算起）。我们曾在自卫斗争中，获得了我们各级统帅部及国民党的成千件的反共或剿共的命令训令。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把这些文件公布于世，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期待我们的友党友军自动地改变态度，停止国内战争，改善

国共关系的心理。尽人皆知，不停止一切国内战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国要配合盟国反攻日寇，是异常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至于正面战场友军之所以大部分丧失战斗力与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示束手无策，例如蒋鼎文将军、汤恩伯将军与胡宗南将军的数十万军队，在河南不超过七万敌人的进攻面前，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其原因，完全在于政治上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共产党，外交上依赖友邦作战与依赖友邦接济，而全不振奋精神，自己动手之故。我们的友党——国民党的方针，拿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今天还在敌后的，只有三部分地方性的军队，他们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阎锡山长官在三个月前才由晋西南派到晋东南去进攻决死队与八路军的第六十一军，这三部分总共不过二万至三万人。

最后，要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在陕北会合时，计有官兵八万人⁽⁸⁾。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乃奉统帅部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只承认四万五千人，

发表了三个师的番号(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即开赴华北参加抗战。

新四军的前身,也是国内战争时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奉统帅部命令,集中于皖南、江北两地,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辖四个支队,计有一万二千人,在华中参加抗战。

华南的中共部队,一部分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改编的(海南岛),一部分是抗战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组成的(广州附近)。

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他们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民主抗日根据地,每一由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土,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在中国境内,只有这一种政府是真正合法的,因为它们是由人民选举,不是由党派委任的)、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其特点就是密切的依靠人民,军队与人民痛痒相关,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向着敌伪展开进攻与防御的猛烈战斗。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他们能够战胜敌伪无数次的进攻,在毫无接济困难万分的条件下,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战场至七年之久。

大体说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期间,日本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以其主力向正面进攻,而以第二等力量在敌后打击共产党。但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中共在敌后战场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日本人就改变了他的战争政策,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

进攻共产党。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这种进攻达到非常残酷的程度，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政策都是这个期间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我们的军队缩小了，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一九四三年以来，敌人进攻的残酷虽仍是有加无已，但是我党、我军及敌后人民，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等），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因此，一九四三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了，军队又有四十七万，民兵有了二百余万，根据地又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六百万，并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经担负抗击敌伪兵力六分之五以上，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象的困苦艰难，然而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也不曾压倒我们。

中共七年来的抗战史，几个钟头是说不完的。现在把七年来我军作战的几种重要统计分别的说一说。

以下是八路军各周年的战绩统计：（见表一）〔9〕

从这一统计表看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其战斗次数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这是第一。

第二、是对敌军作战，毙伤数字较大，而俘虏数字较小；对伪军作战，则俘虏较多，毙伤较少。

第三、可以看出日军投诚的事，在抗战最初两年是没有的，第三周年以后，则逐渐增加，可见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是收到了效果的。

第四、就敌伪与我伤亡比较的变迁来看，中间虽有波动，但自一九四二年以后，我军经过精简整训，战斗力比战争初期是大

大提高了，由三比一进至五比一了。

第五、从缴获敌军的武器数字来看，可以看到我军在第五周年度（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四二年上半年），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就是说，战斗次数很多，而缴获率则比第四周年减少了。

在华中方面的新四军，他们七年抗战的经过情形，大体上与八路军差不多。

下面就是新四军七年来各周年的战绩表：（见表二）

在毙伤敌人的项下应当特别指出：中共抗战七年来击毙日军之将校，根据极不完整的统计材料，计有五十五名，其中有日军中将一名，少将八名，大佐十九名，中佐二十名，少佐七名。

关于缴获武器方面，也应当指出：若将八路军、新四军所缴获的长短枪总计起来，则我军七年抗战的结果，缴获了长短枪三十二万枝以上（其中一部分是日军的，大部分是伪军的）。若按照我军人与枪的比例为五比三计算起来，光是长短枪就可以武装五十四万多人，缴获轻重机关枪及大小炮，还不算在内。但是这些武器有一部分是残破不全不能再用的。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武器来源有三：一是原有的；二是缴获敌伪的；三是民间武装，由人民自动组成游击队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但是我军武器弹药依然非常不够，国民政府从抗战开始即不给以必需的接济，一九四一年以后，更无只枪颗弹文钱粒米之接济，希望同盟国设法给以援助，以利配合作战。我们军队因缺乏优良武器，缺乏子弹，缺乏医药设备，而无辜死亡的人数是非常之多的。

敌后七年抗战的经验还证明，如果不组织民兵，武装民兵，训练民兵，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则敌后的长期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表一

项目	第一周年 1937.9至 38.5		第二周年 1938.6至 39.5		第三周年 1939.6至 40.5		第四周年 1940.6至 41.5		第五周年 1941.6至 42.5		第六周年 1942.6至 43.5		第七周年 1943.6至 44.5		总计
	数	目	数	目	数	目	数	目	数	目	数	目	数	目	
大小战斗(次)	638		2,051		6,936		6,152		12,221		22,735		23,327		74,060
毙伤敌军	34,007		31,083		64,355		50,257		50,306		55,673		65,432		351,113
毙伤伪军	3,704		15,430		23,475		21,581		33,526		62,405		79,831		239,952
俘日军	124		385		689		326		284		296		303		2,407
俘伪军	2,094		7,521		15,338		15,355		17,914		31,161		59,343		148,726
日军投诚					19		12		16		23		45		115
伪军反正	1,366		17,935		9,180		5,178		4,306		4,728		6,948		49,641
缴获主要武器	长短枪	6,699	14,569	37,666	24,017	16,858	38,542	50,677	189,028						
	轻重机枪	192	291	651	519	362	479	626	3,120						
	各种炮	25	61	119	104	29	46	105	489						
我伤	负伤指战员	8,107	31,031	32,175	38,384	40,813	18,107	17,976	186,593						
军亡	阵亡指战员	4,432	15,048	17,012	21,348	23,034	11,378	10,934	103,186						
敌伪与我伤亡比较		3:1	1:1	1.8:1	1.2:1	1.3:1	4:1	5:1	2:1						

注：我阵亡指战员总数中，阵亡团以上干部四〇九名。

表二

项 目	周 年							总 计
	第一周年至 第四周年 1938.5至1941.5	第五周年 1941.6至1942.5	第六周年 1942.6至1943.5	第七周年 1943.6至1944.5				
大小战斗	4,967	2,427	4,822	5,318				17,534
毙伤敌伪	124,252	24,512	39,879	53,107				241,750
俘虏敌伪	5,392	5,458	9,923	13,642				34,415
敌伪投诚反正		4,825	7,921	11,320				24,066
缴获主要武器	48,048	13,870	28,574	33,967				124,459
	1,644	301	330	376				2,651
各种炮	60	8	12	20				100
负伤指战员	36,637	10,856	8,412	9,015				64,920
阵亡指战员	22,448	6,745	7,617	8,058				44,868
敌伪与我伤亡比较	2.1:1	1.4:1	2.5:1	3.1:1				2.2:1

注：我军阵亡指战员总数中，阵亡团以上干部一四六名。

我军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的各根据地上，对民兵的建设，曾用了很大的力量，到今天止，我们敌后的民兵已有二百多万。除华南尚无统计外，华北、华中的民兵分布如下表：（见表三）

民兵以外，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及游击部队，是逐年增加的。广大敌后战场，受日寇压迫的人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残酷的战争，他们开始组成游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及新四军，又复组成新的游击队。所以敌后战场的军制，是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三者的互相配合。有了这三者的互相配合，如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摧毁我们。我们的友党，不愿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及游击队，单靠正规军作战，纪律又很坏，如鱼失水，如鸟失气，所以不能胜敌。兹将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发展情形列表如下：（见表四）

表 三

华 北		华 中	
晋察冀	630,000	苏 中	130,000
晋冀豫	320,000	淮 南	55,000
		苏 北	85,000
冀鲁豫	80,000	淮 北	70,000
山 东	500,000	鄂豫皖	150,000
		苏 南	25,000
晋 绥	50,000	皖 中	25,000
合 计	1,580,000	浙 东	10,000
		合 计	550,000
总 计	2,130,000		

表 四

年 代	八 路 军	新 四 军	合 计
一九三七年	80,000	12,000	92,000
一九三八年	156,700	25,000	181,700
一九三九年	270,000	50,000	320,000
一九四〇年	400,000	100,000	500,000
一九四一年	305,000	135,000	440,000
一九四二年	340,000	110,960	450,960
一九四三年	339,000	125,892	464,892
一九四四年	320,800	153,676	474,476

(正规军游击队均在內)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我军在一九四〇年曾达到五十万，但在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减少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又向上涨，至今保持四十七万多，特别是战斗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敌人打出去，并配合同盟国反攻日寇，八路军新四军还应该壮大。一部分国民党朋友把我们这种壮大抗战军队，诬称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讲这种话，实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现。现在应该不是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设起种种方法去阻止它发展，而是极力扶植它，接济它，壮大它，使它更能担负配合盟军作战，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着正面战场发生严重危机的今天，每一个具有充分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有这种要求的。

我们的战绩表上，已指出七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与日军投诚

的数目。八路军二、五二二名（这中间包括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冀东游击部队——包森支队在遵化地区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员六人），新四军五〇〇多名。关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我们的政策是：（一）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统帅部处置；（三）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

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们以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的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疲倦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

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年有增加。日军中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决不是偶然的事。这一件工作，即所谓敌军工作，我们的日本战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领袖冈野进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日军俘虏除大部分送回日军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虏数目：

一九三九年		一四人
一九四〇年		三人
一九四一年		三人
一九四二年		〇
一九四三年	第一次	一三人
	第二次	一〇人
合 计		四二人

又由太行送往大后方去的数目，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八人。此外，新四军在抗战头三年亦送往大后方若干人，尚未计算在内。

现在留在华北、华中我军内的俘虏数目(其中大部分现在是日人解放联盟盟员)如下表:

地 区	日人总数	其中盟员数	
延 安	七六人	七五人	
晋西北	七人	七人	
晋察冀	晋察冀	二〇人	一六人
	冀 中	九人	七人
冀鲁豫	冀 南	一七人	一五人
	冀鲁豫	一五人	一三人
晋冀豫	太 行	三六人	二九人
	太 岳	一四人	一一人
山 东	滨 海	一九人	一五人
	鲁 中	一一人	九人
	鲁 南	八人	七人
	清 河	八人	六人
	胶 东	一六人	一三人
以上华北合计:	二五六人	二二三人	
华 中 (新四军)			
四 处	六六人	六六人	
以上华北、华中总计:	三三二人	二八九人	

应当特别指出:在这些盟员中,有原在日军的军医中尉山田一郎,现在晋东南我军中做医务工作;原在日军的步兵少尉山光美,现在我军中任步兵炮教员;另有中岛透江荣甫,在我军中任技术教员。他们均积极负责,热心工作。

我们很惭愧,由于我军的装备低劣,接济毫无,未能更多的俘虏敌人。但是我们拥有三百万大军,又得到盟邦大量金钱武器接济的友党,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俘虏敌人的数目,不管我

们的统帅部如何夸大其词，实际上是比我们要少的，这可以将现存的俘虏一个一个去点验。他们没有敌军工作，更没有将俘虏送回去的事。他们缴获敌军枪炮的数目少于我们，俘虏敌军的数目也少于我们，教育俘虏变成反对敌人的斗士，则实际上完全没有。即如此次河南作战，以四十万大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三部分军队在河南境内者，再加五战区派至豫南增援的一部军队）对付七万日军，作战两个月（自四月十七日算起），据我们所知，不但一个俘虏兵、一枝枪、一门炮也没有缴获，反而丧地四十余县，丧军近三十万（其中大部分溃散，一部分被俘），大部分枪械被丢弃（据传仅是步枪就有十五万枝以上，其中有许多是友邦援助的），全部第一战区的粮、弹、枪、炮存储丢光。但是有些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专做所谓“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事。请你们看看，究竟谁人不打日本人，谁人破坏了抗战，危害了国家呢？

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和伤将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〇九名，新四军一四六名。

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下面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牺牲于战争中者：

职 别	姓 名	籍 贯
医 生	诺尔曼·白求恩	加拿大
同	柯棣华	印 度
太 平 洋 学 会	希 伯	德 国
在 华 日 人 反 战 同 盟 盟 员	寺 泽 吉 藏	日 本
同	令 野 (名 不 详)	同
同	安 藤 清	日 本 秋 蒲 县

同	浅野清	形山县
同	黑田嗣	埼玉县
同	铃木(名不详)	兵库县
同	松野觉	广岛县
同	大野静夫	长野县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孙一峰	朝鲜平安道
同	王贤淳	同
同	韩清道	忠清道
同	朴吉东	京畿道
同	石正	广尚道
同	陈光华	平安道
同	胡维伯	广尚道
同	金学武	咸镜道
同	金巴伦	平安道
同	文明哲	全罗道
同	韩乐山	忠清道
同	崔指南	平安道
同	李镛寅	同
同	金永信	同
同	吴均	江原道
同	林平	忠清道
同	韩震	金畿道
同	金明华	平安道

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许多援助，我全体军民是感奋不尽的。

在武器方面：我盟国帮助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在抗战初期，统帅部曾经发给过我们一二〇挺轻机枪，六门反坦克小炮，据说是苏联的军火，可是除此以外，我们未曾得到

统帅部的任何武器接济。弹药接济也自一九四〇年停止了。

在医药及器材方面：我们前后得到不少盟国团体及友人捐来的医药器材，可是还有一〇一箱药品被国民党扣在三原，至今没有收到。这两年幸有中国保卫大同盟捐来一些药品器材（其数目分配另有清单），虽然距我们需要很远，但我们很感谢盟邦朋友的援助和孙夫人领导的“中保”的热心和关切。

在运输方面，八路军前后收到摩托卡车一辆，救护车四辆，载重车四辆。新四军因原来军部在皖南，于一九四一年一月被统帅部派兵围攻，军长叶挺被俘，文件被劫，该军所得国际援助数目，已不明白。

在人力方面：我军得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六人，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奥国的夫赖大夫、罗生特大夫，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英国的林迈可教授，班威廉教授，德国的记者希伯及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至于日本友人冈野进同志及其统率下的大批日本干部，则对于我军进行瓦解敌军及号召日本侨民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其成绩非常之大。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同志以下的大批人员，在这方面，也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情形，当抗战初期，为了保卫黄河北段数百里的河防，巩固西北后方，曾经统帅部批准留下一部分部队在边区，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指挥这些部队。到抗战中期，敌后根据地逐渐被分割，大兵团集中作战，已极困难，为适应战争形势与减轻人民负担，我军曾进行了一次精兵简政。许多精简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在敌后转入生产，一部分调来边区学习，或参加部队，或参加生产。尔后国内政治情况一天一天更坏，边区被包围封锁更厉害，内战危机经过三次的大紧张，陕甘宁边区为

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我们是必须保卫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调了一部分军队（如王震旅）来边区。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作用，就是保卫河防与保卫被胡宗南将军五十万大军包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然至今天为止，边区军队的数目不超过五万人。拿胡宗南将军和我们比较，是十个与一个的比例。现在敌军进攻河南，迫近陕西，我们的这点留守部队，除河防守兵及治安保卫外，很愿意和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一同开赴豫陕前线去打敌人。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的统帅部允许边区的几万军队，开上豫陕前线，并给我们以充分发动民众配合作战的权力，而无友军友党从旁牵制、反对、袭击或截断后路的情事发生，是有把握停止敌人进攻，并把失地收复回来的。

现在说一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这是敌后坚持抗战的基本问题。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一面和敌人作浴血的战斗，一面又和根据地的人民一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亦即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包含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只说一说敌后各根据地的轮廓。

华北敌后战场，我们建立了几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东至青岛与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山海关和锦州，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西至黄河，南至陇海线，包括华北七省（晋、冀、察、鲁、绥、热、辽），东西长二千二百华里，南北长一千八百华里。有政令所及的人民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一万万人口百分之五十一，其中有组织的群众一千

六百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一百五十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在这个区域内，共有五个大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内，又有几个至十几个小军区，我们名曰军分区。

华中敌后战场，我们的新四军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鄂、豫、湘六省地区。包含政令所及的人口三千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百分之五十；有组织的民众九百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五十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一·七。在这个区域内，共有八个军区，即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皖中军区，鄂豫皖军区，苏南军区，浙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又各有几个小军区，同华北一样的。

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一在海南岛，该处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根据地，抗战后改为该地抗日军，领导者为冯白驹同志，国民党部队早已撤退，该岛完全是我军与敌军斗争着。近年因电讯中断，详情不明，然从敌军消息方面，得知该岛大部为我军收复，敌人无可奈何。一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四周，领导者曾生同志。该部现已迫近九龙，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敌人很感头痛。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象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如果没有这些敌后战场的英勇斗争，中国的情形是不能设想的。日寇欲以华北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欲在华中、华南搜括人力与资财，这一目的是被中共七年来坚决的、广泛的斗争基本上打塌了，在人力、棉花、煤铁与粮

食的搜括上，敌人受到我军的很大打击。这件工作，不但对于中国有利，对于我们共同作战的盟邦，也是有利的。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却被国民党统治人士诬之为“奸党”、“奸军”、“奸区”，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派遣军队进行攻击、包围与封锁，派遣成千的特务进行破坏工作，断绝一切接济，并遮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不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明白真相。所有这一切，实在是不利于抗战与不利于团结的。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出来。

关于中共抗战情况的一般介绍，今天就很简略地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所以战胜日寇的政治方针，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军队训练，经济工作，后方勤务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内容丰富，有许多适合情况出奇制胜的创造，连日本人都说“达到神奇的境地”，但不是短时所能尽述，只好待之另外的机会。

根据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柴山，是第26师团前任师团长，1943年2月已改由佐伯文郎接任。本文以下所列日军番号、师团长、旅团长及其分布地区亦有不准确处，未一一订正。

〔2〕归绥，旧县名。1948年设市。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3〕寿张，旧县名。位山东省西部，黄河北岸。辖区分别划归阳谷县和河南省范县。

- 〔4〕察哈尔，旧省名。辖区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 〔5〕城武，旧县名。今山东省成武县。
- 〔6〕礼山，旧县名。今湖北省大悟县。
- 〔7〕砀山，县名。今属安徽省。
- 〔8〕八万人，指三大主力会师时除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外的所有红军部队的总数。包括会师时的三大主力和西路军、十五军团、地方部队、学校、后方人员及陕南红军。
- 〔9〕本文中的“（见表×）”和表头的“表×”均为编者加的。

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 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纪念抗战七周年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保卫祖国的神圣抗战已经七年了。

抗战第八年的开始，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的。这便是：

第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第二战场开辟了，美英加盟军在法国北部进行着艰苦的胜利的战斗，在西欧大陆上盟军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前进阵地，跟着时间的进展，这一战场的规模将日益宏伟，战斗的性质将日趋激烈。苏联红军在东线上的夏季攻势则以空前的规模与兵力发动了，希特勒在东线的所谓“祖国防线”几天内便被粉碎无遗，红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力向西方猛进，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把战争的舞台推进到法西斯德国的本土内去。在南线，盟军正在意大利继续北进，铁托元帅率领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燃起了巴尔干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希腊与法国的游击队正在步随他的后尘。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希特勒的大战开始了，受伤的法西斯野兽在其巢穴中被消灭的日子迫近了，这日子不在今冬，便在明春。

第二，反法西斯联合国——首先是美苏英——团结和合作的更加巩固与亲密。有历史意义的德黑兰会议，不仅决定了三大盟国在消灭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战争中亲密合作，而且决定了胜

利之后的团结合作以建立长期和平的国际关系。战争中的合作，现在已经进一步的体现在第二战场开辟与红军夏季大攻势的互相配合中，这种合作已经进到直接的军事的密切配合的阶段了；而战争中合作的增涨，战友之谊的生长，将必然会促进战后的长期合作。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逼近，而且也可以看到，战后以美苏英为首的团结合作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世界，正在逐步成长了。

第三，太平洋上美国对日反攻的开始。一年内，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已经得到了巨大的进展。据不完备的统计，在最近八个月中（从去年十月起），美国在太平洋上前进了三千六百公里，击毙敌军七万九千人（内有继山本之后任敌联合舰队总司令的古贺），击沉敌舰一千二百余艘，击毁敌机四千二百余架，现在敌寇自诩为“太平洋长城”的外防线，早已为美军所突破，即其内防线，亦因美军在塞班岛的胜利登陆而被打入了一个楔子，日本本土现在被置于盟机的轰炸圈内了。印缅前线，日寇蠢动非特毫无所获，且因孟拱、加迈的克复，雷多公路与滇缅公路之接通已不在远了。在这里，是中美英三国合作的结果。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虽然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在盟军面前虽还有许多艰苦的考验和残酷的战斗，但是以美国海空军的巨大优势和旺盛士气，实现尼米兹将军打到中国海岸的豪语的时期，决不会太辽远的了。在希特勒覆亡之后，日本法西斯决没有多少长期单独苟延残喘的可能。

总之，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法西斯强盗的胜利已经逼近了，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世界快要来临了！当前的国际环境是极端有利于我们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

但是无论国际环境如何有利，在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依然是

要靠我们以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依赖有利的国际环境，幻想盟国替我们打日本，袖手观战，保存实力，坐享胜利之果实，这不仅是无出息的妄念，而且是不可能的幻想，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决战场所是中国大陆，最后决胜力量是陆军，不把日本陆军歼灭，就没有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不把日本军队完全驱逐出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真正解放，不仅中国大陆是进攻日本的基地，而且中国陆军是击溃日寇的必不可少的力量，没有强大的有战斗力的中国和中国军队，决不能最后战胜日寇。正因为这样，迅速发展着的有利的国际形势，非特没有减轻我们的负担，并且加重了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要在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一切方面，加速准备，配合盟军的反攻，与盟军协同动作，驱逐日寇出中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目前，要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必须先完成一个先决任务，即彻底粉碎日寇在中国战场上的救死攻势，这是中国面前最迫切的最紧急的任务。

中国能不能担负起配合盟军实行对日反攻的任务？怎样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看一看今天中国的内部形势。关于中国的内部形势，由于七年来战局的推移，整个中国战场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种划分，从抗战之初就开始了，到现在，这两大战场的差别是愈加明显了。现在是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

敌后战场，七年来无日不在闻所未闻的艰难困苦中奋斗，既无国外的援助，复断国内的接济。武汉失守以后，敌人对正面战场采取诱降政策，集其绝大部分的兵力回师敌后，采取种种毒辣险狠的手段，例如“治安强化”、“治安肃正”、“反复扫荡”、“铁壁合围”、“三光政策”、“无人区”等等，花样繁多，不胜枚举，企图完全摧毁敌后战场。但是，由于敌后军民对于保卫祖国战

争的无限忠诚及艰苦卓绝的奋斗，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远见的领导及正确切合的政策，由于民主政治的贯彻施行与敌后各阶级的团结合作，终于在长期苦战中粉碎了敌人的种种狠毒手段，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站稳了脚跟，以致今日三大战场——华北、华中、华南——不仅依然雄峙敌后，而且发展了，壮大了。现在敌后战场已经拥有八千六百余万人口，二百一十多万民兵，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非但没有退却，而且早已经转入了战役的进攻。今年上半年，在进攻的作战中已经攻克了二十四个城市，克复了一万三千余个据点。虽然越接近胜利，战争将越艰苦，敌后战场的军民及其领导人员决不能粗心大意，自骄自满，决不能忽视将来的极大困难环境，而不作思想上、物质上与组织上的准备；但是敌后战场的坚持与发展已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已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所以，就敌后战场而论，配合盟军反攻日寇的任务是能够担负起来的，而且现在已经在积极准备着。

敌后的共产党员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们！敌后的男女同胞们！你们的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荣耀，你们的光辉成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现在你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了，配合盟军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的任务落在你们肩上了，勇敢地担负起这个任务来！敌后的男女同胞们！加强你们的团结，把一切阶层的人民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贯彻中共中央的十大政策，加紧训练主力军与游击队，扩大民兵与武装工作队；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工作，使全体军民亲密结合起来；澈底减租减息，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与运输业，普遍地发展各界人民联合起来自己经营的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公益事业的各互助组织与合作社组织，发展民办

官助的人民教育与人民文化事业；坚持三三制的政权工作，纠正其中过左过右的缺点，共产党员与各界领袖实行完美的民主合作；如此等等，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变成总反攻的前进基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们！继续积极作战，无情地歼灭敌人，加紧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把自己变为总反攻的先锋队！敌后的共产党员们！保卫人民，依靠人民，一分钟也不要脱离人民，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保证四项诺言，虚心学习，力戒骄傲，整顿三风，努力工作，完成人民先锋的责任。

所有这一切，便能保证敌后战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有能力配合同盟国与国内友军实行反攻。

至于正面战场，则情况完全不同，在极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在敌后战场牵制绝大多数敌伪军的条件下，至今还在节节败退，两个半月失去两个省会，五十余个县城，六十余万平方里国土。正面战场现在是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而且危机所波及的不限于军事领域，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亦均为危机所笼罩。论政治则由于专制独裁，以致民情壅闭，民怨沸腾，阶级间、民族间、党派间隔阂日深。论经济，则由于不正当的专卖统制，以致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生产凋敝，民生憔悴。论文化，则由于箝制封锁，以致正当舆论横遭压抑，反动复古势力日益嚣张。今日的大后方，实在是危机四伏，隐患堪虑。我们目睹空前有利的国际环境，朝气蓬勃的敌后战场，返顾正面战场与大后方此种情况，不得不深为抗战前途忧虑。我们继续大声呼吁，要求国民党当局，从速改弦更张，与民更始。

我们认为：今日大后方与正面战场一切问题之症结是在于民主问题与团结问题，一切危机之根源是在缺乏民主与团结不足。中国需要民主，各方面的民主：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

文化的，党务的……；中国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团结：民族间的、阶级间的、党派间的、国际间的。只有民主与团结，才能使抗战增强力量，才能使中国走上轨道，才能停止目前的敌人进攻，配合将来的全国反攻，也才能建立战后的国内和平合作与国际和平合作的正当关系，否则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共产党人坚持民主、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与保证四项诺言，七年如一日，始终不变。

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珍重七年合作抗战之成果，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改变旧有政策，克服危机，完成同盟国共同期望的神圣事业。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评此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九月六日开幕于重庆，十八日闭幕。这次国民参政会大会与历届历次大会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它表现了国民党寡头专制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误国政策之愤怒；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之互相倾轧和斗争，也揭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民主”伪装“民主”的卑鄙伎俩。

国民参政会此次大会开会于中国正面战场处在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时，继中原长沙衡阳三次败战之后，在开会期间，两星期内，日寇沿湘桂铁路从祁阳窜抵兴安前进五百八十华里，在湘粤桂三省失守了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全州、资源、高明、开平、鹤山、四会、新兴、肇庆、连〔廉〕江、怀集等十六县城，平均日失一城而有余。西南重镇桂林已极危殆。这种悲剧式的溃败，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之严重的愤懑。在政治上，国民党的统治也陷于深刻的危机中。在国内团结上，国共两党谈判虽已继续四个半月，但由于国民党之顽冥不化与缺乏诚意，而毫无结果；在国际上，由于消极观战与暗中反苏，以致国际声望一落千丈，国际舆论抨击日烈；虽置身盟国之林，而外交上却十分孤立，与参政会同时开会以决定进攻日寇之战略方针为主题的魁北克会议⁽¹⁾，中国竟至没有被邀参加。在经济上，则三月至七月物价高涨了两倍，达战前之四百倍至一千二百倍，以致士兵及公

教人员“待遇低微，饥寒交迫，骨形菜色，时有饿殍”。至工农大众的生活，更不必说了。在文化教育上，是“学生成绩低落，体力衰退，教师待遇菲薄，学校量增质减。”总之，由于国民党政府之误国政策——其具体体现，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的结果，国民党中国目前所遭遇的严重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是谁也看得见，谁也无从掩饰的了！

这种严重的危机，不能不在国民参政会上得到某种反映。虽然，国民参政会历来是国民党党员占绝对多数，非国民党参政员少到几乎连提案都提不出的程度，虽然蒋介石氏在参政会开幕之日讲话中，粉饰太平，轻浮乐观，企图以武断词句抹煞严重危机，和以充满杀气的寡头统一论封住参政员的口，但是他并没有成功。老参政员林虎氏给了他当头一棒，痛斥轻率乐观论，号召“发奋振作，痛涤旧污，革除积弊”，要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氏“万不可专靠同盟国胜利做胜利，致贻我中华民族之羞”。接着在政府各部长报告，参政员纷纷质问，问题之多，辞气之严，为历届所未见。尤其集中于对豫湘败战，通货膨胀，贪污舞弊，钳制舆论，反动教育诸项上。更于政府报告期中，提出临时动议“请财政军政两部将改善官兵及公教人员待遇之具体办法，提交本会讨论案”，猛烈攻击何应钦、孔祥熙。至审议提案时，政府交议之“三十四年度国家施政方针”一案，参政员严厉批评其空洞不切实际。黄炎培氏称之为“一篇空洞之策论”。许多参政员均要求参政会有决定国家预算之权。施政方针案实际上是被参政会拒绝了。其后国内政治上之最重要问题：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由王云五、胡霖两参政员之要求，由中共代表林祖涵同志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参政会上作了报告，并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在参政员的许多提案中，又特别通过了“加强中苏合作”一案。所

有这些质问，讨论，以及国共关系，在会上公开提出，是部分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怒，对于要求加强全国团结改善国共关系的热忱，要求民主自由权利的热望，要求加强与盟国，尤其是与苏联合作的殷切。

但是，正因为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的“国民”参政会，而不是真正的“战时的民意机关”和“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所以它只能部分地反映民意，而决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例如在本届大会上，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公意的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虽然由中共代表提出来了，但是由于国民党之阻挠，甚至没有在会议上郑重讨论。这就足以揭露国民党及蒋介石氏企图把国民参政会粉饰为“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是何等虚伪和无聊。

其次，本届大会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危机之深刻化，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各派别之间的倾轧与斗争，也尖锐化了。本届大会对政府批评质问之热烈，除了反映人民之不满外，也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每一派，都想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尤其CC团，利用其在参政会中的人数众多，展开了对何应钦、孔祥熙之攻击。声名狼藉的CC分子黄宇人，领衔提出：“请财政军政两部将改善官兵待遇具体办法提交本会讨论案”及“限制财政部长不得兼任银行董事长及总裁”案，就充分暴露CC的企图。而对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质问达四十六点之多，足见国民党内其他派别与集团对CC的反攻。CC分子又在会议上攻击败战将军汤恩伯，要求枪毙他，蒋介石则极力庇护汤恩伯，反映了CC团与复兴社冲突的表面化。所有这些实在是对于高唱寡头统一论的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一种无情的讽刺，寡头统一非但

统一不了全民族，而且也统一不了他们自己的党与派。

更值得注意与重视的，是国民党及蒋介石应付这次参政会的卑鄙手腕。开会之初，国民党是想以骗与压的方法来驯服参政会，甚至使参政会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开幕时蒋介石之演说，足以表明此点。他一方面高唱敌人无害论，一面在狂呼寡头统一论。但是危机是如此严重，愤怒是如此激昂，蒋的演说遭到林虎氏的痛驳及其他参政员不出席的抗议。而粉饰太平的各部长的报告，受到猛烈的非难。许多腐败现象，终于因无可掩饰而暴露了出来。国共关系问题，被迫地不能不提交大会。这时候，国民党便决心伪装民主，以破坏民主。它怂恿其党徒跟在公正人士之后去“揭露”若干尽人皆知的腐败情形，提出若干词严意宽的质问，它发表修正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表示“扩大”名额，“扩大”职权。它命令其机关通讯社对大会经过大肆渲染，描画得好象真的是“议会”一样。最后，蒋介石复于闭会前夜去讲话，承认“中国战场……处在最艰危的时期”，恭维参政会为“战时民意机关”，“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空口允许“考虑提早结束训政”之类。凡此一切，都是国民党伪装民主以破坏民主的手法。其目的是在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国民党今天开始实行民主政治了，以为经过国民参政会就可以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了，而不需要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的寡头统治，立即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立即建立普选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

但是，伪装终究只是伪装，偶一不慎，就会暴露狐狸尾巴的。在大唱其放宽言论、保障人权的呼声中，林祖涵同志在参政会的报告，被中央社妄加窜改，面目全非。十六日《新华日报》发表的林同志报告提纲，又被删得七零八落。外国记者关于桂林危急的消息，依然被扣。叶挺、廖承志及无数爱国志士，依然关在

牢里。非法逮捕，依然层出不穷。尤其重要的，是依然高唱寡头统一，并且以这种寡头统一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依然要以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失败主义的军令去“统一”一切。拆穿了这个伪装之后，所余者仍旧是那个“应万变”的“不变”，即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保持寡头专制统治及其一切法西斯主义的“政令”与失败主义的“军令”。

我们要正告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伪装、欺骗即使一时能蒙蔽若干人，但是决不能挽救今日的危局的。更何况正如胡参政员霖所说：“抗战以来，一般老百姓智识程度增加很多，所以老百姓也不是可以欺骗的，不是理论与空洞好听的话可以欺骗的，一定要看事实根据”。“不变应万变”，固然不行，“万变保不变”，亦一样不行。现在需要澈底的一变，即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具体办法，就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紧急国事会议，澈底改组政府及统帅部，以民主的新政策代替独裁的老政策，以民主的积极抗战的新人物代替那些反动的失败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老人物。这个问题，已经在此次国参会上提出来了。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历史的发展将必然会解决和实现这个提案的，因为这是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愿国民党人及蒋介石氏有以善处之。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 〔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率领双方最高级军、政人员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会议。1943年8月14日至24日曾召开一次。这里指1944年9月11日至16日召开的会议。

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

(载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

一九四四年过去了。今年是敌后战场主动向敌进攻的一年，是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正面战场到处被动挨打，失败的一年。一年来，敌人在正面得到了某些胜利，而在敌后却遭受了我军一连串的严重打击。

现在，当我们来总结今年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向英勇善战的敌后军民，致胜利的敬礼。

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华北，华中，华南)，远在今春，当敌人开始调整防务，集中机动兵力，准备在中国战场有所动作的时候，我军对敌的主动攻势亦就开始了。四月及其以后，敌人向正面进攻了。为了配合正面作战，敌后我军，在“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指导之下，对敌主动出击与战役攻势，亦就更加猛烈的展开。这种主动攻势的普遍性与连续性，可以说是空前的。从时间上说，是由春季到冬季，贯串着全年，从空间上说，是由华北到华南，普遍于敌后战场的各个地区。

我们先拿主要的战役攻势与胜利来说吧。

华北战场，首先是山东区罗荣桓部。在鲁中区，三月至四月发动第三次讨伪吴逆化文战役，击灭伪军十三个团七千余人，攻克据点四十一处，寨子五十一个，恢复国土一万二千平方华里，村庄千余，解放同胞三十万。由于这一胜利，恢复了鲁山区，打通了沂山与泰山的连系，并使山东的主要山区完全为我

控制。八月中旬，该区又发动沂水战役，歼敌一个小队，俘日军二十一名，俘伪军八百余，收复沂水县城，光复国土三千五百余平方华里，村庄三百五十余个。由于这一胜利，巩固了鲁中山区，打断了敌人分割我山东根据地为两半的台潍公路。十一月二十日，发动冬季战役攻势，直逼胶济、津浦两铁路，前后经过三个阶段，于十二月十一日结束，计攻克迫退敌伪据点三十余处，解放国土二千八百余平方华里，村庄六二四处，人口二十四万四千余人，打通了徂徕山、莲花山两根据地的连系。

在滨海区，七月下旬，发动诸胶边攻势，给伪李逆永平部以歼灭性的打击，攻克据点三十八处，炮楼三百余座，光复国土百余平方华里。由于这一胜利，使滨海与胶东两区连系打通。十一月，该区又在沿莒临公路长达一百四十里的战线上发动战役攻势，收复了莒县县城，克据点十六处，碉堡五十余个，俘敌教官顾问等十名，光复国土七千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三十万，投敌几年的国民党六十九军独立旅旅长莫正民，率领三十个中队，三千五百人，起义反正投入我军。滨海与鲁中两个根据地，和山东主要山区，完全联成了一片。

在渤海区，七月至九月，对敌发动秋季攻势，收复利津、乐陵、临邑、南皮等四个县城，攻克据点二百八十余处，歼灭敌伪一万二千余名，光复国土四万五千五百平方华里，解放同胞四百余万，伪军王道率部两千投入我军。由于这一胜利，过去敌情最严重、分散坚持的小块游击区，转为有大块根据地，予天津、德州、济南之敌更大威胁。

在胶东区，八月至九月，对敌发动一个月的连续攻势，收复荣成、文登两个县城，攻克据点二百余处，碉堡六百余座，光复国土两万余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一百四十余万，荣成、文登两个

县城的伪军七个中队光荣反正。由于这一胜利，威海卫刘公岛两处伪海军七百余入随后反正，投入我军，并使胶东半岛绝大部分为我控制，使该区四个分区连成一片，予烟台、青岛之敌以严重威胁，并为将来盟国在中国登陆准备下有利的条件。

在鲁南区，我军对敌伪展开夏秋两季军事、政治的全面攻势，消灭敌伪一万七千人，攻克该区所有敌寇据点百分之七十，伪军据点百分之八十，解放国土两万平方华里，人民一百四十万。由于这一胜利，鲁中鲁南两区联成一片。

第二是晋察冀区聂荣臻部。一年来连续不断对敌出击，一月攻入卢龙，二月攻入宁城、昌黎，三月攻入赵县、晋县，四月攻入博野，五月攻入任丘、安新，六月攻入定襄、涞源、河间、获鹿、灵丘、徐水，七月攻入大城、易县、蔚县，八月攻入雄县、沧县，九月攻入深泽、饶阳，十月攻入献县、平谷、安平，并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肃宁、武强等城，拔敌据点千五百余个，恢复村庄五千余。由于这一胜利，冀中平原地区恢复到百团大战以前的局面。在北岳区，将敌人第一线碉堡摧毁，并将敌人向后挤退了一步。在冀热辽边区，则将游击战争的烽火，燃烧到了伪满境内。

第三是晋冀鲁豫区刘伯承部。在太行与太岳区，三月收复榆社，四月收复林县、沁水，二月攻入太谷、武乡，五月攻入陵川、左权，七月攻入阳城，八月攻入和顺，十一月攻入元氏，六月至九月在豫北黄河北岸地区连续发动三次对敌攻势，攻克据点三十六处，歼灭敌伪八百余，光复国土九千余平方华里，解放同胞十万五千，黄河北岸大小十股伪军千三百余自动反正投入我军，济源、垣曲地区完全为我控制。

在冀鲁豫区，我军二月攻入沙河、朝城，五月收复内黄、丘

县，五月下旬乘敌冀南道召集十三县干部于清丰举行会议时，一举攻入了清丰城，将伪冀南道尹薛兴甫及所有十三个伪县长、顾问、警备队长、新民会长等一齐活捉，并俘敌伪千余。七月收复莘县，八月上旬，更在汶上至鄄城二百余里战线上，对伪刘逆本功部发动攻势，攻克据点三十七处，光复国土二千平方华里，村庄六百余，解放同胞三十万。十一月收复濮阳、寿张两城，并再度收复莘县，十二月攻入尧山。据不完全的统计，该区今年共攻克据点碉堡千余个，收复县城七个，解放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华里，人口五百余万。该区至今已控制着十一个县城，鲁西南与鲁西根据地亦已联成一片。

第四，晋绥区吕正操部，四月攻入方山，五月攻入静乐，六月攻入离石，十月攻入宁武，九月中旬发动秋季攻势，攻入山西敌人控制汾河西岸地区之战略要点汾阳城，焚毁其飞机场、电灯公司、火柴公司、及火车站等，同时并将敌人分割我三、八分区之离岚路截成数段，我三、八分区已连成一片。

华中战场，首先是新四军第一师粟裕部，三月初发动车桥战役，经过三天激战，歼敌一个大队，伪军千余，俘日军四十八名，并击毙敌大队长，占领车桥等十余个重要据点，光复国土一万平方华里，由于这一胜利，使新四军一、三两师根据地连成一片。

第二是苏北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二月攻入涟水，三月至七月在淮海地区对敌伪连续发动两个月的攻势，攻克据点三十余处，歼灭伪军一个旅，五月在盐阜区发动攻势，攻克连云港南侧的重要港口陈家港，开辟了灌河沿岸地区的工作，六月挥军南下，向射阳河以南进军，消灭伪海防军一个纵队，十月又攻克合德等重要据点，十一月攻入阜宁。这些胜利，粉碎了敌人对苏

北地区的分割，使该区向四周得到发展；打通了苏北地区本身的联系，开展了继续发展的有利局势。

第三是淮北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三月至七月对敌伪发动三个半月军事、政治联合攻势，击灭伪淮海省郝逆鹏举主力，攻克据点八十处，解放人民三十余万，洪泽湖北岸地区完全为我控制。

第四是苏南区，王必成部，八月至十月两度发动苏浙边对敌攻势，攻入长兴、溧阳、溧水等三个县城，予伪一方面军任逆援道主力以严重打击，攻克据点二十六处，光复国土三千平方华里。这一胜利，使该区由过去分散坚持的小块游击区，转为大块根据地，并控制了太湖西南地区，打通了与浙东连成一片的前进道路，给南京、苏州、杭州之敌以更大威胁。

此外，如湘、鄂、皖、豫、浙东、皖中、淮南等区我军，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共军几次进攻与牵制的影响，亦同样不断主动出击，获得许多胜利。

华南战场，我东江游击纵队，虽在国民党反共军香翰屏部不断进攻与牵制之下，但仍然连续对敌出击，不断破袭广九铁路，攻入平湖、常平、深埗、天堂围、林村、樟木头、土堂、横沥等车站，逼近广州市郊，大量消灭敌伪，有力的牵制了敌人向粤北的进攻。

根据一年不完全的统计，一年来我军对敌大小战斗两万余次，毙伤敌伪二十二万余名，俘获敌伪六万余名，争取敌伪反正将近三万，缴获各种炮百余门，轻重机枪千二百挺，步枪八万余支，收复县城十六个，攻入县城四十七个，克复据点碉堡五千余处，光复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千二百万。

由于我们的胜利，首先是大量消耗和牵制了敌人，除了一年

来我们消灭了将近三十万敌伪人力与装备外，至今我们仍然把敌人在华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拖住，使其不能到正面去，这就有力的配合了正面作战，同时也有利于盟国在太平洋上的反攻。

第二，由于我们的胜利，将敌人几年来苦心修筑用以分割、封锁、蚕食我各个解放区的许多据点、碉堡、公路、沟墙、封锁线等打得粉碎，逼使敌人的占领区逐渐缩小，将敌人向后压退一步，并使其处于被动地位。而我们的解放区，不仅扩大了，而且把许多地区的连络打通，这就打开了敌后我军继续争取更大胜利的有利局面。

第三，由于我们的胜利，不仅更加锻炼与巩固了我们的原有力量，而且得到新的发展。由于一年来斗争胜利的结果，我们的正规军，由过去的四十七万，增加到现在的六十五万，民兵由二百万增加到二百二十万，解放区的人口由过去的八千万增加到现在的九千二百万，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反攻力量。

从今年的攻势胜利中，尤其从攻克许多县城、据点、碉堡的战斗中，证明了我军战斗力的增长。虽然我军的装备十分低劣，但是我们能够攻克许多有坚固设防的县城、据点、碉堡，假如我们一旦得到盟军新式装备的话，我们是一定能够担负起最后反攻与驱逐敌人的任务的。

一年来的敌后战场，给了敌人以如此重大的打击，与获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正面战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正面，由于三次被动挨打战役，与节节失败的结果，不仅损失了五六十万兵力，而且失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等四个省城，及郑州、许昌、衡阳、宝庆、零陵、全州、梧州、柳州、南宁等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丢掉了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

国土，失掉了六千多万人民，以及失掉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七个空军基地，及三十六个飞机场，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各省无数物质资源。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年来的敌后与正面，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一个是前进，一个是后退，一个是胜利，一个是失败，一个是增强，一个是削弱。很显然的，如果没有敌后战场过去几年的坚持，如果没有敌后战场对于敌人的不断打击，牵制与消耗，如果没有敌后战场对于正面的配合与援助，则正面战场的情形更不知严重到什么程度，连中国战场的存在都会成问题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敌后战场，则反攻日寇更不知道要困难到何种程度，甚至成为不可能。

在敌后，不但有敌人在华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重大压力，而且有敌人几年来对于我们的分割、封锁、蚕食与“扫荡”，而我军的装备又极低劣，所处环境，较之正面困难百倍，但为什么敌后战场却能获得那样的胜利呢？

有人说，今年敌后战场的胜利，是由于敌人减少而得来的。我们应当肯定的答复，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乎事实的。今年以来，敌后战场敌人的兵力并没有减少，虽然调走了几个老部队，但是又填补了新部队，而且由于我军到处主动出击，与连续发动攻势，引起了敌人对我们比往年更加注意。如今年以来敌人对我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一百六十余次，使用兵力则在四十余万，其对我“扫荡”的次数，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除了对我不断的报复“扫荡”以外，还采取了许多办法，如加强守备攻势，放弃某些次要据点，集中机动兵力，编整新的兵团，调整伪军，加强特务活动，组织特别警备队、“剿共”突击队，经常对我实行奔袭合

击。华北敌酋冈村，在其去职时，还在狂叫“击灭中共武力为当前之急务”。由此可以证明，今年以来，敌人对敌后战场是并没有放松的。

我们的胜利之所以获得，首先是由于去冬今春在各个根据地普遍实行了我党的各种正确政策，尤其是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运动，进一步发动提高了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普遍实行了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进一步改善了军政民的关系，使整个根据地的军政民更加亲密团结一致，此外，还普遍实行了生产运动，保证了军民的衣食自给，这就使今年我们在对敌斗争上更加一致与有力。

其次，是由于敌后各根据地军民，经过了过去几年，尤其是最近两年艰苦斗争的锻炼，那时我们曾经咬紧了牙关，坚持了斗争，取得了许多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从艰苦斗争中克服了自己的许多缺点，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摸熟了敌人的规律，提高了部队的战术，尤其是团结了根据地的各种力量，这就打下了今年展开斗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基础。

第三，是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了“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并由于我军作战指挥上的灵活机动，与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是不顾一切流血牺牲的。一年来，我们一万五千余民族英雄牺牲了，三万余战斗英雄负伤了。我们的胜利，正是由于这许多牺牲流血的代价所换来的。

第四，由于二百多万民兵战斗力的提高，与整个根据地广大人民的参战。仅以山东区胶东的民兵来说，在今年夏季攻势中，就有五万民兵参加作战，拆毁据点、碉堡七百座，他们不仅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且能够单独作战。至于广大民众的参战，当

我军发动对敌战役攻势时，差不多每次都有成千成万的群众，帮助我军侦查、警戒、带路、送信以及参加破路、拆毁据点、碉堡、工事，帮助救护伤兵，输运胜利品，送水、送饭，以及慰劳部队等等。

今年，我们给了敌人最严重的打击，获得了不小的胜利，并且，由于希特勒的快要垮台，与盟军在太平洋上的积极反攻，敌人的死亡与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更加接近了。明年整个战争形势，将比今年更加有利。但是，敌后敌优我劣的军事形势，仍然没有改变，而且，由于今年我军的积极进攻，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敌人对我们是更加注意了。因此，我们不能有任何的骄傲，而且还应当更加努力，准备迎接敌人的报复，准备打击敌人垂死前的挣扎，准备迎接最后反攻胜利的到来。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